

严耕望 著

治史三书

治史经验谈

治史答问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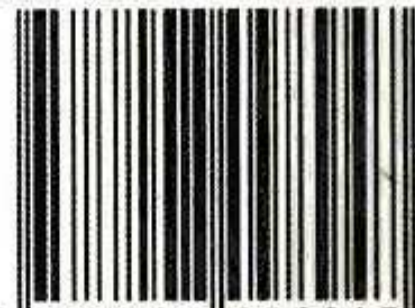
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尤其是史学，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能做到：

工作随时努力，
生活随遇而安。

——严耕望

上架建议：历史学

ISBN 978-7-208-09894-7



9 787208 098947 >

定价：36.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文景网：www.wenjingbook.com

严耕望著

治史三书

治史经验谈

治史答问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治史三书/严耕望著. — 2 版,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09894-7

I. ①治… II. ①严… III. ①史学—研究方法 IV. ①K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288 号

责任编辑 何晓涛
封面设计 肖晋兴



治史三书
严耕望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249,000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2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894-7/K · 1763
定价 36.00 元

工作隨時努力

生活隨遇而安

心毅耕望

目 录

治史经验谈

序言 / 3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 6

- (一) 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 6
- (二) 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 12
- (三) 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 15
- (四) 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 17
- (五) 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 21
- (六) 其他几点意见 / 23

二 几条具体规律 / 25

- (一) 尽量少说否定话 / 25
- (二) 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 29
- (三) 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 33
- (四) 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

2 治史三书

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 35

(五) 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 但须得

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 / 40

(六) 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 42

(七) 不要轻易改字 / 44

三 论题选择 / 47

(一) 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 47

(二) 问题的实用性 / 49

(三) 大问题与小问题 / 51

(四) 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 / 55

(五) 检查论著目录 / 57

四 论著标准 / 60

五 论文体式 / 65

(一) 常行体 / 65

(二) 纲目体 / 66

(三) 纲目变体 / 70

(四) 复合体 / 71

六 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 74

(一) 引用材料方式 / 74

(二) 注释方式 / 77

七 论文撰写与改订 / 81

八 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 85

(一) 立志与计划 / 87

(二) 工作要诀 / 90

九 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 99

(一) 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 100

- (二) 一心力、惜时光 / 102
- (三) 淡名利、避权位 / 103
- (四) 坚定力、戒浮躁 / 105
- (五) 开阔胸襟 / 106
- (六) 慎戒执著 / 107

治史答问

序言一 / 113

序言二 / 114

- 一 我研究历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 115
- 二 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代的课外阅读 / 117
- 三 我对于政治制度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 122
- 四 我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 124
- 五 我的研究重心何以放在唐代 / 127
- 六 我对于上古史与考古学的兴趣 / 129
- 七 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 / 131
- 八 我对于唐诗史料的利用 / 134
- 九 我今后的撰述计划 / 139
- 十 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 / 141
- 十一 研究中国史不必要从中文入手 / 142
- 十二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 145
- 十三 “无孔不入”、“有缝必弥” / 148
- 十四 目录学与校勘学 / 160
- 十五 年龄与撰述 / 164
- 十六 前进与落伍 / 166
- 十七 史学二陈 / 169
- 十八 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 176
- 十九 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 182

4 治史三书

二十 我购藏书刊的原则 / 186

二十一 我对于中国通史讲授的几点意见 / 190

附录一 严耕望先生访问记（黄宽重） / 196

附录二 《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 203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序言 / 215

上篇 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 217

下篇 从师问学六十年 / 235

附录一 我与两位王校长 / 283

附录二 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 290

附录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 294

——敬悼严耕望学长（余英时）

治史经验谈

序 言

我对于历史发生兴趣，当追溯到高中读书时代听李师则纲的一次讲演，题目大意是“历史演进的因素”，同时又读到梁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后来也读了些西方学者史学方法论之类的编译本，所以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不过当我在中国历史方面工作了几十年之后，总觉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讲方法，但绝不应遵循一项固定的方法与技术。只要对于逻辑学有一些基本观念，如能对于数学有较好的训练尤佳，因为数学是训练思考推理的最佳方法，而任何学问总不外是个“理”字。此外就是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然后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彼此不必相同。至于方法理论，不妨让一些专家去讲，成为一项专门之学，但实际从事历史事实探讨的人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过拘守。太过拘守，就太呆板，容易走上僵化的死路上去；或者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多大用处。

大约是一九七四年冬，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邀我作一次讲演，内容希能与史学方法有关。我既不太讲究方法论，对于此项邀约自然不很感兴趣，但辞不获已，只得就自己治史经验作简略报告。为欲使诸生能实有受益，所以先写纲要，油印为讲义。纲要分上下两节，上节谈几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下节谈几条具体规律。后来又就此类问题在我所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班上谈过一两次。一九七六年七月应《中国学人》编者之约，就讲义上节，草成《治史

《经验谈》上篇，在该刊第六期发表。明年续成下篇，以该刊久未出版，而半篇论文未便改投他处，所以迄未刊行。

自上篇发表以来，颇受一些青年读者的重视，促能多写一些此类文字，乃想就平日与诸生闲谈中涉及有关治史经验诸问题而为前两篇所未论及者，续为写出，对于青年史学工作者或有一点用处。今年七月初，自美国游罢归来，趁未开始研究工作之前，一口气写成《论题选择》以下七篇，并就旧稿续作改订，分别为篇，与新作合编为一小册，仍题曰《治史经验谈》。回忆杨联陞兄一次来港，闲谈中谓我对于后辈青年当有较大责任。此语对于这本小册的写作，可能也有催生作用。朋友相勉，特以识之。

这本小册，只是我就所想得到的若干问题，随意漫谈，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体验，个人方法而已。综合这九篇文章，扼要言之，不外下列几点。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楔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最后一篇特措意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要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此实为学术成就的最基本条件。至于探索问题的技术，则本编甚少涉及。因为技术细节，很难具体言之。大约论题若能以述证方式，排比材料，即可达成结论者，较易为功。若是无直接有力证据，必须深一层辩论证实者，即要委蛇曲折，剖析入微，无孔不入（此谓攻，谓建立一项论点，非必攻击别人论点），有缝必弥（此谓守），务期自己论点能站得稳，无懈可击。这就要随宜运用匠心，解决问题，但很难归纳出几条方式，具体扼要言之，

所以也很难以笔墨相传授，目今讲坛一般教学方式也很难传授。只有古人学徒方式，学生即在身边，遇有使用细致技巧处，随时指授，较易见功。但此种学徒式之教育方式已成过去，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技术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庶能体会。若都只匆匆翻阅，一目十行，只能认识作者论点，至于研究技巧，曲折入微处，恐将毫无所获！我在中文大学研究院“中古史研究”课堂上，常提出研作较精之论著，就其探讨入微处，为诸生讲解，立意即在帮助青年揣摩他人精品的研作技巧，以为他们工作之一助。但亦惟程度较高，好学深思者，能欣赏，有受益，一般青年似仍少领会！好在一般论题只用述证方式已可解决，必须深入曲折辩论者究占少数。而且现今写论文，能深入曲折辩论者已较少，能欣赏的人也不多，盖学风日下，率就浅易，此如歌唱，时代曲流行，京剧演员吃力不讨好，因此我也不想花太多功夫在此等处多费笔墨！

近五六十年以来，中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朗若月星；燭火之光，何足自道！但念近代史学巨子多半天分极高，或且家学渊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后来学子可能自叹不如，不免自弃。我的成就虽极有限，但天赋亦极微薄，一切迟钝不敏，记忆力尤坏，幼年读书，三两百字短文亦难熟诵。老妻曰，无聪明，有智慧，这话适可解嘲！相信当今能入大学受教育的青年，论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举我小成之经验与生活修养之薪向以相告，或能有一点鼓励作用！所以毅然违背我一向做人原则，不揣浅陋，不避自伐之嫌，将自己的工作经验献给青年史学工作者，是否有当，实际有用，在所不计！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序于香港沙田吐
露港西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十月二十日增订再稿于九龙塘狮子山下霞
明阁寓所；八〇年四月十五日三稿毕功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我在序言中已说过，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些大原则大方向。我觉得治史学有几条应注意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也有一些应注意的较具体的规律。兹先就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一) 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专精与博通两个概念当为一般人所知，不必说，但尤着重“精”与“通”两字。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治学要能专精，才能有成绩表现，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学愈来愈走上专精之路，要成为一个专家。虽然最近已注意到科际的研究，但过分重视专精的观念仍然未改。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

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种专史，同时

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先讲旁通，要想真正旁通各种社会科学，虽然断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对各方面有一点皮毛知识，有一点总比毫无所知的好。现在时髦的看法，要以社会科学的观点研究历史，于是各种社会科学家都强调自己的立场，以为研究历史非用我的方法理论不可。记得前年台湾有些史学家与一些社会科学家开过一次联席会议，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经济学者、统计学者、心理学者等等，就各人强调自己的方法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法宝。当时有一位历史学者说，这样讲来，我们历史学者就无用武之余地了！其实各方面的意见都有问题。治史有考史、论史与撰史的不同，而相辅为用。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然后才能作综合的撰述工作。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论史最有用，对于考史撰史的用处比较少，社会科学家要越俎代庖，也只能做部分的论史工作，考史撰史还是非全部由史学家做不可！至于各种社会科学对研究历史都有帮助，那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各有局限性，不是随时都可用得上。几年前有一位颇有名的史学界朋友，告诉我：“要用统计法治史。”这话本不错，但史学问题哪都是统计法所能解决的！其实我最喜欢用统计法。三十多年前，我研究汉代地方官吏的升迁，就是用的统计法，根据统计数字，作成升迁图^[1]，在那时可谓是极新的方法了。但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现在我写《国史人文地理稿》，也喜欢用统计法，还特别搜购了一部《地理统计学》来看。那里面所讲的方法非常好，但历史已过去了，很少如意的资料让我统计！所以方法虽好，但材料不允许，用不上，奈何！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治史学，也

[1]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十章《任迁途径》。

同样都有局限性。有些人从政治学的观点批评政治史学家的成绩，从经济学的观点批评经济史学家的成绩，从社会学的观点批评社会史学家的成绩，总觉得不好，那都是不切实际的苛责。他们忽略了历史已成过去，人家那种成就也许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哪有社会科学家研究目前的人类社会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与方法去作调查，材料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样方便！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有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对于研究历史实有极大用处。就以我的经验言：我在高中读书时代写了一篇《尧舜禅让问题研究》，我认为尧舜禅让只是部落酋长的选举制，这就是从人类学家莫尔甘（L. H. Morgan, 1818—1881）所写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悟出来的。儒家不了解当时实情，比照后代传子制看来，尧舜之事自是公天下的禅让，这是美化了尧舜故事。等到曹丕篡夺汉献帝的君位，但表面上仍要汉献帝写一张最后诏书，说是把天下让给姓曹的，所以曹丕就想到“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舜之代尧，禹之代舜，也只是和他自己一样的篡位而已，这又把尧舜故事丑化了。但我若没有一点人类学知识，就极可能不能悟到这一点。又例如我撰《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1]，说明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职权地位之不同，以及两类机关的关系。按唐代六部与九寺诸监的职权似乎很混乱，一千多年来都搞不清楚而有误解。我详征史料作一番新解释，说六部是政务机关，六部尚书是政务官，九寺诸监是事务机关，他的长官是事务官，这两类机关有下行上承的关系。如此一来，各方面看来很不合理的现象都变成合理了，这也是从近代行政学的观念入手的。举此两例，可见社会科学对于历史研究有多少重要。但社会科学的科别也极多，每一种学科都日新月异，一个历史学者要想精通各种

[1] 《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初稿刊《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四本（一九五三年），改订稿刊《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一九六九年）。

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纵不能运用，也有利于自己态度的趋向开明！

至于历史本身的博通，更为重要。但这是本身问题，要博通比较容易。本身博通的重要性可从两方面讲。第一是消极的，可使你做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不闹笑话。我举两个例如下：

其一，法国藏敦煌文书第 3016 号纸背云：

天兴(?) 七年十一月，于阗回礼使、内亲从都头、前高昌令、御史大夫、检校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索全状文。

日本有一位敦煌学专家屡次提到此条，以为北魏道武帝天兴（他释为天兴）七年（西元四〇四），当为敦煌文书之最古者。其实大误。我们只看索全的官衔，马上就可知道这一文件不可能早过晚唐，可能是五代时期的。何以见得？上柱国的勋名创自北周，朝廷中几个功勋最高的大功臣，始能蒙赐，知此文件绝不能早在北周之前。以一个县令拥有“御史大夫、校检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的头衔，那就不会早过安史之乱。又有“回礼使、内亲从都头”的衔名，那就不会早过晚唐，所以至少“天兴”二字当有一个模糊不清，他误释为“天兴”了。其实这些官衔，在两《唐书》、《五代史》中常常见到，都在安史乱后，尤其晚唐以后，安史乱前是绝不一见的，所以不必是讲制度史的人始能知道。那位先生研究敦煌文书，就该对于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历史各方面都有相当了解，然而他事实上只在敦煌文书那一小点上去钻，所以出此大错！

其二，《通鉴》一九九永徽二年纪有一条：

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

有一位研究府兵制度的专家，引此条作解云，“府兵是指这几个都督府的兵”，又云“此时诸州多置都督府，府兵即指州都督府的兵”。按至少“这几个都督府的兵”绝误。因为《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各州置都督府的经过极详，秦州此时置都督府，成岐雍三州根本不是都督府。解释此句，“的”字应放在“府”字之前，不应放在“府”字之后，也就是说发这四州的府兵，不是发这四州都督府的兵。他是位讲府兵制度的专家，这条史料中的“府兵”正是他所要讲的，但却未读懂！其原因就出在只求专精，讲府兵制度，而忽略了其他制度！又不肯勤于查书。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写专门论著时要勤于检书，凡说一句话，没有把握，就得去查，不可信口开河！

能博通不但可避免不应有的错误，而且在积极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也举两个例子如下：

其一，秦国之能统一天下，过去学人的解释，总不外秦国政治改革成功，外交运用成功，加以地势优良，进可攻退可守。四五十年前又从时代思想方面作解，以为当时大一统观念已形成，一般人民已无宗国之见，为秦国统一排除了心理上的障碍。例如钱宾四师的《国史大纲》可为代表。这些讲法，都不错。但另外还有好多原因。例如若从当时各国地方经济社会民风的角度去看，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关东三晋民风较秦为弱，对于秦人极为畏惧，最东齐国民风又较三晋为怯弱。而就各国民间经济状况而言，秦国最贫穷，齐民最富庶，三晋也介乎两者之间。所以当时的情形是地方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但民风则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强悍。以富家怯弱子弟去当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致胜。所以秦国士卒虽赤膊上阵，但勇气百倍，东方士卒虽被精甲执利兵，但一遇上秦卒，内心就生怯意。况且秦国领有中国最佳的战马产区，所以骑兵特强。以悍卒乘壮马，如虎添翼，绝不是东方的怯弱步兵所能抵拒！只有赵国北境也产马，训练骑兵，所以战国后期能与秦国一抗的只有赵

国，当秦赵长平一战，赵国失败，丧师四十多万之后，东方各国就已精神崩溃了。这也是秦国能统一天下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但过去的人讲历史仅注意政治外交，根本忽略社会民风与战马的作用，自然就不能全盘了解这段历史背景了。讲到骑兵，我在此附带说一句，通观历代，凡是能控有今陕西中北部及甘肃地带的朝代，总能居于强势，凡是不能控有这一地区的，总是居于弱势，其故就在骑兵。因为骑兵在古代战争上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坦克机械化部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原子武器核子武器，以步兵对抗骑兵，总是失败的。

其二，南北朝时代，禅家很多，何以达摩一派独能发展成一大宗呢？又禅宗五祖弘忍以后，北宗先极盛于北方，后来何以北宗衰微，而慧能南宗能特盛呢？现在姑且只讲南北两宗盛衰之故！前人讲佛教史认为神秀北宗后来衰微，是因为他的大弟子义福普寂之后继无人。胡适之先生说，这是由于神会发动宗教革命把北宗打倒，并非因为北宗自己衰微。北宗被打倒了，南宗才代之而起^[1]。这两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试问北宗一时无高僧领导就立见衰运，神会在北方把北宗打倒了，何以神会自己荷泽宗一派的南宗也走上衰微的命运？而兴盛的南宗反而是远在江南本无很高地位的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两派的后代呢？我最先的解释是以地区经济的盛衰作背景。因为南北两宗盛衰的转捩点正在安史之乱时代。安史乱后，北方经济残破，南方经济渐渐发展繁荣起来，宗教不能没有经济力量来支持，北方残破不堪，有一个时期黄河中下游千里无人烟，这一带本为北宗兴盛的区域，经济状况如此，北宗岂有不衰之理？神会的荷泽宗也在北方，同样走上衰运，其故正相同。反过来，南方经济力量愈来愈强，老百姓乃至官府才有余力支持宗教，而这一带正

[1]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二《荷泽大师神会传》。

是南宗怀让与行思两系的盘据地，所以就有机会兴盛起来了！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讲义本来这样写了，当我上堂讲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觉得还可从民情风俗方面作进一步解释。那就是当时湘赣地区民间文化程度尚低，可说是文化落后地区，实际上也多蛮越之民，迷信风气极盛。南宗虽不是迷信的宗教，但他们那种讲“顿悟”的境界与传教的方式，多少有些神秘感，而又简而易从，最适合文化落后民风纯朴又具迷信的人民去信仰。所以怀让、行思两派南禅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兴盛起来。这一背景恐怕比南方经济繁荣更为重要！事实上，达摩禅初期在北方一筹莫展，后来二祖慧可传了三祖僧璨，僧璨住在大别山区，才慢慢发展起来，后来四祖五祖也就在大别山的边缘地带。大别山区在南北朝至唐代初期是蛮族聚居地，文化落后，易于接受禅宗的教义，所以达摩禅才能乘机发展起来！过去人讲佛教史只就佛教本身去讲，很少理会到当时历史的其他方面，更不说地方民情文化风尚了，所以根本想不到这一种极有意义的解释！

由以上所讲的消极的与积极的两方面看来，史学本身的博通对于史学专精的研究是如何的重要！

（二）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联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的差异。所以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如此类推。若是研究两个不相连贯的朝代，则中间那个朝代的重要性更为增加。下面举几个例证：

例一，唐代节度使制度。这个制度粗看起来是唐代所创的、所

独有的制度，其实它的结构形式及其他作用与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完全一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所以若能了解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对于了解唐代的节度使制度极有帮助。不幸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湮没不彰，任何书籍都无较详明的记载，致使唐代节度使制度迷惑了渊源！现在我把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详细考论出来了，若再研究唐代节度使制度，就能很清楚的追溯其渊源，了解到何以有这样一个形式与作用的制度了！

例二，市镇制度。现在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有镇。镇多半商业较繁荣，故又称为市镇。这是自宋代已是如此。但是宋代这种性质的市镇何以叫做镇？它是如何形成的？这就不但要上求之于唐代，还要上求之于魏晋南北朝！原来这种镇就是军镇，为军事而设，不是为商业或行政而设。最开始可能是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统治下，设军镇以期镇压，后来形成了北魏军镇制度。军队是专门消费不生产的，所以有些商贩来推销消费品。又因为军镇多设在交通要道，而且治安比较有保障，所以慢慢形成小的商业中心，也有很多人聚居其地。在唐代，军事性质还比较浓厚，到宋代就几乎完全失去军事意义而变成现在市镇的性质了。

例三，唐代滇越通道的路线问题。唐人记载这条路线本颇详。但沿途地名今皆难考，所以前人吴承志、伯希和（Pelliot）、方国瑜、向达等都认为唐代人所记的交通路线就是元明迄今的滇越交通主线，亦即沿红河（富良江）河谷而行，而且伯希和还指称唐前的滇越交通不可考。其实汉代的滇越交通路线，《水经注》记载得很明白，是沿叶榆水而行，即今盘龙江。唐代滇越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取红河水路，但唐人所记的详细行程则仍是汉代所行的水陆兼程的老路^[1]。

[1] 看《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与《唐代滇越通道辨》两文，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第一期，一九七六年。

这也是不了解前代就无法深入正确了解自己所专门研究的问题的好例证。

例四，唐代州府政府组织及用人方式与汉代州府组织及用人方式不同之故。隋唐州政府佐官曰参军，由中央任命，与汉代州政府佐吏曰从事，由州长官任用本州人的制度完全不同。前人都说州政府属官由中央任命，是隋文帝所创始。官员名称的不同，是不是也是由一个人所创始的呢？其实都不是。此种职称不同，任用方式不同，都当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求其答案。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一方面继承汉代旧制，另一方面又慢慢形成了一种新制，成为两个系统并存的现象。旧的一系官吏仍称为从事，由州长官任用本州人为之；新的一系官吏则称参军，由中央任命（可由长官推荐）。本来职权有别，但旧的一系慢慢失权，成为地方人士禄养之官，新的一系慢慢夺到全部权力。到隋文帝把无作用的旧的一系率性废掉，就是所谓废乡官，只留有实权的新的一系官吏，就是由中央任命的参军。所以隋文帝只是省废了一个无行政作用的制度，并未创立一个新制度^[1]。时人把这件事看做是他的集权手法，这完全是不了解实情的想像说法。这一事实大可作为研究两个不连接的时代就必须对中间一个时代有彻底了解的好例证。再者，隋文帝废乡官，前人以为废除汉代的乡官，即乡三老、有秩、嗇夫，这是更加错误了，皆由于不了解隋唐以前一个时代的缘故！

总之，这种事例太多了，这一个时代的事制几乎都要牵涉到上一个时代，不了解上一个时代如何可以？研究一个时代，若能对于下一个时代有相当了解，也很有帮助，当然没有上一个时代那样重要。我为此，也把《宋史》自头到尾，自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

[1] 参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第四节，第九〇一页。

当认真的看了一遍，以求对于宋代有个概括的认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对研究唐史有所帮助。

(三) 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一般人研究史学都是找一个范围狭小的问题作研究，美其名曰仄而深的研究，以为能仄，功力集中，所以能深，同时也能很快的出成绩，如此一个一个的研究，就能出很多的专精的成绩。其实不然。仄则仄矣，不一定能精，而出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至于说成绩出得快，那更是背道而驰！

历史很难作时间的割断，已为上述。作平面的划割，更不容易。因为时间前后固有关联，有影响，而同一时间的各项活动更彼此有关联有影响。所以研究问题不能太孤立，只在某一小点上做功夫。至少要注意到一个较大的平面，作“面”的研究。

我所谓作“面”的研究，就是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如此研究，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例如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这里面包括都督府建置问题，州府僚佐问题，郡县制度问题，北魏军镇问题，领民酋长问题，诸部护军问题，北周总管问题，还有其他较次要的种种问题。我为研究这个广阔的问题群，自然要将这个时代的重要书籍全部看一过，始能下笔。事后估计，连看书抄材料，到撰写完成，一共大约费了三年多四年的时间，把这一个广面所包函的各种问题都仔细的探讨过，完成一部可观的大书，而且对这一时代也有个全面认识了。假如我用一般人的方法研究其中一个问题，若想成绩好，也得把全部重要书籍统统看一遍，然后始能动笔，最少也得一年半时间。若再做其中的另一问题，又得把全部书籍翻看一遍，连撰述最少又要一年时间。如此下去，一个一个的做，所用

的时间一定比我一口气全面的做，要多得多！而每次看书只是翻查材料，对于整个时代也许还不能有一个全盘的认识，你想那一种方法好些呢？

再者，作全盘的广面的研究，容易发现材料彼此冲突，就可以即时纠正错误；材料彼此勾联，就可以相互补充。我的《唐仆尚丞郎表》便有极多这类好例子。因为各种职官有一定员额，搜集的史料，往往年月冲突，就能发现各种材料中必然有些是错误的，须得设法研究出来那些条是错的，那些条不误。若只研究某一个官职，或研究某一个人的经历，就不易发现材料有冲突，也不能发现某些材料有错误，因此也就跟着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第三册卷十二“辑考”四下，“户侍”王源中条，进承旨与迁兵侍事。传世重要史料脱讹颇多，非根据“户侍”、“兵侍”员额及其他人员的任迁参互辩证不可。尤可注意者，岑仲勉先生《翰林学士壁记注补》是一部极精审的著作，对于王源中的史料已作若干纠正，但他只研究翰林学士，不知当时其他居官户侍、兵侍者，所以仍不能尽发其覆。由此正见全面研究之大有好处，狭隘的研究往往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读者可仔细看该条“考证一”“考证二”，今不具引。

若是一个一个问题作点的研究，而这些问题有相互关联性还比较好。最忌上下古今，东一点，西一点，分散开来，作孤立的研究。例如这次研究上古的某一个政治史问题，第二次研究近代的某一个经济史问题，第三次又研究中古某一个学术史问题，第四次又研究某一个时代的社会史问题，这样分开作孤立的研究，外行人看起来好像博学多能，但各方面的内行人看起来，都不够成熟，不能深入，因此都没有永久性价值！而且如此东一点西一点的研究，势必心力时间都费得很多，而实际成果甚少，这是非常不智的做法！远不如集中心力时间在一大片的“面”上作深入精细的研究，既能深入，又能完成不能磨灭的大成果！

再者，在一个大范围内同时注意相关联的问题群，则看书时到处发现材料，兴趣自然浓厚，乐此不疲，而且看书时也就不会赶急了。若是每次只注意一小点，就不能随时看到有用的材料，久而久之，就兴趣低落，而且急于翻得快，书也就自然看得不仔细！

谈到此处，我想稍稍转移论点再讲几句。就是要划定自己研究范围，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好胜。前文讲到要作“面”的研究，这个“面”就是一个研究范围，也可说研究重心所在。但一个人的研究重心范围不能太多，多则精力分散，工作不会能精。因为盯住少数的大范围，在这范围内的各种情形比较熟习，写出论文，不但较少出错，而且能深入探讨，能创获新的成果。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若是重心范围太多，那就近乎上文所说作孤立的“点”的研究，将会事倍功半。但有些人，不仅重心太多，而且喜欢跟风抢进，看到别人研究某一问题有很好成绩，他也见猎心喜去插一脚，不管自己过去对于此一问题有无根柢，而临时去翻查材料。仓促为文，你想这样的文章如何能扎实！记得余英时兄研究方以智，出版了《方以智晚节考》（新亚研究所出版），有一位先生跟风抢进，临时找材料发表文章，讲方以智，后来又自承讲错了，这岂非白费气力！此一事例，可为跟风好胜者之戒！

（四）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要专精的研究问题，既然要对史学各方面有相当博通，如何才能博通呢？当然除了研究专题之外要多看些非自己研究范围的各种史学论著，例如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也要看些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风俗史、学术宗教思想史各方面的书。这是一法，但不是最好的最基本的方法，因为这些书是通过人家头脑所提炼出来的东西。尽管是比较有了系统，但在你的学问中没有根。最好一方面多看这些书，更重要的是就基本材料书从头到尾的看，尤其在初

入门阶段。

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它总是比较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这是正史体裁的好处。搞某一个时代的某一问题，总是要看这时期正史的。问题是一般看正史的人总是以自己所要研究的题目为主，一目十行的去翻找材料，甚至于只看某几个传、某一两篇志。这绝对不可以。看某一正史时，固然不妨先有个研究题目放在心中，但第一次看某部正史时则要从头到尾、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一方面寻觅研究题目的材料，随时摘录，一方面广泛注意题目以外的各种问题。只有像《天文志》《律历志》之类太专门了，根本看不懂，才可以不这样看。但也不妨翻一翻，使自己知道里面究竟讲些什么^[1]。只抱个题目找材料，很容易将重要的材料漏去，因为有的材料只有几个字，有的材料有隐蔽性，匆忙中不易察觉到，至于其他的问题，更就一无所得了。若如我读正史的方法，你所注意题目的重要材料很少有遗漏的可能，而且当你看过这部正史后，对于这一个时代就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也可说有个全盘了解，全盘观念，而这种了解认识观念是你自发的，不是从人家头脑中转借过来的，因此印象比较巩固，这对于以后的研究工作是十分重要。

正史以外的基本书籍也要如此看，至于研究中古史，更要尽可能的把所有关涉这个时期的史料书全部从头到尾的看一遍，因为中古史的书籍不算多，而史料非常零碎，不照我这个最笨的方法看，就可能放弃了一些对于你所研究的问题极有关系的最宝贵史料。我现在举几个例子如下：

[1] 其实即如《天文志》一般人看不懂，但也可以从中发现有用的材料，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例如唐代南疆所至，一直难有定说。我去年就从《唐书·天文志》记录各地测影所得的北极高度，非常正确的讲明唐代南疆之所至约在北纬十七度半，即近代南北越分界线相近地带。这可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发现。

例一：《新修本草》一七“蒲陶”条云：

蒲陶……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本注：“魏国使人多赉来。……此国人多肥健耐寒，盖食斯乎？”

按《本草》为药物学书籍，一般研究历史的人不会去仔细读，研究北朝民族社会问题的人也不会去读。这条材料显示北朝人或许指鲜卑人多肥健，至于肥健的原因是不是食蒲陶，则不必深论。北朝鲜卑人体肥健似别无其他史料可考，你想这条史料多么重要。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好像把唐太宗绘得很肥胖，大概因为他本有胡人血统？

例二：孙樵《兴元新路记》（《全唐文》七九四）云：

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中间百余里，皆故汾阳王私田，尝用息马，多至万蹄，今为飞龙租入地耳。

按唐代马政问题，今存有关国家养马的史料颇多，但私家养马的史料则很少，尤其内地。这条史料说明郭子仪在这一处地方就养马二千五百匹上下，是全唐代书籍中涉及唐代私马极少数材料中最好的一条，多么宝贵。有一位研究生选择“唐代马政”作论文题，我告诉她，《全唐文》中有很多史料，尤其《孙樵集》中有一条好的私家养马的史料。她照一般人搜集史料的方法，检看《全唐文》各家文集的目录，认为某文题目可能与马政有关系就看，否则不看。这篇文章的标题自然与马政无关，所以未看，因此遗漏了。我只好检示给她，教她看书要彻底！但现在研究生在两年之内既要读书，又要谋生，自然也无法照我的方法读书、写论文！

例三：《续高僧传》一〇《释靖嵩传》云：

及登冠受具，南游漳辇。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座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

按自秦汉到隋唐五代的整个中古时代，都市人口数字的史料，似乎只有在南北朝时代有三四条史料。一条见于《寰宇记》引《金陵记》，说建康城（今南京）内外纵横四十里间有二十八万户。一条见于《北魏书》，说北魏一次移民到代都三十六万人。一条见于《北齐书》，说由洛阳徙民四十万户到新都邺城。一条见于《洛阳伽蓝记》，谓十余万户口，盖就城内著籍者而言。此外就是上引《续僧传》这一条。而这一条极其重要，一个都市及其郊区有僧尼八万人，可以推想邺都人口之多了。然而研究南北朝都市的人也不会想到僧传中会有这样一条好材料。有一位研究生以“北朝都市”作论文题，我告诉他僧传中有好材料，他翻了一遍，仍未找到此条，也是最后由我告诉他！翻书之易疏落，于此可见！

像以上这些好的特殊材料其实很多，这里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子，用一般人翻书查材料的方法，都很少可能找得到。只有用我的笨方法，重要的好材料就很少可能成为漏网之鱼！不过由头到尾读一般书的方法，与由头到尾读正史的方法也不相同。由头到尾读正史时，主要着眼点，是求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找材料是副目的。所以要读得仔细，应该尽可能处处求懂。对于其他的书，虽然也要从头到尾的看，但可把寻材料视为主要目的，附带的自然也增加你对于整个时代的全盘认识，这样读法自然可以快些，有些处甚至可以一目十行，不必处处求懂。

最后我还要说几句，抱个题目找材料的方法，当你做完这个题目，其他的东西所得不多，久而久之，将会发现学问的潜力太薄弱，难以发展。照我这种读书法，将会使你的治学潜力愈来愈强，当然

这要在中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发觉一片通明，似乎无往而不可。不过虽然潜力很厚，是博通了，但撰写论著仍要谨守自己的专长，不可随便乱写。随便写文章，仍然不能很精，而且也可能出笑话！当然通论性质的文字可以稍写一点，但也要谨慎，不能太随便。

此外我所讲的这种读书法，不仅在治学方面有其必要，而且帮助读者了解人情事理。一个闭门读书的人，对于社会世故，不可能有多少历练，但是史学家，能认真通读全书的史学家，应该与一般书生不同，只就正史而言，里面所记的人情事理太多了，我们可以从那里吸取古人经验，对于了解现在人情事理就大有帮助！

（五）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新发现的史料极其难得，如果有得用，当然要尽量利用，因为新的史料大家还未使用过，你能接近它，最是幸运，运用新的史料可以很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所以很多人把自己所能掌握到的新史料据为己有，自己研究，不肯示人，更不肯早早发表，让大家来研究，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很不好的行为。然而所以有这种自私恶劣的现象，主要的还是由于一般研究学问的人过分强调新史料的重要性，忽视了旧的史料，尤其忽视普通的旧史料，他们以为旧史料，旧的普通史料没有什么价值了。其实不然，我的想法，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研究历史要凭史料作判断的依据，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过我所谓“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决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

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遥远。这是一个谨严的史学家要特别警戒的！

就这一点讲，前辈学人中，例如钱宾四师，很少能有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利用新的稀有史料所写的论文也极少。他一生治学，主要的是利用旧的普通史料，然而他能研究出很多新的结论。例如他撰《刘向歆年谱》，所根据的都是人人所能看得到的史料，没有一条是新的史料，然而他能得出举世佩服的结论，使今古文之争顿告平息。又例如《国史大纲》，有人说只是根据二十四史而已。这话诚然不错，然而他能从人人能读得到的正史中提出那样多精悍的好看法，几十年来那样多写通史的人，不但没有一个能与比拟，而且真正是望尘莫及，才气学力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这些处才能见出本事！再如汤用彤先生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我认为是近五十年来就某一时代的某一方面问题作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几部论著之一，日本学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太多了，就我所知（以二十年前出版的为限），没有一部能及得上这部书。然而他用的材料，也没有什么新的！据说他衣袋中随时都带着一本《高僧传》，正可见他的研究基础是建筑在旧史料上！再说陈寅恪先生，他懂得的语文极多，能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应该也不少，但他一生的论文中运用新史料写出来的也不算多。他的主要成绩也是从普通史料中抽绎出来的。尤其有关唐史的三部重要著作，《政治史述论》与《制度渊源略论》两稿，主要史料固然不外乎两部《唐书》与《资治通鉴》，就是《元白诗笺证稿》也只引用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很少新的资料。这几位学人的治学方法与成绩，都可说是“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而汤先生尤显笃实谨严。

我个人治史的路线也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虽然我征引史料

除正史、政书、地志之外，涉及诗文、石刻、佛藏、杂著等相当广泛，也偶引新史料，但真正基础仍然建筑在正史上。当我三十几岁靠近四十岁时，听说姚从吾先生批评我，“只是勤读正史”，又谅解的说，“能读读正史也好”，意思是不大看得起；等到我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与《唐仆尚丞郎表》出版以后，才承他很看得起，给我一个实在不敢当的评语。此亦正见以正史为基础，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成绩！

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是要运用头脑长时期的下深入功夫，就旧史料推陈出新，不要愁着没有好的新史料可以利用。新的史料总有出尽的一天，难道新史料出尽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就不能做了吗？不过史前史乃至殷周史要算例外，的确非有地下新史料出现就很难研究。因为旧史料太少了，又大多是些不能尽信的传说，因此不得不把史前史与殷周史研究的基础完全放在锄头考古学上！

（六）其他几点意见

除上文所谈几条之外，还有几点意见，也可视为一般原则性的方法问题，但不欲详讲，只简单的谈一谈。

（1）慎作概括性的结论。有才气、讲通识的学者，往往喜欢下概括性的结论，浅学之士也往往喜欢这样。概括性的结论，诚然最能动听，为一般人所欢迎，也能为一般人所盲目的接受，而发生很大的影响力。但史事只有相对的统一性，无绝对的统一性，下概括性的结论极其困难，容易夸张，而很难真的正确，虽然能为一般人所喜爱所接受，但内行人未必能接受，这样概括性的结论就很难永久站得住脚。政治宣传、商业广告，只要骗得大多数人一时的迷惑，入其彀中，即是大成功，但学术工作不能如此，也不可能真正成功，这就是学术论著与政治宣传、商业广告最大不同之处。所以概括性的话最好少说，要说也只能说大体如上，意谓非全部如此。这是一

个谨慎的史学家应采取的态度。不过有时为了强调你的论点，不免稍稍夸张一点，但自己绝对要有分寸、不可逞心笔之快！

(2) 注意普通史事，即历史上一般现象，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应为史学家所留意把握。特殊现象可能偶然有之，不是群像，在历史发展潮流中不占重要地位，若是过分注意它，反而迷惑读者，甚至也可能迷惑自己！

(3) 概括叙述性证据与例证性证据。史料证据，有叙述性概括性的证据，有例证性的证据。概括叙述性的证据，价值高，但慎防夸张，如第二篇第二节《不要忽略反面证据》引《鸡肋编》一事，即为好例。例证性的证据，价值较低，但若有极多同样例子，他的价值就增高，可能超过概括叙述性的证据，因为例证无夸张的危险性。但若只有一两个例证，它可能是很多事例纪录流传到现在仍保存的一个，也可能是特例，而一般现象可能正相反。这就要凭作者的学力参证当时其他一般情形来作判断，所以初学尤当慎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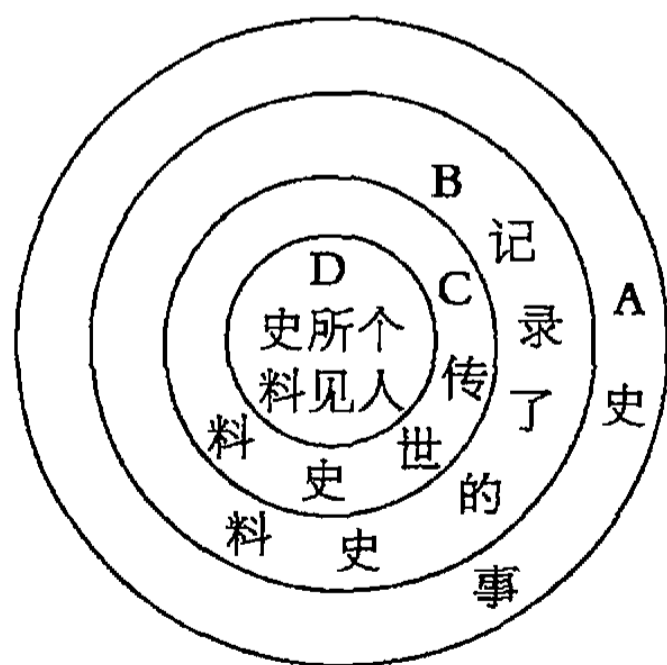
(4) 注意时间性与空间性。研究问题，搜集证据，在脑海中要时时记住纵的时间与横的空间，即年代与地理区域。时代不同，只能作比较作参考，不能混为一谈；地域不同，也只能作比较作参考，不能混为一谈。时代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这点或许大家都较明白，较少疏忽。但地域不同，一般人就比较疏忽。中国地方大！在历史上同一时代中，不同地区情形差异往往很大，所以更要注意。不幸一般学人多忽视地域性的差异，有时就不免有以偏概全，或张冠李戴的毛病！

二 几条具体规律

此篇想谈几条具体的规律。这几条或多为前人所已讲过，不过就个人经验，列举若干例证加以强调而已。

(一) 尽量少说否定话

寻找历史真像，下断语时，肯定的断语比较容易有把握，只要你找到了可信的史料，纵然只有一条，有时也可以下肯定的断语。如说某人某年某月出生，某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只要提出可信的证据，就可作一判断。但否定的判断就不容易，也可说极其困难，尤不可因为自己没有见到正面的史料，就否定有某件事的存在。因为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少数记录下来。有记录的，又未必传世，一直传到现在。而现在保存的记录，自己也未必都已看到。所以个人所知道的、所掌握到的史料都极有限，不能因为自己没有看到可以肯定那件事的史料，就否定有那件事。可作示意图如右：



此图所示，外圈皆包括内圈而言，如 A 的范围包括 ABCD，余类推。

这个道理极其明显，即无记录绝不等于无其事，自己未见到更

不等于无其事。但学人们却常以不知为没有，以书籍无记载即历史上无其事。因此常常违犯此一铁的规律，而轻易的说否定话。兹举数例如下：

例一，《汉书·地理志》汉中郡第一县列了西城。在《汉·地志》的体例，西城应当是汉中郡的治所，也就是说汉中郡政府设在西城。阎若璩作《潜丘札记》，怀疑《汉·地志》各郡国第一县就是治所的传统说法，认为汉中郡实治南郑，不治西城。按《汉·地志》所记汉中郡的辖境是汉水流域的上半部，西至汉中（南郑）小盆地及其四周山岳地带，东到武当山及筑水（今南河）流域山岳地带。南郑县是汉水上游小盆地的中心，经济物产比较发达，又为秦蜀交通的要冲，而西城在今安康县，虽地最居中，但已是山区，就作为一个郡府的条件而言，南郑诚然远比西城为适合。何况南郑早为名城，汉高祖为汉王，就建都于此，东汉汉中郡又实治南郑，所以阎氏此项意见，非常合理，大家认为是他立说（《地志》第一县不一定是郡国治所）的最坚强例证。但是《隶释》三《仙人唐公房碑》云，“公房成固人（今城固县）……王莽居摄二年，君为郡吏（汉中郡）……是时府在西城，去家七百余里。”《汉书·地理志》是根据西汉末年元始二年的版籍所写的，此碑所记正在西汉末年，是西汉末年汉中郡政府在西城的铁证。没有看到这篇碑文，就下了否定的断语，自然错误。

例二，《水经注》二〇《漾水注》云：

汉水又东南迳瞿堆西……绝壁峭峙，孤险云高，望之形若覆唾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

对于这一段，杨守敬《水经注疏》作了一条校订云：

无言高二十余里者。据《宋书·氏胡传》，高平地方二十余里，蟠道三十六回。是谓山之上平，其方二十余里，非高二十余里也。《注》此四句文同，而少平地方三字，明是脱漏。

按《御览》四四引《秦州记》云：

仇池山……形似覆壶，上广百顷，下周数十里，高二十余里，壁立千仞……

这座山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嘉陵江上游西汉水的北岸，今图误植为蟠冢山^[1]。其高是否有二十余里，今可不论。但杨氏没有看到《御览》此条，就下了“无言高二十余里者”的否定断语，显然是说错了。这又是自己没有看到就说否定话的毛病。

例三，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译本）上卷《陆道考》云：

唐以前中国人开拓云南与东京（今河内）交通事，今尚无迹可寻。六世纪初年之《水经注》似未言及此。

按《水经注》三七《叶榆水注》记汉代由交趾（今河内）通益州郡（今滇池东宜良县）的水陆道有两段一百余字，可谓相当详悉。又《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也都有这条路的史料^[2]。伯氏没有详考古籍，就说无迹可寻，又未详看《水经注》，就说“未言及此”，这都是轻下否定断语的毛病。但伯氏究为一老练的史学家，在“未”字前着一“似”字，这就大大的减轻了错误的责任。这不是滑头，

[1] 详拙作《中古时代之仇池山》，刊《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十六期，一九七四年。

[2] 详拙作《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一期，一九七六年。

而是谨慎，也是我们极当取法的态度。

例四，岑仲勉先生《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云：

汉唐在玉门西未见驿传之记载。

按岑先生意谓玉门以西到了元代才开始置驿传。其实唐代玉门以西早已置驿，而且史料极多。例如：

(A) 《元和志》四〇西州柳中县：“当驿路程，极险固。”

(B) 岑参《送刘单赴安西便呈高开府诗》：“曾至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塞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全唐诗》第三函八册参集一）

(C) 《宋史》四九〇《高昌传》引王延德《使高昌记》，由纳职城西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

(D) 《沙州都督府图经》有大批驿馆材料，记常乐县至沙州敦煌县有南北两驿道，馆驿凡十五个之多。又记常乐至伊州驿道有驿名八个，并说明各驿间相去若干里若干步。（罗振玉编《鸣沙石室佚书》本）

(E) 近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文书有《开耀二年宁戎驿配充驿丁名簿》^[1]。

按（A）条柳中县在今新疆吐鲁番东的鲁克沁县。（B）条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二十里的雅尔。（C）条纳职县在今新疆哈密县西一百二十里的四堡（Lapchuk）。（D）条常乐县在今甘肃西部安西县西，敦煌即今县，伊州在今哈密县。（E）条阿斯塔那在吐鲁番东七十华里，就是唐代西州治所。就中（D）条常乐至沙州的南北驿道

[1] 此名簿见《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一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简介》之《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晋唐墓群条》。

尚可说是在汉代早期的玉门关遗址之东，但其余各条，都在最早的玉门关之西，最远的在玉门关西两千多里。这些都是唐代玉门关以西置驿的铁证。不过岑先生只说“未见驿传之记载”，比说“没有驿传之记载”又好得多！

（二）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研究一个问题，在最初期刚着手的时候，自己可能毫无意见，但到某一阶段，甚至刚刚开始不久，自己心中往往已有一个想法，认为事实真相该是如何。此时以后，自不免特别留意与自己意见相契合的证据，也就是能支持自己意见的证据，但切要记着，同时更须注意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这点极其重要，不能忽略。换言之，要注意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各方面的史料，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不能任意的抽出几条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这可说是抽样作证。现在某方面人士利用史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服务，他们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抽样作证！我们一般人治史当然无特别目的，但仍不免主观，也不免欣喜自己意见之能成立，虽然作者并无曲解的意图，但为欣喜自己意见的意识所蒙蔽，无意中也会犯了抽样作证的毛病。而且犯这种毛病的人极多，个性强、喜欢提概括性新见解、下概括性结论的学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现在举个极有影响力的例子于下。

庄季裕《鸡肋编》卷中云：

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今驻蹕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供樵苏。……

这是讲北宋汴京燃料的一条极好资料，但不免过分夸张。有一位当今国际知名的日本学者，从这条史料发挥，引了颇多史料作辅证，认为石炭（即煤）是北宋京师开封府一般人民生活中的主要燃料，认为这是一次燃料革命。这项概括性的结论，诚然很动听，显得光辉有魄力。一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以为定论。但仔细看来，不无问题。

按庄季裕这条笔记的主旨或许在说临安燃料的困难情况，缅怀往日的汴京，比对之下，不免有所夸张与虚美。其实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为主，至少薪柴与石炭参半。下面举几条用薪柴的证据：

(A) 欧阳修《答梅圣俞大雨见寄诗》：“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九门绝来薪，朝爨欲毁车。”（《万有文库》本《欧阳永叔集》第二册《居士集》八）

(B) 《宋会要稿》第四十二册《礼》六二，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赐在京诸班直诸军厢主以下至剩员以上，柴炭各有差。……凡柴五百七十八万，炭五百八十五万。”天禧元年十二月，又赐柴炭，“柴六百七十五万，炭七百二十七万。”仁宗庆历五年，“以雪寒，赐诸班诸军薪。”

(C) 同书第二十三册《礼》二五，熙宁中，宫中见有柴炭库。

(D) 同书第五十七册《崇儒》七，宣和七年，诏罢贡品，其罢贡尚食者，汜水白波辇运司本贡柴三十六万斤，减二十万斤。

(E) 《宋史》一七九《食货志》下一，太宗“调退材给窑务为薪。”

(F) 同书一八六《食货志》下八，大观二年，“诏在京诸门，凡民衣屨谷菽鸡鱼蔬果柴炭瓷瓦器之类，并蠲其税。”

(G) 同书四四一《文苑·洪湛传》：咸平中知贡举，任懿“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馈之。”

(H) 同书三三五《种师道传》：金兵入寇，“京城自受围，诸门

尽闭，市无薪菜。”

我不是研究宋史的人，宋代的史书文集看得很少，稍稍留意，已见很多汴京烧柴的史料，时间自北宋初期到末期都有，足证通贯北宋时代，汴京城里一般市民生活以及烧窑所用的燃料，薪柴至少仍占极重要的地位。不但一般市民，就是皇宫中也仍有烧柴薪的。可以证明庄季裕的话绝对是夸张的回忆，不足据为实证！若据庄氏此说，以为汴京一般市民燃料以石炭为主，甚至称为燃料革命，认为是中国近古文明进步的推动力，恐怕绝非事实！

其次，我再举一个最明显而容易学习改正的例子。有一位研究生讨论曹魏黄初四年曹彪的封邑。他引《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楚王彪以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他认为徙封吴王已是在寿春。这话可能不错，但他下了一个概括性的断语说，陈寿的书法，“改封”与“徙封”意义不同，“徙封”是封地迁徙了，“改封”只是就原地改封名号。他的证据就是《武文世王公传》。此《传》云黄初五年改封郡王为县王。曹据由济阴王改封定陶县，曹宇由下邳王改封单父县，曹林由谯王改封谯县，曹峻由陈留王改封襄邑县，曹幹由河间王改封乐城县。按就中四王改封之县诚然就是隶辖于原来的郡，但曹宇改封单父县，是否隶属下邳郡，就很有问题。这且不论，最大的毛病是把同卷同传的其他改封而显然已迁徙了的例子一概忽略了。兹条录全文如下：

曹宇，黄初“五年改封单父县，太和六年改封燕王。”

曹林，黄初“五年改封谯县，七年徙封鄆城，太和六年改封沛。”

曹幹，黄初“五年改封乐城县，七年徙封巨鹿，太和六年改封赵王。”

曹彪，黄初“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太和……六年改封楚。”

按鄆城不在沛境，白马不在楚境，赵与巨鹿各为郡，宇改封燕

王，似亦不在单父。此外同卷中其他诸王传还有好多例证，显示“改封”并不在原地。由此看来，陈寿遣词并无一定规例。这位同学只选取与自己所想像的意见相契合的例证，而摒弃了上下文甚至就在同一行中不合己意的例证，这是绝对要戒除的！所以告诫他，为之改正。

我想任何人都不免有错误，更不免因为先有定见而发生偏差。但一旦看到反面的材料，就当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在所不惜。我写《唐代交通图考》诸篇，辩论之处极多，往往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与结论，有时在起稿前有个看法，初稿完成又是一个看法，二稿三稿又往往推翻前面的结论，直到我所能见到的史料都能作合理的解释而后已。例如我最近所完稿的《天宝荔枝道考》，便是如此。已发表的论文，也有一些要修正的！梁任公说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一个真学人应有的精神！

不但要随时勇于修正自己的意见与结论，对于别人反面的意见尤要能容忍，若人家证据确凿，优于自己的证据，更当决然放弃自己的意见，公开接受人家的意见。死抱着自己的看法，作无谓诡辩，只见其胸境狭隘而已。下面是我一个放弃自己结论接受别人提出的证据与看法的实例。

唐代志书载胜州治所在黄河东流折而南流处的大湾内，所以过去传统的说法是在今托克托城西黄河西岸。但我前几年写《唐代安北单于两都护府考》^[1]，发现《水经注》所说的云中故城在白道西南不太远，而《元和志》所记的云中故城则在唐代胜州东北四十里，若是唐代胜州在今托克托之西，则此两种记载就较难相吻合。酈道元曾亲历其境，不应错误，李吉甫特别留意边防军政，也不该误记。

[1] 《唐代安北单于两都护府考》，刊《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新亚研究所，一九七四年。

我为欲使这两种记载能相契合，所以要推论他们所以相违之故。因为白道为地形所限，古今无变动的可能，而这一带的黄河在中古时代有变迁的可能，所以我根据种种迹象，认为托克托城西北今黄河之北的民生渠可能就是唐代黄河河床，古代黄河东流折而南流处在今托克托之北数十里，约今民生渠与大黑河会合处，不在今托克托县城附近，因此唐代胜州治所当在传统说法之北五六十里。为了此一问题，我费了颇大气力，就传世史料言，可谓各方面都能配合讲得通。但是前年，李作智在《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一文中^[1]公布了一项新发现，即一九六三年在托克托县西南十余公里处发现了古城遗址，在黄河由西北向东南屈流处的南岸台地上，并且发现一块唐代《姜义贞墓志》，说死者是胜州榆林县归宁乡普静里人，开元十九年辛未二月十一日“殡在州城南一里东西道北五十步”处。此墓在古城址南约四五〇公尺，正相当唐制的一里，可见此古城就是唐代胜州城，至少可证唐代胜州城就在此古城的同一位置，则今日的黄河也就是唐代的黄河，我的推论全部错误，必须放弃。这又是一个要注意反面史料的好例子，也是一个不要轻易说否定话的好例证。

（三）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的引用史料也是一种极常见的毛病。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人们，故意断章取义，以成其曲说，自不必论。就是一般学人也常犯此病，尤其主观强而学力不深的学人更易犯此毛病。这可能都是匆促翻查史料，没有将上下全文看清楚，而生吞活剥的照自己的意想去割裂取用之故。前面讲不要忽视反面证据，提到某位同学在同传同行的史料中只抽出与自己意见相合的材料，而扬弃了与

[1] 此文刊见《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已是一个好例证。兹再举一例证如下：

《汉书·食货志》下云：

杨可告缗遍天下……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余乃足。

按此节文字，大意谓收没钱财、田地及奴婢都很多，钱财分给诸官署，田地交由水衡、少府诸卿所新置的农官来耕种，奴婢则分别给诸苑养狗马，及给诸官如农官等去从事耕作。下文漕四百万石及官自余，乃总指供给这些养狗马的消费者与从事农耕等工作的劳动者而言，甚至还供给其他人口的粮食而言。但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二五〇页将这段话分为两节，先引前节，止于“养狗马禽兽”。又加按语说：“仔细读了这一段话……汉武帝……一面派农官到各郡县去管理田地，一面把没收的奴隶分诸苑养狗马禽兽。这是明明白白没有用奴隶于生产劳动的明证。”其实他没有注意到“及与诸官”四个重要的字。他又引后段，起自“徒奴婢众”至“乃足”止。接着又下按语说，“可见这一批奴婢，只是消费，不能生产，所以成为政府及社会人民之累赘。”他把“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九个重要的字省去了，误解以为这批奴婢只给诸苑，也只有养狗马的消费奴婢了！何况京师奴婢食粟量大，也未必足以证明他们全是不事生产的消费者，因为从事各种生产事业的人也是要食粮的！

断章取义是引用史料时往往不免的毛病，若只与原意稍有出入，还非大病。像上列两例，因为断章取义而显出的意义与原文完全相反，那就绝对要不得！至于还有些人阅读史料的能力实在太差，书

还未看懂，就胡乱解说，尤其一般时髦学人，不引史料原文，只骋一己臆说，不但断章取义，而且不知所云，那更等而下之，不必再谈了！

（四）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此项原则应为每一个研究史学的人所熟知，但未必能遵守。研究中古史上古史，若想都用原始资料，固不可能，但也总当尽可能的利用较早期纪录，即接近原料，或说第一二次改编的史料，不要用第三次四次或更多次改编的史料。但事实上很多人违反此项原则。就我所知，中国研究政制史的人不守此项原则的就极多。中古政治制度的原始史料现在仍保存了的固然极少，不得已，只得以正史为基本史料。正史所无，而可考见于《通典》、《通考》之类者始可引用（《六典》之类当视为较正史更原始的史料）。而《通典》又在《通考》之先（若治唐史，《通典》材料又较正史为优）。但一般学人只图方便，讲中唐以前的制度，也常径用《通考》。不知《通考》所记唐中叶以前的史料已不知是第几次改编的材料了！还有些人研究中古史，引用正史，又将《通典》、《通考》乃至明清的类书、方志中与正史相同的材料一齐排上，以多为贵，真不知所云！他们不知道这些后期的书辗转抄袭，毫无史料价值，抄得愈多，愈见其无识！

何以引用史料要避免用后期改编过的呢？因为史料每经改编一次，价值就减低一次。此中至少有两种原因可言。

第一，史料改编绝不能百分之百的保存所依据原本的内容，即第一次改编，不能完整的保存原始资料的内容，第二次改编又不能完整的保存第一次改编本的内容……不但不能百分之百的保存旧本内容，而且可能无意中写错。兹举数例如次：

例一，《魏书》二《太祖纪》云：

天兴元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二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

按《北史》一同纪，“三十六万”作“三十六署”。而《通鉴》一一〇晋隆安二年纪作“徙山东六州吏民杂夷十余万口以实代。”这与《魏书》大异。据《魏书》三三《张济传》，称此次徙七万家。《北史》二七，同。以每家五口计，正当有三十六万人。故知《魏书》本纪极正确。《通鉴》改编，导致大误。

例二，《魏书》三八《刁雍传》，真君七年，雍上表，请以水运代陆运。《元和志》四灵州卷，与《寰宇记》三六灵州卷，都全录原文，但却作“孝文太和七年”，这是绝对错误。《寰宇记》最后曰“世祖善之”，是前后自相矛盾。而《元和志》最末说，“孝文善之”，更是自圆其说了。

例三，《宋书》九八《氐胡传》。“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勇健多计略，始徙仇池。”而《魏书》一〇一《氐传》无“子驹”二字，《北史》也无此两字，把下文变为杨腾的事了。这也是抄录改编中常见的错误。

例四，《元和志》一四云州卷云：

东至幽州七百里。

东至清塞城一百二十里，又东至天成军六十里，又东至纳降守捉九十里，与幽州分界。

按此条有两“又”字，显示为一条路线。但《寰宇记》四九云州卷作“东室天成军”，“东至纳降守捉”，“东至清塞城”，里数全同，但无“又”字，是都从州城计算了，这就大误。

例五，《新唐书》一三三《王忠嗣传》云：

寻为（河东）节度使。（开元）二十九年，节度朔方，兼灵州都督。天宝元年，北讨奚怒皆……时突厥新有难，忠嗣进军碛口……营木刺、兰山……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并受降、振武为一城。自是虏不敢盗塞。徙河东节度使。……

据此，王忠嗣自二十九年至徙河东节度前之各项建施，都是在朔方节度使任内事。“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事在朔方境内，而徙清塞、横野就是用以充实大同、静边两城。今按这段文字可能本自《王忠嗣碑》（《金石萃编》一〇〇）。碑文说：

公始以马邑镇军，守在代北，外襟带以自隘，弃奔冲而蹙国。河东，乃城大同于云中，徙清塞、横野，张吾左翼。朔方，则并受降为振武，筑静边、云内，直彼獯虏。……西自五原，东暨渔阳，南并阴山，北临大荒。……

这是统前后而又分别言之，说明在“河东”，如何建置，在“朔方”，又如何建置，这样最醒豁明白。《新书》改编，不但混淆，而且实在写错。后来胡三省注《通鉴》（卷二一六），引用宋白《续通典》就沿承此误。

总之，这类例证太多了，可谓俯拾即是。只就新旧两部《唐书》互勘一番，就可找出不少例子。《新唐书》文章写得好，但文章愈好，史料原形可能走失得愈多，所以就史料价值说，《新唐书》不如《旧唐书》。不过《新书》增补了一些“表”“志”“列传”，保存不少史料，这些处才是《新唐书》有价值的贡献！

第二，作者无意中受到自己时代实际事况的影响。任何一个史家，无论他怎样客观，他写历史著作，总不免要受自己时代观念的

影响，尤其作解释时。换言之，他的观点不能超脱自己的时代意识，这是无可避免的。例如唐代前期尚书省六部与九寺诸监的分职问题。在唐代前期，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的性质与职权完全不同，而且分别得很清楚，既不重复，也都不是冗闲机关。但安史乱后，形势大为转变，这一种颇有理想的结构，不能应付当时的情势而渐趋紊乱，乃至失权。杜佑写《通典》，正当尚书制度崩溃的时代，他看到当时制度紊乱的情形，以为开元天宝以前就是如此，所以有了错误的看法与错误的评价。杜佑的评论，去安史之乱以前的时代不远。后代学人都以为杜氏是唐代人，评论唐制应该不错，所以就那样承袭下来，作为一项基本史料，千载莫辨，所以我在此提出来作为一个实例^[1]。不过杜佑此说，严格说起来，还可只能视为一项意见，不必视为史料。至于后代人讲前代史所发挥的意见，更是随时都有自己时代的影子。现在人讲古代历史更多以现在论点去评论古事。不过这些都只是些意见、看法（注意，意见与定论不同，定论要有充分的证据），不是史料，可以不论。

后人评议史事，对于古代史事所发挥的意见，固然可以存而不论，但若作史料的记述，就须绝对避免自己时代的影响。话虽如此，但在无意中仍然往往脱离不了自己时代事况的牵引，不知不觉中把现在的事况与过去的事况混为一谈，因此把过去的事记载错误了。这类情形，地理书中恐怕最多，现在只举两例如下。

例一，酈道元误以魏末之参合县参合陁为魏初之参合陂地。《水经注》三《河水注》云：

沃水又东迳参合县南，魏因参合陁以即名也，北俗谓之仓

[1] 详拙作《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刊《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四本，一九五三年。再稿刊《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一九六九年。

鹤陁，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陁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魏立县以隶凉城郡。……沃水又东北流注塩池。

按塩池即今绥远东南角的岱海，此无异说。参合陁又名仓鹤陁，在今长城外岱海西南。《魏书·地形志》下，魏末天平二年置凉城郡，郦氏说魏立县，大约县与郡同时所置。但秦汉古参合县则在今山西阳高县东北，北魏初期燕魏参合陂之战，为燕亡魏兴的关键性战役，其地毫无疑问的在古参合县之东，其地到魏末尚见有周围七八十里的大陂潭，就是魏初燕魏大战役所在地的参合陂。郦氏为魏末人，不觉以魏末地名释魏初地名^[1]。不但郦氏如此，再看魏收的《魏书·地形志》上，梁城郡的参合县，自注云：“前汉属代。”按前汉参合县诚然隶属于代郡，但地在今山西高阳县境，北魏末期梁城郡的参合县在汉代代郡西北七八百里，在汉代为定襄郡郡境（代与定襄间还隔有雁门郡），何能隶属于代郡？这又是以后事说前事了！古代地理书中，这类错误极多，真是无法枚举，读者不小心，或程度不够，就可能被蒙蔽！

例二，《新唐书·地理志》云：会州会宁县“东南有会宁关。”按唐代会州会宁县在今甘肃省靖远县东北，约今徙城堡、打拉池地区^[2]。据此方位，关在今靖远县东或南。但是检视《元和志》四会州会宁县条，“会宁关东南去州一百八十里。”《寰宇记》三七，全同。《武经总要》一八下，也说关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新唐志》所记方位与早期的记载显然相反，是必有误。再检《宋史》八七

[1] 详拙作《北魏三合陂地望辨》，刊《新亚学报》第一三卷（附在《唐代太原北塞交通图考》之后），一九八〇年。

[2] 详拙作《唐代长安西通凉州两道驿程考》，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四卷一期，一九七一年。

《地理志》，会州会宁关“旧名颠耳关，元符元年建筑，赐名通会，未几改今名。”则宋代会宁关明明是新筑的关，观其与邻近诸城堡的相对关系，此关在南区。《一统志》兰州府卷引《旧志》说，在今靖远西南一百三十里。即是宋关所在。《新唐志》的完成在元符之前，可能宋代早已移关于此，后来名称改去改来耳。由此可见《新唐志》的作者，以宋关说唐关，所以方位完全相反了。

（五）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

后期史书因为传承的关系，他所依据的材料比较正确而且正确的传承下来，有时往往比现存的较早记载更为正确。这种情形也颇常见。例如下文不要轻易改字条所提到的开回车道事，《通鉴》作“开回车道”，而较早期的《周书》、《北史》作“开通车道”，胡《注》从早期史料认为“回”为“通”之误。我证明后期的《通鉴》不误，而早期的正史反误。证据是开道时的石刻，不但时代较正史为早，而且是最宝贵的原始史料。现在再举一例如下：

《通鉴》二五六唐光启二年，“邠宁、凤翔兵追逼乘輿，败神策指挥使杨晟于潘氏……上发宝鸡，留禁兵守石鼻为后拒。”胡《注》：

潘氏在宝鸡东北，石鼻在宝鸡西南，亦曰灵壁。苏轼曰，凤翔府宝鸡县武城镇，俗所谓石鼻寨也，诸葛武侯所筑，城去宝鸡三十里。

按《读史方輿纪要》五五云，潘氏堡在宝鸡县东北四十里，“石鼻城在县东北三十里。”所记石鼻地望，去宝鸡三十里，与胡《注》同。但在县东北，与胡《注》相反。胡《注》较早，一般说，应从胡《注》。但《苏东坡集》卷一有诗题云：

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史分往属县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凤翔府），至宝鸡、虢、郿……

本注：

十三日宿武城镇，即俗所谓石鼻寨也。……是夜二鼓，宝鸡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见于武城。……十四日自宝鸡行至虢。

按宝鸡在凤翔西南一百二十里。若果石鼻在宝鸡西南三十里，则去凤翔府一百五十里，若是在宝鸡东北三十里，则去府九十里。唐宋人一般行程，每日不过五六十里至八九十里。如白居易《送河南尹冯学士赴任》云：“石渠（指长安）金谷（指洛阳）中间路，轩骑翩翩十日程。”又《洛下送牛相公出镇淮南》云：“北阙（长安）至东京（洛阳），风光十六程。”按长安到洛阳，北道约八百里，南道八百五十里。以第一首计之，日行八十里或八十余里，以第二首计之，日行约五六十里^[1]。又如陆游《初入西州境述怀》云，“自行剑关南，大道平如席，日高徐驾车，日暮亦两驿。”（《剑南诗稿》卷三）则每日行程也不过六七十里。苏轼此次出巡，只是例行公事，并无特急事故，日行不会超过百里。他十三日由凤翔起行，当日即到石鼻，足见石鼻必在宝鸡东北，去凤翔九十里，不会远在宝鸡西南。况且虢与郿都在宝鸡之东，他也无必要当日走过宝鸡县城，明天又回来再向东行至虢县。所以《纪要》虽是后期的书，反比胡《注》

[1] 白氏《送冯学士诗》，见《白长庆集》卷五十六；《送牛相公诗》，见同集卷六十四。程有日程、驿程两义。《送冯诗》之十日程，自指日而言。《送牛诗》云十六程，也指日而言，因为长安到洛阳八百数十里，共三十二三驿，不只十六驿（详拙作《唐代长安洛阳道驿程考》，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三卷一期）。至于白氏另一诗云，“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白集》卷五十五）又显指驿程而言，不是日程。

为可信。

（六）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引用史料最好都是自己搜集的，但有时也不免转引他人已用的史料。但转引史料，为慎重计，必须检查原书。若原书已佚，或自己找不到，则须说明转引自何处。若为不常见的史料，纵已查对原文，仍当注明原引者，示不掠美。这一点日本学人比较认真，不苟且。何以要检查原书呢？因为原引的人往往引错，不查原文，就跟着错了。今举数例如下：

例一，《舆地纪胜》一一庆元府卷《风俗形胜目》引《隋书》（《地理志》）会稽郡下云：

市埭二京，人杂五方，俗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

照这条看来，这条内容是述隋代会稽郡的风俗。宋代明州庆元府就是隋代会稽郡的东部。但检视《隋书·地理志》的原文，这是综述古扬州风俗的一段。原文是：

丹阳旧京所在……市廛列肆，埭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

这是述丹阳（今南京）与京口（今镇江），不是会稽郡。王象之引来作为庆元府的风俗，这是大误（也就是断章取义致误之一例）。吴会是吴郡与会稽郡的简称，若述会稽郡，何以说“东通吴会，南接江湖”？故若盲目引用此段，岂非笑话！

例二，同书同卷同目又引《隋志》云：

川泽沃衍，风俗澄清，海陆珍异所聚，蕃汉商贾并凑。

据此，似隋代明州庆元府地方已是国际贸易港。但检视《隋书·地理志》原文，并无“蕃汉”二字，而是王象之所误加。这是因为作者是南宋人，其时明州已为对外通商口岸，设市舶司，所以无意中加上这两个字。若不检查原文，根据此条，说明州地方在隋代已是国际贸易港，岂不又大错！

例三，《读史方輿纪要》四四大同县参合城条引《水经注》云：

可不泥水……西北流经（注之误）沃水，合流而东，迳参合县甫，县西北有参合陂，亦曰参合陁，俗谓之苍鹤陁。

检《水经注》三《河水注》，虽然将燕魏参合陂战事的史事误植在这一地区，但并无参合陂之名，这是顾氏以意为之耳。又丁谦《魏书外国传补地理考证》云：“《水经注》将参合陂水混入《漯水篇》，谓修水入之，特误。”检酈氏《漯水注》只说雁门水“积而为潭”，其陂长二十里，广十五里，有敦水注之。敦水导源西北少咸山，“东流迳参合县故城西。”也无参合陂之名。这也是丁氏以意为之。若据顾氏、丁氏所引，以为《水经注》果如此，岂不又都错了！

例四，同书一一七赵州白崖城条引郭松年云：

自赵州山行六十里至白崑甸，甸形南北袤，与云南品甸相埒，居民凑集……

按郭氏由东向西行，据此文，赵州在白崑之东。检郭氏《大理行记》云：云南州“西行三十余里至品甸……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崑甸，其地南北袤……”下文云：“又山行四十里至赵州甸。”则赵州实在白

崑之西四十里。顾氏引语，方向相反，里数也不合，盖误云南州为赵州也。顾氏为文甚见才气，但历史考证常见粗率，这也是一例。

例五，《一统志》归化城卷《古迹目》武城故城条引《河水注》云：

《十三州志》曰，武城县在善无西五十里，北俗谓之太罗城。

检《水经注》三《河水注》作“在善无城西南百五十里。”则《一统志》所引脱“南百”二字，差误甚大。

大体上说，古人写文章，往往用转引的史料有如自己直接搜集到的一样，那是很通常的事。现代著述态度应该愈来愈严肃，但仍有很多成名的学人也犯此类毛病。近年主编《新亚学报》，往往有人送文章，引大部头书而无卷数，真使人兴叹。有一次某位成名的学人引《唐会要》云云，我为他查出卷数，而内容相差很大。大概他也是转抄了来用上，就不理内容究竟如何了！

（七）不要轻易改字

古书传世既久，往往有脱字有讹字，我们运用古代史料，往往不免先要纠正它的脱讹，但这也要特别谨慎，不能随便轻易的改动。径行补改，有时虽然补改得似乎很合理，但事实上往往就补改错了！上文引《漾水注》一条，杨《疏》误加“平地方”三字，就是一例。兹再引前人改订两例如下，看来非常合理，而实际上是改错了！

例一，《蛮书》卷四《名类》西爨条云：

初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袭杀孟轲、孟启父子，遂有升麻川。

按《蛮书》中错字诚然很多，这一条孟轲之名实在可疑，四库馆臣根据《新唐书》二二二下《两爨蛮传》，改孟轲、孟启为盖聘、盖启。照说这项改动，可信的程度很高。但《张曲江文集》一二《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有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升麻县令孟聘、大鬼主孟谷悞。《文苑英华》收此文，也作孟聘、孟谷悞。向达引了这些较《新唐书》更原始的证据，认为孟为南中著姓，原作孟不误，只是“孟聘”误为“孟轲”而已。^[1]

例二，《通鉴》一六五梁承圣元年纪云：

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开回车道，以通汉中。

按《周书》三五《崔猷传》作“开通车道”，《北史》三二同，都与《通鉴》作“开回车道”者不同。胡《注》据《北史》，以“通”为正，并加以推论说，“前史盖误以通字为廻，传写者又去其旁为回也。”这一说法，看起来似乎非常合理。但《北魏石门铭》（收入《褒谷古迹集略》）记述此事云，正始三年，泰山羊公为梁秦二州刺史，“表求自廻车以南开创道路。”路成，“自廻车至谷口三百余里。”则“廻车”显然是一地名。又《元和志》二二凤州梁泉县，“廻车戍在县西北六十里……西魏遣（略）达奚武……率众七万，由陈仓路，取廻车戍入斜谷关，出白马道，谓此也。”梁泉县在今陕西西南部凤县，则这一地名的地望尚可考见。由此看来，《通鉴》作“廻车”是绝对正确的，《周书》与《北史》反而是错了。因此我可作一个与胡《注》相反的推测，“廻”“回”是一个字，“廻”字形讹为“通”字。或者，后人不知“廻车”是一个地名，认为“廻车”义不可解，因此以为“廻”是“通”的形讹，乃校改“廻”为“通”

[1] 见向氏《蛮书校注》卷四，页八二。

以就文义，这样一来，反而弄错了！^[1]

以上这几条规律，相信是大家都能同意应该遵守的，不是我一人之言。这几条规律，说起来都很容易明白，但严格遵守，却并不容易。我写文章可谓相当谨慎，但也不免往往犯这一类毛病。这里写出来，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共同勉励！

[1] 详拙作《汉唐褒斜道考》（第二节《拓跋魏廻车道》），刊《新亚学报》第八卷一期，一九六七年。

三 论题选择

研究历史，首要的是选择问题。就小范围说，是一篇专门论文题；放大些说，是研究范围，也可说就是第一篇所说的“面”。无论是一篇论文题或一个研究的广面，对于研究的成绩及其所发生的影响都有极大关系。关于此一问题，我想分下面几点来谈论。

（一）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历史上的某些方面某些问题比较具体，某些方面某些问题比较抽象。当然这很难作绝对划分，但无可否认，可作大体的划分。例如就大范围说，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问题比较抽象，政治经济民族社会问题就比较具体。这其中也各有程度的不同，例如学术又比思想具体些，政制也比政事具体些。前辈学人中，如陈寅恪先生喜欢讲比较具体些的问题，少讲抽象问题，这在俞大维先生写的《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刊中研院史语所特刊之三《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卷首）已明白讲到。综观陈先生的全部论著，诚然明显的有此倾向。再如陈援庵先生，更是如此，至于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不但具体，简直是一项机械工作，然而沾溉学林，其功不细！我个人也喜欢研究具体问题。我的主要工作涉及两大范围，一是政治制度史，二是历史人文地理，都是具体性，少涉抽象性。

我认为研究工作，为把稳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用可靠史料，下深刻功夫，一定能获得可观的成绩，而且所获成绩比较容易站得住脚，不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说较易成为定论。但抽象问题，虽然同样用可靠史料，同样下深刻功夫，但所获成绩就不一定能站得住脚，也就不易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定论。因为具体问题的证据也比较具体，较易作客观的把握，需要主观判断的成份比较少。但抽象问题的证据往往也比较抽象，较难作客观的把握，需要主观判断的成份比较多。主观判断的成份比较多，在作者本身言，就比较容易走上主观意向，作错误的判断；在读者而言，在其他的研究者而言，也各参入主观成份，有不同的认识，作不同的判断，因此人各一是非，上焉者可成“一家之言”，但很难得到为大家都能承认的公论。然而一般人都比较喜欢讲抽象问题，尤其现在一般青年更似有此趋向。这或许是因为面对抽象问题，容易发议论，提意见，讲起来比较可以自由发挥想像力。甚至于仅获得少数资料，一知半解，也可以主观的贯串，痛快淋漓的发挥一番，满足自己丰富的发表欲。至于具体问题，总认为繁难，不易见功。但事实上，具体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问题似易实难。因为具体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抽象问题，虽然原则上也是如此，但未必如此，也许自己辛苦经营，以为发千古之覆，心满意足，但他人看来可能付之一笑！

然则大家都搁置抽象问题不去研究吗？我实并无此意。不过就一般常人而言，并以矫正时敝而已！若是对于抽象问题实有浓厚兴趣，又自信天分极高，能透视常人所不能窥视，自亦可以从事抽象问题的研究，不过要特别警觉，谨慎从事！天分高，功夫深又能谨慎，所得成果，纵不能得到公论的承认，但若真能真正成一家之言，也就是一项成就！

(二) 问题的实用性

从事文史学科的研究，本不应谈实用问题。不过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对于别的研究者有较大用处，甚至对于一般人也有用，换言之，希望有较大影响力，那就不能不考虑实用问题。论著本身成就的高低是一回事，对于别人是否有用又是一回事，这两方面往往不能兼顾，但也可以兼顾，关键是在问题方面的选择。当然实用性，对于他人是否有用，也往往因为时代不同而有异。这是关乎时代学风的转变，在前一个时期，某类问题很热门，研究的创获对于他人可发生很大影响力。时代一过，若再研究此类问题，纵然成就很高，也可能无人去看，自然就谈不上有多大影响力了！所以就实用观点说，也很难有绝对的标准。不过就目前一般观点言，国家大计、社会动态、人民生活、思想潮流是最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有了重要的贡献，较易为大家所注意所看重，可发生较大的影响力。

二十年前，我在哈佛访问，参加一次野餐会，大家谈起中国学问，杨联陞兄说，假若列举一百个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日本人要占五十个或以上。意谓中国人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成就远不如日本学人。当时我和李定一、周法高两兄听了都不免有些反感。不过我后来仔细分析此一问题，觉得联陞的话也不无道理。就深度言，日本学人诚然比不上中国学人，但在成绩表现方面，中国学人就显得比日本学人要落后。例如史学家，像陈寅恪、陈援庵先生与宾四师的造诣，在日本学人中诚然找不到，但次一级成就的学人，成绩表现很显著为人所重视，在日本实在比中国人多！我想这不关乎学问的深浅与程度的高低，而关乎研究方向。中国人做学问喜欢随兴之所之，不管问题是否重要，不管对别人是否有用，只就个人癖好去做，有时所涉问题与历史大势毫不相干，而一字一句的去钻牛角尖，用功极大，效果极小，自得其乐，而别人从大处看历史，就根本用

不上。这类论文在中国人著作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自然就被埋没，不为人所重视，在国际上更得不到一席之地了！反观日本学人的研究，大体上都就中国历史上国计民生方面的重大问题下细密功夫。最显著的成绩，如经济史、佛教史、边疆史等，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经济史在较早期只有一位全汉昇兄可与他们相抗衡，现在才慢慢有些人跟上；佛教史尽管有一位汤用彤先生，成就之高，非日本学人所能比肩，但毕竟太少，我们要想对于中国佛教史有个概括性观念，还得要看日本著作；至于边疆史更瞠乎其后，说来岂不惭愧！日本学人的工作，主要是肯下功夫，就其成就而言，不但境界不高，而且往往有很多错误，甚至很有名的学者，引用材料，断句有误，也有根本不懂那条材料的意义而加以引用，闹出笑话。我最近看到一位研究唐宋史的日本名家，引用李白《系寻阳上崔相涣》诗“邯郸四十万，一日陷长平”，作为唐代邯郸县人口殷盛的证据。不知此句是用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秦大胜坑赵卒四十二万的典故。我相信一位中国学者，尤其像作者那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学者，断不会闹出这样大的笑话，而在日本学人中就常常见到，并不出奇！然而这不能深责异国学人；因为语言文字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他们读中国古书，在速度上，在了解深度上，究竟赶不上中国人读自己的书。假若易地而处，我们更当惭愧万分！

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虽然境界不高，常常出错，但他们的工作成果仍有很好的价值，能引起人注意，供大家参考利用，进而在国际上居有很高地位，原因是他们研究的多是关涉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专搞琐细不相干问题的比较少。国际学术界所以重视日本学人的成绩，固然因为日本是亚洲的先进强国，西方人学日文远在学中文之前，他们多半是通过日本人的著作来了解中国学问，所以看重日本人的成就。但日本人研究方面的实用性也有绝大关系，不能一味说是西方人有偏见！就如我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文地理，牵涉到

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种种问题，将来写作，参考近代人的著作，取用日本人的成绩，可能不比中国学人的成绩为少，如果日文好，取用的地方可能更多，这总不能说我也有偏见！

再以我个人的成绩而论，我已出的两部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与《唐仆尚丞郎表》，都是四册百万字的篇幅，也都是我中年时代的精心结构。然而无论在国内或国际学术界，《制度史》所获得的反应都远比《仆尚丞郎表》为热烈，发生相当大的影响。而《仆尚丞郎表》，除了极少数的专家备用之外，恐怕很少人去看，影响自然也就很小！其实就我自己评量，《仆尚丞郎表》的功力之深实远在《制度史》之上。《制度史》一书诚然有许多具体的明显的创获，但功力并非极深，只是能看出重要问题而勤于彻底的搜集史料加以条理化而已！我常告诉青年朋友说，只要能如我一般肯花时间，肯用心思，肯用笨方法，不取巧，不贪快，任何中人之资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七年之内都可写得出来。但《仆尚丞郎表》的内容往往因为材料冲突与记载失误，而须转弯抹角辨析入微，这些处就非学力较浅的人所能办得到，甚至非缺乏耐性的人所能看得懂！自清代中叶以来，研究唐代人物的著作不下两十家，论规模，论精密，自信我这部书都远过前人，然而却影响不大！这不能怪人家不欣赏，而是对于人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综合性的讲唐代人物的风气已过，只有在人家讲到唐代某一人物某一制度时偶一参考取用而已。这是我自己所亲身感受的例证。讲学问诚然不应有功利主义，也不必理会对人是否有用，但若是希望辛勤的著作能获得学术界较大的反应，就不能不考虑选择论题的重要性！

（三）大问题与小问题

前一个时期，前辈学人中往往谈到研究问题的大小。有些人认为要小题大做，才能深入，有所发现，使学术向前推进一步。这大

抵是主张专精一派，目的只在求“真”，不涉其他，所以认为一条笔记往往比一篇皇皇大文有价值。但又有些人则认为要选择大问题作研究，才有意义，纵稍疏漏，也无关紧要，鸡零狗碎的小问题不值得研究，纵然做得非常精审，却无大意义！这大抵是主张通识一派。照我的看法，这两派意见，都很正确，但若各走极端，也都有很大毛病。前者走到极端，势必走上钻牛角尖一途，发生瞎子摸象、见树不见林的毛病。后者若走极端，又很容易走上束书不观，有的自逞臆说，没有踏实根据，有的攀附理论（不论是宗派主义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的理论），毫无实际内容，这是肤浅浮薄的一途，弊病更大！

我想讲大问题是应该的，尤其要重视我前文所说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选做小问题也可以，但要注意到这个小题是否对于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分。或者也可说着手研究的是个小题，而心目所注视的是某些大问题。那末问题虽小，但可供他人将来研究大问题之用，这也是一项积极意义，但这种意义因去大问题的关系愈远而愈消失！至于究应做重要的大问题或与大问题有关的小问题，则要视各人的才性、兴趣、环境等等之不同而各异，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偶尔作些不相干的小问题，作为自己娱乐的小玩艺，也无不可。

此外我还有个想法，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因为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易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这样可以磨练深入研究的方法，养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为将来大展鸿图作准备。若走上来就做大问题，大问题要写成长篇大论并不难，但要精采则极难。自己学力未充时就做大问题，结果往往大而无当，并无实际成就，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终至永

远浮薄，不入门径！中年时代，自己见闻已博，学力渐深，或可说已入成熟阶段，而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换言之，已有做大问题的基本素养，又有大规模辛勤工作的体力与精神，这是一位学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可选择重大问题，做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达既博大又精深的境界，为学术界提出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人到老年，学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谓学识已达最高阶段，但体力精神却渐衰退，很难支持大规模而且精密的繁重工作，所以只能小规模的工作，写札记式的论文，最为恰当。因为他学力深厚，不妨就各种大小问题提出他个人的看法，是否有当也不必认真提出实证。我常常奉劝老年学人，不必写繁重的研究性论文，只作语录式的笔记，最为轻松，而可把他一生数十年中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写出来，留待将来研究者作参考，纵不能代为作进一步证明，也或许有启发作用。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

就我个人的工作而言，凡略识我治学方式的人，皆知我是走专精一路。但若能就我的论著作深一层体察，又当了解我并非走狭仄的小路。我自少年读书时代就喜欢把任何问题都条理化系统化，这也许和我的才性有关。我的记忆力极差，几乎毫无背书的本领，但理解力还过得去。为了应付考试，任何课程的教科书，我只极仔细的看一遍，而加以条理系统化的题识或笔录，以后复习只看题识、笔录，很少再看全书，所以花的功夫不太多，也能获得相当高分。喜欢条理系统化，自然不会专走太仄的小路，而注意较大的问题。不过对付较大问题，我却用做小问题所用的方法，下细密功夫。记得二十几年前有一位大我好多岁、很有成就的朋友很坦白的说，他很佩服我，一做就是一大篇文章，一大部书，而他自己却苦于没有什么好题目可做。我想这和我的选题与工作方式有关。我的选题方向与工作方式配合起来，自然就会有丰富的文章可写，不愁没有工作可做。例如我想做《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这个论题自然关

乎当时国家大政，论范围，不算很小，但也不算很大，若照一般人工作方式，写一篇长文章就完了，而用我的方式，都督区与都督府制度、佐吏制度、北魏军镇制度、护军制度等等都各为一重要专题，写出来了，各有相当创获性的贡献，因为前人未曾如此深入的探索过。再例如我研究“唐代交通”问题。这是一九四六至四七年开始的，也是我真正步入唐史研究领域的初期。在开始注意此问题之前，因为知道陈远元写过一篇《唐代驿制考》（刊《史学年报》第五期）颇有名，但我尚未看到。询之劳贞一先生，据他说陈氏该文写得不够好，还可再做一番功夫，若花半年或一年时间，相信可做一篇很好的文章。因此我就决定以交通问题为研究唐史中心目标之一。但用我的工作方式，一两年时间就决不会能完成。到一九六六年已录集资料好几万条，开始撰写，至今十四年，写了五十几篇论文，一百二三十万字，但还有至少五分之一的论题待续写。也许有人认为唐代交通诚然是一重要问题，但像我这样做，未免花费的功夫太大，仍是值不得。甚至有一位很有才气的朋友坦率的对我说：“我很看得起你，是因为多次与你谈话，觉得很有见识。至于你的文章，老实说，没有价值！”大约即指我近几年写的这类文章而言。我想这项工作在目前潮流中，诚然显得有些过分细致，而且一般搞历史的人缺乏地理素养，看到这许多古地名，更加一层隔膜，对于辩论入微之处，更是如坠五里雾中，不能欣赏。加以目前在撰写过程中，一条路一条路的发表，好像多无关大体。不过等到全部完成，作出总结论，绘出唐代全国交通图，将来人研究唐代问题，不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乃至唐人散文诗篇等各方面，都会有参考价值，因为这些国家大事、社会人民生活，无不与当时的交通情形有关。尤其军事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流通、文化传播，更以交通路线为基本影响因素。不但唐代，研究唐以前或以后的问题，也有参考价值，因为中古时代交通路线先后变化不大。所以唐代交通不能说不是

一项大的重要问题。我之所以要彻底解决此一问题，目的在此。别人对于我的研究过程，尽管无兴趣看，或者看不懂，但我相信他们对于我的结论与图绘定能放心的利用。这也许就是我对中国史学界的点滴贡献。诚然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时间已不太充裕，而这个问题之外，还有更重大的两项计划要完成，看来可能就为唐代交通所拖累，不能完成，自很可惜。然而也不能贪图更大的成就而放松工作精神，更不能做一项工作而虎头蛇尾，那不是科学工作者！

（四）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

选择论题，首先要考虑到自己的能力范围，与关涉此一问题的材料情况。

先讲自己能力。每个人的能力，各有长短，也各有所偏，选择论题，自然要先度量自己的长处何在，千万不能盲目的看到好题目就做，也不管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是否可以胜任！就我而言，在汉唐时代，边疆问题很明显的是响亮的好问题，但我绝不插手，除非研究其他问题时牵涉到边疆，不能不去搞一下！因为我对于边疆民族语言一窍不通，西方语文知识也极贫乏，谈不上利用他们的资料，若真讲边疆问题，一定要闹笑话。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方面，我也不讲，尤其思想问题，绝不插手，因为自觉天分不高，而又太客观，太谨慎，不敢讲无把握的话。我想以我这样个性与工作方式，若讲这些难以捉摸的问题，势必被材料困住，作茧自缚，钻不出来。纵然能讲一点东西出来，仍不会能自信其必定正确，更不能自我满足，这不是自寻烦恼吗？有些人自信心极强，不管讲得是否正确，自己写来总是兴致淋漓，自得其乐，这也是一种福气！

当然研究一个问题，并不能说自己具备一切相关知识才去动手。也可能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缺乏某些辅助知识，那就不免要临时抱佛

脚，自我去补习，尤其是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技术。例如我研究政治制度，就不能不读一些政治学行政学的书，对于经济史有兴趣，就不能不读一些经济学财政学的书，为计量的需要，就不能不看一些统计学的书，为绘图的方便，也不能不稍稍学一点粗浅的地图绘制技术。何炳棣兄曾经告诉我，为了要写《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不知临时恶补看了多少书，请教过多少专门行家。我想这是绝对必要的。不过临时补习，只限于辅助的知识。主要的知识基础与材料，一定要在自己固有的范围中。

次论材料情况。一个论题是否能写得好，有贡献，除了自己能力之外，材料是最基本的因素。选择一个论题，先当留意关于这一论题的材料是否充分到足以圆满的解决问题，得到成果。不但如此，而且也要预先想到，自己是否有力量控制这些材料。例如有些有意义的好问题，材料也很丰富，但散在世界各地，自己不可能搜看得到，这就不能勉强，费时失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成果。所以选择论题，首先要觉得此一问题的材料够用，自己又能搜求得到。但若材料太分散，需要看的书太多，那虽然不碍工作的进行，但势必要花很长时间，费很大气力。若是题目很重要，材料很丰富，这些材料不但自己能搜录得到，而且很集中在某些少数的书中，那更是个上上的好论题，研究起来必能事半功倍！不过这种便宜的事不会太多，不能存心侥幸。在我的著作中，若以一篇论文为单位而言，我想三十几年前所写的《北魏尚书制度考》（刊《史语所集刊》第十八本）可谓最有贡献。因为自东汉以下，中央政府的行政中枢是尚书制度，所以历代正史对于此一制度都记载得比较详细，只有魏收所写《魏书》的《官氏志》，体裁特殊，致将尚书制度写得出乎想像的简略。但实际上，北魏尚书制度之演变即为拓跋氏华化进程的指标，孝文时代尚书台的规制且为隋唐尚书省制度的蓝图，其重要性可以想见。竟然正史不书，到《唐六典》撰作时代已云不详。若能把这

一大漏洞补起来，自是一项显著的贡献。我当时抓住这一好题目，但《官氏志》既不书，其他列传也很少谈到其组织职权，照一般研究制度的方法，是不可能得出丰富成果的。所幸《北魏书》记各人官历甚详，枯燥琐碎，有如家谱，看来毫无意义，我不惮烦，运用最笨拙的方法，把各人官任各部尚书、各曹郎中的年世、迁徙途径及其在任的工作，如拾荒货一般，逐一搜录起来，然后因时代先后，分部分曹，加以排列，结果整理出一个头绪，获得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成果，北魏前期尚书制度的演变历历在目，且与汉化的进程完全契合，而孝文帝建制六部三十六曹，所无考者只有两曹郎中而已。北魏一代的重大制度于此大明，当然至感快慰。然而所用的材料十之七八出于魏收一书，参取其他正史与《六典》、《通典》、碑刻等并不甚多，得不谓之事半功倍！不过我这篇文章发表时只是长篇，字逾十万，久欲抽暇删简，尚未如愿，不免常耿耿于怀！

（五）检查论著目录

选择论题当注意的几点已略述如上。此外再就一般人所已留意到的一项问题，略提一点意见。现在人研究问题，例必先查目录一类的工具书，看看自己所感兴趣的论题是否已有他人做过？成绩如何？同时也查一查别人所做与此有关的问题，先看一下。当然这些都是必要的步骤，但不必费太大功夫在这些上面。我看到有些青年，对于某一问题有兴趣，而查工具书所列论文目录，看到有同题论文一篇或数篇，因而趑趄不前，嗒然若失。或者论题已定，而在着手搜集基本材料之前，先查看他人所作相关问题，往往列出百十篇卡片，遍找该等论文，花费很大气力。其实也都不必。在理论上讲，别人已下过功夫而且做得很好，自己是不必再做了，别人所做相关问题的成果，对于我的工作有些帮助，应该要看。然而事实上，这

都是次要的事。别人已做过的问题，做得好到什么程度？已做过相关问题的成绩对于我的工作能帮助到什么程度？这都有问题。若是做个小题目，前人已有很好成绩，诚然不必再做，枉费功夫。若是做大问题，或寻求一个广面的解决，那就不必费心，多方面去找。大问题得到解决，那应该已是相当有名的论著，稍知学术行情的人，当能知晓，不必去找了。否则，你只管放心，单刀直入，向基本材料上下细密深入功夫，保证会有突出前人的成就。纵然你所做的范围内有某些小问题，别人已经解决得很好了，也无损于你所做工作的价值。我大抵就是如此做法，问题决定之前，当然对于别人研究此类问题的情况已有相当认识，不过我并不认真的去查目录之类的工具书。纵然查到同类论文题，也不在乎。因为我平时已注意论著出版，平时不知，只在工具书中才查到，相信不是下过大功夫的作品，用我的工作方式去做，在这一论题上必能突过前人。我这种自信，可谓迄今尚未失败过。只有在我搜集史料过程中，他人新出少数论文是我研究范围的一部分，成绩很好，使我那一两章成绩的价值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例如《北魏领民酋长制度》，在我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列为《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即第四册）的第十四章。我在进中研院之前已着手研究南北朝地方制，也注意到领民酋长，后来周一良在《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卷发表了《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材料所得几与我完全一样，所以当我写到这一章时，只得说就周文加以改作。因为别人文章发表在前，后来写作，要说所搜资料与之相同，也就没有必要了。不过周文写得颇为散漫，欠条理，分析也嫌不够，读者比看两文自知。但创始之功，仍当归之周文。又如我普遍搜录唐代交通史料，时间已久，有些已录，但已忘记。我来香港之前，姚从吾先生托人自日本购得向觉明先生的《蛮书校注》，我借来阅读一过，深佩其功力，剑南通云南两道，也写得不错。我一方面感到自己在这两道上所用功夫可能白费，一方

面也想偷懒，以为将来写《唐代交通图考》时，这两道只就向文略加增订即可。后来我写剑南地区交通时，就所录材料加以检查分类，发现所积资料远过向文，且多可纠向文之处。所以功夫虽未白费，偷懒也不可能了。但草创之功也当归之向文！不过上举两例都在我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不是我在事前失之检查！

四 论著标准

各人研究学术的目标不同，此处只就史学工作者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而言。

杨联陞兄是位学术批评家，好几年前曾称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成就，说“充实而有光辉”。又曾转述胡适之先生称赞同一个人的成绩说“精细而能见其大”。我想这两句话的内涵不完全相同，但意境实很相近。这两句评语，某位史学工作者是否当之无愧，姑且不论，但我想借此两语作为史学论著的标准，却极为恰当。联陞兄的话本自《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一语，原即寓有“大”义。今就这两句话分析起来，“见其大”可谓为“光辉”的一面，而“精细”尤为“充实”的最基本条件。所以联陞兄的话似乎可以涵盖胡先生的话，故今姑以“充实而有光辉”为主体作一说明。

这句话显然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上要工作做得“充实”，但最高标准则要兼具“光辉”。充实比较容易讲，最主要的是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这样的论著，才能算得是内容充实的有价值的论著。如有必要，须曲折辩论，达到论证的目标，但步步谨严，如做数学，无一步虚浮，这就比较更难，也更见作者功力，在充实的论著中又有其较高地位。凡是内容充实的论著，不论其问题大小，主要在一“精”字，虽然是小问题，而做得很精审，仍然是内容充实的论著，有其颠扑不破的价值。不过精审充实仍只

是有价值论著的基本条件，不具备此种条件，根本不能跻入著作之林。至于欲其论著达到更高境界，则当在“充实”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显示其有“光辉”。

“光辉”比较难以具体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认识：第一要有见解有识力，工作成果要显出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而同时须兼顾最基本条件——精审充实。这样的论著自可当“光辉”之誉。而此种光辉境界，不一定在大论题上才能显现。若论题甚小，规模也很小，但工作精审，在精审之中能透出作者之有超人识力，此亦光辉之一面。胡先生所谓“精细而能见其大”，在这些处尤能认识其意义。或者在专精的充实工作进行中不能随时表现这一点，但充实的工作做完之后，也要能站在材料的坚强基础上，凌空笼照全局的说几句话，此亦为显现光辉面之一法。第二要工作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学术工作要规模恢宏，或组织严密，或有创获，都不难，但要兼而有之，则极不易。当然这里面还要包括一个基本条件——内容充实，这就更不易。兼此四者，自亦可当“光辉”之誉。总之，“光辉”总偏向于恢宏与通识，但与通论不同。写通论性论文，固当以恢宏通识为最基本条件，若不具备此一基本条件，就将毫无学术价值。但恢宏通识却不限于通论性文学，一部大规模的专门性论著，一篇短小精干的专门性论文，皆可透显作者是否有恢宏的意境，通豁的识力，以臻于“光辉”的境界。

不过要达到“充实而有光辉”的境界，自非易事，最主要的做法仍是老生常谈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从小处着手，工作才能“充实”；从大处着眼，成果才有“光辉”。不从小处着手，势必大而化之，不切实际，漏洞必多，虽作出很动听、看来有光辉的结论，能吸引读者的注意，但终久未必能站得住脚，自不能算是真有光辉，更未必有长久价值可言。不从小处着眼，就往往走上小路，

钻牛角尖，不能脱困而出，结果成绩琐碎，不成大体系，自亦不能显现其光辉。不过此类论著仍较大而化之不切实际者为佳，因为这种著作是充实的，仍有其长久价值，不过境界不高耳。所以写论文局促于琐碎材料，为其所困，固不好。专门表现有魄力有才气，能言人所不能言，能说人所不敢说，但脱离材料的支持，更要不得。惟天资过人，识力特强，学力亦深厚者，往往数语可笼罩大局，虽未提出具体坚强的史料佐证，但学力深厚的读者自可默会胸中，知其确然慧解。惟此亦当慎之又慎，若轻易行之，势必言多有失，流于空疏之弊。故此种特例，不足为训，不可轻学，宁可自谓笨拙，不能自恃聪慧过人，因为聪慧似可恃而实不可恃！

所谓“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仍只是原则，至于如何做，就很难作具体说明。今姑只机械的从“大”“小”两字立论，稍加申述。

论者每谓，陈寅恪先生考证史事，“能以小见大”。如汪荣祖撰《陈寅恪传》第十一章与何广棨辑《陈集补编》、《遗诗述释》都有此说。这虽然不是陈先生治学的基本方法，但他确常采取此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在论述形式上常见其如此。例如他的早期名著《桃花源记旁证》与中期的《读东城老父传》等就是好例证。此种方法似乎较为省力，但要有天分与极深学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而且容易出毛病。我个人的工作方式，有些处似乎可以说是“聚小为大”，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如《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与前在第三篇提到的《北魏尚书制度考》就是这种方法最好的例子。他如《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与现在写的唐代交通诸论文，本质上仍是此一方法的运用。这种方法，当然显得很笨拙，也吃力得多，不过我想人人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只是此种方法要特别注意组织系统化，否则一盘散沙，将无多大意义！

此外我在上一篇中提到的以做小问题的方法来做大问题，这也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一面。其他当然还有种种的做法，而且也要因人而异，各出心裁！不过无论如何做法，都要锲而不舍，作深入而缜密的探讨，不可浅尝即止。浅尝即止，工作永远浮在表面，不可能得到高度的成果，纵然能凭着聪明才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但也只停留在“意见”“看法”的阶段，不能算是真正的结论。而锲而不舍的深入缜密的工作，所得到的结论才是真正的结论，长远站得住脚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就我的经验，锲而不舍的深入工作，往往可以显现奇迹，连自己也不能料想得到！例如我讲汉代郡县政府组织，远超过前人之所已知；讲东晋南朝都督区，其固定性往往超过州的辖境；讲北魏军镇制度，其性质因地区的客观环境而不同；讲北魏尚书制度，其组织演变与华化进程合若符契；孝文三十六曹，唐人已不知，而能考出三十四曹之多；讲唐代交通，重要驿道，能极详明的考出其沿途所经，而且边荒千万里无所不届。这些具体而为一代大政的成果，不但为以前的人所不能想像得到，就连我自己在开始工作之前也未预期得到，实在可说都大出意外。深入的辛苦工作之能使人有高度兴致，其原因也就在此。

这一章内容，主要为就联陞兄“充实而有光辉”一语作解。联陞为我二十多年的至交老友，去年此时（五月七日）我由新港专程到康桥去看他，当时他精神很好，相聚至感高兴。本章初稿写成后，因恐内容未必与他的本意相合，所以极欲寄付一观，请其补充意见，或另写一文，附本章之后。但又闻旧疾复发，进入医院，只得稍俟时日。顷闻其病痊出院，并每周到校指导学生写论文，故立即将此章复印副本寄付请教。嗣得其本月二日手书，述其近况颇详。内有关涉本章之意见，节录如下，俾读者参看：

“充实而有光辉”一语出自《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

大”，依朱《注》似指德行修养，但引为论著标准，似乎亦无不可。有光辉之论著，可令读者意动眼明，大抵由于沉思翰藻，但亦不限于此二端。我兄所发挥均甚重要，以自己著作为例，尤为切实。深入研讨，有时可以发现奇迹，超出预料，如此现身说法，读者得此鼓励，必有闻风而起者矣。必欲吹毛求疵，则“永久价值”或可改作“长久价值”；原稿“永远站得住”已增“脚的可能性比较大”，则我兄已注意及此矣。

最后数语，尤见一位谨严学人之态度，亦见文章之贵能改而后精！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〇日

五 论文体式

现在人写论文大都采取夹叙夹议体，材料与论述联为一贯。翻开所有论著，几乎无不如此，一似为写论文必遵之固定体式。个人意见，却不以为然。我认为论文写作，不仅为作者表达意见，尤当考虑读者领受之便利。此种写作方式，就作者言，只就思路发展源源平铺的写出即可，诚然最为方便。但对于读者，却不尽然，加以还有其他条件限制，此种体式实非最理想，更非唯一的体式。

我认为写普通论文，一律采用此种体式固无不可。若写研究性论文，则当因题目内容而异，因材料情况而异，因自己研究与写作详略深度而异，以及因准备供给何人阅读而异。换言之，研究性论文写作体式，当因应各种情况之不同而有所变通，不能拘守一种固定方式。就我所已采用或准备采用以及看到他人应用的体式而言，可分为下列诸种：

（一）常行体

常行体就是上文所提到大家所惯用的体式。此种体式，一切内容，包括引用材料、曲折辩论，以及大小判结，皆在正文中进行。只有太枝蔓的问题作小注讨论，但小注通常都甚短。这种体式为现今一般人所通用，故姑名之曰常行体。我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即用此体。此体既为一般人所习用，故不必详说。但用此体写论文，

以论证简单，文章不长，最为合用。若文章太长，亦当以写得简要为上。尤当要多加小标题，多作小结论，以便醒目，使读者易于把握你的要点。有些人写文章，只管自己如数家珍的娓娓道来，不知读者易坠五里雾中，有时须读完全文始知作者要旨，最坏的情形，读完了还很茫然，不能得一系统观念，甚至于不知主旨何在。如果能注意简练，能多加小标题，多作小结论，最后有总结论，对于读者就方便得多！

（二）纲目体

此为中国传统写作方法之一，即今所知，最早的纲目体可说是经传。经传中的史书《春秋》与《左氏传》尤可为纲目体最早期的代表，不过经与传的作者不是一人而已。后来正式予以纲目之名而成为名著的，是朱子的《通鉴纲目》。前文说过，常行体写起来最方便，不须在文章体式上作特别安排。但若文章太长太繁，读起来就不方便。就以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而论，无疑为一部文章写得好，且极精练的著作，但就阅读而言，仍有很多人感到疲困，不能终卷^[1]。所以朱子又就《通鉴》“增损隐括”，以为《通鉴纲目》，自云：“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自序》）“纲欲谨严而无脱略，目欲详备而不烦冗。”^[2]是谓用大字书写谨严的提要是“纲”，用小字分注详备的是“目”，故称纲目体。自此以后，纲目体成为通鉴编年体之一小宗，颇为盛行。不但编年体，即其他著述，亦多有此类，如马氏《文献通考》，引用材料与自己说明往往低正文一格书写，亦略寓纲目之意，但不严格遵守纲目体之常规。近代学人应用此体颇见成功

[1] 《通考》一九三《经籍考》“资治通鉴”条引其先公转述张新叟之言曰：“此温公所谓平生精力尽于此者也，如人之不能读何？公尝谓，吾此书惟王胜之尝读一遍，余人不能数卷已倦睡矣。”后代此书已被视为经典之作，但真正能首尾尽读者，恐仍不算多！

[2]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七章第二节引朱子《与门人赵师渊论纲目书》。

者，如柳翼谋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即为一例。宾四师《国史大纲》亦颇应用，惟亦不严格。故此体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可谓绝不陌生。但在西方，或许少用此体，近人一切模仿西方，遂绝少复用此体者。

其实此体大有长处，若写得好，纲文前后脉络通贯，为一篇极简练扼要的论文，而材料出处与作者说明以及冗长的反复论辩，皆可在低格目文中进行。读者如不欲详读，则只费短暂时间，先看纲文，已能了解全部内容与作者意旨。如承认作者之立论，即不看低格之目文亦可。若对于作者意见有所怀疑，或欲了解作者得此纲文之本末，始有看目文的必要。若只对于纲文中某几点有怀疑，欲审核其正确性，即只看纲文该几条下的目文。如此则读者对于全部论著内容易于掌握，且省时间。近代论文动辄数万字，一部书动辄数十万字，读来非常吃力，正当用此体式，以救繁芜之弊。盖此种体式，纲文实等于小结论或较详之小标题，而目文则说明得此结论、有此标题之原委，所以最能发挥以简驳繁的作用。我写《唐代交通图考》诸文，为其太繁，故即用此体，免使读者茫无头绪。

不过此体亦有弊病：其一，纲文甚简，往往只一两句，而为此一两句作解之目文往往极长，或即一篇较短论文，占数页篇幅，使此一两句纲文与下一两句纲文之间隔离太远，读起来可能使人有文思断续之感。我的《唐代交通图考》诸论文就极多此类情形。故就“纲”言，可谓极简练扼要，但就全文全书言，则不免有松懈之病。其二，目文与纲文不免往往重复。如纲文即是目文的小结论，目文可能如一篇较短论文，目文主旨既在说明纲文，就不免有与纲文同样文句出现，显得重复。此正如《春秋经》中文句时时重见于《左氏传》中一般。经传为两人著作，自不为病。同一人述作而有重复，总不太好。其三，纲目体本以纲文为主，目文为辅，但一切材料与辩论皆在目文中进行，纲文只是简单的小结论，不免显得太枯燥，

而精采反见于目文中。一般学力不深的读者，若只读纲文，极易轻忽而过，此亦是一病。

此外再仅就作者而言，用此体式有方便处，亦有麻烦处。其方便处之一，如纲文只用一条或数条材料即可证明，不须辩论，则材料逐条低格列于纲文之后即可，不费联络功夫。若用常行体，如不加意经营，则有生吞活剥之病，读来非常累赘，甚至显得文理不通。其二，若论题写作所用材料非常繁琐，需要得到的小结论也极多，必须解决那些小问题，得到很多小结论，然后才能连贯起来成为大结论，则用纲目体，不但较方便，而且绝对必要。如我写唐代交通路线诸论文，每条路的沿线据点，州、县、城、镇、馆、驿、关、梁、峡谷之类，皆一一考明，而且所用材料每极繁琐，往往一个地名，耗费数百数千字。若用常行体，势必很难连贯，读者更会感到茫无头绪，无法卒读。我用纲目体，纲文只云由甲地到乙地若干里，地形景观如何，在历史上曾有何事发生，乙地到丙地，丙地到丁地皆然，而一切材料考证，甚至有很长辩论，皆纳入低三格的目文中。这样纲文虽然显得文笔枯燥，但决不会使读者坠入五里雾中，不知所云。而我的辩论也能畅所欲言，供人仔细参证，知纲文所言之每一字句绝非凭空臆想。此为纲目体最大好处。至于麻烦处，即有些地方不好处理。写一篇论文，可视实际情形应采纲目体或常行体，自不成问题。但一部书，各章各节体式应前后一律，不能参差。若果全书采纲目体，但实际情形，有些全节甚至全章只是一篇辩论，无法割断，结论也只有一条，几句话，或一两句话，此时便会感到进退失据。为顾及全书体裁，只好也勉强写成纲目体，而全节全章只有少数几条。如我的《汉唐时代川滇东道考》（《蒋公逝世周年纪念论文集》，中研院），这是计划中《唐代交通图考》的一章，其第三节《唐代昆川柘东城通南诏苴咩城道》，主要的只是讲由今昆明通大理一道在唐代的驿程。这条路的行程，《蛮书》与《新唐书·地理

志》所记共凡六条材料，但颇有参差，且有脱误，要加以研究，只有将此诸条综合起来作一项比勘辩论，长达一万字，作为一目，而综合其结论为一条纲文，为这一节的主体，前后只能另配上一两条简短的纲文与目文，约两千字，这样很不相称。又如《唐代茂州西通吐蕃两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第一期），第一节实际上只有一条纲文。又《阴平道辨》（《新亚学报》第九卷二期），若作纲目体，各节亦只各为一条纲文。至于滇越道，我就汉晋道与唐道分别考证为《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与《唐代滇越通道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第一期）两文，辩论甚繁，各得万余字，然结论亦各只一条。故此三文，目前只作常行体发表，将来编入全书，势必要勉强改为纲目体，则阴平道纲文或只三四条，滇越道纲文更可能只有两条，各条目文即已发表之两文。如此处理，总觉不相称，然为牵合全书体例，亦莫可如何。所以用纲目体，亦有限制。我的学生谭宗义写《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新亚研究所专刊，一九六九），本欲仿我写唐代交通诸文，采用纲目体，我说唐代交通材料较丰富，我搜集得又极细密，可以考出各路的详细行程，故可用此体，也必须用此体。汉代材料太少，无法详考行程，每条路只能考得少数一两个据点，则每节往往只有一两条纲文，这样就不成体式，所以劝他仍只用一般常行体式。由此正见论文体式，也要看材料情形而灵活运用，虽然同样是考交通路线，但时代不同，材料情形不同，就不能采用同一种体式。从另一方面说，我写唐代交通，若只简单不细密不深入的研究，只写成一篇文章，那也只能用常行体，不必用纲目体。所以用何种体式又与如何做法有关，不能拘泥。大体说来，纲目体以用于材料繁富，工作细密，辩论较多的论著最为适宜。内容较简或规模不大的论著，就不必采用。

(三) 纲目变体

我在中学读书时代，看到一部日本人所著《文化移动论》的中文译本，各章正文非常简单，而于每句或数句之下作一注号，注文说明极详赡，皆置于本章之末，篇幅逾正文数倍。后读桑原鹭藏著《蒲寿庚事迹》，也用此体。今以冯攸译本（改名为《中国阿刺伯海上交通史》，一名《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为依据，略述其体例。该书共分为五章，十四万余字。每章正文都极简要，而联贯书之，一句或数句下标一注号，其注文称为“考证”，置于章末，各条“考证”且标立题目，或不止一目，每一标目之下，则详为考论，多或数千字，少仅列举一两条原料以资证明。计第一章正文约一千八百余字，“考证”二十八条共四十五标题，约二万四千余字。第三章正文最长，约四千二百余字，“考证”三十三条共四十一标题，约四万二千余字。第五章正文最短，约一千二百余字，“考证”二十一条，三十五标题，约二万五千余字。总计五章正文不过一万一二千字，而注文考证乃为正文之十倍。此种体式，正文之每一句即后面“考证”之小结论。此与前述中国传统的纲目体实际相同，只将纲文联贯书之，而移目文于章末，称为“考证”，又加以小标题耳。所以此体可视为纲目变体，亦有以简驭繁的好处。桑原此书为国际学术界的名著，然他人似少模仿者，惟曹仕邦近年写中国佛教史诸文颇用此体，甚为便利。

除此变体之外，我写《唐仆尚丞郎表》，其“辑考”诸卷，以每一官任为一单节，而以人名为标目，下面正文简述此人以某年月日由何官入迁此官，及中间加兼官阶，至何年月日又出迁何官。每一事句，如无问题须加讨论，即在此事句之下，以圆括弧识其出处；若须加讨论，则标注〔考证一〕〔考证二〕，而考证之文或百十字或数千字，皆置于本单节之后。兹就“辑考一”前页举出极简单一条

如下：

李勣——贞观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乙卯，由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迁左仆，仍开府、同三品，是为仆射带同中书门下之始（《旧纪》〔八月〕、《新纪》、《新表》、《通鉴》、两《传》），永徽元年十月三日戊辰，罢官，仍以开府同三品。
〔考证〕

此为正文，下面另行附〔考证〕，今不录。此条即讲李勣入迁左仆射事，两《纪》、两《传》、《新表》与《通鉴》皆同，无异说，惟《旧纪》作“八月”，为小异。而其迁出，则材料所见有不同说法，当讨论，故另为“考证”。此法一方面运用中国旧式夹注体，一方面运用如桑原书之纲目变体，目的不但欲使正文简练，而且尽量节省篇幅。回忆此书初稿逾二百万字，各书所见官任，皆详为综录，为长编，然后删削为定稿。当时中研院迁台不久，全部经费据说只有新台币十余万元，此书规模既大，如欲出版，非极度浓缩不可。而当时局势尚未稳定，此书以早日出版为佳。所以我不遵守任何固有体式之常规，而变通运用，成此特殊新体式。而“辑考”之前有“通表”，为之总纲，又不啻即全书之正文，“辑考”即其考证。所以此书实亦可谓为双重纲目变体。自信此书深得以简驭繁之要义，体裁运用颇为成功，读者可因“引得”以检“通表”，因“通表”以寻“辑考”，极为方便。只是“辑考”中有不须考证者，只以圆括弧识其出处，读者若欲核实，须检查括弧中的书卷，较为费事耳。

（四）复合体

上文所述诸体各有优劣，一般常行体，容易繁芜，供专业学人阅读，固无不可，若供一般人阅读，往往病其冗长，尤其大书，使

人难以卒读，温公《通鉴》文章精练，尚有此感，他人更不必论。纲目体诚为以简驭繁的良法，但亦有弊害，如前论。尤其第三项缺点，即纲文极简，或多作者精心缔造之小结论，但也只有专家一看即知为作者新创获，而感到兴趣。一般人若不看目文内容，只就纲文一瞥而过，以为平常，不知作者之艰苦与内容之价值。这样，就作者言，只要读者能接受其纲文，已是成功。但就读者言，虽已吸取了新的知识，但兴趣不会很浓厚，认识也不会能深刻，此仍是一大损失！所以我想，写作论著，贡献社会，若只供专家阅读，一般常行体或纲目体都无不可，虽然大著作作用纲目体或许更为恰当。但若是一部下深刻功夫的大书，而欲兼供一般人阅读，就得另想办法，期能最满意地达到此项双重目的。

我的计划，最后一部书是《国史人文地理》，既欲稍深探讨，供专业学人的参考，复欲贯串通论，供一般知识分子的阅读。为欲达到这样双重目的，所以想用一种复合体式，亦可谓简文详注体，而注文置于小段之后。稍详言之，即正文仍如一般常行体，但文笔力求简净，惟采主要材料，作简括论证，避免冗长繁复之病。至于次要材料与繁复委细之辩论以及有可补充正文之论点，皆纳入详注中。如此则正文或能精简而不枯燥，注文则能委细曲折，畅所欲言。此种方式，庶能兼具常行体与纲目体两者之所长，避去两者之所短，以达到专业学人之参考与一般知识分子之阅读的双重目的。近人为文例有附注，但不甚长，或置于篇章之末，或置于所注本文同页之下。我想注文置于篇章之末，则读者不胜前后翻检之劳，影响阅读情趣，并不是个好方法；注文置于所注本文同页之下，方法很好，但只限于简注，不能太长。关于此点，另详下篇。我想此书详注既录材料较详，且往往有繁密曲折之辩论，自为一篇短文，占数页篇幅，自不能置于本页之下。故想视正文内容之起讫分为若干小段，本小段之各注文即置于本小段之后，用小字刊行。如此，既期正文

之连贯，又免读者前后翻检之劳，影响阅读情趣。去年所写《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刊《大陆杂志》第六十一卷五期）即用这种复合体裁，以为尝试。惟此种体式，读者虽便，但作者则颇费心机，因为最重要材料与简要辩论既放在正文中，但材料何者最重要，何者次之，论证何者应放入正文，何者当退入注文，进退组织之间，就很费斟酌，花时间，费心力。但我已渐入老境，这样一部大书，又要特费心力创体式，也许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是否能精心结构，成此理想，尚待实验证明。我在撰写《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之前，曾由《国史人文地理讲义》中抽刊《扬雄方言地理区》（刊《新亚学术年刊》第十七期）与《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同上，第十八期）两文，体式各异，也都是试验性质。《学术地理》即采常行体，稍加附注，置全篇之末。《方言地理区》虽亦采常行体，但正文较简，而附注往往甚详，篇幅逾正文之半，素材附后，又逾于正文，此其小异。目前倾向用复合体，如或力不从心，即用《方言地理区》之体式而再稍变通之。即将“注”分为两种。其仅明出处者，或注文极简短者，即置于所注正文本页之下；其注文较繁，或为一篇短文者，则别称为“考一”“考二”，附于各章之后。若是直排，则简注不妨即作夹注尤为方便。要在随宜适应，灵活变化，期便阅读而已。

六 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论文体式已如上述，此外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都与体式有关，续分述如下：

（一） 引用材料方式

现代人写学术论文，对于材料的处理方法，有人将原料直接录入文中，有人将原料加以融化，用自己的话转述出来，有人参合这两种方式，斟酌运用。我想直录原料与作者转述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各有优劣。就作者来说，融化原料，以自己的话说出来，一方面一定要对原文透彻了解，同时作者自己的文字修养也要较高，这是难处。但也有便宜处，即以自己的话转述史料，可以很流畅的与前后文打成一片，可免引用原文生硬阻塞之病。反过来说，引用原文，作者可以省去不少融化史料的功夫。但至少有两项难处。第一，引用原料，原料并非专为你这篇论文而设的，有时原文很长，要尽量删节到适合自己这篇论文的应用，而又不失原作者的本意，这就要加一番心思，一番训练，并非易事，事实上有时比融化原料以自己的话说出来更难。好多人大段的抄录原料，动辄百十字至千百字，那是要不得的！第二，把原料插在正文中，要想行文仍然流畅，条理井然，却颇不易。因为材料原文碍手碍脚，处理得不好，变成一大堆原料，前后不能通贯，甚至于自己说一句，接着一段原料，再

自己说一句，又是一段原料，如此下去，弄得上下不连贯，不成其为文章。此类情形极普遍，翻开学术书刊，可谓比比皆是，甚至很有名的学人也不免此病。有一位地理教授要强写历史地理方面论文，送学报刊载，全篇论文大多如此，弄得编者头痛，莫可奈何！前几天看到胡菊人先生一篇题为《文章》的短文，大意说学术论文不讲究章法文句，不能算是文章。就目前写学术论文的情形来说，诚然不错。但我认为学术文仍当注意章法与文句的锻炼，不过不必像写一般文章那样讲究文字技巧而已！若如上面所提到的一般写学术论文的情形，根本文理不能连贯，实在不像话，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

至于读者感受，直录原料，若原料太多，自不免感到芜累。不过若作者对于原料了解不够，甚至误解，而错误运用，读者可一目了然，不会为作者所蒙骗。若原料经作者转化述出，文章自能流畅轻快，但若转述有误，只有读者程度很高或知道那条材料真相，才能知是作者的误解。至于一般读者则只有和盘接受作者的误解，那就为弊太大了！这种毛病相当普遍，试举一个较离谱的例子如下：

某位先生著《中国经济发展史》，述汉武帝盐铁专卖事说：元狩四年，御史大夫张汤建议盐铁的方策，“这事分由东郭咸阳和孔仅两人主办。咸阳专管齐盐的煮制和运销，孔仅专管南阳大冶。”并且绘了个行政系统图，大司农下辖盐铁长丞，长丞下领两大职任，其一掌“齐之大煮盐”，其一掌“南阳大冶”。作者注明这是出于《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但《平准书》原文云：“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治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食货志》同。这只是说明咸阳、孔仅二人的出身，不是居官任事后的分职。作者读古书的能力太差，又粗心大意，致有此大错^[1]。读

[1] 此条为宋叙五先生所发现，见其所著《评钱著〈中国经济发展史〉》，刊《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十七期。

者若对于咸阳、孔仅事本无认识，那只有查核原书始能发现了，但读者势不能逢注必查，岂非贻误太大！

以上谈现时写论文者两种处理史料方式的利弊。就我的观点看，专门研究性论文与通论性论文，在材料处理上应有不同。通论性的文章当以作者自己转述为主，尽可能少抄原料，除非原料极其重要而且原本极简要不繁，这样可使行文简练，使读者易于领受。至于专门研究性论文，则相反的以录引原料为原则，自己转述只作辅助，而且只限于不太重要处。有时为了怕篇幅太多，不得不只用自己的话说出，注明出处，那就要特别小心，不要误解，以免贻害读者。我的《唐仆尚丞郎表》，凡不须考证处皆采此方式，以省篇幅。引用原料必然使篇幅增多，易见繁芜，但不会贻误读者，最为重要。例如上引汉武帝时盐铁专卖事例，若作者直引原文，则作者虽有误解，但程度稍好的读者应可立辨，不致大有弊害。所以就学术观点言，宁可引用原文有芜累之病，不要贻害读者。而且重要的材料，若直接引录下来，也可增加真实感，使读者不易轻忽而过，这也是直录原料的一层好处！

不过引用原料又当注意两点，即上文所说两项难处。第一，原料本极简要，自不成问题。但大多数原料颇长，若全部照抄，实在太多，有时多条材料证明一件事，若都照抄，实在要不得。所以作者在引用时绝对必要痛下剪裁功夫，一字一句皆须斟酌删略，以虚线表示，愈删节得多愈好，使每条引录的原文都很简短，但又不能有失原意。这也是一项锻炼功夫，不可不学。不过也有例外，如遇特殊基本史料，则不妨照抄，或节录较详。但这不是轻常出现的情形。第二，将原料插入正文中，务须注意上下文意脉络的连贯，在一条或多条材料之前之后，通常至少要用几个字加以联络，使材料纳入正文，显得颇为自然，不能抽去。不要把材料硬塞在中间，使文脉阻断不相连属。若将原材料抽去，反见前后文理通顺。这样引

用原料，就更要不得。

再者关于引录原料格式，作者每以某条材料极重要或太长，而将其另行低若干格排列。这是为引起读者注意，或为欲使文字眉目清晰，自有其必要。现在写文通例，每段首行低两格，第二行以下皆顶格，则引用原料而提行低格者，应有不同，以示区别。最好通体低三或四格较为清楚。有些人引用原料，第一行低两格，第二行以下顶格，此便与自己文章一般，就易显得混淆不清。我写《唐代府州上佐与录事参军》一文，刊于《清华学报》新八卷第一、二期合刊《萧公权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原稿按我的惯例，引用原料，各行一律低三格排列，非常清楚。但主持校稿者说，该刊体例，引用原料提行者，首行低四格，以下各行皆只低两格。低两格即与每段起首相同。该刊为纪念性质，不便抽稿，只得由他。但是印出之后，看来就非常混乱。我引用原料，条数极多，而皆节录极短，通常只两三行，因此看起来满纸一行高一行低，非常参差，就使读者眼花缭乱了。大抵西方论文有如此者。若引用原文之处不多，本不关紧要，若引用原料条数太多，又很简短如我的论文，就很不妥当。以前人“食古不化”，现在人又“食西不化”，不通过自己思考是否合理，一味模仿，真是没法！

（二）注释方式

论文为避免正文累赘而又欲详明周瞻，因此自作注文，是很有必要的。但注文放在何处与排列方式，值得讨论。

中国古代学人著作很少自己作注，但为前人的书作注则极普遍，尤其是经书。经书有经、传、注、疏，传就是为经作注，注就是为传或经作注，疏就是为传与注作注。就体裁言，经传犹如纲与目，注疏则纯如现在的注释，不过通行版本，注文就夹在所注释经传本字本句之下，多作小字双行。最重要的古代史书也多此例。如《史

记》有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汉书》有颜师古《注》，《三国志》有裴松之《注》，《后汉书》有章怀太子《注》，都极有价值，为不朽的名著。通行版本，各条注释也都夹在原书史文本字本句之下，作小字双行。因为这样的方式，注文夹在正文中，而作双行小字排列，所以通称为“双行夹注”。四五十年前，中国学人写书已多自己作注释，而沿用此体，作双行夹注。但后来也许为了排版的方便，改用与正文同号或稍小号字，也排成单行，只加一括弧以资识别。这或许是抗日战争期间因陋就简之故。平心而论，双行夹注，于作者读者皆极方便，而且不易排错，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毛病。不过注文不适宜太长，如长至数页，就多少影响正文（即本文）上下的连贯性。至于改用与正文同号或稍小字型排成单行，只加括弧为别，如注文只有几个字还可以，若是长了，不但更影响正文的连贯性，而且可能一时找不到正文的下一句在何处，所以此类注文绝不能长。

西方论著，例采附注方式。即所有注文附列于章节之末，依次编号，而正文中只于所注文句之下作一注号，读者可依注号数第在章节后附注中去查。近人一切模仿西方，所以此种附注体裁自为一般人所不加思索的全盘采用。我的想法，这种体式本也是个很好办法，尤其注文较长的论著应当采用。若很简单，甚至只注明出处某书某卷几个字，那就无大意义。这种章节后的附注，对于读者本来就有前后翻检之劳的毛病，甚至于影响阅读的情趣，若翻到后面，只是注明出处，并无其他说明，往往使人不免失望。我看此类论著就常有此种感觉，有时看正文不太明白，但句下有一注号，希望在注中得到更深入详明的解释，结果大失所望。不过就西方书籍而言，每个字由多数字母拼成，每行只能排几个字或十几个字，虽然只是个短注或出处书名，至少也要占去一两行，为了避免妨碍正文阅读的流畅，不得已移到章节之后作附注，此犹有可说。中国字方形，

每行至少可排三十字，多至五六十字，此类短注倒不如就夹在正文中，若是双行夹注，每四个字才占正文一格，故全注所占行格不会太多，既不影响正文的阅读，更不会使读者有前后翻检之劳，岂非很好！而且此种西式附注体，一般粗心匆忙的作者还易犯一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即在正文中所记的注号与后面注文的编号数目不符，还有些有注文，而在正文中忘记写注号，甚至正文中有注号而后面附列的注文却无此条，这就更粗心了。若是夹注自不会有此毛病发生！

不过最近二三十年又流行一种新的底注体式，这大约也创自西方论著。此种体式，附注仍与前面所说的一般，不过注文不放在章节之末，而放在所注释正文本句之同一页的下段，用小字刊行。我想这是一项进步，也可能就是为矫正过去的一般论文附注的缺点而改进的。这样体式既不会妨碍正文，有中间隔断的毛病，而检对起来又极方便，不必前后翻检，更不至使人有失望的感觉。不过这种体式也只能适合于简注，至多只能用于注文不太长的论著，若注文太长，甚至超过正文，就绝不适用。而且这种注式只能适用于横排的书，若是中国旧式直排的书，虽然也已有许多人用此体，但每页正文都要中断，以便让出最后若干行去排注文，那就很不好，倒不如用小字作夹注了。

以上将各种注释体式逐一说明，并以个人观点加以评论，认为各有优劣。大体上说，利用小注作为正文的辅助，主要是一般常行体的论文。至于其他各体，因为纲目体的“目”与纲目变体的“考证”，事实上也等于是变相的注释，所以要再利用小注作辅助的必要已减少。尤其变体的“考证”与复合体的“详注”本身已是注的形式，若在“考证”“详注”中用注，只好用夹注体了。

再就上文评论各种注式的优劣看，无疑的以注文排在所注释正文之同页的下段为最佳，当然要尽量避免长注，如有少数长注，可

另标作“附考一”“附考二”……附列于章节之后，有如纲目变体的“考证”。又若专就中文论著言，只有几个字的短注及只明出处的注，或者就作夹注以括弧识之，以省篇幅。作双行夹注尤佳。长注始作附注处理，放在章节之末。这两种方式，都是变通的办法，参合运用，最为妥当。或者曰，如此参合运用，体例参差不一致。其实此类事，只求读者便利，尽可灵活运用，不必拘泥于表面形式。有些人或者说，出处书名列在文后，可以一目了然，知作者曾参考什么书。又中国书名虽简单，但标明卷数页数及版本，也就不短，放在正文中作夹注也有不便。其实现代论著例附参考书目，又有版本，都不必在注中说明。标明页数，只有在学位论文中有其必要，因为可以训练初学要自己直接找材料，标明页数，以便审阅者易于核对。一位训练有素的学人，不必在此小处拘泥。尤其是规模大、篇幅长的著作，如在此等小处噜苏，每条注明出处的小注也必占一行甚至两行，以正文五十万字计，注明出处的小注至少当有一千条，占去篇幅也当在五万字以上，岂不浪费！若以我的《唐仆尚丞郎表》为例，“辑考”约六十一二万字，考出居官者三千数百任次，以括弧作注夹于正文中以明出处者，每任次平均以两括弧计，即有六千至七千括弧，每一括弧平均约七八字，即此等小注占去篇幅不会超过六七万字。但括弧中所记不只一书，若改作附注，且详列其卷数页数，则每一括弧中之注改为附注后，要占一行半至两行，即是一万行以上，每行四十六字，即要用四五十万字篇幅，几乎要与正文篇幅相等。换言之，如不作夹注而作附注，将会增加三四十万字篇幅，岂不可惊！此等处岂可不加考虑！至于有些人务欲张大其书的体积，以“大”为贵，那就不足与论！

七 论文撰写与改订

史学论文最重要的是搜录材料，等到材料搜集得很完备时才开始撰写，这样可以一气呵成。写成之后，只能续作补订，若要大改，就很麻烦。此如艺术品一般，绘一张画，写一幅字，布局着墨，都该有一定意趣与匠心。绘成写成之后，若要改动，一定很难显得完美。写文章也是如此，运用材料作实证的文章更是如此。若是写完后发现反面证据，改动势必较多，更是牵一发动全身，就很困难。尤忌找到一点材料，有了一点意见，就抢急捉笔，将来材料增加了，再来修补，陆续增加，就陆续的补订。那除非是作者本无中心意见，或者只是编排材料，不须严密组织的文章则可。若是须要严密组织的论著，就一定要将所有材料尽可能的搜集齐全始能动笔。

例如我的《唐仆尚丞郎表》，这部书研究唐代中央政府行政中枢尚书省行政长官的任次，因为各种官有一定的员额，例如六部尚书各一员，侍郎有些部一员，有些部两员，所以同一时间，任各部尚书与侍郎的人不可能超过规定的数额。但史料所见，有两人同时任某部尚书任者，同时在侍郎任者也往往超过本部员额。又或者此条史料说某人某年月日在吏部任，另条材料又显示同年月日此人在户部任。如此种种冲突，中间必有问题，须得综合所有资料（例如此人其他官历，或其他的人此时期的官历），转弯抹角，作种种推论，然后始能作出判断，安排下来。若是写录的材料挂一漏万，不很全

备，虽然根据当时手上的资料安排下来，若将来又发现非常可信的资料与我的安排有冲突，势必要改，那就可能牵涉到好多人在本部的官任年月，在他部的官任年月，如此连锁反应，岂非麻烦之至！这就因为这部书的工作，组织严密，彼此牵连。若是我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则增补改订就比较省事得多！

然而文章初稿写成之后又一定要改。必要时且要不怕麻烦，不惜大改。因为初稿往往只是讲出大致意旨，或论证主体，也可说文章的粗胚，很可能有毛病（论证错误），或有漏洞（不够精密），或者还有可进一层讲的地方，这一切都待改订时的审核与补充。而且最好初稿写成之后，打铁就热，马上审核补充。因为由排比材料到初稿写成，脑海中对于此问题已有深度了，再进一步不难。若写成初稿就搁置下来，那末你的脑筋慢慢从问题曲折中退了出来，对于材料也生疏了，以后再去审核补订，就较困难。所以要即时再追下去，直到当时自觉已不能再改进了，才放下来。此时最好仍不发表，过些时也许又发现材料或新的意见，可再来一次二次乃至多次的补订，那就最好。

我去年写《北魏参合陂考》（刊《新亚学报》十三卷），先把主要材料都已准备好了，主旨自然亦已确定，然后动笔撰写，只用一天时间便写成初稿约四千字。但第二天第三天作修补功夫，却花了两三天，篇幅只增加了一千余字。虽然篇幅增加得不多，但漏洞以及各方面可能的理由都讲到了，也就比初稿缜密得多了，这就是一例。又如《天宝荔枝道考》（刊《大陆杂志》五十七卷一期），在再稿中已改订不少，正拟送出刊行，又发觉尚有可修订处，乃再详加改订为第三稿。此次精进颇大，正见文章之贵能仔细精改。若自恃才学，写学术论文也率笔一挥，不加复核与改订，即匆匆刊布，那种文章必然漏洞百出，或显得论证松懈！

再就我已出版的两部书说。《唐仆尚丞郎表》初稿二百万字以

上，文章松懈得多，经过全盘改写，删为定稿，连“通表”不到一百万字，可谓相当精练，出版至今已二十余年，除了下文所谈到的一些遗憾之外，就写作言，已无所憾，这也是写成初稿，马上变换体式，详加删改之故。若时间一过，也许就不可能！《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已出秦汉与魏晋南北朝两部各两册。《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本为大学时代毕业论文，到齐鲁研究所时续写完成。当时宾四师送到商务印书馆，希能出版，但彼时后方物资缺乏，经济困难，这部书又颇大（当时附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后来分别刊行），商务不想印，免致亏累。后来有幸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复加改订易稿拟出版，又值时局变化，迁到台湾，继续改订工作，最后且改易写作体式成为今本刊行。计此书自一九四〇年工作开始至出版时将近二十二年，中间除了删削本外，全部易稿凡三次，局部改订不知若干次，至今对于此书的材料运用与行文论断仍感满意。而《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虽然工作开始也早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并且陆续写了几篇论文，但在一九六〇年前后全书撰述时，因为要赶其他工作（看成书后记），又因为有一笔钱等待印书，迫得我将此书提前付印，所以只是初稿，未及详加删订，粗糙繁芜之病在所难免，至今为憾。若当时能再精心删改一过，或放置些时再改订一次，论断成果可能并无大异，但材料运用与文字精练，必大有进境。

再进一步说，文章改订，要在未发表之前。一经发表，改订的机会就很微。因为时过境迁，不但兴趣消失，而且可能为其他工作拖住，不能再顾，刚才所提到的《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就是一例。再如我写《唐仆尚丞郎表》，在起草之前，本已看了《金石录》与《宝刻类编》，将材料抄录下来，但不知怎地，在检查材料作分类时，将此两书的材料漏去一部分，到全书出版以后才发现，幸无与已安排之官任有冲突处，只可据以增补数任。又此书搜集材料与撰写，是在中研究极度困难时进行，当时史语所图书未开箱，找

一部书极不易。唐人文章只有一部《全唐文》，《文苑英华》也看不到。后来很想根据遗漏的金石史料与《文苑英华》作一补正，迄未果行。又如我在一九四六年所写的《北魏尚书制度考》（刊《史语所集刊》第十八本），这是我进史语所后所写刊的第一篇论文。当时年轻，自信所获成果甚丰，有机会马上发表，就不及删改而发表了。多少年来总觉得这篇文章虽然成果丰硕，价值极高，但写得太粗糙，欠精练，只能算是长编，若大事删削为五六万字篇幅（长编约十一万字）则尤佳。可是一直为其他工作拖住，不暇再改。大前年中华学术院编辑《中华学术与现代丛书》，向我征稿，限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拟题，云不避旧文之改作，但以一万字为原则。我为响应此项征稿，乃抽暇就此文作一述要，刊于该丛书第三册《史学论集》（华冈出版公司编），仍未能认真改作，不知俟之何日！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不过我已可谓最能舍力修改旧作，且不惜大改，凡论文重印，几乎例必改订，如《唐史研究丛稿》内有几篇已经刊印过的旧作，无不再悉心改订。其第一篇《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不但改订，而且更易体式，费时甚多。至于我写新的论文，如唐代交通诸篇，往往改来改去，满纸糊涂，几不能自辨，只得易稿誊正，又可能再改。即如这本小册，并非严格的学术性论文，但再稿完成后，仍随时拿出改订不下四五十次，或删削，或增补，或几个字，或数百字不等，因此有一部分必得易作三稿四稿。不过改稿习惯过深，也不很好，纵是写一张便条，写一封给儿女的信，也要起草，尽管草成并无大改动，但不起草，就思路凝滞，不能下笔，这也是一病！

八 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一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通常总是要有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两者相配合。客观环境所涉甚广，可说整个国家社会无不息息相关，而最直接影响个人成就的当是早期的教育与成年后的工作环境。主观条件，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天分、性情与身体健康等等。教育与工作环境多少有些要碰机会，天分更是先天生成，不可强求。但不懈的努力对于这些多少都可作若干主动的创造与控制。

就教育言，现代教育几乎是绝对开放的，自己的努力，虽不一定能百分之百的取得如意的机会，但能获得的可能性总很大。谋取适合的工作环境，虽然比求学难得多，但我相信，只要自己具备应有的条件，至少可以自己操纵一半。好多人频遭顿折，总以为怀才不遇，怨天尤人，诅咒社会，其实大半还是自己没有具备各种适当的条件（不只是自己的能力）！我相信这个社会虽然不是绝对的公平，但还是有相当公平的；真正能先充实自己，做人正常，大都不会被埋没！我个人今日有这一点成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的培养，无疑的是项重要因素，这当归功于当年傅孟真先生

大公无私的录用一个毛遂自荐的陌生青年^[1]。这就是社会仍有公平的一个显例。不过如果不是自己善于利用这一优良环境，而懈怠自己的工作（史语所工作是无人督促的），或分心外务（外骛名利的机会仍相当多），相信像我这样才具平庸的人，恐怕很难有相当成就。李济之先生曾慨乎言之的说，“你是充分利用了史语所的环境！”我自信这话非常正确。中研院诚然是中国唯一的最好的治学环境，但就我来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十余年的体验，大学教职，若自己能摒除外务，淡薄名位，而集中心力，控制时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台湾一般大学教职更较清闲（兼课太多自当别论），大可埋头做自己工作。何况教书也有好处，在讲授中往往发现新问题，涌现新见解，也可扩大注意范围，而且多少有点心理上的压力，这都是中研院环境中所不及的。因此可说正常的大学教职仍与中研院的环境相差不远。所以主要的关键仍在自己的人生修养与工作精神！没有这些主观条件，环境再好，也没有用！至于像钱宾四师在小学中学教书，每周授课时间，有时多到三十几小时，仍能做出超人的成就，那是特例，自不能希望人人都能做得到！

再说人的天分虽然是先天生成，但“勤能补拙”这句话多少还

[1] 我平生愚鲁迂拙，却有幸得到不少前辈学人的鼓励与帮助。我对于这些前辈学人都永远铭感在心，不能忘怀。民国三十四年秋我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经过，详见《我对傅孟真先生的感念》，文刊《仙人掌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中国的出发》（一九七七年三月）。在傅先生给我的回信中，还提到王抚五先生前曾有信介绍我到史语所，但无著作，无从考虑。这真大出我意料之外。原来在那年的春天，抚五校长到了我的临时工作地北碚，我去看他时，表示希望能回到母校读书，得到他优先的考虑。不想他回家后，因故辞职！他在辞职前后百端纷忙中，居然还记得远隔千里之外的一个学生。母校没有机会，仍想另外安置在一个更适当的地方。此番爱护的热忱，实在使我感动万分！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我与两位王校长》，对于此事有一段感念的回忆。文刊《珞珈》第二十八期（一九七〇年十月，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刊）。我自愧无能，除了遇有公开推荐或被咨询的机会可尽我所知提供有利意见之外，对于后辈青年无力提拔。惟有自我努力期于学术上有点滴贡献，讲书时作充分准备而已。今又不揣浅陋，不避自伐之嫌，“要把金针度与人”（胡先生语），亦前辈学人遗爱之感召也！

有些真实性，并非只是鼓励人的格言。就我的经验而言，假若人的天分以理解悟性与记忆力为重要的两方面，我认为记忆力很难凭努力而得到增进。努力虽不能真正增长记忆力^[1]，但不断努力的结果，仍可吸收到丰富知识。我实在鲁钝之至，尤其记忆力之坏，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在大学读书时代，碰到两位记忆力特强的同学，他们几乎真能过目不忘。其中一位，《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红楼梦》等能整部背诵，自己真很惭愧，深感人类记忆力何以相差如此之远！但我并不气馁，随时与书本接触，也就记得不少，只是不能整篇大段背诵耳。而那两位同学并不因为记忆力特强而有优良成绩，后来一个英年夭折，一个迄无所闻。所以归根究柢，仍是努力最为重要！但努力不是一时的，是要长久不懈的，有方向有计划的，这就牵涉方面很广，而且自己的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治学的成就尤有绝大关系！

此下两篇，我想就做学问努力的途径、工作要诀与日常生活、人生修养等问题，提出一点意见。其中虽多属老生常谈，但默察今日社会情形，仍觉有提醒一般青年的必要。惟是涉及范围比较庞杂，亦只拉杂言之，分节标题不定恰当。

兹先谈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一）立志与计划

做学问要想有较高成就，最好能先有抱负、有信心、有计划，这是努力途径的起点。

[1] 此所谓努力是指多方面的，但我却未曾试图努力磨练增强记忆的能力。因为我觉得记忆力好，记诵得多，对于研究问题的思考固然大有帮助，但我想自己记忆力既不好，勉强谋求增进，恐怕效果也不大，与其花大多工夫去记忆，不如多多阅读，多多思考。至于材料，纵然记忆力好，也要抄录，能记得的究竟有限，所以我也就不特意在记忆方面下功夫。

第一有抱负。也就是要有大志，这种志趣抱负，不专为己，兼要为群，对于社会人群有一份责任感。谈起立志，记得我在小学初中读书时，老师常常灌输同学此种意识，自己也跟着看些讲立志的文章，憧憬着某些古人的丰功伟业，也想着自己将来要如何如何。现在青少年，似乎很少能接受到这类熏陶。当我的儿子晓田在高中读书时，我曾经向他提到要立志，他竟然毫无此种观念，似乎学校教育，从来未向他灌输此种意识，这也是我的疏忽。默察其他青年，恐怕也大多如此，只知读书谋生，争取社会地位，上焉者有些为社会服务的意念，但问他有什么远大抱负，恐怕很少人能具体作答。这样一个没有长远目标的青年，离开学校，投身社会，自然完全为社会环境所控制，没有一点自立的余地，机会好的，可在社会上做出一份事业，颇有成绩，在学校可充当一位教师，甚至颇有名的教授，但要在学术上有真正较高的成就，就不太可能。至少史学方面是如此。因为有些学术园地，尚可半凭天才，史学则十之八九要靠努力，所以国际上，历史上，有极有名的年轻科学家、文学家，但不见有一位很年轻的大史学家，因为史学必须要经过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始可能做得到，没有远大志气，如何能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

或者曰悬立个远大志向，但不一定能达得到，岂非徒然妄想，不切实际。其实不然。有了远大志向，始能有个目标，比如大海航船也要有个固定的目的地，才能有一定方向，中途纵然遇到种种海流的阻挠，终能曲曲折折，突破种种困难达到目的地。若无固定的目的地，那只有随波逐流，不知漂航到何处！至于说立志不一定能达到，那诚然也是事实，但有有志而不成，无无志而有成，立志可能失败，亦可能成功，若无一定的志向则绝少成功的可能，这中间自然有很大差别。何妨有个远大抱负，一步步的去做，纵然落于空想，有如作梦。但能好好的作一番梦，也很不错，是幻是真，姑且不论！

第二能自信。这是跟着立志而来的必要的信念。一个人没有自

信心，纵然立志，也等于未立志。自信心的基础不是也不能建筑在天才上，不能自信有天才，想凭藉天才以达到立志的目标，那是不可靠的。必须要下定决心，奋发努力百折不回的去达成目标，纵然明明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要坚定自信，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去做，企求愈能接近目标愈好。

第三有计划。有大志有信心还不够，因为只有大志有信心，仍是空洞的，必需采取实行的步骤。实行的步骤第一要有较长远可行的计划。古人为学，也许有些并无一定长远的计划而能成为大家，哲学家、文学家可能较多，史学方面也可能有，但相信比较少，一般大史学家仍是以有目标有计划的工作者为多。例如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写《通鉴》，马端临写《通考》。这些都是大规模的艰巨的工作，要说是事先没有计划，可谓绝不可能。温公作《通鉴》的过程最为人所知，那是绝对事前有周详计划的工作，决非随意工作的成果。近代史学更趋繁难，若只求小小成就，固无所谓，若求取较大成就，决非事先有个大体固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不可，否则纵能有成，也将大打折扣。例如陈寅恪先生，是近代一位伟大史学家，据俞大维先生说，陈先生有意写一部《中国通史》，但未成功（见《怀念陈寅恪先生》，刊史语所出版陈先生论文集），原因可能很多，但陈先生似乎始终没有个计划，当为最大原因之一。

就我个人而言，为学志趣经过几次变迁或修正，但每一个阶段总有一个目标与计划。自一九四六年以后，我为学重心转到中国历代人文地理方面，要想从地理观点讲中国历史，也妄想为中国历史建立一个立体的历史观。在这个大前提下，遂有三步计划。第一《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唐代人文地理》，最后《国史人文地理》。这三步计划，由小而大，由专而通，有其一贯性。中间尽管曾经自觉才力有限，时间不足，有放弃最后一项计划的想法，但后来仍是想尽力而为，不轻易放弃最后目标！有了这样三步骤的计划，三十

余年来一直以此为中心，不懈的工作，也成为我生活中乃至生命中最主要的支柱，乐此不疲。今日看来，第一部书《唐代交通图考》已接近完成阶段，应无问题。第二部书《唐代人文地理》，虽然按照既定计划搜录材料已逾八九万条，略近完备，但仍撰述需时。第三部书《国史人文地理》只杂集史料为讲义，逾百万言，抄录复印资料、购置参考书刊亦不少，但撰布论文才三四篇，去完成阶段更为遥远，而年事已长，惟当知其不可而为之耳！我这些工作，虽不一定都能完成，但可完成逾半，殆无问题。然若事先无一定的目标，无坚强的信心，无长远的计划，相信一部都不能完成。即以《唐代交通图考》一书而论，单讲规模之大，或工作之仔细，都不足异，但兼而有之，恐怕并非易事，决不是随意工作者所能幸致！

（二）工作要诀

在学术工作进行中，有几点须要切实做到。胡适之先生曾提出“勤”“谨”“和”“缓”四字诀，似乎宋人也已说过。我想这是基本的工作要诀，还有“恒”“定”“毅”“勇”四字，也同样重要，当切实做到。就中“定”字诀留在下一篇再谈，兹先就其余七事略加说明。

（1）勤。这是学术工作者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不能勤，根本谈不上做学问，做其他的事，恐怕也不会有多大成就。就治学言，要勤于阅读，勤于思考，勤于抄录，勤于写作，也相当勤于听受与讲授。下文就此各点稍加说明。

阅读要精读、粗读、检读、泛览兼具并行。精读是指基本的书、基本史料言，随读随作笔记，最好同时进行圈点，至少作选择性的圈点，将紧要处圈识出来，以便再检时易于发现。粗读是指一般非基本书籍史料而言。检读大抵就写作时临时检查而言。论著写作，基本功夫在平时阅读思考与抄录。而临时勤于检查也极重要，有时复查已录材料再次精读，有时因已录材料而联想其他材料，有时为

问题的联系而临时翻查，总之有种种必要，须不惜时间，不怕麻烦的检查，纵只一两个字，也不能马虎，轻易混过！泛览则博识群书，略识大义，尤指自己论题专门工作以外的知识而言，这样可以扩大眼界，有时对于专门论题也有帮助。

思考与阅读事实上是同时进行的，阅读而有所识别，就已经用了思考，若不用思考识别，则阅读何用？此所谓“学而不思则罔”。然而有些聪明的作者，喜欢凭空思考，懒于阅读，这在史学绝对要不得，此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不过有时却不妨丢开书本，脱离材料，到山颠海滨去玩一玩，凌空的想一想，对于材料的联系，条理的抽绎，系统的建立，也许有很大帮助。不过基本的功夫还是在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上。

抄录。在古人治学，抄录或许不太重要，因为须要阅读的书籍少，特别着重记忆，四书五经四史之类多能上口成诵，所以不重抄录材料。但书籍不易得，动辄全本抄录，也能增加了解与记忆。现在书籍太多了，工作也更精细了，无论记忆力强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专凭记忆来做学问，必须在阅读的同时，选择与自己论题目标有关的内容动手抄录，记忆反居于次要的辅助地位。内容简短或极重要，就须节录原文。内容太长或次要，就当摘录要点。在摘录的同时，就要考虑到此条的作用，以一两字识之，或在原文重要字句旁作一记号，以便将来应用时触目即知其用处。一俟材料书阅读完毕，即可运用这些抄录的材料分类排列，逐章逐节完成。在写作进行中只能临时翻查材料作为辅助联系之用，或就已录材料加以核对^[1]。

[1] 学术工作，自己多购书也很重要。“书非借，不能读”，诚然也不错，但基本书籍，包括基本工具书，就必须自置。因为自己的书，看时可就内容要点自作标识，又可标记某卷约在何册，以便临时翻查，比较容易。尤重要者，基本书籍随时要用到，当写文章临时碰到问题要检查一下，或核对一下，自己有书，可能几分钟之内就可解决。若要到图书馆去查，纵很方便，也要浪费十倍以上的的时间。有时以为问题不大，不免马虎，懒得费时去查，就可能出毛病。

若专靠临时翻查，或大部分材料靠临时翻查，则必挂一漏万，其文必不能精。这样抄录材料，近人谓之做卡片。但一般卡片，太讲究形式整齐，或又太厚，供大家公用，固极称便，但就个人而言，写录慢，运用时又欠灵活，倒不如我只用薄纸片，小纸条，来得省事方便，有时一片中不只一条材料，有时一片中只极简单提示几个字，更见省事，增加工作速度！此外应准备小纸簿，带在身边，以便随时想到什么，立即写录，以免悠忽即忘，可惜我于此点并未养成习惯！

再谈写作。一般而言，写作只为发表。有了学问要向外发表，让他人认识，就必须写作，所以写作似乎只为对外而言。然则假若有人非常恬静，有学问并不想发表为人知，那么他就可以只研究问题不必写作了！我想此大不然。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贡献社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而且是最重要最严肃的研究阶段。不写作为文，根本就未完成研究功夫，学问也未成熟。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没有经过严肃的考验阶段，就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一个人的学术见解要想成为有系统的成熟的知识，就必须经过搜集材料，加以思考，最后系统化的写出来，始能成为真知识真学问。因为平时找材料用思考，都是零碎的，未必严密，也无系统。要到写作时，各种矛盾，各种缺陷，各种问题，可能都钻出来了，须得经过更精细的复读，更严密的思考，一一解决，理出一条线索，把论断显豁出来，这条论断才占得住。否则只能算是个人看法而已，不足称为成熟的学问。所以写作是最精细的阅读，最严密的思考，也是问题研究进程中最严肃的最后阶段，非写作成文，不能视为研究终结。至于发表不发表，就治学本身言，反不是写作的最大作用！

写作是学问成熟的最后阶段，然则写作就一定是成熟的吗？此

又大不然，要看各人的学力与训练。不过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也不能等到学问接近成熟时才写，而要在青年时代就训练写作。据我所了解，一个人在三十五岁以前，至迟四十岁以前，若不常常写作，以后就不大能写作了。所以我常常劝告青年同学，要及早训练写作技术，但不要抢着发表！不但要即青年时代开始训练写作，中间还得常常写作，搁笔太久，再从事写作，有时也会感到下笔凝滞。我是一九六四年来香港任教的，过去不曾正式教过书，而且一向不大说话，口才显得太差，突然要讲授几个课，就得先作充分准备。因此不得不暂时搁置论文写作，准备讲稿。到一九六六年夏天，才得暇再事论文写作。来港之前，我每年至少写一两篇论文，总出版量大约已近三百万字，写作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不意停了两年，就显得颇为生疏。第一篇论文是《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刊《史语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下册），就写得非常吃力，浪费了很多稿纸。固然可说这次写的是关于历史地理问题，性质与以前偏重制度或人事者不同，但两年未写，技术稍疏，也不无关系。俗语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写论文正也如此，不能中断！

最后谈听受与讲授。听受在青年学习时代固不待言，优良教师的课应该仔细的听，一则他们讲授的内容可能很多是他一家之言，别处听不到看不到。二则听来的印象较阅读得来的印象要深刻些。在离开学校以后，听受的机会少了，但有好的机会，也要能听受他人意见，不能以为自己学问成熟，而固拒自蔽！讲授当是学问相当成熟以后的事。职业性的讲授太多，固然浪费时间与精神，有害于治学，但不太多的讲授仍极需要，因为兴致淋漓的讲授中，思考常很敏锐，所以往往在讲坛徘徊讲说中发现新问题，涌出新看法，此即有利于研究。若有好的学生，提出有意义的询问，那就更加有助于问题的研究了！所谓教学相长，并非虚言。

(2) 恒。对于治学而言，“勤”是基本要诀，但若无“恒”以济

之，虽勤亦不能有成。而且在我看来，恒比勤更重要，也更难做到。我常向青年朋友说，“不怕不太勤，只怕没有恒。”因为一时或短时期的勤，几乎人人可以做到，但一时短期的勤实无济于事，最要紧的是长时间永恒的勤，这就不易做到。若能做到，学问必有成就。就我个人言，朋友们都说能勤奋用功。其实我不算顶勤奋。我在学校读书时代，诚然相当用功，但我总按时就寝，绝少为考试温习功课而延迟上床时间，出校门以后更不会有。只有二十年前在哈佛访问时，看到他们中日文图书馆所藏日文图书丰富，且对我极有用，故临时再参加学生行列，去学日文，赶看日文书，因为时间有限，往往读到深夜两三点钟，这是我平生的唯一例外时期。现已老年，晚上更少读书。就是白天，工作也不紧张，大约每天真正工作平均不会超过五小时，当然不能算是极用功。不过我除了幼年时代有一段顽童生活之外，自十二三岁开始迄今五十年岁月，几乎没有一天离开书本，而且一心一意的做我的学术工作，不参与任何活动——包括学术活动。连学术会议也不主动的参加，因为我觉得花费时间太多，得不偿失，不如自己多多的泛览各方面的书刊。至于行政性的工作，当然更不愿沾惹，就是教书也是最近十几年到香港以后的事。记得新亚书院接受雅礼协会补助的初期，宾四师来到台北，约牟润孙兄到港任教，并嘱其到杨梅乡间来约我。当时我的生活虽极困难，一家四五口往往只有一碗青菜佐餐，但自觉学业基础尚未巩固，所以坚持不兼差，也绝不考虑到香港谋求生活的改善。晚兰不曾敦促我多赚些钱，补贴家用，也很难能！

这是我对学术工作之能永恒坚持处。所以要我说我对于学术工作有一点小成就，主要是靠一个“恒”字诀，“勤”还在其次，因为只是相当勤，并不顶勤。所以我常向青年朋友说，出了校门置身社会，任职谋生，不可能人人都有充裕的时间做学问。但无论职业怎样忙，年轻人，精力旺盛，每天抽出两小时读书，绝不困难，只要减少无

谓的交际应酬与消遣，便可做到。每天两小时虽不多，但十年累积就很可观。若能永恒的坚持十年以上，一定会有相当成就。若不能持恒努力，纵然得到好机会，出国留学，得博士，在大学谋得悠闲的教职，在名位上可能得意，但学术成就仍不可必，因为未必能每日认真读两小时的书！

(3) 毅。上文说的“恒”，就已包括“毅”，没有坚强的毅力，如何能永恒的工作下去？再者，毅力在另一方面表现是耐性。学术工作，耐性极重要。因为工作有时不免繁重，或遭遇困难，非用无比的耐性加以克服不可。而有了坚强的毅力，无比的耐性，问题也一定会获得解决，很少白费功夫！我的经验，有时写论文，刚把材料摊开来时，往往显得头绪纷繁，甚至矛盾重重，不知从何下手，尝试着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但我不灰心，坚持着慢慢的想办法，最后总能理出一点头绪，找到一条线索，把那些纷繁矛盾的材料贯穿起来，写成一篇相当满意的论文。当然我有时也想到，这是我作茧自缚。有些人写论文，只搜录重要的材料，那些琐细似乎不关紧要的材料就不管，那末写起文章就较简单轻快。我搜录材料太细太详，有如收荒货一般，细大不捐，因此不免繁杂，要把这些繁杂的材料都组织起来，自然比较困难，这不是作茧自缚吗？不过经过整理穿插仔细的组织所写出来的论文，总要比较踏实坚强些！

(4) 勇。勇敢也是治学的一个要诀。前文所说“立志”，就要有勇气。要大规模的做大问题，也要有勇气。要永恒的坚持下去，也是一种勇气。此外对于问题要勇于怀疑，勇于设想，勇于立论。胡先生说“大胆假设”，也就是此意。若是没有勇气，就不会能提出新意见，得出新结论，大规模的著作更谈不上！

(5) 谨。谨慎是勇敢的反面，但相反而相成。只是勇于怀疑，勇于立论，若不能慎于判断，就很容易出错误，甚至闹笑话。胡先生一方面说“大胆假设”，同时又说“小心求证”，正是此意。他又

屡次提到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也就是谨慎之意。

(6) 和。在谨慎中已寓有温和。研究问题要从容客观，尤其与别人讨论问题，要态度温和，绝不可采取敌对立场，不但不要嫉视反对意见，无宁要尽量听取反对意见，看看自己的想法是否为自己的主观所蔽。有了反对意见，正好藉此反省一下。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免有主观成份在内。也许自己由此一条线索去设想，而忽略了别的线索，所以想得偏了，有人从另一角度另一线索去设想，岂不很好，比勘一下，也许别人的反对意见正确，也许更显得自己的意见正确，也许相互磨砺，引出另一个更好的看法，也未可知。学术是天下公器，真理愈辨而愈明，没有面子问题在内。若是意气用事，文过饰非，纵可争狠于一时，终当暴白于异日，强辩饰非，只见其识见之隘陋，度量之不恢宏耳！

(7) 缓。缓慢在学术工作中可有两层意思。其一，工作缓缓的做，不要抢快。其二，著作完成后，最好暂缓发表。

先谈第一点。学术工作，尤其文史学术工作是期永久价值，不是商业广告，不是政治宣传，不须要争取一时之效。既要做文史学术工作，就要认定能坐冷板凳，慢慢去做。因为任何问题，甚至很小问题，要搜集充分资料，都不是短时间中所能奏功，动辄要屡经寒暑，所以千万不能急功。慢工诚然不一定能出细货，但细货则必定出于慢工，草率抢工完成的东西，决不会好。现在研究院硕士班学生大多没有写过正式论文，要在两年修课期间写成论文，殊为不易。所以我常告诉他们，只是作为训练，不要期望为成熟之作。就是我要在两年之内做个陌生题目，也未必能做得好。事实上，我写论文，除了应酬之作，凡是正式论文，自起意到写成，大约至少要在四五年以上，目前陆续发表的论文更是在三十年前已开始准备了，可谓缓慢之至！就是这样，还有些写得不满意，甚至讲错了！所以

决不能抢快。然则这样慢，岂非一生中做不了几篇东西？此又大不然。就以我而论，每篇论文准备的时间虽长，但作品总不算少，原因是第一篇所说作广面的全面的研究，同时注意很多问题。准备时间虽长，一旦准备充分，就有很多论题可写。例如我目前所写历史地理方面问题，三十几年前就已开始准备，中间二十年毫无声气，几乎无人知道我在做这种工作。但一旦开始写作，就每年可出若干篇，至今至少还有二三十篇交通与其他有关人文地理的文章，可随时抽出来就写，如此总算起来，岂不很快！所以工作虽慢，成绩却不一定就少。^[1]换言之，从长远来看，工作缓慢，并不碍于进度之速！此之谓以慢为快。

次论第二点，论著最好暂缓发表。人人都有发表欲，论著完成，就想发表，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最好能克制一下，搁置一个时期再发表为佳。因为论著初成，必尚多问题未考虑周全，致有小漏洞，至少在撰写方面尚不够精炼，有可改进处。当然在初稿写撰时已仔细改了，但文章工整，绝无止境，搁置一个时期，必定发现有当改进处。若已发表，便懒得再改了。这在我已有不少经验。如《秦汉

[1] 我三十余年来所发表的文字，除了极少数几篇杂文与这一小册之外，都是极严肃的学术论著，总量约在四百万字以上，不可谓少。有一位同学留学日本，据他说，好多日本学人以为我有一个研究班子，跟我搜集材料。其实我还没有力量能请几个人协助做工作。史语所也无此制度，每位研究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独立的研究。所以我所有的每条材料都是自己搜集的。只有在史语所的最后两三年，有一位书记帮我抄录，这当感谢陈槃厂与李济之两位先生的好意。我用小签条写明自某页某行某字起，至某行某字止，插在书页中，交书记抄写，抄好后，我再自己看一遍，用不同颜色的笔加以标识。至于撰写，更是没有一个字假手他人。我的工作完全由自己一人担负，不但是由于无力请人协助，而且纵然有人协助，我也不会要。我在史语所工作的最后一年，担任“国科会”设立的研究讲座，照章可请两人协助，一人就用原来的书记，另加请一位助理研究员，但也只请他代我节译几篇日本学人论文，并未请他为我搜集材料。因为我认为文科研究，一定要一点一滴的都通过自己的脑海。就是材料，也必须自己去看。因为同样看一卷书，程度不同，所了解的深度也不一样，也许有极重要材料，程度不够，往往就看不出来，所以我不想假手于人。有一位颇有名的学人，曾很得意地说：“我每年发表几十万字，但我自己不曾写一个字！”我想除非是编辑工作，若是论著，那不可能是一部好书！

地方行政制度》，因为屡次拖延未能出版，结果屡经改订，臻于满意。《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初稿撰成即为印刷费所迫立即付印，未能再加删改，至今为憾。又如《北魏尚书制度考》，即以长编付印，久欲改作而未果。若当时未迅即发表，相信必已改订，较合理想。复如《唐仆尚丞郎表》，发表以后发现部分金石材料已录而未用到，《文苑英华》亦因当时环境所限未加利用，若非当时政局不佳，不得不即早印行，则至少必已就此两点详加增订，更趋完美。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验，前文（第七篇）亦已分别提到过，不再详谈。近十余年来，写唐代交通问题，也不免为文债所迫，文成即印，出版后却发现不少当增补或当改订处。好在已发表者为散篇论文，等待全书出版时，仍可做一番改进功夫，期能弥补，达于较完美境界。即如这本小册，不是严肃的学术论著，但我也准备在初稿写成后搁置几个月才付印，以期能随时有所改进！

九 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一个人学问成就的深浅，可以从他的生活修养中看出一些端倪，因为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学术工作影响极大。

治学本不是件轻松的事，近代学术工作日趋复杂，步入分工专精之途径，但又不能不相当博通，史学工作所涉尤广，更为不易。个人以为，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尤其是史学，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能做到：

工作随时努力，
生活随遇而安。

这句话等于是我的座右铭，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据我的体验与观察，前六个字还比较容易做到，后六个字却极不易做到，而这点尤与人生修养有关。不过在我似乎天性与此相近。我自幼年就对于物质享受没有多大奢望，这或许与出身农家有关。成年后，生活曾经有过一段极困苦的时期，但我仍是无忧无虑的耐心过日子，既不羡慕别人的物质享受，更不怨天尤人。因为我觉得生活享受绝无一定的标准，要不满足，无论多好享受仍是不能满足。要满足，就随时都能满足。古人说“知足常乐”这一点我是真正能体验到，唯一

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作。我常自己反省，觉得我非贪人，但对于学术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从这一点看来，自愧仍非达人！

下面姑就一般生活与人生修养之影响学术工作者，拉杂言之。

（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要想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第一必须有健康的身心——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记得在初中读书时代，实颇用功，尤不爱运动。长兄德明有一次信上劝我注意身体。他说身体如一只船，学问如同载量，船不坚固，甚至破坏了，如何还能运载！此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最近看《明报》一篇短文，把身体比作成功的机器，意义也是一样。机器性能不良，甚至破烂，如何能利用它制出优良的成品来！要想身体健康，自必生活有节度，饮食、寒暖、运动、休息，皆当注意节度，此不待言。而心理健康，亦同样重要，并且大有影响于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是医学上的专门问题，不敢深论。不过就我个人的体验，快乐的人生观，心情轻松，胸怀坦荡，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对于身心健康大有好处。最近看报，说医学界对于健康提出了九个标准：第一，心里常觉有幸福感。第二，对工作有热忱，办事有效率。第三，笑口常开。第四，有信心。第五，有自我克制的能力。第六，没有疾病和痛苦。第七，不会杞人忧天。第八，能勇敢地面对现实。第九，不失眠。这一大半与快乐的人生观有关。我是个绝对的乐观派，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人类前途，永远觉得有办法，有希望，不悲观。当然不见得遇事都真能乐观，但糊涂的乐观至少自己得到轻松快乐，岂不很好！至于对事对人，我觉得宁滞毋敏，宁可迟钝一点，不要太敏感，多疑虑。纵然觉察到他人对己有不利迹象，也要有胸襟化解，不要放在心上。有人要说太迟钝，

岂不要吃亏。其实吃点亏也不算什么，何必斤斤计较一日的得失！何况这个社会，还是心术正常的人居多，不过有些人心地狭隘，有些人有自卑感，不能吃亏，务欲逞强而已，真正小人还是比较少数。只要能遇事装点糊涂，让人一步，也就相安无事。十几年前我来香港，有位好朋友告诉我说，来到新地方，环境比较复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忠告，但我自譬是个不设防的城市，不会有人来攻。纵然有人来攻，也不在乎。又有位朋友告诉我，像我也该有人忌妒了。盖有所闻而言。我虽也有觉察，但只付之一笑，若无所知，绝不计较。这不但是品德修养问题，也关乎心理健康。我自信这些事对于我无大影响，不计较即无萦于怀，不影响自己情绪，不浪费心力时光，这对于身体健康与学术工作都大有关系。我前面说过，有青年大文学家大科学家，但没有青年大史学家，史学有较大成就，总得在五十以后，至少近五十岁，最好能活七十八十，而且要身心健康。自己不乐观，心情不轻松，对人对事斤斤计较放不开，身体自然不会很健康。悲观，放不开，身体不健康的人，自然精神不济，无法有坚强的毅力达成他的远大志愿。

写到这里，不免想起陈寅恪先生。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家群推陈先生为巨擘，以陈先生天分之高，学养之深，语文工具之博备，诚为旷世难得之人才。据俞大维先生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中研院史语所出版《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卷首），他有志写一部《中国通史》，似也有意写一部《蒙古史》。但皆无所成，“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数十篇有启发性的论文。若在他人，自然已是极大成就，但就陈先生来说，实未尽其才学。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尤为史学界一项无可补救的损失。我想陈先生的大志不遂，最基本的原因是身体健康太差，又是悲观主义者（身体不健康的人很难乐观），自不胜负荷其志愿。加

以陈先生虽是个谨严的史学家，生活修养所表现的性格也是最标准的“学术人”，但另一方面仍不脱才子文士的风格，不是个科学工作者，所以虽有大志而似无具体计划，也不会能耐烦的去做一个有组织的大工作。至于俞先生所谓时代丧乱、生活不安，尚在其次。因为以陈先生的声望，为国内外上下群情所尊仰，一般人际关系也良好，又得傅孟真先生的特别尊敬与支持，若他本人身体健康，意志坚强，想有计划的做一项大工作，相信环境对于他不会有多大困难。但健康太差，此志不遂，殊为可惜！

（二）一心力、惜时光

学问是由心力与时光交织而成，缺一不可。但一个人无论身体多健强，精神心力都有限度，时间更是有限度。要将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学工作上，始能有成，若不能精神集中，将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则学问必不能有多大成就，其他方面也将会失望。此如河渠，固定的相当大的水量，放入一条渠中，必然显得流量很大，气势雄壮。若分入数条渠道，各渠势必显得流量减少，气势微弱，无大作用。一个人的心力时光分散到多方面，各方面的成果也势必都大打折扣。心力时光既然都有限度，而学问又是心力时光交织而成，故心力与时光愈能集中，成果必愈大，最好他的生活一切都投注浸润在学术工作中，成为一个纯净的学术人。我个人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一境界，但已尽可能向往此途，名利无大兴趣，权位尤不敢沾，专心一意的做学术工作，这在上一章讲“恒”字诀已谈过。惟生活消遣则兴趣颇为广泛，如朋友谈天，遨游山水，浏览报章杂志，看电影电视。但谈天遨游的机会并不多（近年香港治安不佳，少数人也不敢到乡间去），至于影视报章，亦随时警惕，尽量放弃，紧缩到了解时局与娱乐生活所必要的最小限度，每天只看一种报纸，至多一节电视，以使心力时间不要分散。此外我还有一点分神处，

即吾妻体弱，家庭杂务须我分任。不过此与外务不同，只分点时间作体力劳动，不费心力。而且使心神头脑能轻松一下，对于健康也未始无好处！

（三）淡名利、避权位

治学贵能一心力、惜时光，然而一般人大多不能注意到这一点，总不免为“名”“利”“权”“位”所困扰，分心力，分时间。当然人非贤圣，名利权位谁不有兴趣，想争取！但这四者的争取，对于学术工作都绝对有妨碍，原因就是分心力分时间。

四者之中亦有分别。就“名”而言，学术上若真有成就，名不求而自至。不过学术之名只是清名，不能凭以有所享受，而且在学术工作进行中也不能以求名为目的，若以求名为目的，则其学术成就必极有限度。有位朋友说，四十岁以前卖力，四十以后卖名。果然这样，则学术上的真正成就到四十岁前后即将停止，很难再真有进境，因为治学的动机不在学术而在成名，名已成了，真正学术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何况学术界的名气又与学术成就并不真相一致，有高名的，学术成就不一定高，成就高的也不一定就极有名，所以名与实仍是两回事，一个真正学术工作者仍当把“名”字撇开！何况更进一层说，名不但不能特意追求，名头太大，对于治学也有妨碍。只就我所及见的前辈学人说，似乎只有陈寅恪先生未为盛名而影响了治学工作，其他享大名的史学家几乎无不受了盛名之累。最显著的例子，如顾颉刚，二十几岁就享大名，为时代青年所瞩目，为当时锋头最健的史学家，每天忙得不得了，几乎毫无工作时间。中年以后，他非常后悔。一九四四年，我到重庆，在他主持的机构寄居多日，据他自己评论说，他深悔年轻时弄得名气太大，不能安心工作，对于史学并无多大贡献，只是研究孟姜女真正有了成就。我想这是颉刚师肺腑之言，但不免过分谦虚耳！再如胡适之先生。

胡先生在近代学术界，无疑为大名第一的学人。他的主要成就，在文学革命、思想解放方面，对于近代中国给予重大影响、重大贡献。但这是他青年中年时代的贡献。中年以后渐渐专于他认为本行的史学。虽然他工作精神仍很旺盛，不减壮年，以他的天分学力，应再有一番高度贡献，但为大名所累，复为国事操劳，始终不能全神贯注在学术工作方面，所以成效未宏！不过以胡先生对社会国家的贡献而论，牺牲一点专业的成就，已很值得，不足为惜了！

就“利”而言，当然一个人总得有基本生活费，不过我想这非绝大问题。何况现在学术人才荒，学术工作真有表现，绝不至于穷得没有饭吃！记得我在中学时代，当时已如现在一样崇尚理工科，大学文科毕业生，多半找不到适当职业，所以中学数理化成绩好的同学一定都投考理工科，考取理工科，回到母校都特显光采。只有数理化成绩差的同学才不得已投考文科。我自小学到高中，一直以数理科见长，为师友所看重，文科成绩反极平平。但在高中时代，我的实际兴趣已确定转移到史学方面，所以我决然投考历史系。当时我的想法，天下没有个勤奋的人会找不到饭吃，只是物质生活有好有差而已。学术当因兴之所之，不能功利主义，所以断然采取与一般时尚相反的决定，使得平日不太接近的师友都大感诧异！现在想来，初出学校几年，诚然有过近于断炊之虞，但总的说来，仍是生活得不错，实出我预期之外！

就“权”与“位”而言，尤于治学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谋取权位不但要分心力分时间，而取得之后，仍有麻烦，位愈高权愈重，麻烦愈多，不仅因为有权位就有职务要做，而且世俗趋附，习于请托，有权位必然应酬大增，为职务为应酬之不暇，何能一心一意的浸润在学术中！但现在学术界人士多喜欢兼任官吏，至少喜欢在学校当什么长什么主任，以为有位有权，自以为荣。或许他对于学术本无多大兴趣与期望，故乐此不疲。若对于学术研究真有兴趣，有

抱负，这样做，岂非缘木求鱼！因为现在做官很忙，学校部分行政负责人也相当忙，皆绝不利于治学，所以真正做学问的人绝不能兼任此类工作。我不是看不起此类工作，中国古训，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做官办行政，意在立功，序次犹在立言之上。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若欲兼而有之，势必两面不讨好，一事无成！

总而言之，学术工作只为兴趣与求真的责任感。为了学术成就，名利权位，皆不能分心争取。而权位两者，不但不能争取，而且要绝对避而远之，就是无意中为形势所迫落到头上，也要设法避开，决不可贪图暂时虚荣，阻妨大计。因为行政工作不但分散了心力与时间，减少了学术工作量，而且因为关心的范围增广，时间零碎，精神不集中，就很难长时间安静下来，深思穷追，如何能深入学术奥壤，探得灵珠！好多年前，有位学人来港在中文大学历史系作一次讲演。他说做学问要有两个条件，富与贵。有钱买书容易，居高位，找书方便，并且举出胡适之先生某次找书为例。不知胡先生正是受了盛名高位之累，致中年以后不能安心学术工作。有找书之便，亦复何用！这种论调，真是因小利而忘大弊，浅薄之至。此君为学有找书之勤，甚为可佩，但不能深入，岂是偶然！

（四）坚定力、戒浮躁

定力本为佛家名词，我想若希望治学有较大成就，定力也极其重要。治学的定力，可分对内对外两方面来说。就内在的兴趣与工作方向言，要坚定信心，不要见异思迁，自己既已打定主意要向这方面发展，就要坚定自信，不要又逐时尚而动摇，更不可看见他人研究其他方面问题多所创获，而欲跟踪冒进。见异思迁，跟踪冒进，都是定力不够的表现。就对外而言，遭遇到外面的压力，不能屈服，面对外面的诱惑力，也要坚定意志，不能动摇。就我的体验与观察，大多数的读书人都有倔强的个性。当他未成名前，对外面的压力，

乃至生活困窘，往往都能咬紧牙关，极力抵挡。但一到渐露头角，小有名气，外面将有不少的诱惑力向他招手，这时能坚定不移，宁坐冷板凳，不被诱引入外务之歧途，不出锋头、任行政、争取名利权位者，千百人中盖一二而已！这都是定力不够之病。所以为了内在志趣的稳定，外在压力、诱惑力的抵抗，不能不在定力方面下修养功夫，达到老僧入定，不为名利权位等任何冲击所动摇！如此则治学有成，无待耆龟！记得一九四一年，我自武汉大学毕业，到成都从宾四师继续读书。一晚散步中庭，师谓我曰：“你将来治学有成，必无问题。但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并不很好，在未成名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不要分心旁务！”这一番训诲，就是教我要有定力。迄今近四十年，记忆犹新，不敢忘，影响我的治学亦极大！

浮躁可谓为定力的反面。性情轻浮急躁，不但是品德上一大缺点，也为治学大忌。因为浮躁的人，行为做事必定虚浮，治学何能例外，自然也是浮而不实，更何能做到勤谨和缓，亦何能有坚强的定力，集中心力与时光在学问上用大功夫？对于问题的探讨也必然浅尝即止，绝不可能锲而不舍的去深入发掘，缜密研究，彻底解决！这种个性的人，如有才气，自可小成，但绝难深入达到较高境界！而且浮躁的人亦易骄满，甚至狂妄，很难永远虚心的求长进！所以一个做学问的人，也要随时反省自己为学为人，是否轻浮急躁。如犯此病，就当极力戒除！

（五）开阔胸襟

近代人提起治史，总说要客观。事实上，绝对客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是总应该向这方面去做，做到尽可能的客观。而客观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开阔的胸襟。有了开阔的胸襟，才能容纳众说，至少能容忍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问题的各种异见，乃至对于他

人成就的态度，也当如此。就个别问题的异见而言，各人看法不同，也必各有其相当理据，何妨多方取摄，作参考之用。就理论而言，各种理论都非十全十美，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但一种理论若果已能成立，为一部分学人所尊奉，这种理论也必有相当的真实性与可用性，我们绝不能采取轻蔑甚至排斥的态度，一棍子打死。反之要采取容受的态度，在某一种情况下，或许有其用处。只是此种理论亦必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的遵用，以为不二法门的神圣法宝！其他任何理论也都是如此，不能蔑视它，也不能迷信其有无边的法力！就对于他人成就的态度来说，无论对任何人的工作都当予以尊重，不能因为自己不欣赏，无兴趣，甚至自己不懂，而看低他人工作的成就，甚至加以否定。那是专制自隘的态度与思想，不但是品德做人方面的缺点，只就做学问而言，一有此种态度，就很难步入博大之路，甚至愈走路子愈狭，终至逼处一隅，自我陶醉而已！不过反过来说，对于他人的成就——不论古人或今人——也只能采取尊重的态度，乃至佩服采用，但不能崇拜。一有崇拜心理，便易步入迷信，失去理智的判断与采择，那也是专制狭隘思想的根源，使自己心思不能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对于各种理论，各种异见，以及各种学问领域，无所不能容，无所不涵盖，则自己治学才能不自隘，不自满，无止境的向前发展下去。此所谓“有容乃大”，亦“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之意！

（六）慎戒执著

对外要开阔胸襟，迎接万千。对内则当戒除执著，免得陷于拘泥不化。

做事做学问都不能不有相当固执，但也要得中庸之道，不能过分固执有拘泥执著之病。不过我所说的“固执”与“执著”只是一种性格的两个阶段，很难指出其分野。要在各人自己体察，“允执厥

中”。即固执应适可而止，不要过分。也可说是能抓得紧，也能放得开。也就是坚守一定的原则，而因应现实情况，灵活运用，不要死执一点，不能随宜变化。这对于治学大有关系，相信做事也当如此。但所谓固执而不过分，抓得紧，放得开，坚守原则，灵活运用，仍非具体，今姑举一事以例之。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于同学中最佩服好友某君。他的天分努力皆在我之上，所以论成绩，尤其国文书法都较我为优，我写文章一定要先请他看过。只是社会科学知识，我有一日之长。在当时，两人同读《史记》，他于书眉用蝇头小字节录名家评语殆遍。我虽也相当用功，但远不如他的精勤。同读《汉书·地理志》，他能几于成诵，我记忆力特差，只略识各郡县约在何方位而已。同摩绘杨守敬《水经注图》，他笔笔依循不苟。我则大致规摩而已，以为细节处，杨氏亦只以意为之，无所依据。课堂笔记，他书写快捷，故极完备，我则断续不能全。由此可见两人天分勤力，都颇有差距。毕业后，宾四师约我到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继续学业，第二学期他也到齐鲁。一日我与宾四师谈到他，深佩其学业，而师则谓彼之前途不如我，令我深感诧异。请其故，师谓彼禀性执著。当时我尚以为疑。不数年，我的工作愈做愈起劲，而他似显诸路不通，无可表现，始服宾师之有远见。再回忆大学时代，两人同习太极拳，我很快即能略得其形似，而他的拳脚伸出始终强劲如少林，教师纠正，亦不能改。此正见个性之差异，表现于动作行事之不同。大约他能刚而不能柔，能认真而不能回环有弹性。也可说，能抓得紧，但不能放得开。用于治学，易执著，不能灵活通变，终至四处阻塞，兴味索然，无可发挥，殊为可惜！今日北望大陆，故友不见已三十余年，传闻在一间学校任教，思想颇左倾。另有一位同班同学，据说在“文革”期间与四人帮一伙比较接近。我深为他们而内疚，因为唯物史观是我最先影响他们的！尤其是前者，他为人极忠厚，多读古书，思想保

守，不想一变而左倾（也许非其本心）！归根究源，仍在执著的个性，易走极端，不能裁以中庸，故接受新知，但不能化！观此一例，性情执著之征候略可知晓，足为警戒！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日全册完稿，二十七日再稿，其后陆续增补改订，局部易稿若干次，至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最后审订毕功

治史答问

序 言 一

来港任教已十八年之久，诸生问学往往涉及治史应取途径与个人治史历程，前撰《治史经验谈》，有些问答内容已分别写入各篇，有些未能写入。近两年来，又续有问答，颇想作《答诸生问》一文，聊当续谈。顷赴台北，出席一项会议，欣悉《治史经验谈》在去年十二月已发行第二版，时去初版不过七个月，显然台湾史学界一般青年学人对于此书有相当兴趣。看来该书不负所期，对于青年史学工作者可能有相当影响，发生一点积极作用，这对于我是一项鼓励。适会“中央”图书馆《汉学通讯》编者苏精、庄耀郎与史语所黄宽重三位先生联袂来访，所问多属个人治学经历。前人治学历程，对于后学多少有些参考作用，自念一向拙于言词，仓促应对，未能畅达，不如并前时答诸生问未写入《经验谈》者，合而述之。故返港以后，趁研究工作尚未开始之前，草此答问若干条，藉存鸿爪。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于九龙霞明阁寓所

序 言 二

前年八月写成《治史答问》十二则，本拟作为一篇杂文发表，但一则这十二条多半为黄宽重先生代表《汉学通讯》所提出的问题，应该等待他的《访问记》刊出后才好发表；二则我一向觉得文章写成最好留在手边一段时期，可以有斟酌订正的机会。在等待期间，又陆续有所写述，至今年暑前，共得九则，合并前稿凡二十一则，可以作为一本小册子发表了。最近得暇将此二十一则答问，稍加整理，各加标题，单独为篇，前十二篇即前年一时写成之旧稿，后九篇则续述之稿。全部内容包括个人治史历程与对于治史的一些意见，就中两篇谈到已谢世的三位前辈史学家，实亦见个人治史之意趣，故此小册视为《治史经验谈》之续编可也。末附黄宽重先生所写《访问记》，盖此《记》颇详，有为个人笔述所未及者，故附供参考。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于南港中研院学人宿舍

一 我研究历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问 你在《治史经验谈》中说，自小学到高中一直以数理科见长，文科成绩反极平平（第九篇第三节），何以在高中时代治学兴趣就已转移到历史方面呢？

答 社会文化的演进大端可能有相当规律可寻，但历史上的个别事件，偶然触发的可能性就很大。我生长在桐城县罗家岭的乡间；只能就近进入乡镇中唯一的小学。在高小时期，学校从省城安庆请来一位算术教师冯溶生先生，他教算术很能引起我的兴趣，所以特别努力加工，做了很多课外作业，并且预习初中低年级的算术课题，尤其四则杂题做得很多^[1]，所以当时算术一科显得特长。小学毕业后，到安庆城进入安庆初级中学，仍对于数学特感兴趣，而文科程度显得很坏。一日我在楼上做功课，有一位乡人在楼下与一位同学谈起，骂我一封信都不会写，数学再好有什么用？我亲自听到这些话，不免有些感触。适在那时长兄德明先生也劝我要对国文下点功夫，因此更自意动，想着如何增进自己的国文程度。听说陈寿《三国志》是文章好的名著，自己看过《三国演义》，以为大概内容也差

[1] 那时做算术还用毛笔，我的预习初中算术簿，直到一九四六年冬我复员回家时还留在罗家岭初级中学做他们学生的范本。

不多，因此买了部《三国志》来看，发现书内生字极多，文章更不易懂。我的个性，决定要做的事，尤其是读书，再困难也要坚持下去，因此借助字典，半懂不懂的看下去。一年下来，虽然还未看完，但阅读能力却颇有进步。后来又自修《左传》，看《曾文正公家书》、梁任公《饮冰室文集》之类的书，这样对于国文渐感兴趣，而《左传》、《三国志》两部古籍都是史书。及到高中，中国历史教师是李则纲先生，我听他一次很有意义的讲演，又读到梁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中国历史的兴趣因此明显的被激发起来。这在《经验谈》的《序言》中已说过。

二 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代的课外阅读

问 你在大中学做学生时代，除了学校功课之外，喜欢看些什么书？

答 在高中读书时代，虽然早经决定将来从事史学研究工作，但求知欲极强，史学方面的书固然要读，其他方面的书也读得相当多，现在能明确数得出来的书名反而比史学方面的书为多。例如莫尔甘《古代社会》（杨东莼译本），罗维《初民社会》（吕叔湘译本），林惠祥《文化人类学》、李则纲《始祖的诞生与图腾》，岑家梧《图腾艺术史》、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忘译者）及已忘记作者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社会进化史》（陶孟和译？）、《婚姻进化史》、《文化移动论》、《史前体质人类学》等至少二三十种^[1]，大约偏重原始人类、落后民族社会生活方面的论著或调查（如广西瑶族调查），这是受了李则纲师的影响^[2]，想运用人类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史，我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尧舜

[1] 《古代社会》译本甚多，杨译可能为最早的中译本。其余诸书著者译者多已忘记。就中《文化移动论》系日文中译本；《史前体质人类学》书名可能不正确，但内容印象颇深。

[2] 李先生出版过《史学通论》与《始祖的诞生与图腾》等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图腾小书大约是中国学者运用图腾学说讲中国古史最早的一本书。稍后他又写了一本有关图腾问题的较大的书。

禅让问题研究》^[1]就是在这个影响下所写的。

史学方面，就古书言，明确记得用功较多的只有《评点史记论文》与《御批通鉴辑览》。这时读《史记》似特注意其文章，所以采用了这个本子，对于评语特别留意，根据评语，体会史公文章的脉络，这对于我后来写文章很注意组织，相信有相当影响。当时为什么看《御批通鉴辑览》，不看《通鉴》，现在想不起原因何在；也许当时有人介绍《辑览》这部书内容比较简要，便于初学。此外对于《史通》、《通志·二十略》与《读史方舆纪要》似乎也都用了些功夫。其余还看了些什么史部的书，或经子书，全不记得。但现在身边还保存一册孙冯翼集的《世本》宋衷《注》抄本，是高中时代同自修室田姓同学代为抄录的，小楷端正，情至可感。回想田兄面貌如在眼前，惜忘其名！当时既然如此重视《世本》，想《竹书纪年》、《国语》、《国策》之类也都摸过，又买了几部子书，翻看了些。记得有一天晚上，训导主任方百殊师到自修室查斋，看见我正在阅读《尚书古文疏证》，告诫我说，“你看得懂吗？”事实上当然看不懂，但我读书就是不自量力，喜欢硬闯，好的书不懂也要看，总看得懂几分，所以乐此不疲，前面讲到看第一部史书《三国志》，已是这样。现在想来，这种硬闯式的读书，固然也可有收获，不过太吃力，事倍功半，还是循序渐进的比较好。

至于今人编著的史书，现在所能记得的，通史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章钦的《中华通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邓书至今尚保存^[2]。断代史有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与陈恭禄的

[1] 此文未发表过，《经验谈》第一篇第一节已提到其大致内容。

[2] 平生好买书，几乎有点瘾。但屡经丧乱，东西播迁，藏书也几次散失。中学时代所购图书，现仍存身边的大约只此一书。另一册就是下一注所提到的《学风》第七卷第一期。一九八〇年，幼侄祖同自芜湖来信，说家中所存我青年时代所购图书，都已散逸，后在枞阳友人处看到一部《论衡》，有我的签名，索回珍藏。中学藏书除了《世本》抄本之外，可能只剩这三种了。

《中国近代史》等。其余比较专门些的书只记得胡适之先生及冯友兰两部哲学史，还有梁任公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书名可能有错）。胡、冯两书，我看得相当认真，做了摘要，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儒家之礼的理论》^[1]，就是在这一影响下写成的。此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看了些史学方法论方面的书。除上文所提到的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之外，有李则纲师的《史学通论》、何炳松译的鲁宾孙《新史学》及其他译本若干种。至于杂志，经常翻看的有《食货》、《禹贡》两种半月刊，所以我对于经济史也早有兴趣^[2]。

当时商务印书馆提出一种预约新书的方式，先付款十六元（当时十六元是学校四个月的伙食费）。以后一年内新书出版，任从选购，六折优惠，直到购满所付款额为止。那时商务的出版量很大，因此又提出一项宣传推销的方式，即就每周新出的许多书籍中，选出一种重要的，估计销量也比较大的书作为“星期标准书”，也是六折优惠。我每年都作前项预约，又另选购星期标准书，如《当代社会学说》、《一九一四年后之世界》等书就是由后一种方式选购的。所以在我的消费上，购书费仅次于学校膳宿费，其他的用度都极节省。安庆商务印书馆就在我所读安庆高级中学的左隔壁，每个星期六晚上，我经常都去站在书摊旁看书。凡是新出的文史社会科学书籍，不论买或不买，都将它的序言与目录翻看一下，也增广知识不少。这样泛览，虽不专于史学，但对于后来治史实有极大关系。

[1] 此文，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成，约九千余字，刊于安徽省立图书馆所编《学风》第七卷第一期，民国二十六年春出版。

[2] 当时看的书实在相当杂，也相当多。我的记忆力太差，大部分都不记得了。最近写《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一条，看到他的出版书名，就中《史通评》、《中国民族史》两书，我当时不但看过，而且也购买了。因此我想若翻查当时出版书目，可能勾起一些回忆！

在这里得顺便提一句：中学时代，一般同学花在功课上的精力与时间，要以数学所占比例为最大，我的数学根基好，占了极大便宜。高中时代我于数学已不做课外习题了，但程度仍强，应付课堂习题，所花精神时间比一般同学要少得多，这也是我能多读各种书刊的一大原因。

一九三七年，我在七七事变中考取武汉大学历史系。武大历史系教授阵容不很强，断代史似乎只选修了“殷周史”，由吴其昌子馨师讲授；“明清史”由汪诒荪师讲授（实际上只讲了明清之际）；“宋辽金元史”历年由系主任方壮猷欣安师讲授，但他觉得我们这一班最挑剔，自动不给我们开课；“秦汉史”“三国史”，新请徐光子明先生讲授，他自以为名教授，倚老卖老，只取《通鉴纪事本末》撮要讲授，而且颇多错误，讲了两堂，我们不满意，徐先生就走了，后来钱宾四师来校讲学一个月，开了“秦汉史导论”。本系的专史课程似乎只有方欣安师的“中国史学史”，陈登恪师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宾四师讲学时开了“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还有吴子馨师给我们讲“中国通史”，实际上只讲了古代民族史。外国史也只有“西洋通史”、“中古史”（皆陈祖原师讲授）、“近代史”（郭斌佳师讲授）、“史学名著选读”（忘记讲授者姓名）及“日本史”（汪诒荪师讲授）等几种。此外就是“世界地理”（韦润珊师讲授）。所修科目似乎不多，倒是别系的课选修了不少。文学院别系的课，有“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皆刘贇博平师讲授）、“诗选”（徐天闵师讲授）、“中国文学史”（苏雪林师讲授）、“论理学”^[1]、“哲学概论”等，还有朱光潜孟实师所授的一课，似乎是“近代文艺思潮”。法学院的课有“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等。所选范

[1] 我在初中、高中之间，曾读了一年高级师范科，那年已读了“论理学”，所以这门学问对于我也有相当影响。

围几乎遍及文法两院的各个学系^[1]。不过课外阅读似乎已渐渐限于史学方面，主要的是史学基本古书，泛览其他科系的书已大为减少；只记得还是看了些经济学方面的书与论文，也有少数政治学方面的书，其余全无印象了！

[1] 似乎未选法律系的课。但王雪艇校长的《比较宪法》一书，在我的脑海中印象很深，不知何故，是不是也听过这门课？

三 我对于政治制度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问 你研究中国历史，着重在政治制度史与历史上的人文地理，请问你对于政治制度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起来的？

答 我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尚无意研究政治制度史，这方面的兴趣是看了陶希圣先生的《秦汉政治制度》那本小书所引发起来的。我本来的兴趣是在上古史，但我治学太谨慎，也太胆小，觉得上古史料太少，又太简单，往往解释上很困难，同样一句话，甲可这样解释，乙可那样解释，丙又可另作解释，是非难辨。我太谨慎，感到上古史问题很难作判断，也许下了很大功夫，结果可能白废，所以目标慢慢的向下移动。上大学后，对于秦史发生兴趣，搜录相当多的史料^[1]。到三年级时，要准备写毕业论文，但“秦史”不是个论文题目，抽出一部分写，又觉分量不够，势必另找个题目。适会这时看到陶先生这部书，虽然篇幅不多，也写得粗略，但写作方法与《十通》式的传统写法完全不同，可说是运用近代方法写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部书。我看了很感兴趣，但觉得《地方政府》一章太

[1] 当时抄录史料，本印制一种卡片纸。但后来觉得太机械，改用白纸本子，已抄约十来本，连卡片约二十余万字。战时武汉大学迁校四川省西部乐山县（嘉定），常有敌机空袭警报，每次跑警报，不论昼夜，手上提的只有这包资料，可想见当时敝帚自珍的心情。但后来兴趣下移，这批资料已不知何时遗失了！

简略。当时我正在看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发觉从诸碑的碑阴题名，可考郡县政府中分曹甚繁，各置掾史，而两《汉书》中都少记载，认为大可下些功夫，根据这些材料增补陶书之不足，所以选定“两汉地方行政制度”做论文题目。后来果然得到相当丰富的收获。一九四一年春，钱宾四师到武大讲学，我以尚未完成的论文稿求教，惠蒙嘉许，增加我这方面的信心，遂决定向政治制度史方面发展。所以这方面影响我最大的是陶先生，但我为人太不活动，直到现在还未曾拜会过这位影响我很大的前辈先生^[1]。

[1] 此文写成后，偶然翻阅生活日记·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条，回忆《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撰述的缘起云：“适阅陶希圣先生与沈巨尘合著之《秦汉政治制度》，颇以为佳，但《地方政府》殊嫌粗略，而余其时对于沿革地理与政治制度两方面最感兴趣，故即决定就汉代地方政治制度作一番研究。”则阅陶书之前对于政治制度已有兴趣了。但我现在无法追忆这种兴趣最初萌芽究在何时，也许高中时代研究尧舜禅让，本来就是政治制度问题，因此渐渐孕育了对于政治制度方面兴趣欤？不过无论如何，陶书对于我的工作兴趣是有很大的激发作用。

四 我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问 但你后来何以又转而对于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发生兴趣？

答 我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发生兴趣，实际上远在政制史之前，并非在政制史之后。我常说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非常偶然，我对于历史地理发生兴趣，正可说是这样。

大约是在高小一年级时，长兄德明先生从安庆城回来，买了一册商务出版的中国地图给我，图名编者都已忘记了。那本分省图相当详细，也印得很精美，记得定价两元。那时两块银元，至少抵现在港币二百元，可谓是相当贵的一本书。乡间小学的孩子何尝见过这样精美的好地图，所以欢喜若狂，每天抱着那本地图摩挲观看，使我对于全国山川河流了如指掌，几能脱手绘出。后来又买到一本相当详细的地理问答书，参看地图，更感兴趣。所以我对于地理的兴趣实奠定于小学时代。可惜这本地图在一九四三年由成都北门外三十里崇义桥赖家院齐鲁国学研究所迁到成都近郊华西坝华西大学的途中失落了，至今为憾！到初中时代，每天早餐后、上课前的一段较短时间，仍是看地理图书。后来因为希望改善国文程度而对历史发生兴趣，自然就注意历史上的地理问题了。

大约就在高中时代，听说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是清代史

学名著，看了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九卷及各省《方輿纪要序》。顾氏才气很高，文笔锋利，讲军事形势，颇能耸动，有相当魔力^[1]，我读了深感兴趣，所以我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最先是着眼于沿革地理与军事地理（这也是传统历史地理学的重点），还写过一篇《中国军事地理今昔观》，是通论文字，在西北一张什么报上发表。真正最早有关历史地理学的学术论文是在大学三年级寒假中（一九三九年冬）写的一篇《楚置汉中郡地望考》，后在《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六期发表。所以在大学末期，我本有“政治制度史”与“历史地理”两方面兴趣。

一九四一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从宾四师继续学业，明年春同班好友钱树棠也来了。我们两人在大学时代的读书生活有高度联系，互相影响，所以他对于历史地理也有兴趣。此时又在一起从事研究工作，遂相约，我专搞政治制度史，把历史地理让给他去做。他在汉代地理方面已下过不少功夫，《汉书·地理志》中的郡县名称几乎可以背诵；可惜后来兴趣转变了！我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以后，觉得他放弃历史地理的研究，深为可惜，不免又重拾旧业。但感到过去学人讲沿革地理的已很多，军事地理也无大发展，我既然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宗教、文化各方面都有兴趣，因此放宽眼界，扩及历史上人文地理的各方面，以期有较大发展。所以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间开始研究唐史，搜录史料，就已政治制度与人文地理两面兼顾。还因为要了解唐代南北人文之盛衰，士风之不同，对于中央政治所发生的影响，而欲彻底解决中央政治人物的籍居问题；事虽失败，却因此写成《唐仆尚丞郎表》一书。

[1] 近十几年来写唐代交通问题，随时利用顾书与《嘉庆一统志》为主要工具书，发现顾氏虽很有才气，但其书内容甚粗疏，错误很多；《一统志》虽是官修的书，成于众之人，但实甚精，往往转胜顾书。此点我想将来专文论列。

此书写成后，深感两部《唐书》错误与夺讹都很多^[1]，沈氏《合钞》颇有整理功夫，但异者钞之未尽，错误脱讹处，更少纠正。因此颇想再做一番功夫。此书《序言》记当时意趣说：“本沈氏《合钞》，钞之益审，纠之益精，又广征他籍，为之注补，俾政事制度，朗然赅备，学者研寻，取给为便。”但唐籍浩繁，若实现此一构想，必须全力贯注，终身以之。而唐代人文地理计划内容包括国疆、政区、户口、民族、产业、交通、都市、商业、宗教、文化各方面，可谓涉及唐代全史，规模很大。故此两项工作绝不能兼顾；取舍之间，甚为踌躇。适会宾四师自港来台，乃就此项问题向师请教。师曰：你对于两《唐书》已下过那样细密功夫，再迫下去，将两部《唐书》彻底整理一番，后人利用，诚为便利，其功将逾于王先谦之于两部《汉书》。但终身沉酣于史籍校补，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较为灵活有意义。我深契宾四师此言，即作决断，放弃《唐书》整理计划，专心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这大约是一九五六年秋冬间的事。一九五七年到哈佛访问研究，即以此为第一中心课题，阅录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中日文藏书，颇多收获。

由此说来，我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早在五十年前心中已有萌芽，就是《唐代交通图考》与全盘《唐代人文地理》的构想与材料搜录，也在三十几年前已经开始。可以这样说：自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后，我的撰述重点虽仍在“政治制度史”，但搜录材料的重点却已转移到“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只是很少发表论文；直到一九六〇年中期，才开始有较多的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发表。

[1] 我写《唐仆尚丞郎表》，纠正《旧唐书》错误六百多处，《新唐书》三百多处，初稿中逐条皆有标记，可谓为写此书的副产品。后来写《旧唐书本纪拾误初稿》一百三十八条（刊《新亚学报》第二卷第一期；《再稿》一百五十五条，收入《唐史研究丛稿》），就是根据这些副产品关涉《旧纪》的各条整理而成。此外与仆尚丞郎四种官员无关的错误一定更多。

五 我的研究重心 何以放在唐代

问 你说青年时代本喜欢上古史，但治学态度太谨慎，怕难以得出能自信的成果，所以把目标慢慢下移到秦汉。秦汉是一大时代，可以大发展，何以后来又把治学中心下移到唐代？

答 我在大学与齐鲁研究所时代，研究秦汉，实际上也只以政制史为中心，兼及历史地理，并无广泛研究秦汉史的意念。我研究政制史，就很自然的看重《十通》，当时理想计划是用现代方法写一部《国史政典》，所以我的意念还是通的专史，并非横的断代史。因此在齐鲁研究所时代，写作工作还在秦汉，但已下阅两晋南北朝诸正史，写录政治制度方面的材料。所以一九四五年秋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后，所写第一篇论文就是《北魏尚书制度考》（一九四六年三月写成，刊《史语所集刊》第十八本），紧接着写的也是关乎魏晋南北朝地方政府诸问题。由于通的专史意念，自然又下及隋唐。我阅读唐代重要书籍，搜录材料，是始于齐鲁研究所时代一九四二年的暑天看《全唐文》，那次看到三百几十卷^[1]，战后复员到南京以后，又复从头看起。所以我研究唐代，实也可说自齐鲁研究所时代

[1] 那时所写卡片还有保存的，看到那时卡片的纸质，令人缅怀那时的物质生活，实在大差！

已经开始了。唐代是中国史上具有关键性的大时代，史料又相当丰富，我这时搜录史料又有“政治制度”与“人文地理”两个大范畴，尤其后者，所涉几及史事的全面，所以必然停留下来，成为我研究的重心时代。

六 我对于上古史与考古学的兴趣

问 你青年时代对于上古史有兴趣，现在是否完全没有兴趣？对于考古学又如何？

答 一个人少年时代的喜爱是很难完全忘怀的，这犹如少年时代在家乡的饮食口味永远不能忘怀一般。我现在的研究中心虽在唐代，但对于上古史也还有兴趣。前在中文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历史地理”，头十年中感到没有人讲先秦史，更无人能讲史前史，所以我把上古人文地理作为一个重点去讲，史前占去两个月，三代与春秋战国也占两个月，共花去一学期，秦汉以下反而没有时间作较详讲述。所编讲义，也只史前与战国略具规模。后来林寿晋先生参加中大历史系阵容，他是考古学专家，讲授“上古史”与“中国考古学”，我才不讲史前，只从三代讲起。一九七八年，曾就一九七四年秋所写夏代讲义加工改作为《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一文，在《大陆杂志》第六十一卷第五期发表，主要用的是锄头考古学资料与文献资料相配合，颇为一般考古界所重视。林先生一次赴北平，见到夏作铭先生，谈到我讲上古问题特别重视考古资料，作铭先生说“不要忘记他是史语所出身的”！我想这话有些道理。因此我想到研究机构涵盖的学术范围大一点也好，史语所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甲骨文五个组室，研究范围包含广泛，在行政上或许比较

麻烦，在院里分经费也比较吃亏，但就所内成员的研究工作而言，不无好处。因为各组研究的问题各异，方法有别，但大家在一块，耳濡目染，只要自己开朗一点，自可互相影响，扩大眼界。就我而言，除了人类学是少年时代所热烈持奉认为是研究古史的启钥之外，对于考古学有相当浓厚兴趣，这与史语所的环境不无关系。我对于语言学完全外行，但写《战国人文地理讲义》却有一章是《扬雄所记先秦方言地理区》作为战国文化区的具体表征，后来整理抽刊于《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十七期，这与我久从史语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可能也有关系。这两篇再加《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刊《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十八期），都是我近几年所写有关古代史的论文，可见兴趣仍相当浓厚。

七 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

问 你把《宋史》全部看了一遍，有没有意思想把研究的时代下伸到宋代？

答 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因为我已无此精力，无此时间。我在《治史经验谈》第八篇第一节中已经谈到三十多年来的研究计划是“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由专而通的三部书，已经料想到不可能都写得成了，自然不敢再有向宋代发展的野心。不过两宋时代实在是史学工作者可以大展拳脚的上好园地，如果我还时间写《国史人文地理》全书，希望至少能写到宋代，但不希望能深入了。

近二十年来，好多学生问我应向什么时代发展，我总是提出两宋是可以首先考虑的时代。我这个想法，一方面着眼于史料情况，另一方面也是着眼于宋代在中国史上的特别意义，也考虑到前人对于两宋的研究工作不如理想。

就政治军事言，宋代虽然是中国衰弱不振的时代，但就社会经济文化言，却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大有进步的时代，可以视为中国近古时代的开始，有别于汉唐的中古时代，这已是人人所能了解的了。但中国历史极长，书籍实在太多，过去学人做学问大多从经书开始，下及四史；到两晋至隋唐已是强弩之末；或者关心时务，

注意近代史的研究。我们看民国早期学人往往治古代史兼治明清近代史，截取两头，而两宋居中，又非国史上的强盛时代，不免被忽略了。近二十多年来，国际学术界颇提倡宋史研究，台湾学术界在这种国际风气影响下，也有不少学人从事宋史研究，并有相当成绩表现，《宋史研究集》已编刊十几册，内容大体上还过得去。尤其近几年来有少数青年学人，成绩表现认真扎实，突过他们的师长辈，是一可喜现象。不过，究竟人数不多，他们是否有长远的大规模的深入研究计划，我也不知道，所以很希望有更多优秀青年学人全副精神投入这一潮流。

再则就材料情况言，两宋也是青年学人最好大显身手的时代。我在《经验谈》第三篇《论题选择》中有一节“论材料情况”说，不但要注意材料是否充分到足以圆满的解决问题，也要注意到自己是否有力量控制这些材料。就这一点言，综观各个断代史，当以两宋时代的材料情况最为适中。宋代人文发达，印刷业也已相当发达，当时人写的大部头史书与重要人物的文集以及笔记类书保存得很多，所以研究这个时代不虞材料缺乏，这比研究汉唐要好得多，更不说先秦古史了。我在同书第一篇第四节中又说研究中古史，“要尽可能的把所有关涉这个时期的史料书全部从头到尾的看一遍。”研究中古以下的时代，当然最好也能这样。然而从事明清及近代史的研究，就几乎根本办不到，也就是说，任何人研究任何问题，几不可能掌握该问题现存的全盘史料，这是莫可奈何的先天局限。只有两宋的研究，若能自青年时代就有大决心，下大功夫，是可以将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书全盘看一遍的。何况现在台湾书商已把大部分的两宋重要史料书影印出来，凭个人力量要将重要史料书大体搜集齐备已非绝不可能，这样运用起来更为方便。所以就我的观点说，两宋史料情况最为适中，是最可以让青年学人大开拳脚的地方。这就是我常常鼓励青年学人投进宋史研究的基本原因。

况且宋史既被前人所忽略，已有的研究成绩自较薄弱，与上古史、中古史比较起来，可以说宋史还是块尚待开发的新园地。在已开发的旧园地里，研究成绩要突过前人很不容易；反之，在新园地里，要想突过前就不难。还有，材料愈少的时代，所需要的学力就愈高，上古中古时代，材料较少，须有高度的学力才能创出好的成绩；宋代史料多，但又非多到不能控制的地步，能下大功夫固然必能产生大成绩，纵然不能下大功夫，也可获得相当的成绩，不至于找不到材料，写不成论文。这是退一步的想法，认为研究宋代史，不论天分如何，功力如何，选题如何（前人工作成绩少，所以选题的范围宽得多），只要相当努力，总不会落空；但在上古、中古的园地里，若是功力不够，又没有选到个适当的好题目，就很可能完全落空，毫无所获，乃至兴味索然。这又是我鼓励青年投身宋史研究的另一原因。

八 我对于唐诗史料的利用

问 你写论文常常引用唐诗，是否对于旧诗有浓厚兴趣？

答 我实际上不懂诗学，只是对于旧诗有相当兴趣。但是除了杜诗之外，兴趣不算很浓厚。

我对于唐诗可分两方面说：第一，我把读诗当作娱乐，这是自幼年时代开始的。因为长兄德明先生略能诗文，家中也有几部诗文选集与专集。我父亲裕荣公务农为生，一个字都不识，但却花了一笔可观的代价换来一部善本《李太白集》，实在难能^[1]！我中学读书时代，寒暑假回家，总不免时时翻阅诗集作消遣，只是伊唔乱唱，并不真懂。后在齐鲁研究所时代，开始对于杜诗发生特别兴趣，暇时经常朗诵杜诗作为消遣。我爱杜诗，是深感杜翁对家庭，对朋友，对社会人群都有一分真挚深厚的感情，而以沉郁雄浑的风格发之于诗篇，对于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深爱其诗。以我的记忆力之差，也能背诵一百多首，往往山林海滨高歌狂吟，似有“意气风发”之

[1] 这部《李太白集》是刻得非常好的仿宋体，纸色古朴，分装两套，函套外面精绣着龙凤图案，看来非常美观。据说本是合肥一位高宦家（一说李氏）藏书，后归他的管家某氏。某氏嗜鸦片，穷困无资，将此书出让，索价若干石稻谷。我家并非富有，在乡间只算小康，那时年收稻谷不会超过七八十石，听说此书来头大，看了又极美观可爱，所以买下。现在想来，以一个不识字的老农，肯花那样高的代价买一部书，这种胸襟魄力真是令人惊服！一九四六年冬我复员回家，把这部《太白集》带到南京，曾请教傅孟真先生。据他说可能是康熙年间某氏的精刻本，已是很难得的善本书。

概！我对于古今任何人物，只有钦佩，而无崇拜，只是对于杜翁近乎崇拜，是个例外。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对于社会人群最具自发性影响力的要以文学家为第一^[1]，就基于此一感受而发。此外我对于王维等人有山林气味的诗篇也很喜欢，这大概与我禀性爱好大自然有关。

第二，我把诗篇当作史料。唐代诗学发达，文人对于一切事物喜欢以诗篇发之，朋友通讯，更是经常以诗代文，所以一部《全唐诗》寓含的史料极其丰富，研究唐史，这部书无疑为史料宝库之一。我这十几年来写唐代交通问题，引用诗篇作证之处，估计当在一千条以上。就以最近改订诸文编为《唐代交通图考》的第一篇《两京馆驿》为例，西京长安驿名可考者凡十，其仅见于诗篇者有五松、钟阳、细柳三驿，东都洛阳馆驿名称可考者凡八，其仅见于诗篇者有临都、伊川两驿，彭婆、白沙两馆。又第二篇《长安洛阳道驿程》，全程馆驿名称可考者三十四五，其仅见于诗篇者有阴盘、赤水、盘豆、湖城、嘉祥、临都六驿，福昌、甘棠两馆。再以蓝田武关道驿程验之，全程可考驿名二十有三，其中仅见于诗篇者有蓝溪、仙娥、四皓、青云、阳城、商於、官军、曲河八驿。具见唐诗史料对于我这项工作之重要性；若没有这些史料，相信成果一定大为逊色。

至于杜诗，号称诗史，史料价值更高。例如《秦州杂诗》云“驿道出流沙”（秦州），《东楼》诗云“万里流沙道，西征过此门”，“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我读此诗始知唐代驿道经过秦州远达西域，后来写成《唐代长安西通凉州两道驿程考》（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四卷一期）与《唐代凉州西通安西道驿

[1] 这只是就自然的影响力而言，凭藉政治权势与宗教宣传所发生的影响力，不能算。尤其因政治权势所强迫造成的影响力，只是暂时的，不能长久。

程考》(刊《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三本)两文,合计十几万字,就是由这两句诗引导出来的!又如《中古时代仇池山区交通网》(刊《新亚学报》第十一卷下册)即以杜翁自秦州入蜀纪行诗为考论中心。又如《唐代三峡水运小记》(刊《新亚生活》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号)不过五六千字短文,引杜诗即达十七首之多。余例不能尽引。又如杜翁《遣怀》(《详注》卷一六)诗云:“昔我游宋中(今河南商丘),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今河南开封)亚,剧则贝(今河北清河)魏(今河北大名)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使当时大河南北几个大城市的都市气象活生生的显现在眼前,真是极难得的绝佳史料。又如杜翁《八哀诗》之《武功苏公源明》诗云:“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兖,读书东岳中,十载考《坟典》,时下莱芜郭,忍饥浮云岫,负米晚为身,每食脸必泫。夜字照燕薪,垢衣生碧藓,庶以勤苦志,报兹劬劳愿。学蔚醇儒姿,文包旧史善,洒落辞幽人,归来潜京辇,射君东堂策,宗匠集精选。”九十个字将当时贫苦青年学子习业山林出而应举的艰难情况,很生动感人的描绘出来。这也是唐代教育史上的绝佳史料。再如杜翁《即事》(《详注》卷七)诗云:“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已非。”此花门显为唐与回纥疆界上的一座唐人堡垒,可考两国疆界在今居延海北约三百华里处,即在今内外蒙古分界之北约一百四五十华里山岳地带。唐代四疆国界明确指证,并非易事,而这一条所见,却是能确考的几个据点之一,可谓极为难得。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十几年前,我曾应新亚书院中文系之邀作一次讲演,题目是“杜诗述史”,说明杜诗有些篇章可作列传看待,此外又列举关涉中央政情与政制、社会生活、地方民风、产业、交通、都市、商业、教育、文化各方面的诗篇数百条,实见杜诗中史料之富。

杜诗之外,其他各家诗篇也大都有史料价值。尤其讲社会经

济史，可利用诗篇之处极多，诸如食衣居行、民族风习、工商行业，无不有诗篇可证；或且为他类史料所绝无踪迹可寻者。此例极多，如论中国史上之国际贸易港口。按《全唐诗》之《张循之集》与《包何集》皆收《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一诗。诗云：“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张为武后时代人，包为天宝进士。晋江口之晋江县有泉州之名始于睿宗景云二年（西元七一一），即一般人所习知之泉州。而此年以前，泉州之名在闽江口之闽县，即后来之福州。若为包诗，是即指晋江之泉州，则泉州在国际贸易上之地位较一般史料所见要提早两百年。若为张诗，是指闽江口之闽县，实后来之福州，亦较其他史料所显示福州在国际贸易上之地位要提早一百五十年以上。故不论是张诗抑为包诗，都是研究唐代商港史的极珍贵史料。不但如此，还有些极珍贵的奇特史料。例如元稹《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云：“似木吴儿劲，如花越女姝。”可窥见吴越地区男女体貌。越女姝美，尚别有诗篇或其他史料可证，但显示吴地男子体型，恐怕只有这五个字了。

我利用唐诗做史料，但研究成果，对于唐诗的解读也有些辅助作用。曾有意编撰一部《唐诗地名考》，对于一般读唐诗的人当甚有用，但为时间精力所限，已不可能做得到了！我除了考证唐诗地名外，也偶从地名解释诗篇。例如一九七四年我曾写一篇《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刊《华冈学报》第八期《庆祝钱宾四先生八十岁论文集》）。杜翁此诗只“秋风嫋嫋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四句，表面看来甚易了解、但试问滴博、蓬婆各在何处？云间戍、雪外城何所指？严武何以要收滴博云间戍？已收此戍，何以想进一步夺取蓬婆雪外城？杜翁歌颂严武何以特用此两句？乃至“云”“雪”是否只是普通名词用以状城戍之高寒？这一连串问题，前人似都无能作解。本文从历史与地理

背景，作深入研究，对于这一连串问题提出明确具体的答案。^[1]自信此文发千古之覆，想不为过。又如我撰《唐代荆襄道与大堤曲》（刊《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引用六朝至唐荆襄地区浪漫热情的“西曲”中最具代表性的《襄阳乐》与《大堤曲》诸诗，以见这条路在中古时代之交通盛况，也为此等诗篇提出交通商业背景作解释，可为读中古时代此类源自民间文学诸诗歌者之一助。

近代研究唐史，以“诗”“史”互证，自推陈寅恪先生为最著。陈先生才思高敏，学养深厚，能就“诗”“史”曲折互证，成其新解；我之以“诗”证“史”，只是从浅显处着手，就“诗”的表面意义加以运用，以显现史事之面目。因为注意而较广，可能较陈先生所获为犹多，但就学术境界言，自不如陈先生之深邃了！

[1] 此文大意：今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与大渡河上游之间以邛崃山脉北段为分水岭，唐代这一地区北至河湟为唐蕃交争最激烈地带。由汶川（今县北威州镇）循沱水（今杂谷河）向西北上行经维州（民国理县，中共理县西移至杂谷脑），越滴博岭，经云山郡（即奉州定廉县，在今杂谷脑西四十里）、天保郡（约今邱地西北），达索磨川（今梭磨河）河谷，此为一道，在南。又由茂州（今县）循安戎江（今黑水）西北上行，经真、悉、静等州至安戎城（约今芦花城西，北纬三二度东经一〇三度十分地区），城在大雪山又名蓬婆山脉（今邛崃山脉北段）中的蓬婆岭下，又西行，亦达索磨川河谷。此为又一道，在北。两道会于索磨川，为通吐蕃大道，即李德裕所谓“地无险，走长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者。故唐蕃用兵攻守，照例滴博、蓬婆两道并重。开元末年，在南道取得维州、滴博岭，建立云山郡；在北道取得蓬婆岭，安戎城，更名平戎城。天宝中，因此西向，在索磨川中游置保宁都护府（约在今中壤口、下壤口地区）以控制西蕃走集。唐人视此为一次重大胜利，朝廷君臣且宣称此次胜利是由玄宗“亲纾密策”，所以当时朝野极为耸动。安史乱后，此地区尽失。有了这样历史与地理背景，严武镇蜀，去此事不过二十余年，自然欲图恢复两道的控制权；已收滴博岭，当然要进一步夺取蓬婆岭；杜翁也势必要从此角度歌颂他。至于云间戍指滴博岭外的云山郡，雪外城即指蓬婆岭外的平戎城，而蓬婆山又名大雪山，所以“云”“雪”也都是地名。借地理专名转化为普通名词，以状城戍之高寒，更见杜翁造句遣词运用之妙。读者若欲了解此段考证，除看《笺证》本文外，尚可参考《唐代茂州西通吐蕃两道考》（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已收入《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

九 我今后的撰述计划

问 你的《唐代交通图考》何时可以完成？此书完成后，《唐代人文地理》与《国史人文地理》两书的写作计划如何？

答 我这十几年的写作重心是在《交通图考》，时间拖得太长，朋友们学生们已屡屡询问我这个问题。这部书委实花的时间精力太多了！目前正在写《东北通塞外诸道》，大约再过一两个月便可写成。届时，唐代政治核心地带及西南、西北、东北地区都完成了，尚余东南地区，材料还是一小箱。不过东南地区，困难问题可能较少，打算把写作态度放松一些，希望在两三年内定能完成。

下面两书，顺理成章的写法是先写唐代专书，次及历代通论。但朋友们或劝我先写《国史人文地理》全书，立一大纲，对于后学益处较大，如余英时兄即不只一次的表示此意，苏庆彬兄也有类似的意见。我想这话很有意义，考虑采取此项意见。

近数年来，深感渐入老境，而交通一书尚未完成，下面两部大书，实已无法都能完成，势必要放弃一部。既然想先写《国史人文地理》，就必须放弃《唐代人文地理》的撰写。但三十几年来所搜录《唐代人文地理》资料，除交通问题外，如国疆、政区、军镇、户口、都市、物产、民族、民风、宗教、文化各方面大约也将近十万条，功夫下得已极大，放弃了未免可惜，不知等到何年有什么人肯对此项问题再下这样大的功夫！所以又想将这批材料分类编录为一

部资料集，如顾氏《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便将来学人之取用，或加工续成。一九八〇年秋冬之际，拟利用晚上时间，开始此项编录工作。先提出都市编的成都资料，加以编排整理。但我一向做精细工作的习惯，也有毛病，看到问题总想追求解决，发觉晚上在家短暂时间不够，乃移到研究室作为一项正式工作来做，结果仍写成一篇正式论文，《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刊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二卷），不过已比我做交通问题松懈多了^[1]。

在这篇论文写成之后，我的撰述计划，又有一项大转变，决心仍先写《唐代人文地理》，至于《国史人文地理》一书，以后再说。因为唐代资料已搜集相当完备，成书极有把握。即如这篇论文，全凭手头已录资料写成；临时参考，也只限于自己收藏书刊，利用图书馆藏书之处极少。如此看来，虽然完全退休家居，工作进行仍无问题，必能顺利完成这部计划。至于《国史人文地理》，已有的成绩，最主要的是历年编写讲稿十八夹一百数十万字及写录卡片（唐代除外）殆不逾两万张而已。此外历年复印资料及搜购书刊虽大多为此项工作而准备，但尚待加功阅录，想来就是尽有生之年全力以赴，也无把握能写得好（太大的东西本不能奢望写得如意）。故为稳健计，仍先写专题，暂置此项通论工作，将来只将这批讲稿加以整理，并作必要的补充，精粗杂陈，作为一种初步的未定稿保存而已^[2]。

[1] 做研究工作稍一松懈，就可能出毛病。即如此文，讲唐代及其以前的成都城郭及城外两江问题，虽已纠正杨氏《水经注图》之误，但因为比较放松，就疏忽了《舆地广记》双流县下的一段材料。后来检到此条材料，乃知宋人已知内江（郫江、市桥江）本流经城南，高骈始将内江改道绕经城北，与我费力考证所得结论完全一样。虽然自喜考证功夫之精密可信，但究竟是白费了！再者据该条，高骈所筑罗城的南墙实在旧内江故渎之南，外江（流江、笮桥水）之北。我未得此条材料，只得以意绘之于内江之北，这就是疏懈之过。所以真正认真研究问题，一点都不能马虎！不过时不我与，已不能随时顾到绝对标准了！（按此文已大加增订，刊《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

[2] 最后两段文章，已见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三日所写《唐五代时期之成都》的附记。

十 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

问 研究历史，从哲学入手如何？

答 近来青年喜欢谈哲学，中文大学历史系学生有不少以哲学系为辅系，你此一问大约也是因为有这个现象而发。据我的看法，哲学理论对于史学研究诚然有时有提高境界的作用，不过从哲学入手来讲史学，多半以主观的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能努力详征史料，实事求是，只抓住概念推衍发挥，很少能脚踏实地的做工作。这样工作，所写论文可能很动听，有吸引力，但总不免有浮而不实的毛病，不堪踏实的史学工作者的一击。不说远的，只就主修哲学而以历史为辅系的学生而言，他们的答题方式，总是大而化之，不能针对问题踏实作答，好的尚能抓住概念想像发挥，差的更似是而非，东扯西拉，不知所云。这样做历史研究工作，就很难深入，钻研出真正的成果来。现在也有些成名的哲学家写历史，就不免有这些毛病，空洞无内容，只是他自己的哲学，不是历史！当然若想研究哲学史自当别论；研究学术思想史，先对于哲学有较深入的认识，也比较有帮助。例如汤用彤先生研究中国佛教史，萧公权先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好的例证。不过也因为汤先生为人极踏实，极沉潜，萧先生禀性也相类似，而且兼学政治学，所以他们两人有那般真实的成就，只见有哲学根柢的好处，不见从哲学入手的毛病，此外似乎就很少有！而且他们两位也只限于研究与思想史有关的领域，若是泛及史学领域的全部，恐怕就未必能那般出色！

十一 研究中国史不必要 从中文入手

问 研究中国历史，先从中文方面入手，或者先进中文系，打好中文基础如何？

答 中国语文为治中国史的一项基本条件，因为治史必须有看得懂古书的能力，又要有写作表达的能力，所以研究历史的人必须要有适当的中文程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专从中文入手，却有毛病。因为走上来先搞中文的人，做学问的态度往往趋于过分保守，乃至株守，发不开。我在中学大学时代就看到不少例子。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是在《经验谈》第九篇第六节中所提到的那位好友。他以中文见长来读历史系，在大学中也特嗜中文系的课。他文章写得好，治史也很努力，但终于不能有所发展。目前很多大学的中国语文学系，讲学的态度有些保守的倾向，青年们读中文系，若就从中文这条路子一直发展下去，自可有其成就，但若中途转到历史园地中来，他的史学基础既很薄弱，对于与史学有关的各种社会科学更无一点概念。在那样情形下，做史学研究工作，势必遭遇到很大的局限。他最有希望的一条大路可能是在学术史方面求发展，其次也可能长于史籍校订工作，因为一般言之，这方面的工作者要有较深厚的中文修养。不过他仍要在史学本身补下极大功夫。否则研究学术史固然不会能有辉煌成就；就是史籍校订，虽属小道，但若只

凭中文造诣深厚，也不能得到较好的成果，我最近就看到一个极好例证。至于史学其他方面，因为他对于历史上关涉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风习各方面的问题，多不免有些隔膜或不大关切，自更难贯穿历史各方面，做一个有规模的大工作。

实际上，历史学是一项人文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包罗万象，任何历史现象都当寄予关怀，甚至天文历数动植矿等纯自然科学也当留意，所以研究历史就当从史学本身入手，庶免有先天性的先入为主的性向。若先从别的某一学科入手，势必走上来就无意中执着在某一方面，他的着眼点关怀面不免先有局限，方法上意识上也不免有所偏向。因此研究史学不但不要从中文哲学入手，就是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入手，也有同样毛病，倒不如从史学本身入门，而广泛留意各方面，吸取各种知识，虽然对于各方面所知者浅，但对于史学研究助益则大。至少可以使你能胸襟宽宏，关怀广阔，无所执蔽！

所以我认为研究中国历史还是要以史学本科为基础，中文固然重要，但中国历史的重要史书、基本史料，大都是文学名著，如《左传》、《四史》、《通鉴》之类自不待言，即如《晋书》、南北朝各史、旧新《唐书》，文章虽不都是第一流，但都有相当水准，而且里面收有很多当时第一流的文章，久读之后，自能增强你的中文程度。我在中学时代，中文程度极差，大学读书时虽也选修了中文系的“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及“中国文学史”、“诗选”等课，但基本功夫仍下在史学名著《史记》、《汉书》等方面。后来更少在中文方面下功夫，但看书能力与写作能力也就与时俱增。这都是从史书中无意中学到的，不曾特意要学好中文。在这期间，虽也将《全唐文》、《全唐诗》都从头到尾看一遍，但那只是找史料，不是从文学观点去研读。专从文章观点去读的书，除了第一、二篇所提的《饮冰室文集》与《史记论文》等之外，恐怕只有《古文辞类纂》与

《续纂》，自然也只是选读。所以我认为对于史学有兴趣的青年，在学校中只要选修中文系的文字、声韵、训诂之类的课即可，其余的，只要能认真的读史书，自能无意中兼有收获，不必要先搞好中文，以中文为基础来研究历史。

再说若要从语文方面入手，倒不如先对外文下点功夫。主要的是英文与日文。先有了相当的英文阅读能力，读些外国的史学名著，可能在方法上有些帮助；先有了相当的日文阅读能力，将来治中国史时，可以充分利用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的成果，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帮助尤大。可惜我对于这两种语文都未曾事先下过一番功夫，一走上中国史的专门研究之路，就为兴趣所牵，不能旁顾外国语文，这在研究工作上也吃亏不少！

十二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问 现在新的风气，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你对于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答 这一点我在《治史经验谈》的第一篇中已谈过，大意是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但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上的运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丹。而且社会科学种类繁多，对于史学的研究可说都可能有相当辅助作用，但这样繁多的学科，一个人事实上不可能都能通解。现在我再想更进一层谈几句。

史学研究是要有辩证发展的基本观念，运用归纳法求得新结论。演绎法只可用作辅助方法，不能滥用为基本方法。大陆上一些左派史学家抱着社会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治史的万应灵丹，实际上只是依据未经深入研究而主观拟定的结论与概念，来加以演绎推展，应用到历史事件上去。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者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所推演出来的，然后拿这个结论或意念作为标准，在史书中搜录与此标准相合的史料，来证成其说。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选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

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

唯物论强调物质生活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因素，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我本来是非常同意这种看法的，所以特别注意经济史，我计划中的《唐代人文地理》也以经济地理所占分量最重。但要像他们那样研究历史，实际上等于没有做工作。因为研究工作就是要找出新的结论，新的概念，既然结论概念都已有了，何须再要研究？这种工作要说有意义，那只是用来巩固什么主义思想的权威性。所以这些所谓史学工作者，只是响应当政者“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个相当坦率的口号，而趋附权贵，不是真正的史学家。所幸近几年来，大陆上的史学工作者，“念经”的文章已渐见减少，转而再走踏实之路，有可看的文章了，这是个好现象！

从另一方面来说，若是大力宣扬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来治历史，也有偏差。我的意见，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研究历史本是条很好的途径，可以采取，但过分强调，毛病也很大。我看到好些论文，什么理论、什么模式，不一而足。模式理论有时诚然可以用来帮助理解问题，分析问题，但过分强调，盲目的遵行，研究问题也不免先有了一个概念，甚至有了一个想像中的结论，然后再选样式的找材料，加以证明，也就是找一些合乎模式的材料，再把模式套上去。

这种风气之所以流行，我想除了运用这类理论模式研究历史，有时诚然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之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其一，这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新动向。青年人留学海外，惊为新奇，不免趋新向往，回国以后，更恃为法宝，以此自矜。其二，抓住一种理论模式来研究问题，工作上要简单容易得多。因为先有一个架子，再找一些材料往上敷衍，就不难。而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更明白的说，要从史料搜罗、史事研究中，

建立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可说一番理论；而不遵行某一种已定的理论为指导原则，来推演史事研究。换言之，要求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这种研究方式自然要吃力得多。避难趋易是人类的天性，所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一经引进，就成为史学界的新动向！

但一九七九年我在耶鲁大学，以此项问题请教余英时兄。据他说，这一学派在西方史学界仍只是一个小支流，人数并不很多，而正统的史学家仍居主流。他们的工作仍是着重在史料，根据史料实事求是的研究事实真相，并不标立理论，遵用模式。大约西方正统史学，学起来比较困难，而讲理论模式的方法，比较容易吸取，应用到中国史研究上也比较容易写成论文，所以大家乐于吸取这一类方法，成为一时新风尚。最近几天，我偶翻过去生活目录，看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在一次严肃的会议席上发言，也谈到此一问题，认为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历史，是一项好的进展，但我希望这是历史研究方法的一项“发展”，而不是“交替”（替换）。所谓“发展”是在传统方法上再加上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交替”是放弃传统方法，而过分重视从社会科学理论去作解释。我现在仍坚持此项意见，应不可易。若是鄙弃传统方法，而以理论解释来替代，我担心可能愈来愈走上空疏虚浮一途，重蹈明末王学末流的覆辙，束书高阁，游谈无根！所以总结起来说，我对于社会科学方法，不但绝不排斥，无宁说非常赞成，只是绝不赞成奉为法宝，在史学研究上到处滥用！

十三 “无孔不入”、 “有缝必弥”

问 你在《经验谈》的《序言》中说，研究问题要“无孔不入”“有缝必弥”。是否可举一两例说明之？

答 所谓“无孔不入”者，当建立自己论点时，要从各方面尽可能的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与理由，来证明或加强自己的论点；当发现史料或他人论点有矛盾或不合常理处，尤其是个好的孔隙，可以钻进去作一番探寻。所谓“有缝必弥”者，已建立了自己的论点，还要看看这个论点与所用证据是否还有漏洞，可能为人所乘，被一举击破；或可能被人误会有漏洞，引起人家怀疑，故必须预先弥缝起来，让别人无怀疑余地。所以前者是积极的，是攻势，是主导方法；后者是消极的，是守势，是辅助方法。

我最近为诸生讲解较早期所写《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一文（《中研院院刊》第一辑。按此文已增订，刊入我的论文选集）。今即先就此文各举一两例。

班氏《地理志》按郡国排列，各郡国下列出所领各县名称，并在适当的地方注明各种史实。就职官言，将本郡国中次要职官都尉的治所与各种业务机关（如盐官、铁官等）的所在地都明白的注明，但却绝不提本郡国的行政首长太守与国王、内史究驻在何处。这种情形，读者应可推想班氏必有义例。否则，班氏未免太糊涂，殊不

合理。按《续汉书·郡国志》（即今本《后汉书》中的《郡国志》）在篇首即说明，“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续志》书事，除分州排列外（州在西汉只是监察区，东汉州刺史权重，州实为行政区），一切条例皆仿班《志》，其自言郡国治所条例如此，故自酈道元《水经注》到胡三省《通鉴注》，均认为班《志》体例也是如此，《续志》承之耳。就是说班《志》各郡国下所列第一县就是治所，故不必特别注明。这是个顺理成章的排列次序，也是个极合理的解释。但到清代阎若璩始作翻案文章，说班《志》各郡国所列第一县诚然很多是治所，但不一定是治所。此说见其所著《潜丘札记》卷二。后经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五《郡国属县》之数条）、王先谦（《汉书补注》），迄近代学人如谭其骧（《西汉百三郡国守相治所考》，《禹贡》六卷六期）等，逐一增加史例，似已成定论。但我仍认为元以前旧说是正确的，阎若璩迄今学人的反驳，虽然列证纷纭，但在逻辑理论上都绝对站不住。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西汉二百年间，郡国治所常有变动，班《志》乃据西汉末年平帝世一时之版籍写录成篇，自不能与《本纪》、《列传》中随时所见的郡国治所完全相合。阎氏以下诸人，没有时间观念，忽略了这个基本道理，而遍搜《本纪》、《列传》中所见之郡国治所，来与班《志》相比勘，发现某些郡国治所不是班《志》的第一县，就说班《志》第一县不一定是治所，显得班《志》体例紊乱。其实《纪》、《传》所见郡国治所，往往是西汉末年以前某时的治所，自不一定能与班《志》完全相同。

我这篇论文，首先说明班《志》详细注明都尉治所，而绝不提太守治所，如此书事，必有义例。再遍举例证，证明西汉二百年中，郡国时有分合、增加或省废，治所也常有迁徙。然后再就阎氏迄今诸人所提出的证据一一加以检讨，有些处他们没有了解当时史事，尤可怪者，他们都无时间观念，好像西汉二百年间郡国绝无变动，

治所更是不可有变动，真太迂执了！其实要使他们的论点能够成立，只要找出一个可信的证据，证明某郡国在西汉末年平帝世（最好元始二年）的治所不是班《志》某郡的第一县。只要有这样一条，就可说班《志》义例不纯，第一县不一定是治所了！只可惜他们提出的证据都是西汉中叶以前乃至秦及汉高祖时代的郡国治所，这样证据，虽征引纷纭，实际上毫无用处！

不过他们证据也有一条很坚强，即梁国八县，首列碭县。阎若璩曰：“梁国不治碭县，而治睢阳，以《梁孝王武传》知之。吴楚七国反，梁王城守睢阳，后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王国以内史治其民，而梁内史韩安国从王于睢阳。非以睢阳为治而何？”这条证据似乎很坚强，所以王鸣盛、王先谦、杨守敬、谭其骧诸学人皆信实其说。全祖望本持旧说者，至此也不能不承认班《志》有此一例外。承认有一个例外，就是承认阎氏新说第一县不一定是治所了！

我认为阎氏举《梁孝王传》为证虽很有力，但若只因梁孝王武与内史韩安国治睢阳，仍不足证明班《志》第一县之碭阳不是治所。因为梁孝王武与韩安国事在景帝世，下距平帝元始年间尚有一百五十年之久，仍不足以推翻班《志》第一县即是郡国治所之旧说。不过，我检查《梁孝王武传》，孝王薨，分为五国，长子买仍王梁，是为恭王。买子梁平王襄仍居睢阳。五传至王立，当成帝世，仍都睢阳。成帝（西元前三二一七）至平帝元始（西元一一五）时代已极接近，只有十几年，甚至只有八九年，就是班《志》所依据的书籍之时代了。所以他们的证据以这一条最为坚强有力，不过他们自己却未仔细分析出来！

我研究这个问题，到此处是一关键，若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作合理的解释，则我的论点就要动摇。但又实在找不到一条积极有力的铁证，必得从各方面寻出孔隙，钻进去深入探讨，作合理的推论，以削弱上引《梁孝王传》这条证据，以维护自己的论点。我搜

索思考结果，得到相当满意的合理解释与推论。兹录这段原文如下：

考《获水注》，“获水又东迳碭县故城北，应劭曰，县有碭山，山在东，出文石，秦立碭郡，盖取山之名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斩山作郭，穿石为藏。……山上有梁孝王祠。”又《续志》惠氏《补注》引《曹瞞别传》云：“引兵入碭，发孝王冢，破棺收金宝万觔。”是碭不但为大县，为秦碭郡所治，且亦为梁国始祖宗庙所在也。又检《孝王传》，梁分为五后，梁国尚有十三县，一传至王襄，有罪削五县，尚有八县，又五传至王立，仍都睢阳，然屡削户数。至成帝元延中（纪元前一二一九），复削立五县，只得三县矣。至平帝元始中（西元一一五）废为庶人。后二年，又立孝王玄孙之曾孙音为梁王，盖还复削五县，故《地志》仍为八县也。据杨氏《汉地志图》，梁国地形，东西两头广大，中间狭仄（中为沛郡之祁乡县所扼），如药葫芦形。西部五县，睢阳其一，东部三县，碭县其一；碭与睢阳之间有下邑、虞、蒙三县，则王立末年仅有三县时，必不能兼有碭及睢阳也。然碭县为梁之始祖墓塚祠堂所在，既与立国，似不宜割隶他郡，盖即其时尽削西部五县，徙都碭县，以就祖墓宗庙欤？且立甚刚戾，其得重罪，始于永始中“对外家（王氏）怨望有恶言”，故元延中削五县，有三县；元始中为王莽所奏废，亦“坐与平帝外家中山卫氏交通”之故。故自始即以不满王氏擅权而得罪，其他罪名皆莫须有也。睢阳为关东有数之大城，军事之重镇，王氏窃权，自不乐为刚戾不驯且素不满王氏者所居，故以东就孝王冢墓祠堂为名，徙都碭县，而收睢阳以益邻郡耳。故据《孝王传》，虽成帝时梁国仍都睢阳，但仍不能以概平帝元始时之版籍也。

我无直接证据，证明自己论点之必是，阎氏诸人论点之必非，但我以梁国祖墓祠庙为基点，参合梁国国土日削，疆域地形与梁王立得罪之背景，从这种种角度上加以推论，则在班《志》所代表的时代，梁国实都碭县非都睢阳已为极明显之事实，这就是“无孔不入”之一例。梁国祖墓祠庙所在、梁国疆域形状与疆土屡削至仅有三县，以及梁王立得罪之背景，这四点都是可以钻进去仔细探讨的孔隙。

再就此文另举一例。汝南郡，《汉·地志》第一县是平舆（今汝南县东南六十里，中共图置平舆县）。阎若璩以为汝南郡治上蔡（今县西），证据是《翟方进传》卷首叙事与《汝水注》。我就他这两条证据提出驳论，并从各方面观察，提出理由，推论西汉末年汝南郡治平舆之可能性远较治上蔡为大。兹亦就原文稍加增饰，引录如下：

检《翟方进传》首云：“汝南上蔡人也……父翟公好学，为郡文学。方进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太守府为小史。”云云。汉制，郡属诸县之人皆可为郡吏，此段文字何足为郡治上蔡之证？至于《汝水注》，则云“东过汝南上蔡县西。汝南郡，楚之别，汉高帝四年置。”此虽可证高祖始置汝南郡时治上蔡，然高帝时事不足以概哀平。且高帝四年，天下尚未定，仓猝间所建之郡，其四境及郡治，势难与二百余年后哀平世班《志》之版籍相一致。而班《志》与百余年后之《续郡国志》，县数全同（均三十七城），县名四境变动亦极微。按《续志》汝南郡治平舆，吾人与其相信郡治迁徙在东汉初年，不如相信在西汉末年以前，因为高祖至武帝时代郡国变动最大。而西汉末至《续志》时代变动则甚小。且据《召信臣传》，昭宣之世，上蔡置长，不置令，是为小县，非大县。且于班《志》汝南郡三十七县中地位偏在西北境（参看杨氏《汉地志图》）。按汝南乃中原大郡，班《志》云领三十七县，四十六万余户，平均每县万户

以上，必令多而长少。上蔡为长不及万户，可见在诸县中之地位甚低。以理推之，不宜以地位偏在一隅而人口稀少之上蔡县为郡治。据《汉书·翟方进传》及《后汉书·方术·许杨传》，汝南有鸿郤陂，滨陂地饶民富（参看《淮水注》及杨氏《汉志图》），必多户口众多之大县。平舆为令为长虽不可考，然滨临鸿郤陂东岸，必地饶民富，为大县之可能性极大，加以地处一郡之中心地带（参看杨氏《汉志图》），其为郡治之条件远优于上蔡。则高帝仓猝建郡虽治上蔡，其后迁治一郡中心人口众多之平舆大县，殆可断言，阎氏拘泥高帝四年事以驳班《志》，谬矣。

这也是没有直接硬证，而从多方面寻罅蹈隙，找出合情合理的理由来支持自己论点之一例。

同一文中，也有“有缝必弥”之例。我在原文第六节中，先提出证据，证明酈道元《水经注》已以《汉·地志》首书之县为郡国治所。但是酈《注》中言汉郡治所亦偶有非《汉志》之第一县者，这岂不是我的话有了漏洞？所以下文又设为“或问”预作解释说：

或曰，酈氏既承认《汉·地志》首书之县即郡国治所，何以《注》中言郡治偶有非《地志》首书之县欤？曰，此亦有故。第一，酈《注》常云故某郡治，旧某郡治，或汉某郡治，属辞含混，并不一定指西汉而言。如《漯水注》，高柳故城，旧代郡治。按《地志》，西部都尉治高柳，必非太守所治，东汉乃郡治也。又如《濡水注》引《地理风俗记》曰，阳乐故燕地，辽西郡治。此明东汉郡治也。此类情形极多，不列举。前人于西汉郡治之无考者，即取此类所谓旧郡治、故郡治作为西汉郡治，遇有非《地志》首书之县，即据此譬班《志》无义例，此非逻辑所允许者。第二，酈《注》本非专言郡县之书，尤非专言汉

世郡县之书，惟就河流所经附带追述故事耳。汉代郡国治所前后既常有迁徙，即曾为治所者不止一城。设有甲乙两城，如甲城为西汉末年所治，故《地志》列冠他县，乙城为前期治所，故《地志》序在甲后。前后治所既有甲乙二城，若甲城无河流，乙城有河流，甲城既无河流，郦《注》自遗而不载，乙城既有河流，自可附书为汉代郡治，吾人固不能据此以否认郦氏承认《地志》首书之县为郡治，亦不能据此谓西汉郡治乙城，即不治甲城也。若甲乙两城均有河流经其地，则或两书之：如中山郡，既云治唐县之中山城，又云治卢奴；又如河内郡，既治野王，又云治怀，是其例也。亦有一书一不书者。如犍为郡，西汉四易治所，皆近河流。郦《注》惟于犍云郡治，于武阳似亦以为郡治，而于南广、犍道两地则失书。然吾人亦不能据此以否认郦氏承认《汉·地志》首县为郡治，亦不能据此谓西汉犍为郡治犍及武阳，即不治犍道、南广也。此皆关乎逻辑方法问题，前人考证往往忽之！

这是我自己找出自己论点可能被误解为有漏洞，而预为辩解之一例。

以上皆就班《志》郡国治所问题各举一两例。我写论文，有述证处，有辩证处。辩证处，就经常要运用这两方面的方法。兹就其他论文再分别各举两三例。

关于“无孔不入”者，例如我写《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史学论文选集》第七篇）就是由史料中两种不合理的情形所引发。《括地志》久已散佚，只有徐坚《初学记》之《州郡部》录存其《序略》，列举贞观十三年大簿之府州三百五十八个名称甚备。而孙星衍《辑本》辑此条，排列方式殊为可疑。如胜州都督府（治所在今河套东北角黄河东流折而南流处之南岸）越过好几州而远统蒲州（治所在今山西西南角永济县）、虞州（在今山西南部安邑县），黔州都督

府（治所在今四川东南部彭水县）越过潭州（今湖南长沙）、洪州（今江西南昌）而远统睦州、括州（皆今浙江省境）、常州（今江苏南境）、抚州（今江西东境）等。如此之类颇多，绝不可能是事实。又《旧唐书·地理志》述各州沿革，有置都督府者，述其督州，屡次说“今督”某某若干州，而“今督”之后又有高宗、武后、玄宗年号，如永徽、显庆等。《旧志》为五代时期所编辑，此云“今督”显非五代时期之“今”，而为抄录过去志书原文。这两点都是大“孔隙”，可以钻进去深入探讨的，结果写成这篇论文。

又如东晋十六国时代末期，慕容燕与拓跋魏因参合陂一战（西元三九五年）而决定了燕亡、魏兴之命运，奠定魏统治北方之基础，这是北朝史上一次关键性战役，其重要性不下于东晋、前秦的淝水之战。但其地究在何处？郦道元《水经注》指在平城西北约三百里之遥的仓鹤陁，即后立为参合县处（今岱海西南）。但自汉世代郡有参合县，在今阳原县，是在平城之东百里以上，不在其西北。这又是史料有矛盾处，不过时代不同。我写《北魏参合陂地望辨》（《太原北塞交通图考》附录，《新亚学报》第十三卷），从种种角度研究，也可说从种种孔隙处探讨，乃知北魏初期之参合陂仍在平城东北汉参合县，今阳原县地，不在今岱海西南。但汉县故地之参合陂，到北魏后期已淤废，而苍鹤陁音近“参合”，又当平城西通云中故都之大道，近处亦有陂地，故不免世俗相传，以为即燕魏战地之参合陂，郦氏不察，故有此误耳。

再如《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七年八月“乙酉，尚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兼吏部尚书宋璟为尚书右丞相。尚书左丞相源乾曜为太子少傅。”按此文显有问题。姑不论宋璟官衔前后两“右丞相”是否有误，而宋璟原衔，开府仪同三司是散阶，右丞相与吏部尚书都是实官，唐籍中书人官衔，决无以散阶夹于两官名之间之事例。此显然是一大孔隙，有问题。经过与他人官历参互比勘，多方

取证，乃知第一个“尚书右丞相”下脱去“张说为尚书左丞相”八个字，以致文理不通。说见拙作《旧唐书本纪拾误》（《唐史研究丛稿》第十篇。按《旧唐书·玄宗纪》此条已编入《正史脱讹小记》，刊我的《史学论文选集》）。

我撰论文，如此诸例，不胜枚举。但有些史料所显露的小孔隙，当时懒得细心追求，即酿成大误。例如我写《唐五代时期之成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二卷），在附记中已自表白，这篇论文的写作态度比研究交通问题松懈得多。但一放松就出毛病。例如第三节讲城郭，我遗漏了《舆地广记》卷二十九成都府双流县一条重要材料，因此白费了许多转弯抹角的考证功夫（虽幸结论不错，但那条材料早已讲明了），这且不说。而照这条材料看，高骈所筑外围罗城之南墙在外江（大江）之北，内江故渚之南。我虽未看到这条材料，但我写作当时，看到《元和志》成都县目云“万里桥架大江水，在县南八里。”《寰宇记》华阳县目云，“万里桥在州南二里。”益州成都府所治成都、华阳两县实在一个城中，两书记万里桥去城墙距离有六里之差，当时本已想到《元和志》撰述在高骈筑罗城之前，自就旧城（即后来之内城）而言，《寰宇记》撰述在高氏筑罗城之后，当就外围罗城而言。若当时循此孔隙追求下去，可能有所发现，但态度放松了，此等细节处懒得再进一步分析。所以本文中未加说明，后面附图，不免随便将外围罗城的南墙也画在内江故渚之北，因此就错误了。这是个好教训。所以真正的以绝对标准研究问题，实在是一点都不能放松的！何况不着实际的放言高论！

至于“有缝必弥”者，例如我近年讲唐代户口问题。一般人总拿正史《地理志》所记户口数作为当时中国的户口实数，其实这是大错。《地志》所记户口只是户籍，政府凭以收税，当时实际上的户口数照例比户籍簿上的户口为多，有时多几倍，乃至十倍。唐朝户

籍之户口数以天宝年间为最多，但仍非实际户口数，因为除了隐没户口之外，还有很多人合法的不入户籍簿。如僧道、商贾、官户、杂户、部曲、奴婢等等都不入户籍簿。中国境内还有少数民族，也多不入户籍簿。所以实际上的户数口数都比地志、政书所记户籍数量为多。因此在唐代其他文献中所见到的各州实际户口数字多半比同时代或相近时代户籍簿中的户口数字为大，而且有些大得多。例如元结《舂陵行序》云：“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全唐诗》四函六册）癸卯为代宗广德元年，上距《新唐志》所记天宝版籍甚相近，而户数几为《新志》道州户数（二二五五一户）之两倍。又如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云，“今此州户万有余。”（《全唐文》五五四）按愈以元和十四年贬潮州，在《元和志》版籍之后只六七年，而民户为《元和志》潮州户籍（一九五五户）之五倍有余，亦为《新唐志》所代表唐代户籍最盛时代潮州户数（四四二〇户）之两倍以上。此两条证据皆无可置疑者。但有些证据却可能被怀疑有问题。如顾况《宛陵公署记》云：“夫宣户五十万，户二丁，不待募于旁郡，而宣户之半已五十万矣。”（《全唐文》五二九）按此《记》以庚辰年作。检《新唐志》，宣州天宝户一二一二〇四。《元和志》二八，宣州元和户五七三五〇。庚辰为贞元十六年，上距《新志》版籍四五十年，下距《元和志》版籍至多十二年，而户数为《元和志》之九倍，亦为《新志》之四倍。不管如何解释，都比户籍簿上的数目多得出奇。惟此文所记数字有一可能的漏洞，即两个“五十”之“十”字可能为衍文。若此“十”字果为衍文，正与时代极相近之《元和志》所记户籍数相当。欲推翻我的论点者就可能这样怀疑，所以这两个“十”字是这条证据可能的漏洞。但考韦焕《新修湖山庙记》，“今宛陵、泾县十八乡，户四万，民奉湖山神。”（《全唐文》七九一）检《元和志》，宣州领乡一百九十五，韦《记》云十八乡四万户民奉此神，则一百九十五乡正当近五十万户，所以

“五十”极正确，无衍文。如此一来，顾《记》作证的力量就大为增强，成为一条铁证，证明宣州在贞元元和间实际户数毫无疑问的为户籍簿中户数之八九倍。这是“有缝必弥”之一好例。

又如我写《汉代地方官吏籍贯限制》（《史语所集刊》第二十二本，又《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一章），主要方法是用诸多史例作统计，但发现有极少数例外，我都自己提出来，一一预作解释，或证明该条材料本身有误，不要等到别人发现这些史例来驳我的论点。或者如果材料本身就有局限性，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也要先自加以说明。例如我写《扬雄所记先秦方言地理区》（编为《史学论文选集》第三篇），照史料数据统计，吴越方言，只是亚强区（C级），至多只能归入强固区（B级），不如东齐、南楚之为特强区（A级）。这一点决不是事实，所以也预为说明吴越数据何以偏小之故。我写论文，在这些方面很注意，尽可能的不遗留一个缝隙一个弱点，让人家抓住，也尽可能的不遗留一点可疑处引起人家的误会！这就是所谓“有缝必弥”。不过这只是辅助方法，不是每一篇辩证性论文一定都用得到的！

大抵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论点，一般人通常都能努力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对于自己论点的漏洞或可能的漏洞，通常都比较疏忽，不太注意。即如上文所提到的《汉书·地志》郡国治所问题，自康熙时代的阎若璩直到现在差不多三百年，好多有名的学人只是尽力的去找出治所不是《汉志》郡国下所列第一县的证据，却不反省一下，班《志》详记都尉治所而绝不提太守治所，其故何在？也不想想，西汉二百年郡国治所有迁移的可能性。这可说是，只知盲目的进攻，不知稳健的防守，自己留下了明显的大漏洞，致命的大弱点。所以我在大学读书时代就看出他们的论证在基本理论上站不住，不过要提出批驳的具体证据，就要十年以后才能做得到！再如有一位很有地位的史学家，研究《蛮书》中所记戎州石门

通南诏道，谓道中之“曲州、靖州”即今云南曲靖县，旧南宁县，南北朝以来之宁州、南宁州。按《蛮书》此段记程甚详，云“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石门……西崖……有阁路。”“阁外至蒙夔岭七日程。”下文详述自石门第三程、第五程各至何处，“第七程至蒙夔岭。”“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废城及丘墓碑阙皆在。”“凡从鲁望行十二程，方始到柘东。”按戎州即今四川宜宾县，柘东即今云南昆明市，都绝无问题。曲、靖州故地若在今曲靖县，则由曲靖西至昆明平地三百华里，为十二日程，而宜宾南至曲靖一千五百里以上之千古险道乃仅十九日程，这是绝不合理的，所以这个论断必有问题，是一个大漏洞，而作者竟未考虑到，无疑也太疏忽，读者只要细心一点，马上可以看得出来，不过要指明曲靖故地究在何处，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此段辩论，请参看拙作《汉唐川滇东道考》（按此文收入《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

总之，不论是“无孔不入”或“有缝必弥”，都是要细心的阅读史料，严密的思考问题，否则自己论点很难真能建立起来，所提论点也很容易被人一捣即破，归于失败！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日再稿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日最后增订

十四 目录学与校勘学

问 《励耘书屋问学记》各篇多谈到陈援庵先生治史特别重视目录学、校勘学，你的意见如何？

答 这两门学问都是治史的基本学问。目录学是治史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之一，校勘学是治史所必备的基本技术之一。

兹先谈目录学。不管你治史走那条路，对于目录学都要有相当认识，但我又认为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在这上面先下极大功夫。这一点与史学方法论之于史学研究一般，很重要，但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精通此道。若再进一步分析，所谓目录学可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目录学可指一切目录书籍，也可指一切书目知识而言；狭义的目录学是就章实斋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叙）而言，这是学术史的基本功夫，也是一项专门之学，一般史学家不必都能精通。一般史学家所须广博知识者，倒是广义的目录学，因为对于各种书刊内容多所了解，等到研究问题时，就知道当看些什么书。近人着手研究一项问题之前，多先翻查各种目录书，作为研究的准备功夫，也就是想先掌握与此问题有关的目录知识，并无必要达到狭义目录学的境界。但是我认为真正的目录学应就狭义而言，狭义的目录学才能真正算是一门学问。广义的目录学只是些目录知识，不能算是一门有系统的学问。不过史学界所谓目录学，通常都只就广义而言，非就狭义而言。

援庵先生治史特别重视目录学，也精于目录学，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治学的初步途径是自目录学书籍开始的。他本来只知读四书五经，目标在时文科举。后来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才知道还有很多好书可看。继而他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了不少功夫。后来著作也颇多直接关乎目录学的，如《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所以他的史学可说是从目录学入手的，自然也特别重视此项学问。其二，他特别注意史事专题研究，不但很少写通论性文字，而且也不做范围比较广阔的专史研究。他那样只作仄而专，而且比较偏僻的专题研究，就特别需要注意目录学，也就是上文所讲的广义目录学。例如他在抗战期间所写两部有名的佛教史考证文字，《清初僧诤记》征引书目，多到八十种，《明季滇黔佛教考》征引书目更多至一百七十余种，而且都是不常见的书，陈寅恪先生为后者作序，称其“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若非于广义的目录学先有广博的知识，何能至此！但反过来说，若不作专仄问题的研究，也就不必先有那样深的目录学功夫。即如我常说的前辈四大家中，就广义目录学的功夫言，宾四师与诚之先生、寅恪先生，似都不如援庵先生，不也同样有其高度成就？且如寅恪先生，中年名著唐史两《稿》及《元白诗笺证稿》，皆不藉很深的目录学功夫。而晚年《柳如是别传》，则征引繁博，非深于此道者不为功。此与论题有关，也因时代不同，而运用不同。中古时代的书籍不多，几乎研究中古任何问题，都要把所有相关的古书全看一遍。目录功夫只限于后代，尤其近代学人研究这些问题的成绩了。所以治史需要目录学功夫的深浅，亦因论题性质而异，因时代不同而异，不拘一律。但这门学问仍要有人下功夫去研究。不但狭义的目录学要有人去研究，为学术史建立基础，广义的目录学也要有人下功夫，编辑各种目录书，以便一般人各取所需地去利用。

至于校勘学，古籍传承久远，往往有脱讹处，故阅读时必须随

时留意比勘，以免为脱讹所误。清人治学极注意校勘功夫，到援庵先生撰《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重刊本改名《校勘学释例》），校勘学的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总结经验，认为校勘有四种方法，即“对校”、“本校”、“他校”与“理校”。照他的说明，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之前最宜用之”。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理校法，即“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鲁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我们研究历史问题，一接触到史料，常会发现古书字句可能有问题，就必须运用校勘方法来解决。否则就可能做不下去，或者为脱讹的史料所诱导而对于史事作出错误的判断。至于校勘方法，大体上不出援庵先生所说四种方法的范围，若能加以综合运用，必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不过需要校勘学功力的深浅，也看自己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研究什么问题。有些问题随时要运用校勘技术来帮助解决，有些问题就很少需要。例如我写《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运用校勘法处比较少，而写《唐仆尚丞郎表》，就随时都用到校勘方法。后来写《旧唐书本纪拾误》（《唐史研究丛稿》第十篇），补正《旧纪》一百七十八事，就中很多是传刻夺漏或传刻字讹，都是该《表》写作的副产品，

也都是用校勘法所获得的成果。近年写唐代交通问题，发现《元和志》、《寰宇记》及《通典》的《州郡典》，脱讹都很多，我们运用时要随时留意，遇有可疑处，就必须仔细考量，经过审慎比勘，才能引用。我曾有意对于这几部书作一番全盘校勘工作，但时间不允许，只得作罢。大抵讲通论、讲大问题，需用校勘功夫处比较少；讲较小问题，愈下细密功夫，校勘法的功夫就愈大。

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再稿

十五 年龄与撰述

问 一般说，人到老年，对于早期发表的论文，往往有悔意。你年青时代发表不少论文，现在有无此感？

答 我也有此感，但不算很多。如《北魏尚书制度考》写得太草率，实际上只是长编，至今无暇改订，不过也只是文字问题，内容并无悔意。再如《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如果在齐鲁研究所时代的初稿能顺利的发表了，后来一定要后悔。至于更早期的作品，如高中读书时代所发表的《研究国学应持之态度》与《儒家之礼的理论》，今日看来，当然很肤浅，但我也并不后悔，因为人人都知道那是学习之作，无伤大雅，甚至也可保存，虽然对人无益，但仍可视为个人学术生活史上的一个标记。

一个人做学问，如果努力不懈，他的方法、悟解一定能愈老愈进步，也愈邃密，我就明显的有此感觉，大约要到精力大衰时为止。例如我写《唐仆尚丞郎表》，就比秦汉、魏晋南北朝两部《地方行政制度》精密得多。五十岁以后写唐代交通问题，又比《唐仆尚丞郎表》写得精密，而且问题也复杂得多，有时心想放松一点，都放不下来！再就某一个小问题来比较，例如我在二十年前写《北魏六镇考》（《北魏军镇制度考》之一节，亦《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一章之一节），据《水经注》之《沽水注》、《鲍邱水注》与《濡水注》三篇，推论北魏御夷镇当在今察哈尔的沽源县、独石口，或稍东数十里地区（《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页七〇九）。最近写《唐代

幽州北通御夷镇故城至契丹炭山道》，虽仍据此三《注》为基本史料，但比勘精密，认为在沽水东源大谷、尖谷二水之间，约今云州堡、独石城之正中间，猫儿峪东或东北乏三山堡地区（N. 45°10'），较旧作已大有进步（旧文仍有颇多误处，兹不说）。又如同一文中之沃野镇，旧据《寰宇记》四九云州云中县条引《入塞图》及《元和志》四天德军条，置镇城于东经一〇八度、北纬四一度半地区（同上书页六九五—九六）。此为粗略的推估。《元和志》云唐天德军在沃野镇南六十里，是谓军城亦在东经一〇八度线上。至一九七二年七月，我写《唐代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考》（香港中大《中国文化所学报》第六卷第一期），作较详密推论，断定天德军城在今乌兰鄂博地区，即在东经一〇八度三〇分、北纬四一度二〇分地区。后据《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五期《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一文，一九七六年，在乌拉特前旗阿拉奔公社境内，发现一座唐墓，并出土《王逆修墓志铭》一块，墓主王逆修曾任天德等军州都防御马步都虞侯等官职，“安茔于军南原五里”处。墓北约二公里处，确有一座古城，可以肯定就是唐代天德军城。《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页七六一七七有摘要，云古城在阿拉奔公社之北。但两文皆无经纬度。据《民国地图集》之《绥远人文图》，以为可能即乌兰鄂博稍北之阿拉恩格地区。最近读到《内蒙文物考古》创刊号张郁一文，有较详报道，再参考 ONC-F-8 与《民国地图集》，始可判定军城当在东经一〇九度，北纬四一度之稍西北，今乌梁素海东北水滨。治学之老而益精，于此可见。杜翁云“晚节渐于诗律细”（《详注》一八《遣闷呈路曹长》），又云“老去诗篇浑漫与”（《详注》一〇《江上值水如海势》）。仇氏曰，“律细言用心精密，漫与言出乎纯熟，熟从精处得来。”所释是也。我深觉治学亦正如此。等到精力大衰，自当别论。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再稿，八五年三月校稿时订正

十六 前进与落伍

问 好多人说，研究历史要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否则被视为保守或落伍。你对于此点有何意见？

答 文学界诚然有一种相当流行的想法，说某人前进，某人保守或落伍。其分野，以是否遵用马列主义或以是否接受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为标准。

我个人认为，研究历史提出成绩，只有正确不正确与有价值没有价值的问题，无所谓前进与落伍的问题。正确不正确的唯一判断标准在证据是否可信，证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合乎事实，或近乎事实。价值的判断标准又更进一步，除了正确之外，还要看你的工作成绩，在这项问题研究上，是否比过去他人更进了一步。若是你的工作成绩虽很正确无误，但那个问题别人早已解决了，你提出的成绩只和已有成绩一样或更低一层，那就仍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说落伍，这样的成绩应可说落伍了！至于是否接受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与价值判断并无必然的关系。因为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只是研究历史可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之一，不是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更不是价值判断的唯一大前提。

其实研究历史，只要能产生正确有价值的成绩，采取任何方法都是一样，主要是在成绩表现，不在方法的新旧。退一步说，要追逐时髦，认为社会科学是新的，就是进步的，但不能产生正确有价值的成绩，仍是无用，功夫白费。若不采取社会科学方法，但能产

生正确有价值的成绩，他的价值仍然存在，只是不时髦而已。何况治学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也该是无止境的进步，愈后愈臻精密，社会科学方法也不例外。摆在眼前的事实，社会科学门类众多，派系各别，而且也是随时有变换，有进步的。若是研究史学要以接受社会科学理论、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为前提，否则就是落伍，那末你运用目前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史学成绩，过了几年不是仍要被视为落伍了！换言之，任何人，任何成果，所谓前进都只是暂时的，稍过时日便落伍了！我想研究历史真正得到好的成果，不应该是暂时性的，而是永久性的。

所谓研究成果，分析起来，也可大别为意见、看法与基本史实两类。意见、看法往往是就史实作解释，属于论史性质，可因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也或许有时间性。但基本史实则绝不能有两样，只要真正探得了史实的真相，就永远有其价值，不是暂时性的。就以我的《唐史研究丛稿》所收几篇论文为例。第一篇《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既考史实，也运用行政学的理论为唐代六部九寺间混淆不清的关系别作新解。此项新解虽然能使千年疑案得到合理的说明，但此种新解是否绝对可信，将来他人是否可另作解释，都难预料，所以此项新解是否有永久性的价值，我也不敢有绝对的自信。但其他诸文，如《唐代府州僚佐考》、《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等，主在考论史实真相，不在为史实作论释，自信钩沉稽隐，可谓已将当时史实正确的显露出来，将来学人几乎不可能再予否定。是即其价值有永久性，非暂时性。

我认为治史仍当以发掘史实真相为主流，以解释、论史为辅助。找出史实的真相写录下来，可以永远于人有用，即永远不算落伍。例如《史记》、《通鉴》虽然写作时间已过去很久，现在史学方法也已有很大进步了，但《史记》、《通鉴》仍然永远有利用价值，即永远不得视为落伍的东西！现代著作也是一样，只要发掘出某一史事

的真相，为前人所不知，就有其永久价值，他人永远可以采用，或踏在这个成绩上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创出更新的成绩。所以我认为史学研究，最主要的要看成绩是否正确，是否有永久性价值，至于运用什么方法，那是次要的事，绝不能以是否采用某一种方法作为衡量的尺度！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再稿

十七 史学二陈

问 已谢世的当代史学家中，你似乎特别推重陈垣、陈寅恪两位先生，可否对于这两位先生发表一点评述的意见？

答 我认为前一辈^[1]的中国史学界有四位大家：两位陈先生、吕思勉诚之先生与业师钱穆宾四先生。两位陈先生或联称为“二陈”。陈寅恪先生（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是江西修水县人，陈垣援庵先生（一八八〇—一九七一）是广东新会县人，都是南方人，而在北平任教，建立其在史学界的隆盛声誉。但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寅恪先生避地南方任教，援庵先生一直留在北方，所以或又别称为南陈、北陈。

两位陈先生中，寅恪先生声誉尤著，亦早两年谢世，兹先谈寅恪先生。先生自一九〇二年十三岁东渡日本求学三年，一九一〇年到柏林大学转巴黎大学，前后五年，一九一八年赴美国就读哈佛大学，一九二一年由美国再赴德国就读柏林大学，至一九二五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年三十六。故其少年青年时代求学时期极长，在东西各国就读研究，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其学习科目，主要为古今各国语文，及中国边疆民族语文，次及哲学宗教，似亦

[1] 此处所谓“前一辈”系指我所及睹丰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若如梁启超、王国维两先生皆不在此列。

稍涉社会科学。先生记忆力特强，据各家所记，除英、德、法、日等国语文外，遍习梵文及巴利、希腊、拉丁、波斯、土耳其、蒙、藏、满文，有些或且甚精。吴宓雨僧《空轩诗话》云：“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1]此语信实，非吹嘘可比。

寅恪先生回国以后的学术动向，从其授课与著作次第看来，其治学以历史为中心，兼及佛教与文学。其治史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刚回国的几年中，即四十岁前后，治学中心是佛经与边疆民族史，讲佛经特别致意佛教与文学、社会的关系。中期即四十四五至五十五岁前后，治学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古史，特别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所涉范围，自政治、社会到宗教、学术各方面，对于文学兴趣尤浓。所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就是《元白诗笺证稿》，惟其论诗着眼于以诗证史，仍是史的范围。晚年失明以后，虽然仍写了不少关乎两晋至隋唐史的论文，但其代表作当推《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大抵早期中期诸作只是为学术而论著，晚年诸作多寄寓深远，不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了^[2]。

先生旷世奇才，加以早年环境优裕，语文工具特强，东西学术基础亦特别深厚，惟惜中年时代健康情况看来似颇差，殊难尽量发挥其才学，我在《治史经验谈》中已表示非常可惜^[3]。近年读先生

[1]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页八一引。

[2] 余英时著《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下篇，《明报》月刊一九八三年二月号，总二〇六期。

[3] 《治史经验谈》第九篇《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页一六一。

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另有一番感触。先生晚年感切时艰与自己估计错误之不幸，奋笔为此巨著，以抒愤激之情。我读此书，除了对于先生在恶劣政治环境下困顿愤懑的心情深表哀悼之外，对于先生之奇才博学 with 强毅精神又有进一层的认识，与进一层的钦仰，但同时又更加感到极其可惜！

先生晚年失明，在一般人而言，绝不可能仍写分析入微的细密考证文字。而先生却在助手诵读的协助下，完成如此大规模的繁琐考证论著，其精细邃密较之前此诸论著有之无不及，其篇幅逾七十万言，更为前此任何论著之数倍^[1]，不能不令人叹为奇迹，绝非任何并世学人所能做得到！而这种奇迹的表现，可以说是凭其旷世奇才与无比的强毅不屈的精神，因特别环境的激发而产生的。所可惜者，当大陆政权转移期间，先生既以健康欠佳，对人生对大局一向悲观，以致滞留大陆，及目睹世变，大出想像之外，乃又发愤为此巨著，以寄“悯生悲死”^[2]之情，事固可哀，亦极可惊！但稍作理智的想来，昔太史公父子遭遇困顿，发愤而为《史记》，先生以失明老翁，居然仍能写成这样一部考证精细的大著作，足见稟性强毅，精力亦未全衰。既发愤著书，何不上师史公转悲愤为力量，选取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泻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而乃“著书唯剩颂红妆”^[3]，自嘲“燃脂功状可封侯”^[4]耶？真令人悲之惜之！盖此书虽极见才学，但影响作用可能不会太大。第一，文字太繁琐，能阅读终卷的人实在太少，此与先生著作不讲究体裁大

[1] 陈先生壮年中年时代实际上只写论文，不写书，唐史两稿也都是有系统的论文集性质。

[2] 《柳如是别传》末页，稿竟说偈。

[3] 《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页四六《辛丑七月雨僧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有《注》。

[4] 同上，页四二《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为寿赋此酬谢》自注：“时方笈河东君诗。”

有关系。这种繁琐的考证体裁，写几万字篇幅的论文并不妨事，写小的书也还可用。像《别传》那样七十万字以上专题研究的大书，我想绝不适宜。总当采取以简驭繁的方法来处理那些繁琐考证，让一般读者易于领会。第二，这部书，除了研究先生本人及钱谦益、柳如是者之外，要读、必须读的人也不会多，因为论题太小，又非关键性人物。第五章虽讲钱柳“复明运动”，但以钱谦益那样怯懦无用的人，柳如是虽有过人之才，从旁协助，也不可能使他能在复明运动中发生多大作用。其他各章对于明末清初政情虽亦不无发覆之处，但究竟都不太关紧要。若与援庵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一比较，两书都讲明季史事，也同样各有寄托，《柳传》篇幅之大与辨析功夫之深都远超过《滇黔佛教考》，然而就意义言，就价值言，或者说就成功度言，《柳传》似转有逊色。我常说选题重要，此亦一例。所以我很惋惜先生这部大书除了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发泄一己激愤之外，实无多大意义。《缘起》一章引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之语以自伤，是亦真无益之事矣！但即此一端，更可想见先生心中激愤悔恨之情达于极点，所以几乎失去理智的作此无益之事，并以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一词中的两个名词作为自己毕生论文集的名称了^[1]。不过先生晚年不惜时间精力写此大书，对于我倒是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因为我近十余年来专心致力写《唐代交通图考》，已成一百三四十万字，尚未竣事，每感此一论题花费时间精力太多，急切想早日结束，以便转移阵地，做其他早经准备要做的较大论题。看了先生以那样不世之才，垂暮之年，专心一意写那样的小问题，不觉又自心宽意释了！

次谈援庵先生。先生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

[1] 余英时著《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下篇，《明报》月刊一九八三年二月号，总二〇六期。

成名。一九一七年撰成《元也里可温教考》，是其第一篇学术性论著。自后二十年间，重要著作以次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史讳举例》、《敦煌劫余录》、《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释氏疑年录》等。此诸著作涉及多方面：其一，各种宗教史，尤其西方诸宗教传入中国史。其二，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皆为历史研究所必备的辅助学科，先生诸书多为有创建性的工具书籍。其三，多种著作与元史有关。一、二两者都是一般学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故先生一经做出成绩，即为学林所推重。这些地方，显得先生常能适时寻空蹈隙，提出重要有意义的问题，用最大努力，搜集资料，写成专书或论文，获取学林的重视。

以上诸项研究，可谓为早期成绩。后期重要成绩则有《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九四〇）、《清初僧诤记》（一九四一）、《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九四一）、《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九四二）、《通鉴胡注表微》（一九四五）五书，都是极踏实有创获，应许为有永久性价值的著作。这五部书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敌人铁骑下的北平城中所写成，大都寄寓民族之思。这一时期，这几部书显示先生学术著作达到最颠峰状态，但也即此而斩。先生享年九十二岁，《胡注表微》写成于抗日战争末期，当时年龄不过六十五六，精神尚旺，何以此后二十余年都无重要著作？据最近出版的《励耘书屋问学记》（一九八二年六月，三联书店），诸弟子记先生自述治学历程是“钱、顾、全、毛”，意谓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进而浸润于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与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最后服膺毛泽东思想^[1]。这

[1]《励耘书屋问学记》第一篇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代序）》（页六）。后面各篇亦屡见此语。

几部书可说是先生走钱、顾、全路线的总结晶，老年转而尊毛，学术生命自不得不中途顿折，乃至突然终止！

下面再就两位陈先生比较言之。就治学言，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巨擘。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1]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如《明季滇黔佛教考》即为佳例。先生著作以平实自许，也以平实著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2]，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我读《励耘书屋问学记》所载诸弟子记先生治学为文之道，与我在《治史经验谈》中所言有很多相通处，看来我一

[1]《励耘书屋问学记》，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页一一六），“陈先生在讲课中常提到他的两句名言，即‘竭泽而渔’和‘打破砂锅问到底。’”（按据俗语，“问”原作“纹”），又见陈智超《史料的搜集、考证与运用——介绍陈垣的治学经验》，《文史哲学者治学谈》（岳麓书社，一九八三年一月）。

[2]《励耘书屋问学记》，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云，“先师时常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页八九）

向推重先生的成绩，是有必然性的了。

至就立身处世言，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其《赠蒋秉南序》^[1]自称“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一九六四年，时年七十五）诚非虚语。亦唯有此强毅不屈的精神，所以衰暮之年仍能奋笔写成平生所未有且可视为奇迹的大著作。援庵先生则为另一类型，自青年时代即热心世务，其后叠任文化教育机关首长，老年乃以毛为师，并且常说自己“闻道太晚”^[2]。亦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或者先生一向热心世务，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后来也看出势头不对，所以自一九六二年以后，似已不再热衷为政治作宣传文字^[3]，但为时已晚了！

最后总结一句：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棺论定，在乎读者。

一九八三年三月廿一日初稿，

三月廿四日再稿，七月五日补订三稿

[1] 《寒柳堂集》页一六二。

[2] 《励耘书屋问学记》：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第四节（页五四）。

[3] 参看《励耘书屋问学记》，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

十八 通贯的断代史家 ——吕思勉

问 你说吕思勉先生也是一大家，可否提出一些评述的意见？

答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一八八四—一九五七），江苏常州（武进）人。他的治史与两位陈先生不同，他是宾四师的中学老师，但两人治学蹊径也不相同。综观他一生的治学成绩，可以称之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诚之先生平生著述极为丰富，为人所习知的，以出版年份序之，有《白话本国史》（一九二二）、《经子解题》（一九二六）、《理学纲要》（一九三一）、《宋代文学》（一九三一）、《先秦学术概论》（一九三三）、《史通评》（一九三四）、《中国民族史》（一九三四）、《燕石札记》（一九三六）、《中国通史》（一九四〇、四五）、《先秦史》（一九四一）、《历史研究法》（一九四五）、《秦汉史》（一九四七）、《两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燕石续札》（一九五八）、《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诸书。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他未发表的札记与已发表的两部札记合并，分时代编为《吕思勉读史札记》出版（一九八二），还有《宋辽金元史》与《明清史》未能完成，不知将来是否有

人能整理出来，作为未定稿出版^[1]。

综观先生一生著作程序，可知他的国学基础极深厚，五十岁以前的著作，属于国学范围的居多，所以他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基础上。然而他的治史意趣并不保守。这两点可以证明。

第一，在一九二〇年代，一般写通史都用文言文，而先生第一部史学著作就用白话文，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通史。全书四册，内容颇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顾颉刚师在《当代中国史学》下编《通史的撰述》一目中列举诸家通史，就以此书为首，认为此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可谓当之无愧。我想这部书大约是当时极有销路的一部通史，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阅读的人仍很多，也是我读的第一部通史，相信这部书对于当时历史教学必有相当大的影响^[2]。

第二，先生在一九四五年发表的《历史研究法》称述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他说唯物史观“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认为这一观点有助于对史事的了解。吾人应当注意，此时早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好几年。再看他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中国通史》上册，其编次先社会经济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后是学术文化。次年出版的《先秦史》，其编排次序，在先秦各代政治事迹之后，分类述文化现象，也是这个顺序。这一程序，正是他这种意识的具体表现。更可见他这种意识发萌很早，与中共得政后一

[1] 吕先生还有些较长论文未编辑出版，我很清楚的记得有一篇《汉代亭传制度》，刊在一本不太厚的杂志中，我写《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时大约已找不到此文，所以未引用。今检《读史札记》中无与此题相近的条目，足证《札记》未收论文，希望有人续事辑录出版。

[2] 参看《隋唐五代史出版说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般趋附者大不相同。就因为早有此种意识，所以他治史相当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在通史及各断代史中，这方面的篇幅相当多，《读史札记》中这方面的条目也不少，这在没有政治色彩的前辈史学家中是比较特别的！

就著作量言，先生的重要史学著作，篇幅都相当多，四部断代史共约三百万字，《读史札记》约八十万字，总共出版量当逾五百万字，著作之富，可谓少能匹敌。就内容言，他能通贯全史，所出四部断代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非常踏实，贡献可谓相当大。我自中学读书时代，对于他的史学著作就很感兴趣，不但见到即看，而且见到即买。我在中学时代看《史通》，似乎就是由他的《史通评》所引起的。所以他的著作对于我有相当影响。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声光显然不及二陈及钱先生。我想这可能有几项原因。

第一，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瞻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诚之先生属于博瞻一途，故不免为一般人所低估。

第二，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诚之先生的重要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处甚少，更少新的史料。这一点也是他的著作被低估的一个原因。

第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诚之先生的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亦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诚以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而诚之先生学术生涯之主要阶段，一直留在上海

光华大学任教。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尤非一般学人所重视。诚之先生是一个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我想这也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之又一原因。

因为有上列几项原因，所以他的声光遂不如二陈一钱三位先生之盛，但实际上他的成就并不在他们三位之下。前文谈到博通周贍与精深有新解两途。学术创获诚然须专精有新解，但博贍仍是为学大道，且极不易，或许更难。只就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而言，每部书前半综述这一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后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方面分别论述。前半有如旧体纪事本末，尚较易为功；后半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藉，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贍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而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此种成就，看似不难，其实极不易。若只限于一个时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得到，但他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独力完成四部，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了诚之先生，恐怕都难做得到。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

记得高中读书时，看到张贴在阅报栏中的一张报，有一篇短文描写诚之先生与另一位文学家的生活习性。近年又看到黄永年所写《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1]一文与钱宾四师的《师友杂忆》（第二篇《常州府中学堂》第二节）写诚之先生一段，再参以他的著述风

[1] 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刊《学林漫录》第四集（页六四一七五），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此文颇能见吕先生的生活、性情与为学为人各方面，值得一看。

格，与半生株守光华一事^[1]，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世传他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的阅读过三遍，是可以相信的^[2]。

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不过诚之先生几部断代史的行文体裁诚有可商处。就其规制言，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撰史当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话写出来；要明出处，宜用小注。而他直以札记体裁出之，每节就如一篇札记，是考史体裁，非撰史体裁。不过照宾四师说，诚之先生这几部断代史，本来拟议是“国史长编”。作为长编，其引书固当直录原文。况且就实用言，直录原文也有好处，最便教学参考之用。十几年来诸生到大专中学教历史，常问我应参考何书，我必首举诚之先生书，盖其书既周赡，又踏实，且出处分明，易可检核^[3]。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札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

[1] 黄永年回忆诚之先生的文中说：“胡适想请他到北京大学去，但吕先生拒绝了，理由是光华的文学院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

[2] 黄永年回忆诚之先生的文中又说，吕先生所用的二十四史是价廉易得极普通的线装小本，“全部从头到尾动过笔。……是用红笔加了各种符号，人名加〔 〕，有用的重要史料圈句，名物制度在词旁加△，不仅《纪》《传》如此加，《志》也加，很少人读的《天文志》、《律历志》也加，连卷后所附《殿本考证》也加。……吕先生的断代史或中国通史所以写得如此快，几年就是一大部，其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对二十四史下了如此扎实的基本功夫。吕先生究竟对二十四史通读过几遍？有人说三遍，我又听人说是七遍，当年不便当面问吕先生……但我曾试算过一笔帐……至少应有四遍。”

[3] 引书间或有误引处，但以这样一部大著作，内容所涉又极广泛，小有错误，任何人都所难免，不足为病。

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只是厚古薄今耳！至于材料取给只重正史，其他史料甚少参用，须知人的精力究有限度，他的几部断代史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正是一项难能的基本功夫，后人尽可在此基础上，详搜其他史料，为之扩充、发挥与深入、弥缝，但不害诚之先生四部书之有基本价值也。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二日初稿，八月十日增订

十九 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问 你很推重冯承钧先生的翻译工作，可否稍详说明你对于翻译工作的意见？

答 世界上国家民族众多，语言文化各不相同，欲增进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最好的方法当然是能语文互通，以增进彼此的了解，渐期达到生活文化的沟通融和。然而语言互通，只能期之于少数人，绝大部分人群不可能都做得得到，何况多样化的语言文字，要每个人都能通解，不但不可能，而且是一种浪费，有害于其他方面的高度发展。就学术而言，除了自然科学大体上没有民族国家的传统特征之外，其他各种学科领域，各国家各民族总不免各有其独特的传统，也各有其思考述作的方式，而各种传统也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观摩。就史学范畴而言，研究世界史固不必说，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如能多懂些外国语文，多看人家的论著，也大有益处，这在前面谈治中国史是否要从中文下手时也已谈过。不过精通一种外国语文，就以英国语文为例，真正能看英文书刊就很不容易，要花很大功夫。一个人的精力时间都非常有限，要想研究中国史的人都能精通英国语文，虽不是不可能，但他在中国史上所用的功夫势必相对的人为减少，他的成就也就相对的降低。何况英国语文之外，还有其他各种语文著述，也各有参考价值，若要每个人都精通这些语文，始能了解他们的东西，那就绝对不可能。所以近百年来史学界，除了特

号天才陈寅恪先生之外，就数不出第二个人来！因此我认为研究中国史的人都能精通几国语文，观摩各国学人的方法与成绩，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上不可能，只能求其次，提倡翻译工作，希望能出些大翻译家，来弥补本国学人不可能都精通各国语文的缺憾！

况且从历史上看起来，翻译工作对于文化的传播与吸收都极其重要，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中古时代印度佛教的东传。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前期，当时固然有不少信徒，不远万里，跋涉山川，到西域、印度去直接学习，回国传扬。但历史事实证明，佛教传扬与吸收的最有效方式是高僧大德大规模的译经运动，然后中国学人才能慢慢消化融合而光大之为中国式的佛教，甚至孕育发展为宋明时代的儒家理学。我们看，在东晋时代中国最有名的两位高僧道安与慧远，都极力提倡翻译工作。汤用彤先生说，道安虽不通梵文，但在长安七年，以主持译经为中心工作，兵乱都邑，伐鼓近郊，仍工作不辍，而江南译经之盛，慧远提倡之力居多。唐初玄奘更是以精通梵文佛法而大规模从事译经工作。唯有经过这些大师的提倡与主持，把印度佛教重要经论都翻译过来，使不能通解梵文的人都能接触到佛学的理论精义，然后才能使佛学在中国生根，对于中国文化发生极大影响。

近代中国也出现了少数大翻译家，如严复之于社会科学，林纾之于西洋小说，都尽了不多的介绍作用。但自我记事以来，翻译工作似乎不大为人所重视，好多精通外国语文的学人都喜欢自己著书，而不想译书，甚至鄙视翻译为程度较低者的工作。其实这是极大错误。我觉得一个人的工作，主要的是向社会人群提出贡献，对于他人有些用处，不论著作或翻译都是一样。外文好的学人，与其提出一部不成熟、不顶好的著作，绝不如翻译一部西方名著之有贡献。不但如此，翻译工作有时可能比著作更有影响力。例如以玄奘的学问当然能著作论疏，但若只撰论疏，而不大规模地翻译，他对当时

对后代的影响可能不会有那样大，自己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也没有那样高。再如严复的翻译工作，对于清末民初的学术界发生极大影响。我想若果他只自己著述，不翻译西方名著，他的影响力也不会有那样大。就是林纾，虽然因为他不懂西文，不免传译失真，也不免选择失当，但他的译品在近代文学史上仍居有相当地位，或许超过他的散文作品。

冯承钧先生毕生从事西文中译的工作，把早期西方汉学家的几十部重要论著翻译成中文，让一般不能通解原文的人都能阅读运用，真是功德无量！我常常向同学们说，冯先生的学问当然比陈寅恪先生差得多，但他对中国史学界的贡献，决不在陈先生之下。这话并非夸张，因为学问高低与对于社会人群的实际贡献是两回事，不一定完全相一致。

近年来，台湾出了两部重要西文名著的译本，其一是梁实秋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我不懂文学，对于梁先生的认识也不深，但这部书的问世，使我对梁先生有了很大的敬意。因为这部书是西方文学经典之一，以前虽有不少人翻译莎翁作品，但似都不全面，梁先生独力完成这部大书的翻译工作，以梁先生的文学造诣，相信为一部不但是全面也是最好的译本，从此莎翁作品将可渗入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孕育新文化之一血轮。所以从长远的看来，相信这部书对于学术艺术界的贡献与影响，可能比梁先生的散文更为深远。其二，是陈立夫先生主持翻译的李约瑟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这部书对于世界学术界应有广泛影响力，不过牵涉范围极广，如果译得好，自是一项不朽之盛事，也是陈先生真正的一大贡献。

一般人看轻翻译工作的原因，是以为翻译易而著作难，其实好的著作固很难，好的翻译也决不容易。著作居于主动地位，比较自由，不懂的可以避而不谈。但翻译是被动的，不懂处不能逃避，所以真正好的译本，决不容易。轻视翻译也是浅人之见。况且被选作

翻译的书，总是他在学术界已建立了信誉，一旦翻译过来，就有客观的地位，有益读者，自己的著作却不一定能建立起这种地位有益读者，所以翻译工作对于一位精通外文的人，无论为公为私，都是一项值得做的工作。有些人不直接翻译西文名著，而节取多种名著的章节，穿插编译成书，作为著作出版，这是既不智又欺骗的行径，纵能盗微名于一时，实际上对社会的影响不能久大，自己地位也不牢固，是大可不必要的！所以我至诚希望精通外文的人，对于外国东西，多翻译，少著作，更希望公私机构能发大心愿，建立翻译中心，从事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回想一千几百年前，鸠摩罗什之译《大品般若经》，与诸旧宿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字。浮陀跋摩之译《毗婆沙》、《沮渠蒙逊》令智富等三百余人考文详义，务存本旨。当时译场规模于此可见。到隋唐时代，译经事业，更得国家全力支持，译场组织更臻完备。中国人之于佛学，能取精用宏，使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重要内容，基本功夫端在前人先努力作大规模的译经工作。现在精通外国语文的人不少，政府与私人财团也都相当富裕，应有余力提倡支持翻译工作，希望在公私团体与个人意愿的合作下，多出几位玄奘、严复、冯承钧、梁实秋，使中国社会大众都能接触到西方的学术文化，也使中国学人纵然不通东西各国文字，也能取之于译本，作为研究的参考。如能这样，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对于新文化的孕育，都有绝大好处！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初稿，三月十四日再稿

二十 我购藏书刊的原则

问 看你搜购的图书，水准高低似乎很参差，范围很广泛，内容也很庞杂，还有些本草书，是否对于中医药物学也有兴趣？

答 我搜购图书的唯一原则是实用，并无一定的水准，只要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量力购存，以备参考。好的书固然要参考，很坏的书也往往有一得之长，有可利用处，所以我的书架上也有品质很低劣的书。不过我要在此提醒青年学人们一句话，自己学术基础尚未巩固时，千万不要乱看，一定要选择标准高的好书看，千万不能常常看品质低劣的书。因为自己辨别的能力尚不够，很容易受到劣书的影响，走不上正轨，或者只是铺陈材料，毫无创获，或者更是走到歪路上去，虚浮浅薄，随意胡扯。铺陈材料，虽不能深入做出有高度价值的成果，但还可以做些编辑工作，仍是有用。若走上浮薄胡扯的歪路上去，更是害己害人，而且也绝难回头走到正路上来。此犹如教拳术的师傅，教一个丝毫不识拳路的人容易，教一个对于拳术有一点知解但走错了路的人，要他矫正过来，那就很难。所以初学的人，不要乱看，以免误入邪路。当然等到你的根基已很稳固，遇到劣书，倒也不妨翻着看看，也可能有一点用处。

因为我的购书原则是实用，所以我的藏书并无一定的水准，更无一定的系统。有的书有几册，我只购其中一册。很多杂志也是如此，往往只购某卷的某期，因为该期有一篇文章的某一节对于我有

用。再者，既然只讲实用，所以多半不论版本。善本书固然价钱太贵买不起，而且就一般应用言，有些善本书反而不如普通版本的书。例如正史，我只用艺文印书馆出的《二十五史》，后来有了标点本。就改用标点本。至于百衲本，我只购有两部《唐书》，但也只偶尔查查，不常利用。

至于搜求范围，那可说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因为我留意国史的各方面，只就我的专业“历史人文地理”而言，也涉及中国史上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各方面，所以无所不看，也尽量购存，当然也稍偏重到与地理分布有关的材料。我自少年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有经常逛书店的习惯，明明知道没有什么好的新书可看，仍然经常去看看，这不但是我消遣的习惯，而且认为一个学术工作者也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这是与学术世界随时保持接触的一个方法，同时也是购存图书的一个有效方法，一本有用的书，若不及时买来，迟几天可能就再也买不到了！

再说本草方面的书籍，我诚然也搜购了好多部，但我不懂中医，也非对于中国古代药物学有兴趣。我之搜集本草书籍，完全只是把它当史料看。中国本草学已有长久历史。原书今存残本的，有唐初苏敬的《新修本草》为最早，原书完好而且内容丰富的，较早的有《大观本草》，迟些的有《本草纲目》。更早期的书经清人辑录大体尚颇完备的有《神农本草》。这些书记录植物动物矿物的药材很丰富，各种药物条目下，除了说明其药性、功能之外，兼及其产地，并或说明其制法。那些说明文字就往往可以利用来作为一般史事研究的资料，而且往往非常宝贵。我在《治史经验谈》中第一篇第四节就已举出《新修本草》中讲“蒲陶”的一条例子。这本残存的小书，保存字数已不多，但保存可用的史料却不少。兹再举两例。如卷一五麝香条，“今出随郡（今湖北随县）、义阳（今河南信阳）、晋熙（治怀宁，今安徽潜山）诸蛮中者亚之”。这是讲东晋南朝以来南方

少数民族北徙分据州郡的好史料。又如卷五土阴薛子条，“谨按此即□乳是也，出渭州郿县三交驿（今甘肃郿县西七十里）西”。按《武经总要前集》一八下《边防西番地理》云，岷州（今甘肃岷县）“东至故渭州（今甘肃陇西）三百里，开元中置八驿”。是岷渭间置驿道，此盖八驿之一也，但驿名可考者亦惟此一条！辑本《神农本草》中也可发现不少史料。例如我看唐代诗文笔记之类的书籍，觉得剑南蜀中的人采药与栽培药材的风气很盛，杜翁客寓成都，也入境从俗置药栏。蜀人采药栽培药材，不仅自奉，尤似视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业，所以有药市的兴起。后读《神农本草》辑本，注意南北朝时代药材产地的分布，出产最多的地方果然是蜀中。此外本草书也常记载某种药物的制法。例如盐是重要的民生必需品，而史书讲制盐方法不详，较早的制盐技术史料似乎也当引用本草。所以本草可以视为是研究经济史的必备材料书，当然更是科技史的基本史料之一。其他科技方面的书，如《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以及各种辑本《月令》之类的书及近人研究这些书的成绩，我也搜集不少，同样也只是当作一般史料用，并非要研究科技史。例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中就有不少很好的难得的经济史料，也关涉当时的经济地理，但一般搞经济史的人似乎都不太注意。再如《大藏经》史传部，内容有很多关涉世俗的史料，陈援庵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已谈到过，但他只举出一些关涉政治史的例证，这是因为前一辈的史学家一般都偏重政治史之故。其实关涉社会经济方面的材料尤为丰富，并有关涉民族史、语言史、音乐史等方面的上好材料，而且有些是在一般史部书及其他书籍中绝对找不到的绝佳史料。但一般人也都不大留意到，以为只有研究佛教史的人才必要看这些书，那就大错特错！不过宋以下的和尚所写僧传之类的书，关涉世俗的史料就比较少了，这可能与写书者的识力有关。尤可能是南北朝至唐代前期的和尚，境界比较广阔，比较活泼，喜

欢在社会上活动，多采多姿，所以为他们写的史传也就比较内容丰富。自唐中叶以后，诸宗衰微，禅宗独盛，和尚退处山林，生活净化，与社会关涉较少，所以他们的平生事迹就比较单纯，为他们写的传记也就显得枯燥无味了！

以上所谈几点，都关乎史料书籍，将来如果有暇，我想写一部《中古史料谈》，就中国中古时代各方面书籍的史料价值作一次比较有系统的介绍，这里不再多说了。

一九八四年二月起草，三月十八日完稿

二十一 我对于中国通史 讲授的几点意见

问 大学“中国通史”一科，好多教师感到讲授困难，不知你对于“中国通史”的编撰与讲授有何意见？

答 目前大家所急于要讨论的是通史讲授问题，现在就侧重讲授方面来谈一谈。

一般而言，讲“中国通史”应顾及中国历史的各方面，但极其难讲。因为若面面俱到，平铺述说，必将与高中历史课相重复，或无大差别，学生不会感到兴趣。我听说好些讲通史的人摆脱全面讲述的方式，而采取因时代不同的重点方式进行，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此又容易落到近乎专题讲演的毛病，不成其为通史。所以又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与断代史有别，与专史也有别。因为有此种考虑，所以大学“中国通史”可说是所有历史系课程中最难讲的一门课。过去大学“中国通史”课程教得最成功的，我想应数钱穆宾四先生为最，因为他学力、才气兼备，加以擅长讲演，又富于民族感情，所以他在北京大学讲“中国通史”，据说极一时之盛。此外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能兼备这四项条件，所以也就不能有他那样的卓越表现。虽然我当时尚在南方读中学，不能聆听钱先生的通史课程，但后来抗日战争期间，他到武汉大学讲学一个月，我听了他几次通论性讲演，并读到他的《国

史大纲》，章节编制与一般通史书迥异，内容尤多警拔独到处，往往能以几句话笼罩全局，精悍绝伦。想像他在北京大学讲通史时，正当四十余岁的盛年，精力充沛，驱之以民族感情，发之为锋利讲辞，其能动人心弦，激发青年爱国情操，可以想见。若讲通史皆能如此，必能增加青年们对于国史文化的向心力，进而有助于民族感情的凝聚，与青年爱国精神的提升。只可惜，这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绝难找到很多能讲好“中国通史”的人才。

现在教育部门规定，大学各院系的学生必须修读“中国通史”，立意甚善，但实无这样多能讲通史的人才。各校为应付此一课程，似乎只有多请些年轻学人担负此项重大任务。我不知他们如何的讲，不过我相信成效不会如何的好，倒可能发生反效果。因为讲的人一定感到力不从心，很难讲得与中学教师不同，而能自成脉络的一气贯通下来，久而久之，只好虚应故事，敷衍塞责。学生更将抱着应付心理，既是必修，就不得不半听半逃的去应付，目的只是骗到学分而已。如此一来，他们不但认为“中国通史”是一门无味的课，不关紧要的课，而且是门讨厌的课，无聊的课，因此更进而漠视中国民族文化，这岂不是得到相反的效果！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值得重视的、需要检讨的大问题。

为了因应这一情势，我有几点意见在此稍作申述。

第一，学校应该显示特别重视通史课程，把通史教授列为历史系教授阵容的第一线，选请最好的教授去讲授。若本校无显著的能讲通史的好教授，那就要资深教授一齐上阵，系主任尤当为同人表率，以教通史为他们最重要任务，其次才讲其他专门课程——断代史或专史。听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人人都要担任一班通史，不是都让年轻的讲师去讲，这是不得已中的一个较好办法，可以推广到其他学校。

第二，至于讲授方法，有些人提议通史讲授不能采取平铺述说

的方式，而要用分析综合的方式来讲，不要铺陈材料。这一构想是非常正确的，但限于师资条件，绝难做得到。因为历史的分析综合，是要根据复杂的史料创出简要的结论，这是史学的上乘功夫。中国历史时间长，方面广，材料又多，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做工作，分析综合，比较上还可以做得到。“中国通史”包罗万象，非学力极深厚，才气极超卓，绝难做得到。就我而言，就不敢有此自信。别人也许有此才学，但人数不可能很多，自不能应付目前通史讲授的需求。所以若强调这一方式，势必要乞灵于模式的运用，以史料就模式，然而那样讲历史将变为新式的“八股”，也就失去讲历史的意义了！

第三，讲授“中国通史”既不能采取平铺述说的方式，以避免与中学历史课程相重复，但又不能就各个时代分讲几个问题，变成不相连贯的专题演讲。我个人意见，不如比较侧重“中国文化史”。因为要青年们必修“中国通史”课程，无非想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有较深的了解，要通史讲授得很成功，既不大可能，倒不如干脆缩小范围，只讲“中国文化史”，多少要省力些。

我所谓“中国文化史”，与过去学人所写的《中国文化史》也有些不同。过去学人所写文化史过分着重上层结构，如各个时代政府颁行的各种制度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之类。与通史所不同的，只是减少了军事胜负与政治演变而已。我想这种讲法，内容仍然太多，而且仍过分偏重中央政令与学术文艺方面少数高阶层人物的表现。中央政令固然有其主导地位，影响历史发展，学术文艺方面的显著人物对于文化固然有其重要贡献，但这些其实不是民族文化的基本所在，应该简化这些方面的资料。例如制度只择关系国史发展大局的紧要问题作简要介绍，说明其影响，主要在能使青年们感到此种制度对于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发生了些什么作用，不要搬弄太多专门的规格名辞，使青年们发生枯燥生硬感。同样，对于学者文人也

只择要的采取轻松方式加以介绍。这一切从上层结构中节省下来的篇幅，可以加述一些历代国计民生状况与社会风俗习惯，这些才是民族文化的基点，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占有最基本的地位，但过去学人大多很忽视。有些通史、文化史书虽也稍稍涉及这些方面，但又仅限于中国核心地带。中国自古是个大国，版图广阔，民族复杂，各地区、各民族的生计状况与风俗习惯差异很大，写历史的人只注意到汉族聚居区域的核心地带，以偏概全，这是绝对不够的，也可说是绝对不正确的观念。所以我常说这是一条线的中国历史观，应当建立中国历史的立体观，把中国境内各个地区、各种民族的历史文化全部容纳到中国历史体系中来，这才能算是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只着重中央政治的演变、中央政令的推行、与各方面伟大人物的表现，而且只限于汉族活动的核心地带，这决不能算是全民性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

第四，一般史学撰述通常只用文字说明，极少运用图表来表达，史学讲授也是如此。其实图与表最能使读者、听者容易领会，使他们印象深刻，其功效较文字说明要强得多。我希望史学撰述者能多多融化资料，简化为图或表，以代替噜苏的文字说明，讲授者也应该这样。作图制表又当运用匠心，尽可能的让读者、听者不必先看图例、表例就能直觉的领会，这样才能收到最佳效果。如果先要详看图例、表例才能了解图表中所表现的意义，那已是间接的认识，不是真正的直觉领会了。但只有直觉领会才能让读者、听者印象深刻！再者，社会生活衣食住行等方面，如能制放一些实物幻灯片，以增加听者对于这些方面的直接印象，也很必要。现在锄头考古，出土这类资料很丰富，做起来已非难事了！

第五，单就“中国通史”讲授而言，我想再提出一个更切实可行的简易方法。现在既要每个大学生都修习“中国通史”，而又实在找不到那样多的师资来担负此项任务，不得不降格以求，请些较年

轻学力尚浅的学人来担任。在这样不得已的条件下，我想与其让这些年轻学人彷徨无主的自我摸索，不如预立规范，使他们有所依凭。有些人说这样做法似有“钦定”之嫌，但总不失是一条不得已的可行之路。有人提议由教育部颁布讲授纲要。这方法诚然不错，但编拟纲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颁布纲要容易流为形式。讲授的人若谨遵纲条，势必仅存躯壳，空无内容，学生仍将不会感到兴趣。若任讲者自由取舍，又可能各就兴之所之，走到专题讲演的路上去。我想，倒不如选择一部较好的通史书为课本，讲授教师只站在导读的地位，领导学生阅读，有必要时再加以补充发挥，这可能是目前最切实可行的较好方式，因为这样至少可让青年学子认真的读一部中国通史，对于他们还可能有些益处。

至于读本，我想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内容既见识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几部通史所能企及。而民族意识又很强烈，正合乎现在要求所有大学生修习“中国通史”的目的。我听说现在大学生已多嫌这部书太深，看不懂，但若得到教师的辅导阅读，当能有较真切的领悟。况且现在讲授通史的教师既然多为青年学人，若能藉此导读的机会，先就此书下一番功夫，对于他本人将来的治史工作也会有颇大帮助。所以这可说是目前可行的一举两得的方式。至于说这部书有些部分现在已嫌过时，最明显的，如史前三代部分，及我上文所提到的基层文化面，以及还有些其他阙略处，自可由导读讲授的人斟酌补充，为之弥缝。局部的补充，究易为力，讲授者就不会感到太困难了。

此外，我再附带一项建议，导读可以钱先生书为主，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它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也要诸生仔细的阅读。吕书周贍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它作为钱书之辅，

以济钱书之疏阔。而且吕书征引原料甚详备，最便讲授者参考之用。

一个勤奋能用头脑的青年学人，在如此一经一纬的准备下为诸生导读，同时也努力认真的做些专门研究工作，我相信在十年八年之后，他将会感到治学途径宽广，四处通达，无往而不可。而在通史讲授方面，也可以慢慢地摆脱教本，自起炉灶，发挥自己的意见，建立自己的体系，而不失之于空洞肤浅。那就不会与高中历史课程相雷同，也不会如同历代专题讲演，失去连贯性了！

我个人治学，常悬个高度理想，但做起来总趋于务实一途，“卑之无甚高论”，遇事只在环境条件许可下采择实际可行的途径去做。我对于“中国通史”讲授问题，也采取同一想法，上面几点意见，希望能供讲授“中国通史”的学人作参考。

一九八四年四月初稿，五月二十日再稿

附录一

严耕望先生访问记

黄宽重

问 先生在《治史经验谈》一书中，谈到您年轻时以数理见长，后来何以转而研究文史？

答 小学时受老师的影响很大。我读小学时，由于从外地请来的一位老师数学教得非常好，引起我的兴趣，数学成绩相当可观，已能做初中的问题了。但我做事一向将全部精神投注一件事，对数学有兴趣，别的功课就马虎些，文科尤其疏忽，国文的程度很差，作文更是不行。初中时，有一次在旅馆楼上听到一位严姓同学与一位同乡在楼下聊天，严同学称赞我的数学好，那位同乡却说严某连一封信都写不好，数学好有什么用。这句话是事实，我听了很受刺激。后来，我的大哥也警告我，数学成绩好固然不错，国文也得下功夫。既然受到讥评，又受大哥的劝勉，就开始注意文科了。首先就是找课外书看，我曾看过《三国演义》，又听说陈寿的《三国志》是部名著，于是买了《三国志》，却看不懂，处处是生字，只得买本字典来查单字，一学期下来，字典都翻破了，书还看不到三分之一。下学期又花了不少时间读《左传》，渐渐的对国文有了兴趣，作文的能力才大为提高。

我高中时，受历史老师李则纲先生的影响很大，由于他的启发，

使我的兴趣由数学转向历史。他是研究上古史的，思想多少带点左倾的社会主义色彩。有一次他对我们演讲“历史演进的因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久又从朋友处借读梁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觉得非常有兴趣。我一向读书或工作都不开夜车，《中国历史研究法》是第一次开夜车一口气看完的。

总之，我先是受《三国志》及李则纲先生演讲的启发，再看到梁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历史的兴趣大增。虽然在老师和同学的心目中，我素以数理见长，却很少人知道我将考文科。等到我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时，老师和同学都很惊讶，因为当时成绩比较好的都读理科，考文科的人较少。实际上，我在高中一、二年级时，兴趣已转到文史了。

问 读大学时，先生的研究偏重那个朝代？后来何以研究秦汉政治制度？

答 研究秦汉政治制度有一半是机缘。高中时期受李则纲老师的影响，对中国上古史产生兴趣。当时莫尔根（L. H. 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一书颇为风行，我受到这本书的启示，也注意我国古代社会问题，乃以《古代社会》的模式来看禅让问题，写了一篇《尧舜禅让问题研究》的文章，认为“禅让”应是部落酋长的选举制，而不是后来儒家所美化的让贤。同时，我看了颇多南洋及中国西南民族的调查报告，作为研究古代史的参考。

读大学时，我仍注意古代史的问题，但古代史的材料简单，往往须要加以解释，而解释的弹性又大，看法人人殊异，我是一个比较注重实际的人，觉得没有把握，因此对古代史研究的信念动摇了，就把研究的方向慢慢下移。大二时注意秦史，搜集不少材料。到大三时，要准备写毕业论文，但就已搜集的秦史资料拟定题目，就颇感为难。要将所有资料汇集写成《秦史》，既不像论文，也不能精彩，要抽出部分资料写专题，又怕份量不够，只好在秦史以外去找

题目。不久，看到陶希圣先生与沈任远先生合著的《秦汉政治制度》一书。陶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山者，他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是我高中时候最喜欢看的文史刊物之一。他除了引导社会经济史研究外，对政治史也有研究。以往研究政治制度的多半走《通典》、《通考》等十通的老路子，用现代的方法研究政治制度，陶先生那本书是最早的，我看了深感兴趣。不过该书对地方制度的描述很简单，只有短短的几千字，我既要找论文题目，何不就地地方制度加以扩充？恰巧，我又看到一些好材料，像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及宋人洪适的《隶释》、《隶续》等石刻资料。石刻中有一部分是各地方官为歌颂其长官而建的碑，正面是碑文，为歌颂辞，背面是碑阴，刻有发起立碑者的职位、名衔，如户曹掾、户曹史、兵书掾、兵曹史等。当时各部门称曹，一如今天省政府的厅，曹长称掾，副称史。《汉书》、《后汉书》记载汉代地方制度很简单，若把这些碑阴的官名整理排比，可以知道汉代地方政府组织，补正史的不足。这些材料极多，可惜没有人加以引用，于是我就利用这些材料，写了《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作为毕业论文，就这样展开了中古政治制度的研究。我的研究受陶先生的启示与影响很大，非常感谢他，可惜至今尚未见面。

问 后来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转而研究历史地理？

答 实际上我对历史地理发生兴趣要比政治制度早。政治制度是在大三时因上述的机缘而研究的，但早在小学时我就对地理有兴趣，这也事出偶然。我是乡下人。当时乡间小学所用的书和作业纸的质料都很粗糙，有一天，我的大哥从城里买回一本大概是民国三年印的地图，记得售价二元，纸质很好，印得很精美，我看了非常兴奋，常常翻来看，渐渐的对地理有了浓厚的兴趣，一些重要的山脉河流都能画出来。后来又看了《读史方輿纪要》，更加注意历史地理。我最早发表的一篇学术性的论文《楚置汉中郡地望考》（《责善》

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六期)就是历史地理的问题,是我大四上学期写成的。一般人以为汉中郡是秦设置的,实际上是楚国所置。

读大学时,“地方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是我同时用心的课题。民国三十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跟钱宾四先生到齐鲁研究所继续读书,当时就感到同时注意二个大的课题,不容易做得好。第二学期,我一位非常要好的大学同学钱树棠先生也来齐鲁研究所,我便与他相约,由他研究历史地理,我则专研究政治制度。他工作极勤,也搜集了几十万字的汉代地理材料,但兴趣却随时在变,最后竟放弃历史地理的研究,我又得兼顾这项工作,所以当地方政治制度研究告一段落时,我就全心研究人文地理了。

问 先生关于地方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的论著都止于唐末,目前有没有继续研究宋以后的问题?

答 宋以后的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的研究,有事实上的困难,并没有继续研究。目前我的研究计划分成三部分:一是“唐代交通”,这部分做得最彻底,其次是“唐代人文地理”,再次是“国史人文地理”。唐代人文地理现在已搜集了约近十万条资料,也写了一篇唐代成都都市问题的论文,“唐代人文地理”完成之后再写“国史人文地理”,如此由交通而慢慢扩展到整个国史人文地理。目前材料已无问题,但能否写完尚无法预测,尤其国史人文地理恐怕很难完成,如此一来,便谈不上写宋以后的问题了。

问 以您的经验,研究宋以后与唐以前的问题,在方法上有无差别?

答 研究五代以前和宋以后的问题,在方法上应有不同。五代以前的材料较少,要考证的地方多;宋以后的材料多,需要考证的地方也许较少,但在组织及解释上要多下工夫,如果仍采五代以前的方法去研究,由于资料太多,不易理出头绪,而且没有组织、解释,可能只是一堆散漫的史料而已。

问 您对借助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研究历史有何意见？

答 我在《治史经验谈》一书中也提到这点。我认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帮助历史研究，但它不是主题，从事历史研究还是要从资料入手。研究历史如能兼通哲学、文学及社会科学等，会使自己的态度较开朗，方法运用也可多样化，当然是很好的，我就曾利用人类学的观念，来研究尧舜禅让的传说，也曾用行政学的观念来研究唐代尚书制度。但社会科学的理论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不必倚之为法宝，有些地方能用，有些地方不能用，不应勉强。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从材料上建立新见解。总之，人文及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都有帮助，借助社会科学的理论或方法来研究历史是值得鼓励的，但最重要、最基本的还是资料本身。

问 先生的意见，对有志于学历史的青年是很好的忠告。除此之外，您对年轻人有那些建议？

答 我的意见大体在《治史经验谈》的前二章都谈到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年轻时要打好基础，看书的范围不妨广一点，不必急于做太专的题目。做学问要有潜力，先要广泛的读书，对社会科学要能相当通达，同时对中国几部大的旧书能彻底的看，基础一稳固，将来往任何方向发展，皆能得心应手，毫无窒碍，成就也会大。因此，年轻时要以打好基础为第一要义，不要太急功好利。

问 您对目前成立的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有何期望与指教？

答 成立资料中心，能便利研究，是第一步。将来若人力财力许可，不妨再进一步成为研究中心。

问 先生提过“国史人文地理”可能没时间写，是否可以做几次演讲，提出您的见解、概念以指引后学？

答 我的口才不好，做事也比较慎重，不成熟的观念不喜欢讲，

因此很少作演讲，在香港也只是讲课而已。“国史人文地理”是我在中文大学开的课，不敢说有何精义。我原计画写完“唐代交通”后先写“唐代人文地理”的，后来曾有朋友建议我先写通论，再写唐朝。有一个时期我也想这么做，但我最大工夫在唐代交通与人文地理，材料都已搜集好了，我的年龄也超过六十五岁了，不太可能同时完成几件大工作。既然想先写通论性的“国史人文地理”，就很难再有时间仔细的写“唐代人文地理”了。因此，就想仿顾炎武写《天下郡国利病书》的例子，把唐代材料编起来，让别人写。前年起，我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将材料分类，准备由成都开始编唐代都市方面的资料。编了之后，总觉得有许多问题未解决，不大安心，结果还是把唐代成都的情形做了深入的探讨，写成研究性的论文，在中文大学发表。这篇文章写来很顺手，有了这个经验，我又打算改变主意，还是决定先写“唐代人文地理”。这么一来，“国史人文地理”只好慢慢再说了。

问 您选择以成都为研究“唐代人文地理”的第一篇，有何特殊的意义？

答 都市与交通是联类问题，我在做交通问题之外，要想别有写作，就很自然的想先写都市。唐代重要都市如扬州、长安、广州、洛阳，都有人写过论文，成都却没人写，所以我写唐代都市就从成都开始^[1]，此文写成，我才发现成都在唐末竟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唐末五代的扬州、长安都没落了，只有成都反而更繁荣，其程度超出了我事先所想像的。写完成都之后，我对于写“唐代人文地理”

[1] 我讲中国历史地理，感到中国史上寿命最长久的大都市，当推广州与成都。广州因为南洋诸国通商之故，所以能历久不衰，直到近百年始为香港所代替。成都为西南地区唯一大的盆地平原，本身物资丰富，又为西南诸少数民族物资聚散地，所以长久以来，蜀商活动范围至广，成都亦为有史以来始终保持西南最大都市之地位。这一点也是当时先写成都之一动机。（耕望）

已极有把握，因为写这篇论文，全凭手头已录资料写成。临时参考，也只限于自己收藏书刊，利用图书馆藏书之处极少。如此看来，虽然完全退休家居，工作进行仍无问题。

原载《汉学研究通讯》第三卷第一期

附录二

《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和，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中国疆域辽阔，交通建设尤为要务，故中山先生避总统之位，即以铁道建设为己任，其立意盖以交通建设为国家一切建设之基本也。

其在古人，亦早有此认识。先秦史事邈远，姑不涉论。秦人为政，尤重交通，惠文图蜀，先诱蜀人通石牛道^[1]，昭王承之，“栈道千里，通于蜀汉。”^[2]既利巴蜀物资，且以加强控制。始皇大治“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3]，北凿直道至九原^[4]，世责其便游幸，实则此项建设与“堕坏城郭”^[5]为加强国家统治之两项相对政策，一以削弱六国余烬之抗拒力，一以加强中央军政之控制权。始皇虽暴，但极勤政，车驾屡巡，亦有其重大之政治意义，何得以游

[1] 《水经注》二七《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寰宇记》一三三兴元府褒城县褒谷条引《十三州志》。

[2] 《史记》七九《范雎传》，参一二九《货殖传》。

[3] 《汉书》五〇《贾山传》。

[4] 《史记》六《秦始皇本纪》。

[5] 同上。

幸薄之！至汉武帝通西域，而恃河西走廊为孔道，故“列四郡，据两关”，“自敦煌西至盐泽（今罗布泊），往往起亭”^[1]，亦以交通建设为加强军事外交之手段。汉制，县有蛮夷者曰道^[2]，正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行政措施，惟道路之维持与控制，以利政令之推行，物资之集散，祈渐达成民族文化之融和耳。下及隋炀，大开运河，唐人利之，“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3]。虽云：“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4]但唐代后期，以东南之财赋支持西北之军政，正赖此河为之馈运^[5]，而南北经济文化之沟通，运河自亦有其重要之作用。故李吉甫已云：“隋人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6]皮日休更谓：“共禹论功不较多。”^[7]于此可知交通之畅阻对于国家之盛衰，地方之开发，与民生之调剂，皆具有莫大之作用，治史者岂得不三致意焉。

余自青少年时代留意历史地理，尤重国计民生诸大端。民国三十五六年决定从事唐代人文地理之研究，视野所届，除一般地区沿革外，泛及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各方面；凡涉区域分布发展者，皆在搜讨之列，而尤置重交通路线一课题，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类书、杂著、诗文、碑刻、佛藏、科技诸书所见及考古资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陈援庵先生谓“竭泽而渔”^[8]，余此项工作庶几近之。至民国五十五年，所录基本

[1] 《汉书》九六上《西域传序》。

[2] 《汉书》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3] 《通典》一七七引《坤元录》。参注 [6]。

[4] 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唐诗纪事》五八。

[5] 前人屡有此论，其详细发挥，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

[6] 《元和志》五河南府河阴县汴渠条，“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

[7] 皮日休《汴河忆古》（《全唐诗》九函九册《日休集》八）。

[8] 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励耘书屋问学记》；陈智超《史料的搜集、考证与运用——介绍陈垣的治学经验》，《文史哲学者治学谈》（一九八三年一月，岳麓书社）。

资料殆逾十万件，遂开始分区逐题撰述，首成《蓝田武关道篇》。迄去岁又已十七年，完成三都及秦岭、关陇河西、山南剑南、河东河北诸地区之写作，都凡五卷五十余篇，约一百三四十万言。尚有河南淮南、江南岭南、河运海运及交通制度诸卷待续撰述。承史语所代所长丁邦新先生邀约回台工作，并促完成此书，付本所刊行，念前写五十余篇成文或逾十载，续获材料多可增订，遂暂辍第六卷河南淮南以下诸卷之写作，就已成旧稿逐一增补，或且改写。余于此书已付出三十七年之岁月，亦为平生功力最深，论辨最繁之述作，然问题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学术求精，固无际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

回想余为此书本末期有现今之成果，以为二十万言，即可毕事，不意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而内容所获尤非事先所能想像者。举其大端，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境域，人迹罕到。乃其实，自汉末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通长江流域之一要道。唐置馆驿，南通成都，东接散关，北达河陇，为唐与吐蕃必争之地。此其一。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此其二。凉州（今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先生云：“汉唐在玉门以西未见驿传之记载”^[1]。此非一人之见也。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

[1] 《中外史地考证前言》。

煌、吐鲁番出土文书^[1]所见，瓜州常乐（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瓜州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驿馆名称里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东西道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十五个以上，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也。此其三。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 $N41^{\circ} \cdot E107^{\circ}40' - 50'$ ）、胜（今托克托西黄河南十二连城 $E111^{\circ} \cdot N40^{\circ}13'$ ）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多不过四日余，亦尽中古驿传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 $E109^{\circ} \cdot N41^{\circ}$ 稍西北地区，乌梁素海东北岸水滨），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道，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矣。此其四。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 $E107^{\circ}25' \cdot N41^{\circ}20'$ ，或石兰计口 $E107^{\circ}30' \cdot N41^{\circ}20'$ ）、甘州居延海（约 $E101^{\circ}30' \cdot N42^{\circ}30'$ ）、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山南，约 $E90^{\circ}30' \cdot N45^{\circ}$ 地区）三道相通，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且回纥入唐先取鹑鹑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 $E108^{\circ}50' \cdot 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今归绥、呼和浩特），取太原入长安，迂回千余里，此亦非粗研史事者所能想像也。此其五。东北边塞，居庸（今关）、古北（今古北口）、卢龙（东晋至唐道出青陞，盖今青山口 $E118^{\circ}35' \cdot N40^{\circ}25'$ ）、渝关（今山海关）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详，今得历历指证。此其六也。飞狐之险，久著史册，而关隘之要，因时代而转移。中古北魏前期，尤为人塞之第一要道，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雁门反居其次，此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非一般读史者所能想像得之。此其七也。

[1] 瓜沙伊州间驿道，详见《沙州都督府图经》（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现仅出版至第六册，所见馆驿不多，此处所云馆驿十五个以上，系据《新疆历史文物》，页五一。

剑南边区，诸道并出，而通南诏之青溪、石门两道为著，此《蛮书》已著录者，向觉明先生《校注》已颇考研，然功力未深，今皆详为比证，事乃大明。此其八也。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陆道，前人论者多家^[1]，皆以今红河线当之，实则取叶榆河谷，今盘龙江。且汉晋已然，不始于唐。此其九也。以上所言，皆边区也。反顾内地，长安、洛阳为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大驿道也。以云途程，必谓大抵与今陇海路相当，而实不然。自崤山以东，南取永宁（今洛宁东北，三乡镇西北），东循洛水，与今道异，与汉以渑池、新安道为主者亦异。而两都间计程八百余里，置驿三十四五，今考其名号尚十得八九。他如长安太原道、洛阳太原道、蓝田武关道、骆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荆襄道、太行东麓走廊道等，馆驿名称亦颇有可考者，凡此馆驿多出于诗人之吟咏，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想像之外也。此其十矣。此外如褒斜、阴平诸道之名实，洛南三关，太行八陉之通塞，黄河关津之建置，永济通渠之流程，三峡水运之兴盛，大堤商贸之繁荣，渤海海运之发达，河套、代北水运之绩效，以及东南沿海海运之萌芽，诸如此类，殆难尽列。

交通之外，有随文旁涉者，如国疆、如互市、如军镇、如唐诗地理等。兹仅以国疆言之。古代国疆，载籍模糊，前人绘图，多以意为之，不得已也，但至唐已可略考。乃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图》之《唐地理志图》，竟绘唐代西疆，止于瓜（在沙州东）、沙（今敦煌）；其西北之伊（今哈密）、西（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北庭（今孚远北二十里破城子）皆摒于唐疆之外。按安西（今库

[1] 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三（刘氏《求恕斋丛书》本）；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商务《史地丛书》本）；向达《蛮书校注》卷一及六（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本）；方国瑜《古涌步之位置》及《步头之方位》（《滇史论丛》第一辑）。

车)、焉耆(今县)各自为国,中央仅置镇戍,为之统摄,其势虽略胜于今日苏俄之于东欧,然究非中国正州,摒归藩属,不入版图,犹自可也。但其东之伊、西、北庭三州,乃唐室正州,在《括地志》三百六十州之列,两《唐书·地理志》亦在版图,其行政领县视瓜沙以东之正州绝无差别,庭州最西领县为轮台,在州西四百二十里,约今阜康县(E87°56'·N44°10')地区,西州最西领县为天山,在州西一百五十里,约今托克逊(E88°35'·N42°48')地区。唐有西州、庭州几三百年,故唐代西疆最保留之拟定当在今迪化西山,与天山南支之阿海泉山口(约E88°30'·N42°30')。宋祖玉斧一划,尽弃大渡河以南之地^[1],壮士断腕,势不得已,杨《图》何竟率笔一挥,弃地几三千里!自后日人箭内互编《东洋读史地图》,一承杨《图》,瓜沙以西皆属蕃界,国人依样葫芦,一仍旧贯^[2],宜乎俄人谓新疆自古未入中国版图矣!可为一叹!余详考交通,必涉国疆所届,凡所考获,指证分明。例如北疆,自今迪化而东,循北塔山脉(N45°·E90°—93°)至吉奇吉奈山脉(N45°·E96°—99°),此唐代北庭通回纥道所经之国界也。又东微南,至戈壁阿尔泰、诺颜博格多山脉(约N43°·E101°—105°),即唐史所谓花门山也。居延海北三百里之花门山堡(约今鄂博图庙E101°25'·N43°),盖居延道中唐疆之最北镇戍,杜诗“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已非”,此其地矣。又东鹑鹑泉(约今乌尼乌苏E107°30'·N41°45'至贡噶泉E106°10'·N41°30'—40'地段)、木刺山(天宝间置横塞军,约今乌拉特中旗E108°10'·N41°50'地区)、黑沙城(约今乌拉特后旗地段)、诺真水汊(今百灵

[1] 《方輿胜览》五六黎州大渡河条。

[2] 杨《图》刊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箭内互《图》初版于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其后屡次增补及和田清补本(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皆未更订。余所见正确之图绘,以《东洋文化史大系》之《隋唐盛世》卷末附图为最早,时在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但国人所编历史地图例袭箭内之误。近年所出虽有更正者,但承沿旧误,仍随时可见。国人治学,不但抄袭成风,而且不知所择,可为一叹!

庙 E110°28' · N41°40')，此四地皆当碛口，属唐境，其北属突厥、回纥。又东云州（今大同），“北至长城蕃界三百里”，殆今苏木海子（E113°15'，N40°50'）地区。又东至大宁城（今张家口 E114°45' · N40°45'）北数十里。又东包御夷故镇（今独石口、云州堡之正中间，约 E115°45' · N41°10'），今马尼图山脉东至独石门外之长城，盖即唐之国界欤？御夷镇塞外之冷陁山（契丹名炭山）即奚王避暑牙帐矣。又东南度云岭，一名墨斗岭，唐置墨斗军，在柳河（今伊逊河）西二十里，滦河北岸（约 E117°30' · N41°）。柳河即唐、奚国界也。又东北营州（今朝阳）西北百里有松陁岭（约今朝阳西北大青山 E120°5' · N41°40' 处），其西奚，其东契丹。而秦长城在此北二百里外，视唐疆为远届矣。营州东出驿道，经燕州（今义县）、巫闾守捉城（约今北镇），渡辽水至安东府故城（今辽阳）。城西北、东北八十里皆契丹境，盖驿道线之北不远处亦皆契丹境。以上所陈，皆唐代长时期稳定之北疆。就中除北庭通回纥道中之国界，稍涉推测外，余皆有实证，不可易。

凡此百端，皆详征史料，悉心比勘，精辨细析，指证详明，俾后之读史治史，凡涉政令之推行，军事之进退，物资之流通，宗教文化之传播，民族社会之融和，若欲寻其径途与夫国疆之盈亏者，莫不可取证斯编，此余之职志也。至于解诗、正史、补唐宋志书之夺讹，纠明清志书之失误，皆余事矣。

抑余尝思，过去所出两书，及此《图考》，所得成果，无论规模与创获，皆大出自我预计之外。推原其故，殆亦平生治学之方式有以致之。盖余为学，既详征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余才极平庸，尤弱记忆，特以强毅沉潜，遵行计划，深思虑，穷迫索，不畏艰辛，不求近功而已。幸故籍不吝其宝，勤力能用心思者，皆得深掘，出其隐蕴，加以仔细研析，悉心缔构，宜能密实有获，且

具规模也。方今青年学子每以治学相询，当以诚告，不觉坦言，触自信之讥，读者谅之！

再者，当代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1]。余撰为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如谓有“我”，不过强毅缜思之敬业精神与任运适性不假外求之生活情怀而已！再则，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少年时代，深契斯言。初中毕业，尝欲投考安徽二中，以就黄山，而未果，意甚憾之。民国三十四五年，在李庄，听李霖灿先生讲玉龙雪山^[2]，峻拔雄丽，异花积雪，令人神往，平生聆讲，感受之深，至今不忘，未有逾于此者，亦好奇探胜之心情也！今者，书读万卷固有余，路行万里，则仅托足空航，留鸿异域耳。祖国山河，惟溯三峡，攀峨眉，览青城，登钟阜而已，乃于古人诗文书志故纸堆中，遍识华宇山川形势，景物民情，舟车繁会，夷夏走集，僧道游化，墨客吟踪，以及关塞镇戍，政区背景，战略进退，兴亡百端：“读记忆仇池”^[3]，神游千万里，亦静坐书斋之一赏心乐事也。如谓有“我”，此又其一端矣！

此书撰述，尚未竣事，本不期即时出版，承丁邦新、管东贵、毛汉光、陈庆隆诸位先生之雅意，多方筹划，又承黄庆乐先生绘制地图，廖华淑、廖幼华两位小姐之誉录与校稿，华淑小姐且为制引得，而印刷诸务，委烦卢健荣先生，赖诸同人之协力，俾此稿能早日问世，衷心感荷，并此谨致谢忱。

草序既竣，不觉念及傅孟真先生。若当年先生不能大公无私接

[1] 参看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明报》月刊一九八三年一月号、二月号；收入《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时报出版公司），及拙作《史学二陈》（《大陆杂志》六十八卷一期；编为本《答问》第十七篇）。

[2] 在云南丽江县北。《民国地图集》、《云南地形图》约 E100°10' · N27°5'。

[3] 杜翁《秦州杂诗》卒章（《详注》七、《镜铨》六）。

纳一位毛遂自荐之陌生青年，或不能雅量优容其入所前即慧拒第一项指令^[1]，则余纵能勤力为学，成绩所获，定必远逊。先生胸怀之磊落，爱护青年之热忱，令人至深感念，走笔至此，不禁涕泪之交零也！^[2]

一九八四年双十节初稿，十四日增订再稿，
二十日三稿。嗣续饰订，十一月四日毕功。

此序末节关涉个人生活情怀及治史方法，与此小册内容有相通处，因便附入，俾并参考。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识。

[1] 详见《我对傅孟真先生的感念》，刊《仙人掌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中国的出发》，一九七七年三月。

[2] 《图考》出版时又略有增订。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序 言

民国以来，中国史学界名家辈出，梁任公、王静安两位先生时代稍早，今置不论。我所及瞻仰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之前辈学人为数尤多。傅孟真、顾颉刚两位先生承新思潮之激荡，胡适之先生等倡导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史学探究上各开一派，分别发展。颉刚先生创刊《古史辨》，倡导疑古，以廓清古史神话传说、伪装外衣，使迷信古文献之史学传统得到解放，为古史新研开其先路。孟真先生汲取西欧实证史学，以加强乾嘉以来考证之学，为新考证学派，并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实践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史学之一大中心。故两位先生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数年前曾撰《史学二陈》与《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两文^[1]，略述陈吕三位先生学术行谊之风貌，并略及个人肤浅之意见。今兹先师宾四先生亦已作古，我与先生关系最切，对于先生行谊了解较深，自必有所述作。会新亚书院为纪念先生，属我恭述行谊，遂在仓促中

[1] 此两文刊《治史答问》。

撰成《先生行谊述略》一文，以应一时之用^[1]。此文取先生自撰《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为素材，稍加增补，参以个人对于先生治学之认识，贯串述之，以见先生治学意趣与人生境界。

稿成后，追忆从游往事，怀念无已，遂发往年生活随录及一九四九年师生分别避地港台后之先生手教六十一通^[2]，参以回忆，撰录为《从师问学五十年》，惟思从宾四先生问学之前，小学中学时代，亦各有一位老师冯溶生先生与李则纲先生，对于我之治学亦有甚深影响，故推前附述之，易题为《六十年》，但主要内容仍在宾四先生一人。

我在撰写此文过程中，深感先生述作虽富，但教人治学之文字并不多见，读其书者，更无我当面聆教之真切，其中尤多鼓励督责种种情节，今日粗有成就，自觉得力于先生之督教者实甚多。此中历程，亦为我治史经验极重要之一环，对于后辈学人之治学蹊径与治学精神，容有可观摩处，故合此文与《行谊述略》为一小册，在此发表，既以纪念先师，永志不忘，亦以奉献青年，或可资借鉴！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四日初稿于美西旧金山之联合城（UNION CITY）晓田寓所，八月四日再稿于落衫矶之阿翰巴（ALHAMBRA）晓松寓所，旋复增订为三稿。

[1] 初稿刊《新亚生活月刊》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一月两期，增订稿刊《新亚学报》第十六卷《钱穆先生纪念论文集》上册。

[2] 另有自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冬，先师自成都、重庆、遵义等地先后所发十余信，结为一束，五六年前尚看到过。因为早期文献，特别重视，不知深藏何处，迄未找到，殊以为憾。不过不曾搬家，相信将来定可发现。

上篇 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钱先生江苏无锡人。讳穆，字宾四。原讳恩铤，民国元年（一九一二）更名。以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阴历六月初九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出生，世居县东南四十里延祥乡嘯傲泾七房桥之五世同堂大宅，地在荡口镇西五里。

先生世代书香。曾祖绣屏公，国学生。祖鞠如公治五经、《史记》，极精勤。父季臣公讳承沛，幼有神童之誉，双目炯炯有光辉，习诗赋，入泮第一，但自此绝意功名。为人仗义直言，不以个人私利介怀，故为族人乡里所尊，凡有争端，得公一言为决。教子有方，委婉不责，任其自悟，惜与鞠如公皆以英年早逝。

先生天赋聪悟，目如季臣公。能强记，少习古文，朗读三过即能背诵。尤爱小说，年九岁，父执以《三国演义》相试，随章回，不失一字，且揣摩人物个性身分作表演，传为美谈。

先生七岁入私塾，十岁入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肄业四年。体育教师钱伯圭先生，乡里之望，实乃革命党人，以民族思想相启导，先生民族意识特浓，实萌芽于此。又读蒋方震所译《修学篇》，书中选录西欧不经学校正规教育而自学成名者数十人，述其苦学情事，对于先生后来治学，影响亦巨。高班教师华紫翔先生授各体古文，与魏晋南北朝诸短赋。顾子重先生学通中西，又精历史舆地之学。其他诸师亦多乡里宿儒，旧学基础深厚，兼能接受新知，所授课文，

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先生晚年仍自谓治学蹊径，实由果育诸师启之。

先生十二岁丧父，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仰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明年，与长兄声一先生投考常州府中学堂。声一先生读师范科，明年毕业任教，乃谢不领义庄抚恤金。

先生肄业府中三年余，深得监督（如今校长）屠孝宽元博先生之爱护，而治学则受吕思勉诚之先生影响最大。诚之先生为校中最年轻教师，任历史与地理两课，时有鸿议创论，同学争相推敬，而对于先生深为奖掖。先生成名后，仍常与诚之先生作学术切磋，互相欣赏，互有补益。余曾为文，推崇两位先生与陈寅恪、陈援庵先生同为前辈史学四大家。核实论定，应无异议。（此处所谓前辈，以余曾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者为限。）

一九一〇年冬，先生因故退学，偶见谭嗣同《仁学》一书，读之大喜，即私去长辮。明年春，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五年级，每晨闻环城军号胡笳声，复心仪陆军学生之壮肃步态，常思出山海关，与日俄对垒。是年秋，升读六年级，适会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致辍学。

读先生《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两书，虽然中学教育尚未受毕，但幼年在家与中小学七年余，受父祖慈母与诸良师之教益殊多，立己处人处事以及治学根基与方法，乃至娱乐兴趣，一切皆植基于此一时期之优良环境。尤可叹异者，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无怪明清时代中国人才多出江南！先生少年时代虽然经济环境极为困难，但天资敏慧，意志坚定。而禀性好强，在如此优良精神环境中，耳濡目染，心灵感受，自能早有所立，将来发展，自不可量！

一九一二年春，先生年十八，辍学家居。自念家贫，已无受大学教育之望，乃矢志自学。首先读《孟子》，七日而毕。不久任教于

秦家渠三兼小学，一人兼任国英算史地体育音乐诸课，每周授课三十六小时，此为先生从事教育生涯之始。

三兼创办人秦仲立先生乃绩学之士，文理兼长，崖岸自高，藏书丰富，但不轻示人，惊于先生才思不群，终成忘年之交，切磋益友。乃获读秦家藏书，始得严复诸译著，得益匪浅。一九一三年，先生转入鸿模小学任教，即前果育易名。先生虽已辍学任教，但常以未能进读大学为憾。其时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考生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入学后则以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易名《中国古代史》）为教本，先生即日勤读此两书，尤喜章氏书，对于后来治学趋向，有深远影响。

一九一四年夏，无锡县创立六所高等小学，梅村镇一所为第四高小，设校于泰伯庙（县东南三十里），邀先生任教。先生就读常州中学时，染有抽烟习惯，及到梅村，课文有《劝戒烟》一篇，因念自己抽烟，何以教诲诸生，遂决心戒除，数十年不犯。直到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会议频繁，甚感无聊，始再抽烟作消遣。先生每悟一事，即身体力行，此为一例。又如读《曾文正公家书》，教人读书，必自首至尾，通读全文，遂即遵行，数十年不懈。复如读一本卫生书，谓人之不寿，多由忽略健康教育，自念父祖及不少亲长多不永年，可为殷鉴，遂痛下决心，力求日常生活规律化，作息散步有定时，至老不衰。

先生为学善师法，善变化，喜新知，勇创见，而能悉心追求，每从细小事故中彻悟大道理。如此种种，均在任教小学时代表现无遗。如授《论语》课，适读《马氏文通》，《文通》论字法，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一书，为先生第一部著作。又如读《墨子》，开卷即觉有错字，愈读愈疑，遂奋笔逐条列出，加以改正，成《读墨暗解》一稿。但念《墨子》乃名著，传世已久，此类错误当早有学人指出。试翻《辞源》，知有孙诒让《墨子间诂》一书，急求读

之，凡先生所疑，《间诂》皆已指出，并有详确证据，读书精博，叹为观止，乃自知孤陋幼稚，有如初生婴儿之对八十老翁，相去太远。自此始游情于清代校勘考据训诂之学，力求精进。

一九一九年秋，先生改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六。先生在高小任高班教师多年，适会美国杜威博士来华，讲教育哲学，先生读其讲辞，深感兴趣，但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大异，故欲改入初级小学，得与幼童接触，作一番实验。再者，当时学人提倡白话文，初小教科书已全改为白话文体，先生极欲亲自察看白话文体对于幼童初学之利弊得失。因此在一个偶然机会中，毛遂自荐，担任小学校长，俾能亲身体察究竟如何？先生到任，教师连自己仅三人，每事相商。乃别出心裁，改变教学法，务使课程规章生活化，学生生活课程规章化，以期两方面融为一体。因此废除体操唱歌课程，但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歌唱，全体师生参加，成为学校全体活动。后加国语，亦采同一方式。又废除体罚，而随事诱导。作文课，常带学生到校外，随事指导学生观察讨论，自由发挥，只如一种生活。如此种种新实验，获得各方面之满意与赞许。

施之勉先生任厦门集美学校教务长，曾读先生文，深为推许。一九二二年秋，推荐先生任高中部与师范部三年级毕业班国文教师，此为先生任教中学之始。到校，与之勉先生一见如故，至老不衰。次日开课，首讲曹操《述志令》。此文仅见于《三国志》裴《注》引《魏武故事》，千载读者都未重视。先生指出此文显示汉末建安时代，古今文体一大变。诸生闻之，大为钦服。今读曹文，果然。先生治学，慧眼独具，此为又一事例。

一九二三年秋，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子泉先生推荐先生到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从一年至此班四年级毕业，再回任一年级。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概

论》，教者各自编撰讲义。先生第一年文字学，讲六书大义，未付印。第二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孟子要略》。第四年编撰《国学概论》，后亦续成完稿。并前在梅村无锡县四高小所编《论语文解》，共四稿，为先生正式著作之始。

一九二七年秋，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亦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本校为前清紫阳书院旧址，藏书甚丰，校园有山林之趣，三元坊、孔子庙、南园遗址，均在近地，先生课暇，徜徉田野间，较梅林泰伯庙外散步，尤胜百倍。

先生在苏中时代，课外研究工作主要者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四川蒙文通先生，前曾读先生《先秦诸家论礼与法》一讲词，以为与其师说相近，来长信讨论。此时到南京，听欧阳竟无讲佛学。一日来苏州相访，同游灵岩山数日，俯仰湖天，畅谈今古。蒙先生便中披览《诸子系年》，以为体大思精，极为欣赏。其时苏州顾颉刚先生，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路过苏州，留家小息。一日由东吴大学陈天一先生相偕来访，此为两位先生相交之始。顾先生读《系年》，谓先生宜到大学教历史，不当久在中学教国文，遂向中山大学推荐，继彼后任。不久，中山大学来电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典存先生曰，先生到大学任教乃迟早事，我明年亦将离校，先生能否再留一年，因此不果到广州。

一九三〇年秋，顾先生又推荐先生到燕京大学任教，时年三十六。先生既不能到中山大学，颉刚先生促为《燕京学报》撰文。先生前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心有所疑，遂撰《刘向歆父子年谱》，辨康说之非。颉刚先生正主讲康有为，先生此文不啻与顾诤议，但顾先生绝不介意，既刊先生文，又特推荐到同校任教。此种胸怀实极难得，故先生每提起此事，总叹颉刚先生之胸襟，最不可及！

先生到校，任大一大二国文。课余，就《诸子系年》续加增补，并作《通表》，付商务刊行。此书考论博洽精悍，使战国旧史诸多改

观，为前此所未有，故学林推服。

大学规模大，先生开始意识到职业与私人生活大不相同，当于职业外，自求生活。念在大学任教，惟当一意努力学业，传之诸生，不宜过问他事，遂决意此后不担负任何行政责任，庶能使职业与生活不相冲突。但终感教会学校环境，不易适应，故一年即辞职。

一九三一年夏，先生在苏州，得北京大学聘书，及到北平，清华亦请兼课。先生云此殆皆出颉刚先生预为安排者。后又为情面所迫，在燕大与师范大学兼课。

先生任教北大历史系是为先生讲授历史课程之始。第一年开课三门，“中国上古史”与“秦汉史”皆为学校指定必修课，另一选修课由先生自定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后撰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商务刊行。

“中国上古史”本多可争议处，当时北平治上古史者特多，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除先生所开上古史为必修课之外，别开八门选修课，由各教授分别讲授，但意趣各异。故先生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足见当时上古史学之盛。不仅上古史如此，其他课程，亦受人注意。教授讲义稿，发到讲义室，校内外人人可向讲义室预定，往往教者尚未讲，但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当时北方学术空气如此浓厚，殊非今日所能想像！

次年，先生选修课，改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但历史系负责人，以为今已民主时代，此前中国君主专制，不必再讲，是以历史系学生无一人选课。但法学院院长周炳霖先生以为政治系同学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选听此课。稍后历史系同学多来旁听，乃知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亦有可讨论者。其后刊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即为此课程讲义之简编。

其时“中国通史”为部定课程，但北大由多人分时代讲授。先生谓，多人讲授，彼此不相通贯，失去通史意义。一九三三年秋，

学校请先生一人独任此课，并特置一助教。先生认为通史必须于一年内，自古至今，一气讲授完毕，绝不可有首无尾，有失通史课程之精神。因此开课第一年，集中全副精神，为此课作准备，务期章节间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俾学生对于中国历史能有一贯而全面之概括性了解。

先生寓所距太庙不远，庙侧古木参天，散布于大草坪中，景色幽静。草坪有茶座，但游客甚稀。通史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课前一日，先生例到草坪茶座，择幽静处，斟酌讲稿，一年讲毕，幸能不失初志。通史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但高年级与其他学院，其他学校学生旁听者亦不少，每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

当时北平人文荟萃，先生在北平首尾八年，交游益广，除顾颉刚、胡适之、蒙文通，前在苏州已相识外，新交有傅斯年、汤用彤、陈寅恪、周炳霖等三四十人，时相切磋。此诸学术界友人皆学有专长，世局虽艰，而安和埋首，著述有成。当时北方学术界可谓鼎盛。又其时北平如一书海，书肆搜存古籍刊本、明清手稿极富。先生得暇，常至琉璃厂、隆福寺访寻故籍，自谓平生一大快事，学校薪金，除菜米外，尽耗于此，凡得五万余册，内有不少秘笈。七七事变，无力迁藏，遂致散落。

当时北平学术界既人才鼎盛，藏书又极丰富，故学术著作真如雨后春笋，专业性刊物如《食货》、《禹贡》等亦愈出愈厚，呈现一副蓬勃气象，稍假时日，中国学术界必有一番新风貌出现。但日本侵逼不已，战端遂开，北平学术声光顿息。八年抗战，虽能疆土重光，但学坛元气大伤，光采无存，至今未复，可为一叹！

先生稟性好大自然，任教北平期间，遍游近郊名胜。又曾四次远游。第一次一九三三年，与北大诸生结伴，畅游济南大明湖、曲阜孔林，与泰山诸胜。第二次，与清华师生结伴游大同，观云冈石刻，西至归绥、包头。第三次，一人独游，至武汉，登黄鹤楼，参

观武汉大学。乘江轮至九江，游庐山诸胜，汤用彤先生有宅在牯岭，盘桓甚久。复乘江轮回无锡乡间小住。第四次一九三七年春，复与清华师生，同游开封、洛阳、西安三都诸古迹。归途游华山，由苍龙岭，抵一线天，历登诸峰。华山险峻，为诸岳之最，缅想韩昌黎游此，不能下山故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战军兴，先生与同事结伴南行，由海道至香港，经广州至长沙，复南行至南岳文学院临时院址，遍游诸胜迹。学校旋迁昆明，先生结队经桂林，水路下阳朔，沿途风景最胜。复经广西南部过镇南关，转赴昆明，旋复南至蒙自，以就文学院。

同事陈梦家先生前曾选读先生课，此时常相过从，力促先生撰写通史教科书，以应时代青年迫切需要。先生意动，《国史大纲》之撰述，实由梦家先生促成之。其时文学院复迁昆明，遂借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极清静，后移上寺，更清幽。寺中一人独居，集中精神，期一年完成。其间曾由滇人李埏先生伴游路南石林、石乳洞、大瀑布。石林者，遍山石笋嶙峋，尤奇者，山前有广阔青葱草坪，巨石平地拔起，高耸云霄，有如春笋，而排列有序，殆若天工，真为天下一奇观。

学校课程排在星期四五六晚间，每星期四午后乘车到昆明上课，星期日清晨返山寺，故每周得四天半之闲暇，或不交一言，静思着笔，幸能于一年内毕功。先生云“回思当年生活，真如在仙境”。

先生在北平讲授“中国通史”四年，及来昆明复讲两年，每星期四晚间开讲，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听受，极一时之盛。六年讲授既毕，《国史大纲》亦已成

书，先生遂亦离校，东归侍母。

一九三九年夏，先生经香港、上海归苏州，探望慈母，故夫人亦率子女自北平来会，遂择居耦园幽僻地，除间中至上海晤诚之先生外，杜门不出。生活多暇，每日上午习英文，阅读一部美国学人所著世界史，虽无所成，但得益不浅。下午至晚间，撰述《史记地名考》。此书虽仅为一部工具书，但编排组合，别具心裁，与一般工具书迥别。先生著述总与寻常不同，于此可见。

先生离开昆明之前，顾颉刚先生向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在迁徙成都之齐鲁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邀先生同往开办。先生东归在即，受其聘，但请假一年，四〇年夏，始到成都履任。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研究所则在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距城三十余里，地静书富，深为惬意。会武汉大学历史系诸生，感师资阵容不强，请学校邀约先生与吕思勉诚之先生等来校任教，校长王星拱抚五先生俯纳诸生陈情，通函接洽，先生仅许讲学一个月。一九四一年三月到嘉定践约，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与“秦汉史”两课。并到岷江对岸凌云大佛左侧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政治问题。书院为马一浮先生所创，专讲理学佛性，不与武大师生往来，而邀先生讲演，且不避政治史论题，殊为意外。

其时《国史大纲》刚出版。此书多具创见，只观其章节标题，点出每个时代之动态及其特征，已见才思横溢，迥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气沉沉者可比。尤极难能可贵者，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数语切中事机，精悍绝伦。吾人可伸而论之，前世如商之灭夏，周之灭商，后世如北魏南牧，辽金侵宋，清之灭明，其结果影响皆可作如此观。在此进展中，华夏文化疆域逐次扩大，终形成疆土一统、文化一统之广土众民大国局面。其他胜义纷

陈，不能尽列。而《引论》一篇，陈寅恪先生谓为近世一篇大文章。陈先生为文虽在专业，但具通识，宜有此论！

先生前在北平与昆明讲通史，本已轰动一时。此刻抗战正在艰苦阶段，此书刊出，寓涵民族意识特为强烈，复在重庆等地亲作多次讲演，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遍及军政社会各阶层，非复仅为黄宇讲坛一学人。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赖家院僻处乡野田畴间，竹树小溪环之，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十余人，各自钻研，每星期六举行讲论会一次，每月出外旅行一天。讲论会分组轮流，每次由一位研究员两位助理员讲演或报告，然后共同讨论。其时余亦来所从先生问学，深感最得益处，乃在讲后听先生论评其是非得失，或作补充。往往诸生提出具体丰富之资料，得出正确结论，但不能伸论此项结论之意义，经先生加以发挥阐明，乃见此项结论意义重大。如此教示，真如画龙点睛，乃见生动灵活，启发诸生能于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后，站在坚强材料基础上，作笼罩全局之凌空发挥，以显现论著之光辉性。

在此期间，先生先后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或遵义浙江大学等地讲学归来，即埋头读书写作，先后完成《清儒学案》与《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学案》系教育部奉蒋中正先生之命，特请先生编撰者。惜原稿在教部复员途中，坠落江流，仅存序目。

一九四三年秋，齐鲁研究所停办，先生转在华西大学任教，兼四川大学教席。得暇游灌县青城山，居灵岩山寺，西至老人村，乃唐宋以来一处世外桃源，村民数百家，年逾百岁者常十余人。先生在四川数年，竟以讲学繁忙，未及游峨眉，经三峡、剑阁、秦岭栈道诸胜境，每以为平生之憾！

抗战胜利后，先生以时事方扰，暂时不欲遽返京沪平津繁华地。

一九四六年，滇人于忠义创办五华书院，邀先生任教。念战后昆明环境宁静，欣然应之，后亦兼云南大学教席。先后居翠湖公园与唐继尧旧宅。授课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阅读以禅师与新道教为主，此为先生治学之又一趋向。先生幼习昆曲，善笛箫，教学之暇，藉可怡情。此时偶识滇中老伶工栗成之，精滇剧，一举一动，皆深具功夫，妙得神情。先生自谓，每听一次，即多得一次领悟，为滇行一大奇遇。

先生多年胃病，不能根治。友人有云，人到老年，倍宜乡食，先生以为然。一九四七年，无锡荣家创办江南大学，屡次邀约任教，一九四八年春，遂东返。时唐君毅先生亦在校，为两位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山坡上，风景极佳，常雇小舟，荡漾湖中，幽闲无极，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尤为近代《庄子》研究之突出著作。

一九四九年春，先生与君毅先生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旋随校迁香港。前在广州，与张其昀、谢幼伟、崔书琴诸先生有约，在香港办一学校。先生到港后，该校已定名亚洲文商学院，内定先生为院长，并已向教育司立案。先生自以不能粤语与英语，甚感为难，但其事已定，只得勉强应承，并邀请唐君毅与新知张丕介两位先生共同效力。学校以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学，夜间上课，学生六十人。明年秋，别创办日校，名新亚书院，申请立案为香港当时唯一私立不牟利学校，请赵冰先生为董事长。承新交上海商人王岳峰先生斥资，在九龙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楹为校舍。初期同事仅君毅、丕介等少数人；旋有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亦来任教，或纯尽义务，为当时国内学人来港者之一荟萃地，故亦特为香港教育司所重视。学生来源多为大陆流亡青年，约近百人，多得免费。学校课程之外，又设公开学术讲座，每周末晚七时举行，校外来听讲者，常七八十人。

学校初期经费仅恃王岳峰先生支持。但王先生并非富商，不能久支，同人盼先生到台北，希能获得支援，遂有一九五〇年冬台北之行。承各相关机构邀宴，垂询校政，蒋公邀晤餐叙，由“总统府”每月先拨出三千港元支持学校经费。事定，应邀到台湾中南部各学校及陆海两军校讲演。北归，又在师范学院连续四次讲演，题为“文化学大义”。在“国防部”“总政治部”连续七次讲演，题为“中国历史精神”。而《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整理而成。

一九五一年秋，为《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撰成《中国思想史》。是年冬复到台北，明年春承何应钦将军邀约，在“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作连续五次讲演，题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即就前在北大讲稿，增补再讲之。后出书，其为海内外学人所重。是年四月十六日，应朱家骅先生之邀，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作一次例行讲演，借淡江文理学院新建惊声堂为讲坛。讲词方毕，屋顶水泥大块坠落，听讲者立法委员柴春霖重伤不治，先生头顶亦破，但未深入脑部，幸能康复，时年五十八。

一九五三年夏，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庐定先生来香港，受雅礼协会之托，拟在香港或台湾、新加坡觅一学校或医院，提供补助发展。首约先生晤谈。卢氏一一询问，先生就办学宗旨与情形，一一率相告，遂定议协助。但先生提出一项先决默契，雅礼只可派人驻校联络，绝不能过问校政，卢氏亦同意。遂每年协助二万五千元为经常费。先生乃具函辞谢“总统府”赠款。

一九五四年夏，先生又到台北，应蒋经国先生邀约，在救国团作连续四次讲演，题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明年秋，又应“教育部”之邀，率领访问团到日本作报聘访问，所至以东京、京都、奈良三地为主。在京都、东京大学作公开讲演，深感日本上下对于前次侵华战争并无忏悔意，而日本社会则在大变化中，左倾趋向尤堪警惕。其后定居台北，复两度到日本韩国访问，获读不少韩国理学

家书，归来有所述作。

一九五四年秋，新亚在嘉林边道增租新舍，两处上课。旋复由卢定先生洽得福特基金会捐款为新亚建校舍，择址农圃道，由港府拨地兴建，五六年落成。新亚之创办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故校内悬挂孔子画像。其时雅礼协会代表建议，并挂耶稣基督像，先生以为新亚非教会学校，此项意见有违当初协议，断然否决。

先是亚洲协会艾维先生与新亚久有联系，新亚获雅礼之协助颇赖其促成。不久艾维又与先生协议，在太子道租楼，筹办研究所，培养学术专才。但艾维不久即离任。一九五五年春，哈佛赖谢夫先生来嘉林边道相访，定议协助研究所支付奖学金、图书费，并出版学报。至此研究所始能正式招生开办，两年毕业，成绩优良者留所为助理研究员，有至十年以上者。又五四年，哈佛燕京学社来函，请新亚选派年轻教师到哈佛访问，但无年轻适当人选。明年又有来函，遂推荐研究生余英时，以助教名义应征，是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第一人。其后新亚学生远赴美欧日本游学任职者，不胜缕例。

当时香港兴办私立书院七八所，独先生所办新亚得美国雅礼、哈佛多方面作财力支持，深为香港政府所注意，遂于一九五五年港大毕业典礼中颁赠先生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与胡美琦女士缔结良缘。夫人为江西南昌大家，先就读厦门大学，随家避难来港，曾在新亚求学一年。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先生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夫人每日抽暇伴侍，遂渐建立感情，旋就读台北师范大学，五四年毕业，亦来香港，复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新亚创校以文史哲为基础，及得美国各方面协款稳定发展。五七年二月，首创艺术专修科，发展为艺术系，又组国乐团作课外活动。先生自幼重视艺术，此亦为一项理想之实践。六〇年复得雅礼代表罗维德协助，成立理学院。

新亚创办获得美国多方面协助，美国各教会又支持创办崇基书院，亚洲协会出资集合当时其他五所私立书院，成立联合书院。三校皆由美国协助兴办，香港政府乃有集合三校创办一所公立大学之议。新亚同人多持异见，先生以为新亚建校之初，本供早期大批青年难民就学机会，今时局已定，为学生前途着想，应交付港府负责。且本人亦感精力日衰，办学与研读已难兼顾，当量力性，渐可摆脱行政工作。参加大学之议遂定。

一九五九年秋，耶鲁大学函邀在其东方研究系讲学半年。先生乃邀请前“教育部”次长吴俊升士选先生为副校长，代主校务。港府以吴先生为国民政府前任官员，党政色彩浓厚，诸多顾虑，经先生坚持争议，终获港督特别批准。学校主持有人，先生乃于明年正月，经日本到美国践约。授课两门，美加学生四人，而华人在耶鲁任职者乃有十余人，由李田意先生翻译，故能畅所欲言。课外多暇，一方面补读英文，一方面续写《论语新解》。学期结束，耶鲁特颁赠名誉博士学位，校长请李田意先生在典礼中，以华语作介绍，据云耶鲁典礼中未曾有此先例。

先生在美国半年，先后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在哈佛东方学研究所、哥伦比亚丁龙讲座、中美文化协会、芝加哥大学讲演，复由芝加哥绕经大峡谷，到旧金山、西雅图，折返芝加哥水牛城，游尼加拉大瀑布，转赴加拿大多伦多，复返美到纽约，中途作千岛游。再由纽约到英国，践半年前之约。富尔敦爵士邀至其家，讨论香港创办新大学事，为校长是否用华人，数度争持，最后定议任华人为之。后乃遍游伦敦诸名胜，深感英国人极为保守，而社会闲逸，与美国迥异。再转巴黎，又感法国民风闲逸之情，又胜于英。会学校有事，函促速归，乃急转罗马回港，择居沙田西林寺后山。其时富尔敦又来港，议校名，先生主张不如径名中文大学，众无异议。大学成立，先生即辞新亚校长职，时为一九六四夏。自

办亚洲文商至此，前后十六年，先生自谓为平生最忙碌时期。董事会定议，先休假一年，明年离职。

先生休假之始，即移居青山湾两月。寓所为一小楼房，环境幽静，尤胜沙田。拟定退休后生活计划，首为撰写《朱子新学案》。六五年夏，南洋大学商请任校长，马来亚大学邀请讲学，先生不欲再涉行政，遂应马来亚之聘。但不胜南国湿气，胃病复发。明年二月即返香港，仍寓沙田旧址。其时香港难民潮骤起，乃于六七年十月迁居台北。承先“总统”蒋公礼遇，公费建筑庭园小楼，背山临溪，署榜素书楼。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第三进素书堂侧，故以名新居。明年七月，以百分之九十最高票，当选中研院院士，象征中国文史学界同异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

乡居多暇，得哈佛支助三年研究费，专心撰写《朱子新学案》，前后七年成书。自谓不卸新亚校政，绝不能成此专著。《学案》既成，遂应张晓峰先生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课，台湾大专师生多人旁听，成《中国史学名著》与《双溪独语》两书。复应蒋复璁先生之约，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得每日到院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续有撰述。其他著述有《孔子传》与《理学六家诗钞》等书。先生不能写诗，但爱诵诗，以为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亦为人生一大乐趣。旋自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分时代为八册，为先生平生有关中国思想论著作一结集，但《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学术通义》等仍各独立为书。

一九七七年，先生年八十三，胃痛剧作，几不治。明年春病渐愈，但两目已不识人，不见字。会新亚创设钱穆讲座，坚邀先生为第一次讲演人，情不能却，讲题为“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凡六讲，为时三周。又明年，新亚创校三十年纪念，先生年八十五，复来香港，首先热心协助新亚之耶鲁卢定先生亦来港赴

会，两人回念前尘，感慨不已！

一九八〇年、八一年，复两度来港，获与留居大陆三子拙、行、逊，两女易、辉，及长侄伟长先后相见。三十余年海天违隔，幸能一晤，自感快慰。八四年七月，先生复来港，在港门人为先生庆祝九十寿辰，大陆子女与嫡孙亦得来会。其时先生精神乃甚健旺。八九年，新亚创校四十周年，先生以九五高龄，仍能到港参加纪念会，于新亚、于先生个人，皆为一大可欣喜事。但先生健康已大不如前！

一九八六年，先生九十二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蒋经国先生念先生学林泰斗，民之硕望，特礼聘为“总统府”资政，以表当局尊学崇德之忱。今年五月迁寓台北市城内杭州南路新居。先生劳碌一生，至此始有自置寓所。

先生年七十时，已患青光眼，自此目力日弱，阅读渐感困难，八十四岁时两眼已盲，但先生一向下笔千言，字甚工整，论文数千字，常只改数字，即可付印。及入老境，目不见字，但展纸落笔，亦只偶有一两字重叠，故仍能撰文，惟不能亲笔改订，必赖夫人诵读，再指示增补。是以先生晚年仍能著述不辍，最后出书乃名《晚学盲言》，虽云自谦，亦是纪实。

先生壮年时代，虽体魄强健，但为传统书生，不能自我料理生活。抗战期间，辗转后方，无家人照料，常致胃病大发，苦受折磨。直到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轨道。夫人笃爱情深，加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先生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于先生起居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最近数年，先生脑力大衰，时或失去记忆，且不能进食，夫人千虑百计，寻医进药，期能延年于万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终以今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许，安祥中一瞑不视。魁斗星沉，士林震悼！

一九七四年，先生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游，寓梨山、武陵农场等地，撰成《八十忆双亲》，后又撰《师友杂忆》。读此两书，先生幼年环境与一生行谊，历历在目。虽终一生只为一介书生，但治学之暇，喜游历，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宁中，得人生至趣；又于棋管游艺无所不爱；交游颇广，论议敏健，先后办学，一以理想为依归。兼此诸端，可谓多彩多姿，此又非并世学人所能企及者，亦可谓学林一异人！惟先生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学研究。

综观先生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派古文，后始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乃集中向史学方面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先生治学途径发展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及社会与经济，惟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家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先生问学，仍常感到先生思如泉涌，能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大多实有理据，并非恣意想像之说。惟先生天分太高，所提论点，往往如天马行空，读者未必人人都能理解，都能接受。但先生任何论点，多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读先生书，不论能否接受，皆能获得一些启示，激发读者别开蹊径，不致执著，拘守成说，不能发挥。此为先生著作除了建立本身论点之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项贡献，殊为难能！

先生今以九十六高龄谢世，亦标识前一辈史学界之落幕。先生

虽已作古，但遗留述作极为丰富，供今后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六日初稿，刊《新亚生活月刊》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一月两期。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补再稿，呈钱师母审阅，六月八日再次增订。

此文再稿曾寄钱树棠兄斧正。顷得来信，提出几点意见。惟此文已排版三校清稿，只能在适当处约略增补。但信中尚有一条云：“先生曾说，辛亥革命时期，曾拟在棉衣内缝入银元当甲冑，参加攻宁之役。”此条字数较多，若补入正文，势必挪动版面，故附记于此。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最后校稿后记。

下篇 从师问学六十年

一代史学大师钱穆宾四先生已于本年八月三十日溘然辞世，享年九十有六。我自一九四一年三月在嘉定武汉大学听先生讲课，至今首尾五十年，回忆追随往事，悼念无已。除应新亚书院之约，撰成《先生行谊述略》一文外，复提笔写此小文，以志永怀。同时又联想到小学、中学时代各有一位老师，对于我的治学影响也很大，时间分别在遇到钱先生之前七年、十三年，故并述之。则我自受第一位良师的薰陶，迄今已六十余年，故以命篇。

* * *

每个人的性格、形象，都由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塑造而成。青少年时代在学校受教育，每位老师大多都给予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往往有少数师长的影响特别深远。我做学生时代，就先后遇到三位这样的老师。第一位是小学的冯溶生先生，第二位是中学的李则纲先生，第三位就是钱先生。冯李两位先生早已作古，现在钱先生亦已谢世，成为历史人物，我也年逾古稀，学术研究已近尾声，境界不会再能提高，规模只能渐渐收缩，不能再有扩张了。回想一生历程，除了两亲生育、兄嫂爱护，与农村环境孕育成朴质的天性外，一路读书、作学术研究，受到这三位先生的影响无疑也极为深远。

* * *

冯师溶生是我在罗家岭乡镇小学高年级读书时的算术教师，时

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先生是怀宁县人，当时似不过三十岁之谱，程度自应不错，也擅于讲书，使我对于算术发生浓厚兴趣，不断的看课外书、找习题做，尤喜四则难题。当时学校课本，每课练习题远比现今还少，只有四五题，但难度大得多。我感到习题愈难，愈有兴趣，因为难题才好转弯抹角的思考，设法得到正确的答案，增加成就感。到六年级毕业时，已把初中一年级的数学习题都做完了。一九四六年冬，我自南京回家，仍看到罗岭初中保存了我在小学时代的数学作业簿，供同学作范本。因为数学根柢好，所以我在中学一直以数学见长。后来我虽然弃理习文，但研究问题能深入、能精细、不敢一步虚浮，这种作风，大都得之于少年时代的数学训练，这是溶生先生之赐！

李师则纲是桐城县人，在我就读的安庆高级中学教本国史，也在安徽大学兼课。他有些倾向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但非共产党，而与当时的民主同盟可能有些关系。其时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史学通论》、《始祖的诞生与图腾》两书。第二部书可能为中国人运用人类学上的图腾观念解释中国史前史的一部最早著作。一九三四年，我由高中师范科转到普通科，第一个纪念周上，由李先生作学术讲演，题目大意是“历史演变的因素”，主要是用唯物论的史学观点作解释，我感到非常有兴趣。同时又看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两种机缘的凑合，使我慢慢投身到史学研究的行列中。在这同时，有一位初高中都同班的好友童长庆，也有些受则纲师的影响。他可说是学校中最聪明、优秀的学生。初中入学试，他考第一，我考第十；高中时代，他曾在作文课堂两个小时内写成五百字的旧体诗，与我的国文程度，真有天渊之别。我们两人在课外阅读方面有高度的联系，常常同阵到校内外图书馆猎取新知识，往往他发现好书，与我同读。不过他读了些章节，就不想再读了，另猎取其他的新目标，我则遇到好书，多能坚持的看下去。在高中三年中，我由

于李先生的引导与长庆的联系，看了不少社会科学书籍，也略涉一点唯物史观的理论，对于我后来的史学观念，影响也极大！

* * *

谈到钱先生，我与先生曾经朝夕相处，作息追随将近三年，后来联系时间又长久，受到的影响也最大。除了学术方向的引导与诱发，教我眼光要高远、规模要宏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我的鼓励。

我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进入武汉大学，就读历史系。因为抗战军兴，教授不免有些流动，例如李剑农先生离开学校了，郭斌佳先生只授了一学期的课，就去从政，所以教授阵容显得较弱。大约是三年级末期，同班好友钱树棠、郑昌淦与我等多人感到系中这种缺憾，相互商议，请学校设法约聘留在敌后方的一些名教授来校任教。我们当时提出名单有吕思勉、陈登原诸位先生，钱先生当时已离开西南联大，回到苏州，所以也在希望约聘的名单中。校长王星拱抚五先生非常开明，果然接纳了同学的意见，积极的与这几位先生联络。吕陈两位先生皆已答应来校，但终不果来。钱先生早与顾颉刚先生有约，要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所以只应允来武大讲学一个月。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闻先生已由苏州到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履新，明年春将到武大讲学，诸同学都为之雀跃。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先生自成都来校，决定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与“秦汉史”两课。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七时开始讲政制史导论。讲坛原定在一间教室中，但听的人太多，临时改在大礼堂。同学发现先生讲课颇有政治家演讲风度，而高瞻远瞩，尤不可及。

先生一开讲，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

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

我听了先生这番开场白，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当时正对于这两门学问发生浓厚兴趣。那时大学毕业要写论文，我的论文题目就是《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已写成若干章。至于地理更是自小学时代就培养起来的兴趣，所以上一年（一九四〇年）元旦已写成《楚置汉中郡地望考》，更前一年的十一月写成《中国军事地理形势之今昔》。此刻听到先生这番话，自然增加了我研究这两门学问的信心，所以我后来几十年的努力，坚定不移的偏向这两方面发展。不过一般所谓历史地理，主要就沿革地理（政治地理）而言，而我后来的研究，推展到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各方面，欲从人文地理角度窥探全史，这是旧历史地理学的延伸。

四月尾，先生讲学期满，计在嘉定四十余日，除在武汉大学授课外，又应校外团体邀约作公开讲演。四月二十八日，在江苏省同乡会讲“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大意谓：

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至于读书的方式，或采直闯式，不必管校勘、训诂等枝节问题；或采跳跃式，不懂无趣的地方，尽可跳过，不要因为不懂而废读；或采闲逛式，如逛街游山，随兴之所之，久了自然可尽奥曲。读一书，先要信任它，不要预存怀疑，若有问题，读久了，自然可发现，加以比较研究。若走来就存怀疑态度，便不能学。最后主要一点，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

这些意见大都很轻松，人人都该能做到，藉以建立学术基础。先生

讲学结束，历史系师生在三十日开茶会欢送，先生即席勉励各位同学，要眼光远大，要有整个三十年五十年的大计划，不可只作三年五年的打算。这两次讲话，对于我后来的治学都有不小的影响。

当先生在嘉定讲学期间，居在嘉乐门外一间平房中。晚上无电灯，油灯如豆，不能看书，所以我三四度晋谒，皆在晚间，以免耽搁先生时间。我的毕业论文已写成四章，先成三章已送呈导师吴其昌子馨先生，近成第二章先呈先生批阅。先生问我看了些什么书，我列举了些书名，内有《水经注》。先生问何以看此书？我曰，一则我喜欢看写景文，前人常说此书写景文优美；二则我想考知秦代县名。先生很高兴的笑着说，能知道自《水经注》中考查秦县，已是入门了！四月九日我再晋谒。先生曰，你的论文，原料已搜集详备，惟后代著作，如《山堂考索》、《廿二史考异》诸书尚未阅，可取其研究成绩为之补充。并建议将封建与行政分开，以免有含混之弊。先生又垂询毕业后作何打算，是否有家庭负担？我曰一人在外，尚无家累。听说武大历史系明年将办研究所，我想先到中学教一年书，明年再回校读研究所。先生曰，教书颇费时间，既无家累，或许可到齐鲁研究所任助理员为佳。我自然感到高兴，但事尚未定。六月十一日，接到先生手教，嘱即来齐鲁从学，第一年工作以两汉史为中心。此为一理想机会，遂决定从师研读。八月五日我首途赴成都，七日自成都坐鸡公车^[1]抵研究所报到。

* * *

齐鲁研究所的所址在成都西北三十余里的乡野间，离乡镇崇义桥尚有数里之遥。院子本为一赖姓富家住宅，占地甚广，旧式庭院三进，后为花园，花木甚多，故又称为赖家花园。院之右前部有大

[1] 鸡公车，四川旧日一种独轮小车。头宽约一呎余，两掖向后八字张开，中间弓背高起。推者两手各握一掖向前推进，推者之头有如翘起之鸡尾。车头与弓背间可坐一人，或装载货物。相传即为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之遗型。

荷花池，池外围墙内植杨柳数株。池中有大型水榭，曰消夏亭。池后厢房多间。屋宇花园外有围墙，竹树环护，甚为畅茂。墙外小溪绕之，溪外农田，一望无际，只有稀疏的独立村庄点缀其间，好一片宁静气氛，不知顾先生创办研究所时何以能借到这样一处好地方？所中藏书也很丰富，我估计约五万册之谱，版本都不俗，本为四川大户罗姓藏书，为避敌机轰炸，移藏乡间，供本所师生利用。

先生看我到了，很高兴，安排住在前面庭院左端的一间房中。院左有厢房三间，中为小堂，面对庭院，我住堂右，对面李为衡，来自云南大学。先生领我到住处，对于一切起居饮食，乃至铺床叠被、整理书物诸琐事，都细心指点周到。而且在不足一天的时间内，来我房间五六次之多，诚恳关切，宛如一位老人照顾自家子弟一般，令我感到无比的温暖。这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走笔至此，仍不禁涕泪交流，不能自抑！

我到所休息几天，就开始增补大学毕业论文《两汉地方行政制度》及其附表《两汉太守刺史表》。同时协助先生编撰《两汉学术通表》，因为当时教育部商请先生撰一部《秦汉史》，计划中有一表，嘱我做初步工作。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系由哈佛燕京学社支持兴办，由校长刘世传兼领所长，顾师颉刚先生以历史系教授兼研究所主任，实际负行政责任。钱先生以历史系教授兼研究员，另一位研究员为胡厚宣。后来顾先生为办《文史杂志》，迁居重庆，所务由钱先生负责。研究员下置助理员八九人，或兼管事务（魏洪楨），或兼管图书（杜光简），此外有书记四五人，后又加一名编辑。所以在组织上，近似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机构，非教育机构。不过，助理员都把顾钱两位先生当做老师看待。而这两位先生对同人的看法不大相同。顾先生把一切人员都视为同事，平时称为先生，大除夕吃年饭时，举杯向大家说：“一年来都辛苦了，谢谢各位！”但钱先生却完全是另一

番态度，他把所有助理员、书记都当作学生，平时直呼姓名。又顾先生负责所务期间，规定门房中，除星期天外，有一人值班，上自他本人，下至书记，轮流当值。自己当值时，自上午八时起就拿了简单文具、书本，坐在门房桌上工作，有客人来，自己传呼。钱先生就懒得值班。这些小节就显得两位先生的性格作风有很大差别。

至于工作、生活方式，两位先生更不相同。顾先生自二十几岁已出大名，喜欢兴办学术事业，客人也多，一天忙到晚。他寻觅赖家院为所址，家人居在后院，极为安静，大约即寓有减少访客的意图。但他本人仍常在城内处理各项事务，回到所中家居，只在后面书房工作，绝少出外走动。钱先生在前面消夏亭工作，平时客人也较稀少。消夏亭长方形，占地约八九百平方呎，中间置大型长桌，供集会之用。前端临池，横置小型长桌，即先生平日读书、写文之处。四面空阔，夏日清风徐来，荷叶飘香，有些山林习读情趣。研读既久，感到困倦，就提了手杖，到田野蹊径间漫步走一圈。先生家人远在苏州，自己独住在院子中进右边的一间厢房中，距离公共餐室不远，即参加青年同学们所办伙食团，同桌吃饭。晚餐后，只要天气好，常常到院外散步，诸生也各提手杖，鱼贯追随先生，在田野间到处乱跑。自己主理所务后，更规定每月一同出去作短程旅行一次，当天回来。目的地大体都是附近县城或场集、名胜风景区。最可游的是成都北郊的新都县，城外宝光寺在大片楠木林中，城内有桂湖公园。由赖家院到新都，步程来回六七小时，先生率领诸生去过两次，钱树棠来所后，我与他又单独去过一两次。星期天，诸生到附近场集玩，先生有时也参加。若星期天气候不好，就另择风和日暖的天气放假一天，率领诸生投身大自然中。有时坐在乡村茶馆，喝茶吃花生、闲谈；有时席地藉草，或坐或卧，看青天飞鸟，望白云幻变。诸生可随意提出问题请教，先生即海阔天空的随意漫谈。在这些随意谈话中，我每每得到不少启发。再者，先生貌似严

肃，而实随便有风趣，有时且显得很天真，在这些师生平日游乐活动中，时时显露出来。先生对于讲课很有兴趣，后来我也讲课了。有一次听他谈讲课的乐趣说：“一登上讲坛，发言讲论，讲到得意处，不但不见下面有大群人，也浑忘天地人世，连自己都忘掉了，只是上下古今毫无顾忌的任性尽情的发挥，淋漓尽致，其乐无比！”他说得兴高采烈，最后得意的大笑“哈哈！好痛快！”那状貌神情真像个天真的老小孩，我也被逗得大笑！

就研究所的正式工作言，不论研究员或助理员，都各自选定论题，自由钻研，只是每个星期六举行一次讲论会，分组轮流讲演，或作读书报告。每组研究员一人、助理员两人。讲者词毕，与会者共同讨论。最后由顾钱两位先生作论评。我参加讲论会时，顾先生已到重庆，主要的是由先生论评得失或补充。我感到最得益处的，是先生随时提醒诸生，要向大处看、远处看，不能执著的尽在小处琢磨，忘记大目标。尽往小处做，不能有大成就。

先生在论评诸生所讲内容时，又往往代为发挥。十一月一日轮到我讲。我一向讷于言辞，又不曾在会议桌上讲过话，加以刚来，在本所尚无成绩可言。先生嘱我只讲来所工作计划，我勉强讲了四五分钟，先生接着自谈认识我的经过，时间反而长了两三倍。又一次我讲“两汉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根据一千多条事例作统计，结论是：（1）自武帝以后，凡是朝廷任命的长官都非所统辖地区的本地人，县令长不但不用本县人，也不用本郡人。（2）顾炎武说，州郡县长官自由任用的属吏，都是本地人，我检查过，有几个例外，但不是有特殊原因，就是正史所记籍贯有误。我本以为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结论。先生听了我的报告，精神为之一振，说这是个极重要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大发现，怎么是小问题！秦汉时代，中国刚由分裂局面进入大一统的局面，封建潜势力仍存在，而交通不便，极易引发割据观念。若任本地人做本地长官，则名为统一国家，其实

在文化意识上并不统一，对于大一统的局面，甚为不利。汉制地方长官全用外地人，自不易发生割据自雄的观念。但本地民情只有本地人最清楚，规定地方长官任用的属吏必须为本地人，既可避免长官任用私人，复可使地方行政推行顺利。所以这一条法规极有意义，不可等闲视之。这一席话启示我们研究问题时，不但要努力的搜取具体丰富的材料，得出真实的结论，而且要根据勤奋的成果，加以推论、加以发挥，使自己的结论显得更富意义。

所中刊物除了《齐鲁学报》之外，又出《责善》半月刊，原意在供本所青年练习撰文，但同学写文章的并不多，倒是有很多成名的学人投稿刊出，因为当时大后方经济困难，学人论文刊出的机会不多！我到所不久，大约是九月尾，先生嘱我常写短文在《责善》刊布，最好每月一篇。这对于我是个很大的压力。第一篇，我想到前一年元旦所写《楚置汉中郡望考》^[1]一文，辨汉中郡乃楚国所置，不始于秦；地在汉水中游，尚无汉上南郑之地，故郡治亦不在南郑。当时吴其昌子馨师甚为称许。此刻先生要文，因此加功增补，十月十日中午送呈先生审阅。晚餐时，先生笑着对我说，“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好。若能如此，《责善》前途有望了！”回忆我一时兴有所会，写成此文，不想承先生如此激赏！此时我读《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对于武帝创建年号问题发生兴趣。觉得史公言简，但极正确，后人多据成帝追改后之纪年以疑《史》文，实乃大误。因此据《封禅书》、《郊祀志》与《汉书·武帝纪》撰成《汉武帝始创年号辨》^[2]一短文。自以为只据几条少数材料，恐非佳构，不敢送呈先生。十一月五日上午，工作困倦，出门散步，遇到先生，问我有无新稿投《责善》下期发表，乃将此文呈先生审阅，曰这不过是一

[1] 刊《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六期。

[2] 同上，第十七期。

短札，不能算是篇文章。先生看后谓我曰，“此文甚好，实出我意料之外！”自此继续为《责善》写文，直到一九四三年夏离开赖家院时，《责善》陆续出版十余期，我发表五篇短文。又由《两汉地方行政制度》稿中抽出两篇论文，在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发表。

先生与诸生同桌吃饭，又常一同到野外散步旅行，所以师生关系相当密切。我卧房的小堂对面就是助理员研究室，可坐十一二人。小堂与研究室之间为前进庭院，院子颇大，梅花数株。我晚饭后常在庭中散步，或由外面散步回来，常在小堂阶檐下，面临庭院稍坐。先生也常到前庭院中散步看月，所以我们师生接触的机会非常多。一日为树棠来研究所事，在庭院中与先生谈话甚久。武汉大学历史系原拟在本学年设置助教一员，树棠成绩最好，预计留他在校担任此职。不知何故，助教一职并未增置，树棠只得到附近中学任教，因此也想来齐鲁研究所，从先生研习，函嘱我向先生转致此项意愿，承先生同意。在这同时，也谈到我自己。先生谓我做学问极有希望。我曰，自己虽然很有决心，要向学术路上走，只是天资甚笨，身体又不好！先生曰“你读书研究问题很用心思，看来天分并不坏，只是身体要随时注意！”

树棠来所后，与我住在同一间房中。他是我在大学时代所最佩服的好友。我除了看现代社会科学书籍较多之外，其他一切，如天分、勤力、旧学根柢样样都不如他，学校教授大约也作如斯观。同学朋友都称他为大书橱，我是二书橱，既是取笑，也是赞誉，同时也见得大家都认为我比他尚差一截。有一次又在庭院中与先生闲谈，我表示对树棠佩服之意，但先生曰：“你是我认识的最有希望的学生，树棠前途不如你。”我为之愕然不解。因问何以有如此与一般人相反的看法。先生曰：“树棠个性执著，程度虽好，但很难发得开！”当时我还不相信，后来才佩服先生真有远见！但我另有一种想法，

树棠的才学不能得到发挥，可能与他的眼光标准太高有关。我与树棠在大学时代的读书意向有高度联系、相互影响，我选习很多中文系的课，是受了他的影响。而我对于历史地理学有兴趣，也影响了他发生兴趣。等到进入研究所后，两人相约，我专向制度史方面努力，他在历史地理方面用功，两人分工，各在一园地中发展。他的精勤实在令我自叹不如。《汉书·地理志》所记郡国属县，几乎能背诵。在秦汉人文地理方面，已搜集了几十万字的史料，但只写出《两汉的两都》一篇短文。这篇文章虽然短短数千字，但他说明西汉长安是个动态的都市，东汉洛阳是个静态的都市，这正反映了西东两汉两个时代的整体精神。这是个非常高层次的论点！大约他后来只想写高境界的论文，不欲“卑之无甚高论”，所以花了很大气力搜集几十万字的史料，也不想动笔，时间久了，自然锐气尽消！当然这仍是基于先生所谓执著之故！再有一层，我后来有幸进入中央研究院，能专心读书，他若能也有此机会，可能也有较好成就。近数年来，常通音问，他的笔下仍较我为健，而才学不能得到适当的发挥，实在可惜！

先生教人治学，常常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在讲论会上，固然常常这样提醒大家，在师生成群外出散步、旅行或与我个人闲谈中，也一再强调这些意见。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师生多人徒步旅行到新都赏桂，当日途中，先生谈得很多，我在日记中写下了两千多字。例如先生说：

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的混日子，你们有意读书，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气魄不够。例如你们两人（手指向树棠与我）现在都研究汉代，一个致力于制度，一个致力于地理，以后向

下发展，以你们读书毅力与已有的根柢，将有成就，自无问题，但结果仍只能做一个二等学者。纵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历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我希望你们还要扩大范围，增加勇往迈进的气魄！

树棠问，“梁任公与王静安两位先生如何？”先生曰：

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王先生讲历史考证，自清末迄今，无与伦比，虽然路径是第二流，但他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绩不可磨灭。考证如此，也可跻于第一流了。

我曰，我也想到，做学问基础要打得宽广。但我觉得大本大源的通贯之学，实非常人所可做到。我总觉天资有限，求一隅的成就，已感不易。若再奢望走第一流路线，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狗！先生曰：

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饭后，先生在大门外，又与我有一段闲谈。先生曰：

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倘使走来就是小规模，等到达成这个目标后，便无勇气。一步已成，再走第

二步，便吃亏很大！

又有几次与诸生谈到此类问题，说：

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这难道是必然的吗？是自己功夫不深，写的东西价值不高！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为要着！……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诸如此类，随时谆谆致意！

树棠来研究所后，我已决定专向制度史方面发展，心中慢慢形成一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计划。是年十月十三日，与先生谈到此项计划，拟以毕生心力完成这一部书。先生极力赞许。晚餐后野外散步，先生曰：

近人求学多想走捷径，成大名。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比如五四运动时代的学生，现在都已成名，但问学术，有谁成熟了！第二批，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当日有名师指导，成绩很好，但三十几岁都当了教授，生活一舒适，就完了，怎样能谈得上大成就！你如能以一生精力做一部书，这才切实，可以不朽！

又一次晚饭后，在前庭步月，谈到中国学人读书之不易，先生曰：

中国读书人在未成名之前，要找一碗饭吃，都不太容易。一旦成名了，又是东也拉，西也扯，让你不能坐下来好好安心读书！

这番话显然是先生切身经验与感受。当时他在学术界、在社会上，名气日盛，邀请讲学的很多，又要常常到重庆，开会讲演，浪费不少精力与时间，所以有此感慨。又告诫我说：

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

最后一番话对于我的影响极大。

我是个农家子弟，安徽教育又较邻近各省落后，比之江苏、浙江相差更远。由这样一个环境出身，又自觉天分有限的青年，虽然意志坚定，也有几分自信，但绝不敢狂妄有极高的自许。先生天才横溢，历教南北各大中小学，识人无数，在学术界有崇高地位，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凡青年，竟然屡次那样的赞许，认为极有前途，自然大大加强了我的心，使我更能坚定不移的奋发向前。后来又有幸能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获得优良环境，让我完成这项愿望，也部分的达成了先生的期许，而在我坚定的奋斗期间，也一直牢记着先生上面最后一段告诫！自励自惕，不敢或忘。五十年来，我对于任何事都采取低姿态，及后薄有浮名，也尽量避免讲学，极少出席会议，都与先生此刻的告诫不无关系。不过到了我中年以后，先生却又鼓励我多讲学，启迪后进，仍见先生无时不在关心学术、关心社会！

一九四三年夏间，因为校长与董事会不和，闹得两败俱伤，哈燕社协助研究所的经费又已大削，必须裁员。先生以为都是自己学

生，不欲显得厚此薄彼，所以干脆辞职，改任华西大学教职，率领诸生到华大后园一幢洋房聚居，各就职业。我与树棠及吴佩兰则在四川大学研究所继续学业。九月四日迁寓川大宿舍，虽然房舍古旧，但也还宽松舒适。不久，先生嘱我到华西大学讲授一班“中国通史”。我本不想教书，但先生既好意有此安排，对于我也有扩大学术基础的好处，所以到华大兼课，并迁住先生寓所。同时聚居者又有姚翰园、张遵骝、李定一、孔玉芳、黄淑兰等七八人，树棠、佩兰亦常来盘桓。

其时先父裕荣公年近八十，先母亦年届古稀，希望我能早日回家，所以长兄德明屡次来信催促。十一月十五日又得信，嘱我明年定要回家觐省。事有凑巧，前文提到的李则纲师，抗战开始，随安徽省政府迁到立煌，任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主任，其时我在嘉定武汉大学，师生仍有书信来往。此时，我得长兄促归的家书后不数日，即得先生来信，云师范专科学校已升格为安徽学院，历史系仍由彼主持，希望我回乡任教，旅费由学校汇付。适会朋友中有丧亲者，我闻之，心中警惕，因思两亲年高，极当省侍，既然在外教书，不如回乡，遂决计明年东归。既已有此决定，遂作一切准备，一方面分批邮寄书物，一方面搜集到校上课教材。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拜别先生，首途到重庆。日夕追随先生问学三年，至此终结。

在这段从学期间，诸同学中，我与先生似乎最为接近。我坦诚的无话不说，乃至初恋情事，所中惟好友树棠知之，也告诉了先生，先生还代我谋划，拟让我能有机会到重庆去一趟。后来因为她的一时不慎，不得不离开我，使我情绪低落，万念俱灰，招致长期伤风。先生不时劝解，要为我另介绍一位女友。我经过这次打击，深知自己太重感情，做人做学问都不执着，只有感情不免太痴执，所以当时只想埋头读书，不想再陷入情网！

我对于先生既很坦诚，也很直率。我读《国史大纲》，深感才气横溢，立论精辟，迥非一般通史述作可相比肩，将为来日史学开一新门径。惟行文尚欠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故曾向先生建议，再加几年功夫，作更进步的整理。一方面就当补充处加以补充，一方面就文字加以修饰，每节每章写成浑体论文。若能力求通俗化更好。先生曰，你的意见有理，但书已出版，即不想再在上面琢磨，只有期待后人继续努力了。

我们师生三年日夕相处，一直很融洽，只有一次先生命我与树棠做一件事，我们迟疑未即应命。事后我很后悔，次日佩兰告诉我们，昨日之事，先生很生气。我约树棠向先生请罪，他不敢去，我曰，自己老师，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去。见面时，先生还起立相迎，笑容满面。我们深表悔意，先生曰：

我平日自知脾气很坏，昨日不愿当面呵责，恐气势太盛，使你们精神感到压迫，伤了你们锐气。但昨日之事实不可谅。你们努力为学，平日为人也很好，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有大的成就，但此亦不仅在读书，为人更重要，应该分些精神、时间，留意人事。为人总要热情，乐于助人，不可专为自己着想！

先生所责正是我们的弱点，而在盛怒之下，仍顾虑到怕伤了我们锐气，爱护之忱于此可见。

我离开成都到重庆后不数日，湖北老河口战事复起，归路中断，返里省亲的计划遂不果行。五月三日得先生信，希望我仍回成都。当时国立编译馆在北碚，熟人较多，我想暂留重庆，如能进编译馆最好，下学期看情形再说，乃向先生说明此意。不数日，先生来信，仍希望我能回去，但附致编译馆馆长陈可忠先生一封介绍信。我持此信到北碚，值陈馆长生病请假，友人李符桐告诉我，人文组主任

郑某心地仄狭，非中大出身，甚难被录用，且其人对于钱先生颇存忌心。其时顾师颉刚先生正在北碚主持文史杂志社与中国史地图表社，我以此情相告。顾先生也说，目前进编译馆诚不易，不过钱先生既已写信，不妨一试。但我想先生介绍信云“倘能予一位置，感同身受”，情辞恳切如此，万一被拒，大失先生颜面，所以决然作罢。顾先生曰，你研究政治制度史，不如到中央政治学校。钱先生也有此意。我想政治学校要沾上政治色彩，所以甚为迟疑，暂居史地图表社，为史学会标点《后汉书》。不久，顾先生命我在北碚修志委员会协助傅振伦先生工作。七月五日，复得先生来信说，《两汉地方行政制度》稿可能有出版机会，又云：

近又细阅一过，较三年前初稿进步极远，盼能坚持意志，
潜心孟晋，勿负私愿！

先生在千里之外，仍记挂在心，鼓励我努力不懈如此！

一九四五年春，武汉大学校友一位同乡周君在北碚之北嘉陵江岸金刚碕创办工艺班，我应邀任教。但我想如此下去，学业无法长进，极欲突破困境。因思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最能安心读书，但不得其门而入，乃异想天开，欲毛遂自荐，期能有一线希望。大约七月中旬，写了封申请书连同论文三篇，直接寄到中央研究院向傅孟真所长申请人所。此事本不抱多少希望，不想八月二十一日奉到傅先生的挂号快信，成全我的愿望^[1]。这真令我喜出望外！

*

*

*

史语所是个做学问的最理想环境，我跟先生读书时就希望有个

[1] 参看《我对傅孟真先生的感念》，刊《仙人掌杂志》第一卷第一号，转刊为本书附录二。

能长期下苦功的机会，史语所的工作正合了我的想望。因为在那种环境中，除了自己读书之外，无任何必须负担的任务，只要自己能看得开、看得远，遇事让人一步，不会有人事烦扰，可以专心埋头读书。不过史语所的高级研究人员，除了极少数为钱先生的同辈学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傅先生的学生，他们都已晋升到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而我只是个助理员，地位悬殊，年龄也小十岁之谱，一般言之，应当以后辈自处。但我很迂执，想到钱先生与傅先生为同辈学人，所以我对这辈年长同事，虽然极为客气礼让，但名份上仍只以同辈看待，以免对于钱先生有所伤害。这一点似乎显得有些倨傲，不过我对人的态度始终如一，不因自己地位日高而有改变，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了然，不以为忤！

一九四六年，中央研究院复员到南京，国共战争亦起，师生音信中断，只听说先生到了云南。大约在一九四八年^[1]，闻先生回到苏州，遂与树棠相约，联袂到苏州耦园谒候，寓宿一宵，次日先生导游苏州名园而别，时间短促，未能多谈。

一九四九年春，我随中央研究院迁到台北，寓居新竹县杨梅镇，从报章中藉悉先生已到香港，创办亚洲书院，乃去信探候，但被退回，因为无详细地址。明年冬，先生来到台北，寓励志社，我自杨梅专程到台北谒候，即居先生寓处。当时先生应酬、开会、讲演以及记者追逐，无片刻之暇，亦只看到先生健康良好，私心欣慰而已，更不暇详谈。后来先生屡次到台湾，亦只能晋谒，问候起居，不能多谈。但在一次谈话中，对于我后来治学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在撰述《唐仆尚丞郎表》过程中，深感新旧两部《唐书》各有优劣。《新书》体制完备，但文伤简略，往往因文害意，酿成很多

[1] 进入史语所后，因为结婚，家务繁杂，日记中断十余年，所以此下一段叙事，年月往往不详。

错误。《旧书》叙事详尽，但因后期史料零落，比次每误，仅就我撰此《表》时，已发现谬误或夺讹不下六百条，此外问题可想而知。清人沈炳震东甫合钞两书为一编，甚有卓识，但是详者钞之未尽，误者摘发殊少，所以我很想“本沈氏《合钞》，钞之益审，纠之益精，又广征他籍，为之注补”，俾“学者研寻，取给为便”^[1]。意欲如王先谦之于两《汉书》，对学林亦是一项贡献。只是唐籍浩繁，必须投入毕生精力与时间始克有成。但我自一九四六、四七年已开始搜录“唐代人文地理”材料，意欲从地理观点研究隋唐五代人文各方面的发展情况。这项工作也工程浩大，亦非投入毕生精力与时间不可。故此两项大工作势难兼顾，致迟疑不决。一九五五年，《唐仆尚丞郎表》全稿已撰述完成，将来去向必须即时决定。一次先生来到台北，我即以此项犹豫的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稍加思索，告诉我说：

你已花去数年的时间完成这部精审的大著作。以你的精勤，再追下去，将两部《唐书》彻底整理一番，必将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其功将过于王先谦之于两《汉书》。但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心得，这样较为灵活有意义。

我深感先生这一番话极有意义，立即决定放弃两《唐书》的整理计划，专心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至今仍感到这是正确的抉择，但此当归功于先生数言的启发。

我在史语所工作十九年中，一直秉持初入所时已定原则，自己

[1] 参看《唐仆尚郎表》序言。

专心努力做学问，一切都不计较。至于升级问题，不但不曾向所方有所要求，亦不曾表示有此类意向。我在史语所未期，曾连续三年考绩第一，第三次我未接受，推予他人，以免显得太突出。只有一九五六年哈佛燕京学社开始函请史语所派遣青年学人到该社访问时，第二年轮次应当是我，但我的英文甚差，他人不免有争先之想。因为我当时已届哈燕社邀约的最高年龄，所以不得不事先向所长李济之先生表示，也有意到外面看看。这是我在史语所十九年中，惟一的一次为自己的出处表示积极的意见。对内随缘如此，对外更不想多赚一分钱，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所以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光阴！后来不免有点知名度了，但我仍然坚持不兼课，不出席会议。先生在香港办新亚书院，获得雅礼协会的重视，自动加以协助，因此到台湾物色教师，图谋更进一步的发展，牟润孙兄就是那时来到香港的。我当然也是先生心目中要约聘的一人，并请润孙专程到杨梅乡间来邀约，但我并未接受先生的美意。其实那时我的生活环境极其困难，一家五口，每餐只有一两碗蔬菜佐膳，于情于理，都应该遵从先生意旨到新亚工作。我所以要做那样不合寻常情理的决定，主要的是自己觉得学术基础尚未稳固，一到新亚，可能为先生所重用，不能再埋头做研究工作。当时先生可能尚有些不快，其实正是笃守先生教诲，以极大的定力，一心向学，不为任何外力所动摇！十年之后我才来香港任教，先生倒欣赏我的坚持，不只一次的拿我为例勉励青年！

* * *

一九六四年，我之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任教，说来事出偶然。在这前一年的八月，好友李定一兄来香港联合书院任教，劝我也来。我非常留恋史语所的研究环境，认为是做学问的天堂乐土。其时王世杰雪艇院长到任不久，看到我连出几部专著，特别重视，超擢我为国科会的研究讲座。先敦促我领导编撰“中国政治制

度史”，经费由他全力筹措。我自度缺乏领导能力，“只是个强兵，却是个弱将”，不敢担此重任。继又要我领导编撰“中国中古史”，我仍不敢应承。在这种情形下，要说离开中研院，未免太伤感情，所以对于定一兄的建议，未能考虑。后来前议重提，我说现在正在撰述“隋唐地方行政制度”，把这部书写好了再去。一则我的地方制度史计划可告一段落，再则时间迟点，也好向院方有个交代。定一兄非常热心，认为我已意动，遂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中旬与润孙兄谈起，并告知钱先生。当月二十五日，得先生二十一日手书云“弟驾有来港之意，惊喜交并”，又说“研究所本欲增一导师名额，久欲延弟来任此职，而所请经费，至今尚未决定”。次日复得二十四日手书说“已加紧再与港府商量研究所增一导师事，如获通过，则务望弟决心前来，因穆即以延聘吾弟为理由，要求港府从早增此名额。如弟不来，使穆出言失信，此后遇其他交涉，将受影响”。我得此信，深为惶恐，因为不但王院长、李济之所长必然深惜我的决然离去，而晓田已将满十八岁，接近兵役年龄，出境也有问题。所以马上去函，并立即发一电报，请先生勿为我特向港府要求增加导师名额。二十七日再上一函，详细说明不能即时赴港的理由。不想二十九日复得先生函告，“来电已悉。惟此间为申诸研究所导师增名额事，获得意外快速之成功，务盼弟就此职名，千万千万”。最后两句并打了三个圈。同时得定一两信，一云“宾师此次大费周章，始有此一缺：若兄不就，则宾师颇难过”。一云“此事宾师系硬向中文大学特要之导师，并郑重声明，已有极佳人选”。“如兄不来，则宾师不能下台”。不数日，又收到新亚研究所导师聘书^[1]。事已至此，已无回环余地，若仍坚持不去，实在对不起二十余年来心神俱契的恩师，所以赴港事不得不就此决定。

[1] 此时新亚研究所尚有相当独立性，可自发聘书；稍迟由中文大学续发大学聘书。

既决定要到新亚，接着就是两项困难问题要解决。其一，如何向王李两位先生请假；其二，晓田出境手续。请假事，我早意识到必有困难，应当采取何种方式，能获批准而不伤感情呢？实在大费心思！而且此事宜当早日进行，万一事实已传到王李两位先生耳中，而我尚未坦白说出，反而不好。遂于三月中旬，先到李先生寓所，向他请假，并声明几点：第一，事非得已，并非我自己应征要去^[1]。第二，只是请假，将来一定会回所。第三，在请假期间，暑假中仍回所工作。第四，重要著作仍带回史语所出版。经恳切向李先生说明后，先生虽然很感惋惜，但也不好不让我请假。不过他说，别人请假，他可直接答复，但你是王院长极欣赏的人，须先征得他的同意。我遂晋谒王院长，说明不得已情形。他说“我们老一辈人总希望培植几个年龄较轻有为的人才，你与周法高都走了，令我们一班老辈人感到丧气！”最后希望我考虑，是否可缓一年。他这一番极恳切的谈话与沮丧的神情，我也黯然，感到辜负他老人家一片为公为私的美意，只好暂时拖一下，让他情绪平静下来。不过事势已发展到此地步，钱先生那边绝不能不去，所以过了些时，再晋谒院长，直至四月尾，终于得到他的同意，准假两年，并为我办理出境手续。剩下的最大问题是晓田出境事。他已将满十八岁，接近兵役年龄，一般已难出境。幸好距兵役年龄尚有四五个月，在法令上尚有可为，经钱先生恳托相关人士协助，也顺利获得批准。一切都办好了，不意突然获得先生七月二日来信云，“穆已决意辞职，惟仍留港，当仍在研究所作名义之导师，弟来正可多获从容商讨之机会。”我这时虽然有些迟疑，但也不好两头反复，遂于八月尾来到香港。明年暑天，我仍回中研院工作一段时间。一九六九年休假，也回中研院工作一年。济之先生要为我叙薪，但我婉谢，只利用哈佛所赠少量研究费

[1] 当时有些人应征，消息已传到李先生耳中，他也知道我未应征。

维持生活。后来《唐代交通图考》那部大书，也交史语所出版，当然这是我一生心力所萃的最重要著作，也不愿交他处出版。这些都是想实践请假赴港时的诺言。只是原想两年即回院供职，未能实践。那是因为两个孩子来港后，即无法回台升学。因为来港不到五年，不够侨生资格，但若回台参加联考，又一定不能录取，所以只得留下！

我到香港后，乃知先生已经提出辞职。先生的摆脱校务，萌念甚早。新亚书院虽然办得有声有色，成绩卓著。但我总感到先生天才横溢，境界亦高，是学术界一位不世出的奇才，在五十岁左右之前，迭出几部极有分量的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庄子纂笺》，皆为不朽之作。五十岁稍后，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但世局不安，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虽有述作，但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诸书远有逊色！我想兴学育才虽有功教育文化于一时，但那只要中人之资即可胜任。先生奇才浪掷，对于今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深为惋惜。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之先生在院士会议结束后的酒会上，心脏病突发，倒在会场，一瞑不视。我感到非常悲痛，一个真正学人办行政，实在不适合，因此想到钱先生亦已高龄，应当放下行政工作。自信我们师生间无不可谈，遂于三月中旬毅然作书，表达此意，认为新亚既已办上轨道，有了基础，宜可摆脱，仍回到教研工作的老岗位，期能有更好的成就。当月二十一日即得先生十九日手教说：

即日奉来书，想念之意，溢于纸外，诵之感慰。惟儒家处世，必求有一本末终始之道。穆在此办学亦出一时之不得已。惟既已作始，应有一终。此刻尚非其时，弟絨云云，穆实无时不在筹虑中也。此刻只有力求护摄之道，不使精力过于浪掷，

人事应酬已省无可省，内部只问大体，此外分层负责，亦不多操心……只是年岁日迈，精力有限，即复摆弃百事，亦恐不足副相知如吾弟者之深望耳！回顾（民国）二十六年后，此二十五年全在乱离窘迫中过去，岂能无慨于中！

足见先生在一九六二年春之前早已萌生摆脱校务之想，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不能一走了之。恰巧次年港府有意聚合三间书院成立一间大学，先生认为“应有一终”的时机已到，所以力主新亚参加，使员生各有前途，学校也能稳定发展下去，而自己则可即时摆脱出来，回到教研的自由生活。辞职后，不数年撰成《朱子新学案》，自谓为“晚年一惬意之作”^[1]。我对于朱夫子虽然所知甚浅，但观此书立论与辨析过程，无疑为先生晚年又一部境界很高而论证密实必可久传的大著作。倘若仍负责校务，绝不可能有此成就。因为一个人的精力究竟有其限度，顾此则必失彼，何况行政工作诸多麻烦^[2]，抽暇治学，时间零碎，心难宁静，探讨问题，必难深思缜密，穷其底蕴！

先生在一九六四年夏虽已提出辞职，但董事会决议，任先生休假一年，明年才真正离任。当时新亚研究所仍仿齐鲁研究所旧规，每个月举行一次学术讲论会，由研究生、助理研究员轮流讲演，先生在休假期间仍常出席论评，使我回忆起二十年前赖家院追随时的一段往事，受益不少。

* * *

一九六七年，先生迁寓台北市郊外双溪新居素书楼。明年七月以接近全票当选中研院院士。

先生之当选院士，对于中国史学界，尤其对于中研院，意义重

[1]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信中语。

[2] 就我所知，以胡先生声望，在中研院院长任内，也遭遇一些不开心的事。

大。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余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遭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论学养成绩与名气，先生必当预其列，但选出八十一人，竟无先生名。中研院代表全国学术界，此项举措显然失当，所以当时有“诸子皆出王官”之讥！

一九五六年夏，史语所出版了我的《唐仆尚丞郎表》，循例分赠与史语所有关之人文社会科学界学人，胡适之先生照例受赠一部。九月中旬，我突然接到胡先生自美国来函，对于拙作谬加推许，并提出宋鼎作《慧能大师碑》问题。自此往复七八函讨论禅宗史，我一些意见深获先生赞纳。明年秋，我获哈佛燕京学社邀约访问，到康桥生活安定后，专程到纽约拜谒胡先生。先生一向待人亲切，我按门铃，自报姓名，先生在门铃电话中听到我的桐城口音，立即高兴的向夫人说，“客人还是同乡呢！”我一进门，看到客堂、书房所有桌椅茶几上，到处横竖摆满了图书，而且很多是翻开的。先生兴高采烈的与我大谈禅宗史事，几达三小时之久。中午邀我到外面进餐后始别。从多次通信与这次谈话中，我们彼此都感到很投契。不久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先生辞职，胡先生回台继任。我想中研院院士不能尽罗全国显著学人，任令钱先生独树一帜于院士团体之外，已不应该。别人担任院长，事犹可谅，胡先生无疑为全国学术界领袖，若仍不能注意到此一问题，更属遗憾。所以我勇敢的给胡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陈述此项意见，希望他积极考虑，并很直率的说，

我此番心意不是为钱先生争取此项无用的荣衔，因为先生学术地位、中外声誉早已大著，独树一帜，愈孤立，愈显光荣。但就研究院而言，尤其就胡先生而言，不能不有此一举，以显示胡先生领袖群伦的形象。胡先生对于我的建议，深表同意，与在台几位年长院士筹议提名，但少数有力人士门户之见仍深，致未果行。一九五九年我由美回台后，胡先生曾有一次欲谈此事，又默然中止，后来姚从吾先生才将原委简略的告诉我。

一九六六年夏，研究院将举办第七次院士会议。这年春间，几位年长院士也许有了觉悟，拟提名先生为候选人。其时我已在香港，得史语所同人的信，请我就近征询先生同意。但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的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1]，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我笑着说，先生讲学意趣与他们不同，门户之见，自古而然。现在他们幡然改图，为了表示中国学术界的团结，似也不必计较。但先生终不同意。先生有时显得很天真，此刻言貌亦见天真不解世情的一面。我只好通知史语所撤销提名。到了一九六八年举办第八次院士会议，才获先生同意，当选院士，象征中国学术界之团结，也一洗中研院排斥异己之形象！

* * *

先生迁居台北后，与我常有书信往来，我亦因事屡到台北，长期一两年，则每月晋谒一次，短期几个月，晋谒次数更频，纵然只有两三天，也必到素书楼谒候。所以我们师生间的关系，并未因分在台港两地而疏远。见面时谈得多，但记录甚少，而自一九六七年先生到台北后七月三十一日第一封信，至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最后亲笔信，共凡四十四封，最后两信文字已不易辨识，故自后有事都

[1] 一九四八年首次院士选举，由各大学、各独立学院、各专门学会及各研究机构提名候选人，因为当时尚无旧院士，故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投票选举。现在想来，其时先生尚在昆明五华书院，或刚到无锡江南大学，可能根本无机关办提名手续。

由师母写信。检视这些亲笔信件，参合我断续的岁月录，值得作一综合叙说的，有下列各端：

其一，经营庭园。先生一向爱好大自然，喜欢游山玩水，从他的《师友杂忆》与本文首段述赖院与沙田寓居时代的生活情形，已可充分了解。在赖院时，先生对于灌县青城山自然环境非常向往，很遗憾的说，若果研究所设在灌县，有多好！又叹不曾登峨眉，历剑阁，经三峡，引为大憾！及迁寓台北新居后，在极有限度的条件下，极意布置园庭。所以在初期连续几封信中，一则曰，月来园中栽花果草木若干枝，“虽多是低价易得之品，无足观赏，然满园生气，欣欣向荣，亦足怡情。”再则曰，“所居小园，半年来栽培花木略成格局。”下述“古松四枝竞挺苍奇”，及其他大小花木品种数目甚详，“盘桓顾盼，大可怡神。”惬意心情，跃然纸上。又一信谈园中花木布置说，“此事亦有大学问，非急就所能惬意也。”足见先生于此颇用心思。一九六九年春先生来港，回台后来信云，“此次去港，获过新居，最为惬意。”蜗居极小，但高朗空阔，面对狮峰，稍显峻拔凌虚，苍翠有生意。先生莅临，自移小凳在骑楼观赏甚久，正见天性酷爱自然景观，故随处流露此种心情。一九七〇年偕师母游溪头，来信云，“投宿溪头林场一宵，满山杉桧清幽，疑非尘世，日昨归来，犹自往来梦寐间也。”溪头只是有原始宁谧气氛，本非胜境，先生爱好大自然，身入其地，顿有超世脱俗之感，回味无穷！由于这种心境，所以在自己小环境庭院中，特意培植花木以资自赏。自一九七四年以后，我屡次到台北，每去必晋谒，陪侍院中散步，先生一草一木历历指点，有悠然自得意。我观小园，稍见高踞，草木栽培，疏松有致，令人感到自然闲适，这正是先生人生境界。去年曾参观久已闻名的张大千摩耶精舍，谷底溪边，夏日山洪暴发，有浸灌之虞；而举目四顾，只丈尺许，群山环堵，如在釜底，地方局促，花木壅塞，全无艺术气息，以视林语堂旧居，高坡旷远、自

然朴质之气氛尚远不如，何耶？殆由缺乏书卷气，究难脱俗欤！

其二，诵赏诗篇。一九七二年九月三日先生来信，自谓“不吟诗，而好读古人诗集”，以为是“晚年最好消遣”。先是上年十二月十七日先生信云，《朱子新学案》已出版，近始寄港，惠我一部。又告诉我说“最近选宋明理学五家诗”，“藉此玩诵，聊以忘忧”。大约我在复信中提到也常读杜诗作消遣，所以他在次年二月二十日信中说：

弟乃性情中人，故能欣赏诗篇。古人论诗，必曰陶杜，陶乃闲适田园诗，而实具刚性，境界之高，颇难匹俦。杜有意为诗，陶则无意为诗。倘两家合读，必可增体悟。

又于七月二十七日信中说：

穆与弟性格微有不同。穆偏近刚进，弟似为柔退，故于陶杜各有爱好。高明柔克，沉潜刚克，正是各于自己偏处求补。曾文正特爱闲暇恬退诗，即是此故。

此论两人性情刚柔不同，爱好亦异，自是至理实情，但我实亦极服膺陶之境界，故以陶诗“归园田居”自字，只是特爱近体诗，常于郊野海滨，高歌唱诵，以抒胸臆。所诵除杜诗外，亦爱右丞闲适律诗。陶诗古体，故不常赏玩。

其三，论治学蹊径。在屡次惠示中，往往论及子史文艺及自己写作事，就中有不少提醒我治学蹊径。最要紧者，如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日信，主在论陶、杜、晦翁、阳明诗，亦及班、马、温公诸书云：

专论文与史，班不必不如马。若论义理，则所差远

甚……古人治学本无文史哲之分，如读《通鉴》……温公此书实已文史哲三者兼顾……东莱《古史》一见便是史，温公《通鉴》，史中兼融文哲。弟试从此两义参入，学问必可更上一层楼。

此谓读史治史应向高境界参透。明年二月二十三日信甚长，除谈《国史大纲》校补事外，又谈到一次讲演题为“理学与艺术”，自谓颇有所会，因云：

总之，学问贵会通。若只就画论画，就艺术论艺术，亦如就经论经，就文史论文史，凡所窥见，先自限在一隅，不能有通方之见。

此项大格局、高境界的论点，对于治学，尤其人文学诚极重要。近代治学过分在狭小范围内用功，以为可获专精成就，其实往往缘木求鱼，背道而驰，很难达到精深成果。我在《治史经验谈》中，曾郑重强调，治史既要专精，也要博通。只能博通，固必流于肤浅；过于专注精深，实亦难以精深，且易出大毛病，而不自知。并且举出若干例证^[1]。尤当纠正者，如佛教为中国中古史上之重要一环，有不少书籍。前人治世俗史，多忽视佛教书，对于当时史事自难得窥全貌。即治佛教以外之问题，亦遗失不少宝贵史料。至于治佛教史者，仅据佛教书谈佛教史，局限更大。不了解当时其他背景，以致佛教史上之重大问题往往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我在《佛藏中之世俗史料》^[2]讲文中，与论禅宗发展之背景，尝强调此项意见，今重读先生此番论议，实可视为治史者之座右铭。

[1] 看《治史经验谈》第一章《原则性的基本方法》第一节《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2] 刊《大陆杂志》第七十一卷第三期。

其四，校订《国史大纲》。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疑为廿二日之讹写）手书云：

《国史大纲》，商务以字模不清，拟予再排。……穆……欲趁此机会将全书通读一过，或有增改。意欲吾弟亦拨冗为穆阅一过，遇弟意认为当增删改动处，逐条见告，穆当酌量采用。又……或欲穆一一增写出处。其实书中似有交代。其未交代者，今欲一一补入，则颇费精神，不知弟意如何？

我对于此书之校读增补。自乐为之。但我又想起二十年前在赖家院初读此书时，曾向先生所提出之建议。深感此书虽然极有创获，但写作草率，仍存讲义形式，宜当加工，增补修饰，臻于完美。故在复函中再提出此项意见，并愿尽力协助。至于增补出处，承先生早年相告，系陈寅恪先生意见，但我并不以为然。盖此书以通识擅胜，与考证之作大异。考据之作，重在实证，必须一字一句明其来历，如无明显具体证据，必当详为辩解，为之证明，但不当议于通识著作。通识之作，尤其通史，重在综合，重视章节布局，提出整体意见。就一个时代言，须综观全局，作扼要说明。就前后时代言，须原始要终，通变今古。不在一事一物之点滴考证。核实论之，一部通识性大著作，固然也要以考证功夫为基础，缺乏考证功夫与经验，即很难提出真正中肯之通识性论点。但不能要求其叙事论说之尽合乎考证标准。即如司马氏《资治通鉴》，不能不视为《史记》以后之第一标准大著作，但错误之处仍甚多。例如卷四十四东汉永平三年《纪》，列云台二十八将次序，因为误读《后汉书》列传十二朱景王杜诸人传末云台诸将之次第，而致大误。此见《通鉴》作者之粗心，实所难谅，但仍不损《通鉴》崇高之地位。还有一层，有些大问题，只能凭作者的才智与深厚学力，提出简要的慧解，很难在有限篇幅

中原原本本加以证明。只有让看书多、程度深的读者，循此慧解的线索，自己体会，获得了解。此等处，一点一滴的考证方法，几难有用武之地，何能事事注明出处？我当时即略本此意，向先生陈述，认为《史纲》为书，叙事或略出处，不足挂怀。陈先生从考证法度指出此类小弱点，不足介意。若今日再逐句寻出处，费大事而就小功，殊不值得。与其在这些小处着墨，不如在大处加工，完成一部通体融会的通史读本。十二月十一日得先生七日的信，小字四纸约两千字，多年来信中，此为最长，详述对于此次校补之意见。认为大事增补，甚至改作，功夫很大，自觉已“少此精力”，又有种种其他考虑，而且时间亦有限，“不如一仍其旧，保留原写时模样，只就原书补原书，较省力”。至于增补出处，即采鄙见，不作考虑。明年一月十五日、二月二十三日，复有信谈《史纲》校补事。先生原则确定后，我即遵从此项原则，将所发现脱误处校出。上册发现脱误较多，并将史前部分稍作补充。因为抗战以后，大陆各地发现史前考古资料极为丰富，中国史前史已完全改观。此书既云增订出版，不能全盘不理，故据当时已发现考古资料，稍作增补。下册两宋以下，非我所长，自难多有贡献。

我此时再次通读《史纲》一过，对于先生才识，益加敬佩。二月五日校毕全书，曾作一条日记说：

此次校阅，比较仔细的看了一遍，得益不少，益敬佩宾师思考敏锐，识力过人。早年我即钦服宾师境界之高，识力之卓，当上追史迁，非君实所能及，再读此书，此信益坚。惜当时未能好好的写，只将讲义草草改就付印，不能算是真正的史著！（下文追忆三十年前赖院建议，前文已说过。）……然即此讲义，已非近代学人所写几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项背，诚以学力才识殊难兼及！

今又十八年，我的看法，依旧未变。可惜自七七抗战军兴，扰攘数十年，先生健壮的中年时代，一直不安，只成就一间新亚书院，造就不少青年，自己却未能专注学术工作，致天赋奇才未能尽量发挥，继史迁、君实成就通史大业。此实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弥补之重大损失，不知何日再出奇才，思之慨然！

其五，谈学术写作。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七日长信末段谈到其《中国史学名著》出版事云：

穆在此有“中国史学名著”一课，其课堂录音由一台大旁听生录下，据此略删润其文句，顷在校正清样中，一月后可出版。此稿在文化学院《文艺复兴》月刊先行刊载，乃颇为一辈人注意。大抵正式撰著极难望有读者，只降格作随笔性文字，则较易有人看。此诚大可嗟也！

按此信前文谈《史纲》，深感今时能读者已不多。又一信谈到《朱子新学案》，亦云难觅读者。此两书皆为先生才学所萃、不朽之作，而读者不多。《中国史学名著》诚然有不少超卓新颖的宝贵意见，为一般史学史家所不逮，但究属散论随笔性文字，非严肃精审之论著，而读者反多，故先生有此喟嗟！此点为真正学人一莫可奈何心情，我的经验更有强烈的感受。记得我在史语所的前十年，在《集刊》已发表不少学术性论文，兼有专书出版，但似并无多少读者。倒是在《大陆杂志》与《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等处所发表的不成熟、自己不重视的文章，却反而读者很多。大约正式著作，矜谨严肃，读来通常都较困难，不但理解不易，而且也较枯燥，程度弱的读者，更烦厌生畏。作者若以非研究性的态度，用简略文字表达，一般人始能较易接受。其实这种较低水准的不负绝对责任的述作，写来实较容易，只是很难谨严缜密作准确的表达，在学术水准上势必大打

折扣，难入真正著作之林，不能期其有恒久的价值。但时代如此，亦莫可如何！只得在谨严著作之余，用点时间写些较轻松的文字，以迁就读者，诱导他们渐入深境。所以学术著作固当“阳春白雪”，有高度水准，但“下里巴人”亦不能尽废！

明年二月二十三日信谈《史纲》校订事，说到惮于改作云：

一书既成，亦只有仍之。若要在体裁或内容有改进，此极费力，所以著书戒速成也。

此类语，学术工作者应当视为一大警戒。关于此点，我在《治史经验谈》第七节《论文撰写与改订》中，已有颇详之现身说法。一九八三年秋，我到史语所担任特约职位，着手整理《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对于原稿采纲目体不很满意，想改为复合体，文章将会较佳，读者亦较方便。但考虑到一百七十万字的旧稿，若全盘改写，花的功夫太大，时间也来不及。结果只好仍存原稿体式，此亦为论著改作不易之一例。

其六，激励我坚守学术岗位。一九七三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牟润孙将于秋间退休，五月上旬登出征聘广告。有些朋友早就鼓励我应征此职，就中一位在他系担任同样职位者特邀我到他家晚餐，一再促我不要放弃，说“你不做，一般人总以为你不如人”。我一直认为此一职位对于我有害无益，绝不作考虑。至于一般的人的看法，不关紧要。不想十二日唐君毅先生约我午餐，也促我应征。十四日又到我研究室来谈此事，并说新亚梅贻宝校长与学校几位高层人士曾商此事，认为此职是新亚员额，一致希望我能出任。唐先生语意恳切，我也很感动。但考虑我的才性与自己研究工作，始终不能同意。十七日并且写了封长信，给梅唐两位先生，说明我担任此职对我个人有百害而无一利，对新亚也不能有所贡献。他们

的意见，一方面希望维持学术水准，一方面阻止大学当局任意用人，使新亚失去一个重要职位。二十三日，梅校长复约我到校长室，唐先生亦在座，仍希望我重新考虑。认为讲座教授已不一定要兼系主任，行政事务可由他人负责，我任此职只是象征有个学术水准，不致影响我的研究工作。他们两位先生于公于私都极具诚意，但我仍只能恳切感谢他们的美意，不能改变初衷。因为我想，居高位，人事关系定较复杂，社交应酬也必增多，增加许多麻烦。而且就我个人言，只有牺牲，并无好处。就收入言，原有薪金已很够用，再增加，亦无必要。至于一般人所看重的名位，我自信已不必任何高级职位头衔来作装饰了！这不是我过分自负，而是觉得，若有志事功，名位权力诚不可少，但就一个纯学人而言，任何高级名位头衔都是暂时的装饰，不足重视。只有学术成就才是恒久的贡献，必须坚持。后来唐君毅先生任新亚研究所所长，一定要我挂个教务长名义，不看任何公文。君毅先生不幸谢世，我有此名义，不能不暂时代理所长，但坚持不能正式久任，而推荐孙国栋兄继之，也是基于同一考虑。而且我这个人，一向以道家自处，以儒家待人。但若做事，则心向法家，奉法有所作为。但又自知无应事之才，故只用所长，不用所短。既可保持生活闲适，稳步在学术上求长进，又可避免尸位素餐，于公无益，于己有害！

六月初，我写信给先生，谈到不应征教授之故。当月五日先生来信说：

昨得来缄，不胜欣喜。弟不欲应征中大史系教授，亦未为非计。担任此职，未必对中大能有贡献，不如置身事外，可省自己精力，亦减无聊是非。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此层所关不细，尚

幸确守素志，继续不懈，以慰夙望！

先生知我最深，所以他的意见正是我的考虑。前次我希望先生为学术急流勇退，这次先生欣喜我为学术作出反常的决定，更显得我们师生心神俱契。

* * *

一九八二年秋以后，先生已不能亲笔作书，而我在台北的时间却较多。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回台北，在中研院史语所担任特约职位，明年恢复专任研究员职位，寓南港前后两年有余。我到南港后六日，适值教师节，到素书楼拜谒。回宿舍写日记一条云：

先生精神极好，分析事理仍极能深入，足见脑力仍佳。以一个八十九岁老人如此健康，真是难得，也是得天独厚！

自后每个月至少谒候一次，每次侍坐闲谈甚久，常承师母留餐。说是便饭，实极丰厚，且具特色，风味醇美。有时别装，要我带回佐餐。

我们师生谈话，常涉诗文。是年冬，先生的《中国文学论丛》出版，惠我一册。同时某君关于某史校证的一部大书也出版。某君此书，据说用功十余年，书成数百万字，甚为自负。某君壮年成绩着实不错，我以为必不很坏，不想只就史文逐条抄列前人考证，自加几句案语，实少贡献。尤可怪者，校订六国史事，而不利用《竹书纪年》，令人骇异！先生此书虽然只是一部薄薄的讲演集，但内容丰富。两书同读，篇幅大小，内容劣优，差距如此。所以我在一九八四年一月写了一条日记，叙说我对于此大小两书的评价。其中论先生书云：

钱先生书虽只是一部小小讲演集，但内容实多精采处。论古代文学有很多独到见解，有些深获我心，但我说不出来。也有些处我还不能懂，不能作评。尤其元明以下，我更不能领会，因为我只看了些一般文学史的通俗意见，自己并未看当时人的诗文集！

是年五月十三日晋谒，又谈到唐代诗学极盛的背景，先生曰：

妓女歌唱可能是一大原因。唐代官私妓女均盛，凡公私宴集，恒有歌妓娱宾，所唱往往为诗篇，宾主即席吟诗，可能即付她们歌唱，被之管弦。歌妓唱诗，犹如今日大众传播之电台、电视台，以此播之四方，这样诗人易出名，人亦群趋为诗。惟此种风气，不如始于何时？

我曰，大约南北朝已有端倪，如南朝“吴歌”“西曲”，往往即供歌唱。后检《梁书·贺琛传》，正见南朝公私歌妓舞女之盛。

又一日，先生曰，“可惜年轻时代未学做诗，吟诗是老年好消遣。”我曰，做诗很费功夫，先生若会做诗，必然花费很多时间，即不能有现在这样多的著作。先生以为然。

闲谈中亦偶评鹭古今学术人物。先生对于任何事，标准都高，论古今人物亦不例外，故不轻易推许。我则比较迁就现实，不以最高标准论人，有几分成就即肯定他几分，所以总是抱着乐观态度。一日，先生曰某君毫无成就，而颇有名气，轻易取得院士。我曰，此君其实天分颇高，根柢也不错，只是懒惰，所以眼高手低，不能有所成就，亦甚可惜！但他与人谈话，往往极能得体，有风趣，所以人际关系很好。先生如与相处，定不讨厌。先生笑笑。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我趋素书楼谒候。那天先生精神极

好，谈话亦最多，我记录了两千多字。主要内容为谈论现今史学界。先生非常关心学术界情形，他感到台湾学术空气不够浓厚，深为叹息。我曰，目前台湾三四十岁的青年学人中有不少可造之才，也知奋发努力，可能很有希望。先生感到欣慰。

又在此稍前，我接受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邀约，讲授一门“中古史专题研究”。今日将此事告诉先生。先生极感高兴，说：“应该讲讲，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究该如何做了！”我当时感到先生未免把自己学生看得太高，学校教授很多，何至如此！但后来想想，若从某一角度说，先生的话也不无道理！事缘一日，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史语所同事黄宽重先生，他刚从韩国访问回来。据他说，在韩国见到几位曾留学台湾的青年学人。他们抱怨说，到台湾留学，本想看看中国人如何治学。但不幸，所听到的不是美国式的方法，就是日本式的方法，仍不知中国人传统的治学方法。他当时告诉他们，应当看我的《治史经验谈》，所以他拟寄几本到韩国去。又我在台大讲课时，有七八位相当成熟的中青年学人经常来旁听。学期结束后，其中一位说，“从来未听过像先生这样讲课！”他是台湾名大学硕士，美国名大学博士，而有此论调。我后来想想，或与韩国青年有同样感受！所以先生上面一番话，若以“中国传统”作解，却不无道理！我所体验到的中国人传统的治学方法，是既要精深，也要博通，而基本功夫不全在用功读书，尤要从人生修养做起，始能真正达到此一境界^[1]。

又在同一次谈话中，先生问我“你到香港教书，现在想来，是得计抑或失计？”我曰，自觉得计。若不到香港，《唐代交通图考》当已写成，但可能无现今之精密，因为能看到的新材料较少，地图也较少。至于整体学术规模更不会有现今这般大。因为史语所工作，

[1] 参看《治史经验谈》第九章《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无外界压力与刺激，势必愈做愈专。而教书不能专讲自己研究的专题，必得扩大注意面。且在授课时，往往刺激自己，涌现新意见。所以若一直在史语所环境中，我的学术规模必然较小，境界也可能较低。先生以为然。当天晚间，廖伯源来访，我提到与先生的对话。他说若非先生在史语所专心工作二十年，不可能有深厚基础，后来也就难可发挥。他这番话也很有理。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我与余英时、何佑森应钱师母之约到素书楼晚餐。当日先生精神极好，席间笑着说，你们三人都是安徽人^[1]。英时曰，可谓“吴学入皖”，相与谈笑极欢。桌上菜肴除了师母亲自烹饪几色菜之外，何太太也做些安徽菜共赏。何太太照顾佑森最为体贴周到。她不是安徽人，特意学会皖式菜肴，所以佑森随时尝到家乡口味，为同门所称羨。餐后师母出示大陆家人托人带来武夷最上乘茗茶一小瓶，约一二两，供大家品尝。此茶采自朱夫子所种茶树。想来当是朱茶遗种，今只存两株，每年产量绝少。今日尝试，果与凡品不同。其品尝法，用极小壶泡好，以极小杯（如酒杯）品尝，每次半杯，约一小口。茶液呈清黄，微带绿色，甚清丽，每人饮了四次，总共只约中等茶杯的半杯量，但回宿舍竟睡不着，刺激性之大如此！唐人书说，北方饮茶之风大盛，导因于禅僧学禅，务于不寐之故^[2]，可能有相当理据。

是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到素书楼谒候，藉悉先生上月尾轻微中风，现已较好，精神仍颇佳。其时我的《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册出版，史语所赠先生书已收到。先生双目失明，垂询全书写作规模，我略陈分卷分篇大致情形，现刊前五册，约一百六七十万字，后三册尚待续写。先生过去已看过我考唐代交通路线论文多篇，知我写

[1] 佑森为巢县人，我是桐城人，英时是潜山人，但青少年时代多居桐城。

[2] 参看《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

作方式与水准，非常高兴的说，“很久无此大著作，可惜我已看不见了！”言下甚为感慨。我怕久坐影响先生精神，约一个半小时即辞出，好让先生休息。

先生对于我的论著，一直很欣赏称许，此为最后一次。我虽迂鲁，为文亦只平实，无甚高论。而有幸侧闻不少前辈学人的称誉，但却未闻先生向同门以外的学人为我吹嘘。一次我推荐一位好友，也是先生最欣赏、最期许的学生，当选院士。事后我拜见先生，先生并不感到高兴，淡然的说“迟十年更好！”可见先生对于自己最欣赏的学生期许极高，不想其早日向社会崭露头角，怕影响其将来的发展。此与台湾一般前辈学人极力提拔得意的学生，使居要职，往往影响其学术前途者，大不相同。此等处亦见先生意趣宏远，与时辈迥异！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下旬，我自中研院退休返港。明年七月二十六日，为院士会议复到台北。次日晋谒，先生健康已大恢复，饮食口味仍颇好。去年英时兄与我在素书楼见面时，关心我退休后的生活，拟向有关方面建议，留我长期在台讲学。我很感谢他的美意，但对他说，“我的生活尚过得去，请放心，不必为了我的事，背个大人情！”先生也是一直关心我的经济环境，此次院士会议结束后，我于八月八日再到素书楼辞行。先生曰，“听说此间仍想请你再来，不要疏远此间关系。”我曰，诚有两处邀约为特约讲座，但我不想应聘。因为当局法令，七十岁退休，即不能再有长久固定的工作机会，一两年的特约职位，虽然位尊俸厚，但非经常性，即是生活随时都有问题，对于我的研究工作与精神生活都有损害。我在香港有自置寓所，环境颇佳，新亚研究所虽然待遇微薄，但自己也另有一点经常收入，已很足够支持我的俭朴生活，所以不想再动。先生了解我的个性，知我经济环境并不太坏，自是心安。又有些朋友关心“九七”后的香港。我对于香港前途一向乐观，认为不会有什么大动乱。

而且以我这样一个无籍籍之名的纯读书人，日常只到市场买菜，到公园郊野散步，极少讲演，也绝少出席会议，在香港更没有一点社会地位，将来纵然政局有变，想也不会遭到大的灾难。我与陈寅恪先生，时代环境不同，个人情形也不同。陈先生名气太大，为一派政治人物所景仰优遇，自会遭到另一路人物的嫉视。树大招风，自古明训！

先生不但天生奇才，体魄亦极康健。但自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只身避地南迁，一直过着单身生活。当时公私经济情况都很坏，大家健康都受影响。记得在赖院时，先生年近五十，所内研究工作，所外奔波讲学，皆甚勤奋，而起居生活与青年同学完全一样，不但营养不够，其他一切生活都无家人照顾。抗战胜利后，此种单身生活一直沿续，几二十年之久，势必影响健康。加又关怀国事，负责校政，内外诸事不免有可生气处，而又闷在胸中，引致胃病，备受困扰。直到一九五六年在港成婚，生活始上轨道，得到改善。后来又患青光眼，视力日弱。先生自述，晚年著作全恃夫人始能成稿。其实其他一切生活都唯师母是赖。先生在港在台期间，我与家人常到钱府谒候，看到师母照顾先生生活无微不至。一九七〇年，小女晓松曾为托福考试到台北居钱府一段时间。此前此后亦屡到钱府谒候，深获老人钟爱，前后七八信都提到她。她考后回港，先生来信说，“彼骤然离去，却不无寂寞之感。”一次她自台回家说，“太师母把钱公公当做孩子照顾！”我与其母都觉得她很聪明，一语形容尽至。一日我笑着向先生说，“先生奋斗一生，艰苦备尝，但晚福不浅，是人生最大快事！”先生得意的微笑。

先生得师母全心全意的呵护，续得三十年稳定幸福的晚年退休生活。只是两目失明，为唯一缺憾。我自一九八五年冬由中研院退休返港后，仍因人情难违，不得不几次到台北走动，纵或只停留两三天，亦到素书楼谒候问安。大约自一九八七年后，已感到先生精

神虽然尚不算坏，但已常常生病，体况大不如前。师母遍访名医，力图挽救，极尽苦心。同门诸君也都感到有些忧虑！

* * *

我自退休回港后，虽然仍几次到台北，但自念已入老境，不欲再应聘到台担任特约职位，只想集中心力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计划。但去年十月仍应邀到东吴大学讲学三个月。此缘于两种考虑。其一，雷家骥在东吴任教，两年多前，学校请他负责历史系系务，雷君迟疑，征询我的意见。我想学术界能读书的人多，兼能办行政者很少，雷君即其一。行政也需有人办，所以赞成他接受此项任务，可能有些作为。他接任后。果然很有闯劲，但屡屡希望我能到东吴作短期讲学。我想前已怂恿他主办系务，也当给他一些支持。其二，更重要的，先生已年迈多病，枯居寂寞。自一九七三年以后给我的信中，屡次显露此种心情。如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信云：

七月能回台，获一畅晤，大以为望。长日杜门，寂寞之甚。偶有来者，皆不谈学术。偶有谈者，亦无法接口。目疾又不能看书，握笔心情可知！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最后一封亲笔信云：

弟驾此来，能多获畅晤，一抒积念之悃。人生快事，宜无过于此矣！

读此两信，可想像先生晚年心情的一面。又一次晓松自美国回港，取道台北，谒见太老师、太师母。先生从她谈话中得悉我不久将去台北，告诉她说“教他快些来！快些来！”足见急切希望我去看他。我想先生晚年心情如此，殆由于两种原因：一则人到老年，往

日友朋渐见凋落。台北虽有几位北京大学老学生，前几年尚结伴向先生拜年，后来也都年届八秩，步履维艰，难遵旧规；能常到素书楼者，只有少数新亚或更后期的学生，年龄相差稍远。二则先生学养博通，天分太高，境界亦高，谈到治学，一般人或许多难领会。我与论学，也有局限，如经学、理学，及宋元以下集部，我所知极浅，所以先生也很少提到此类问题！我既了解先生晚年心情，近年健康又渐退化，东吴校舍近在素书楼左邻，而小菊又已离港回美读书，愚夫妇行动已可自由，所以决然应雷君邀约，到东吴作短期讲学，以便常得趋侍。

到校后，居在后山半坡教授宿舍，有山林风味，下行素书楼只数分钟步程，故得每周谒候。其时先生虽已精力大衰，有时常见浑噩，似无所知。但有时又似颇清醒。例如一次问我的讲题，如何讲法，外面有些什么人来听？我讲“中国政治制度史述论”，有时请教先生意见，偶尔也能清楚的指示。但不论先生神智如何，我都侍坐颇久，一则可能略解先生枯寂，一则也警觉到机会已不会很多！

我与内子每次到钱府，皆承师母留餐。今年一月课毕，二十日离台回港。行前一天，已到钱府辞行，并已承师母治肴饯别。次日临行，整装已就，尚有时间，再到素书楼看先生一次。不想先生当时神智极清醒的问我两个有意义的问题。先问，“我这样大年龄了，你想该不该仍写文章？”我说，“只要有意见，仍当告诉邵小姐或秦小姐写下，有一句记一句，供后辈作参考。但不必费神写成整篇文章。”继又问，“现在学术界对于我治学的看法如何？”先生此问，可见仍很关心自己著作对于学术界的影响。我说，“三四十年前，考证派正盛，先生独持异议，强调通识的治史方法，与时风迥异，所以当时虽然一般社会人群与部分青年学人心向先生的论点，但主流的史学界却似颇抗拒。现在潮流已有转变，观点与方法论渐与先生接近。最近趋势，更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来治中国史，观点虽与先

生不同，但重视有系统的通识，却与先生路线暗合。所以有不少讲思想史、讲方法论的青年学人对于先生极为推崇。”他高兴的微笑。不想那已是最后一次的论学！

我讲这番话都是据实陈说，无一虚语。现在学术界对于先生学问的重视，大家都可目睹。但三四十年前，情形并不一样。当时学术界只重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与《近三百年学术史》，对于《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则不少有名学者颇为忽视。因为站在考证立场，其中诚不免有些可议处，这是原因之一。再者，先生以一个中学教员骤跨入大学任教授，而对于当时学术界当权者，毫无逊避意，勇悍的提出自己主张，与相抗衡。此种情形，只有顾颉刚先生的胸怀雅量能相容忍，一般人自难接受。好在先生讲学深得学生欢迎，而北京大学自蔡元培先生以来又有容纳异议的传统，否则很难讲得下去！后来离开西南联大，据说仍与此点有关！此后先生声望益高，超出等伦，更足招忌。所以学派对垒，也有人际关系，思之慨然！

今年七月初，中研院举办第十九次院士会议，因为畹兰要作健康检查，提早于六月十二日到台北。十六日谒候先生于台北市杭州南路的新迁寓所。六月尾，晓松率小菊自美回港，中经台北，下机与我夫妇会合，内子率她们两度谒候先生与师母，留存学术关系的四代合照，我因事未能同去，今日思之，深感遗憾！七月二日至五日要出席会议，六日即须回港，所以赶在会前一日再到钱府谒候。日记中又说，“先生面色极佳，头发生多了，而且黝黑，一副健康形象。”不想六十天后，五十年来所追随问学的恩师即与世长辞，那次拜别竟成永诀，思之泫然！

* * *

遭此剧变，连类想起冯李两师。冯先生离校后，即无消息。至于李先生，前文谈到，一九四四年我应先生之召，将到安徽学院任

教，因时局变化，滞留重庆而未果行。及我随中研院复员到南京，他仍在安徽省政府任职，邀我任文献委员会秘书，协助他的工作。我深惜中研院的环境，故未应召。迁台以后，遂失联络。我到香港后，看到一九五六年出版之《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报告》，序文为先生所写，其时任安徽省文物局副局长，主持发掘工作。有一次我参加安徽省旅港同乡会，据一位同乡说，李先生已于文革期间或稍前被诬陷，以莫须有罪名遭到清算，屈辱而终！想起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知识分子，爱国热情有余，而认识不足。我在中学听先生讲课，感到先生忧国忧民、民胞物与的民族感情极为浓厚，憧憬着民主自由、经济繁荣的升平盛世，与当时一般民主人士皆不满现实，致遭浩劫，思之慨然！

* * *

我的早期师长多已谢世了，影响我治学最深远的恩师宾四先生今亦以高龄隐入历史人物中，而我的生命也接近尾声。平生不信有天授的命运，深信命运当由自己把握。我的人生历程诚然也有很不如意的一面，但就学术研究而言，在这条道路上，可谓极为幸运。有些固然可说是由自己把握着的，但有些也是偶然的机运！

在我求学过程中，先得到溶生师的教诲，使我从数学的学习中，磨练成思考问题能深入、能细密的能力与习惯，不致思路混乱，或凭虚妄想。继而得到则纲师的引导，广泛的吸取新知识，境界得到开阔，对于史学也渐有宏观的通识倾向。继又得到宾四师长期的琢磨，虽然始终自觉才气不够，但总想朝大处、远处、高处看，可谓“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最后有幸进入史语所。在当时，这是历史考证学的中心，在意趣与方法论上，虽与李钱两师所揭橥者不同，但正可长短互济，而且少年时代数学训练的基础正可大派用场。所以此后我的学术论著，可谓是前此的训练与史语所的传统两种不同的取向，糅合融铸而成。基本上，一点一滴的精研问题，不失史语

所规范。但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所以每写一部书，都注意到问题的广阔面，因此规模甚大，但仍扎实不苟。记得二十几年或三十年前，有一位年长十岁的朋友很坦白的说，他很佩服我能不断的写出大书，而他自己却苦于无问题可做。我想实际上的差别，只是我来史语所之前有一段通识性的训练，看问题总从大处、广阔处着眼，此则多为李钱两师的影响，而宾四师的影响尤大。又一次黄彰健兄说，“你在史语所，但所写论文与史语所一般同人不大相同。”他究竟是学术史的行家，故能一语道破！

回想起来，我一生的治学历程可谓极为幸运。若非先在小中大学得到三位师长的薰陶，尤其钱先生长期亲切的鼓励与教诲，影响最大；又若非有史语所二十年的安心研读机会，则今日学术风貌必然大不相同。这一切的前后机缘，都是幸运，我只是能即时把握了这些宝贵机缘，冷静沉着、心无旁骛的持恒努力而已。李济之先生曾一次很感慨的说，“你是充分的利用了史语所的环境！”此语诚然，但若非先有机会汲取三位师长的教诲，相信在学术层次上，也必不一样！

我虽然受到宾四师的影响极大，私人感情似也最密切，但在学术上，却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为先生的学问，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所以重要著作除《国史大纲》外，如《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近三百年学术史》、《庄子纂笺》、《朱子新学案》都关乎学术思想，晚年自编文集，也以学术思想史论文为最多。至于制度与历史地理只是先生学术的旁支，所以这两方面的著作不多，也不很精。拿先生自己的话说，这两项学问只是他治史的两只脚，藉以站稳而已，不是主体。我在学术研究上，虽然极想达到通识境界，进而贯通全史，但始终只以制度史与历史地理见长；经济、社会与民族亦较注意；至于学术思想，不但非我所长，而且是最弱的一环。先生门人长于

学术思想史、各有贡献者甚多，余英时显最杰出，我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而已。

宾四师对于我的治学虽有极大影响，但我也未完全遵从先生的意趣，一步一趋的做到。例如前述赖院时代，先生希望我走通才第一流路线，我仍胆小，走了专业的第二流路线。再就历史地理的研究具体言之，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先生信云：

从地理背景写历史文化，此是一大题目，非弟功夫殆难胜任。如能着手撰述，实深盼望。际兹学殖荒落之世，吾侪筚路蓝缕以开山林，只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凿险，待之后来继起之人，不必老守一窟，尽求精备也。不知弟意以为如何？

或许先生知我有“老守一窟”、“探幽凿险”、“尽求精备”之病，所以一开始就告诫我，只当从大处指出一大路向，不必尽求精备。但我依然故我，仍从低处做起，虽然悬了一个“国史人文地理”大目标、大纲领，讲稿百余万字，另加写录史料不少，但实已无力完成，深负先生的期望！

不过先生并不以我不能完全跟进为憾，对于我的每一部著作都很欣赏，无疑为我治学的一大精神支柱。现在先生遽归道山，我的心情不免沉重，感伤不已！不想在这同时，又发生另一不幸事。十一月尾我正撰写此文期间，消息传来，老友杨联陞莲生兄已于十六日在美病逝，去宾四师隐归道山不到八十日！

* * *

莲生兄为我一九五七年到哈佛访问时开始建交的老友。当时中国学人在美国任教者不如现今之多，中国学人访美者，哈佛几为必到的一站，也必拜会莲生。莲生兄嫂好客，中国学人留访哈佛时间较长者，更几视杨府为俱乐部，假期佳节，常去聚会。杨夫人盛肴

招待，极为热闹，使朋友们忘其异乡之感。记得杨府经常置一签名簿，友朋第一次来者，例签名作纪念，我到时已满八九册，足见访客之众多^[1]。莲生天分极高，学问极博，自己谦称杂家，其实他的学术触觉灵敏，境界很高，常能贯通各方面的知识，提出新颖论点，岂只他自谦的“杂货摊”而已！他通晓数国语文，凡中外学人讨论中国学术问题，他发现谬论，必直言批驳，不留情面，为国际间公认的汉学批评名家。莲生亦自谓为“汉学的看家狗，看到人家胡说，必高叫一声”，不啻为胡说的一股吓阻力量！但对于我的论著，一直只有赞誉，从无微词，并且传达国际学人的观点。一九七一年一月四日来信，拟推荐我为高级访问学人，再到哈佛研究一年。其时岳母病重，不能抽身，而且我刚休假一年，短期内不能再有休假，故未能去。他在这封信中说，“我兄对于唐史及魏晋南北朝史之贡献，充实而有光辉，确已超迈同辈，连大陆及日本学人在内。”其后又屡次在公众场合为我延誉。我自度“充实”可以当之无愧，但“光辉”尚不敢自信。一九八五年，我的《唐代交通图考》出版。明年一月十六日莲生兄来信，有打油诗云：“体大思精多创获，严公政考早流传，新编又见追双顾，管领方兴数百年。”朋友捧场，游戏之作，固只博一粲，尤其亭林宏博，一代宗师，余何敢望！但我的英日文化程度都未达到真正能看书的水准，对于国际学术行情所知极少，常恐闭门造车，未必能出而合辙。以他对于国际学术行情之了解，而对我的论著作如此高度的评价，虽不尽实，但对于我自是一大鼓励，增加我的勇气与自信。所以他也是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一大精神支柱。

[1] 记得有一次，我与周法高、李定一等数人，到杨家玩，他们要打麻将，只有我一个人不会玩，被罚要做一首麻将诗。我与钱先生一样，虽爱诵诗，却不会做诗，只得胡诌打油四句：“初观方城，南北西东，九丘八索，乐在其中。”当年一班朋友在杨府起哄，附记此小掌故，聊存鸿爪！

一九八六年夏，莲生与我都到台北出席院士会议。一日告诉我说，“我去看了钱先生，谈到你。先生说你是专家之学，我说你现在已不只是专家了。”我想先生与莲生的话都很正确。莲生以现在一般标准论人，我诚然已相当博通，不专守一隅。先生一向标准极高，希望我更上层楼，故持论不同。自度我的基本功夫与成就诚然只在制度史与历史地理几部专著，虽欲再力争上进，但已强弩之末，诚如五十年前先生警惕我，“纵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历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一语定我终身，何其神耶！莲生传述他与先生的对话犹在耳际，不意八十日内，良师益友一时俱逝，使我顿有孤单寂寞之感，痛何可言！

记得宾四师曾有一次谓我曰：“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此论近似诡异，但想起来，确有至理。现在宾师、莲生的言行状貌历历在目，我则不但顿失两大精神支柱，而且我留在他们两人心目中的形象意趣已完全幻灭了，是犹我已向死亡迈进了一步，岂仅孤单之感而已！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初稿，时去宾四师谢世一百又七日。同月三十日再稿，一九九一年一月十日增补，承廖幼华女士誊录。五月二十八日校订毕功，时寓南港中研院新落成学人宿舍。十二月十四日清校，最后定稿。

附录一

我与两位王校长

一九六九年十月尾，我自香港归来，适逢校友集会，赵保轩、徐叙贤两位学长促我写一点在校时期的回忆录，我一直迟迟未能应命。一方面是由于疏懒，一方面也是因为文思滞涩，写不出来。以一个出版量超过四百万字的人说是写不出来，似乎是言不由衷。然而在我，实在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平日所写全是研究性的论文，根据材料去推论判断，习惯了，不觉得难。但要凭空写一篇散文，却就感觉殊不容易。何况我这个学历史的人却不注意自己的历史，没有养成经常写日记的习惯，加以记忆力很差，过去的事只是依稀仿佛，所以更无从下笔。但看到各位学长的长篇回忆录，勾起我三十年前在校时期的生活情趣，总也想勉强写一点凑凑热闹。

今年四月初的一个早晨，收到《珞珈》第二十六期，是为祝贺雪公校长八秩寿辰而编辑的。我因为不知道这期出版的特别意义，未能写一篇恭祝校长的嵩寿，衷心感觉十分歉疚。事有凑巧，当天下午历史语言研究所开所务会议，决议出版《庆祝雪公院长八十岁论文集》，我这才有了弥补内疚的机会。现已缴卷，大约是第一个提供论文的祝贺者吧！

后来又接到叙贤学长的通知，为《珞珈》第二十七期催稿，适当雪公校长刚刚摆脱最高学术职位，我想就此写一点我认识他老人

家的经过，也谈一谈我对于王抚五校长的认识，并且表达我对于两位校长的感念！

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我在中学毕业，就与几个同学结伴到武汉，向三大学（中央、武汉、浙江）联合招生会及中山大学招生会报考。我在中学时代，喜欢看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书，希望从人类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当时中山大学在人类民族学方面表现的成绩比较好，所以原想以中山大学历史系为第一目标。但一到珞珈山，看到武大校舍的宏伟壮丽，兼具幽静自然之美，就把我的精神吸引住了，改变意志，以武大历史学系为第一目标。录取入校后，住在那样古典式的宏伟辉煌的建筑中，感觉无比的兴奋，也加强了我对于学术追求的信念！每读中国史，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大兴土木，建筑咸阳；萧何在天下未定之前即创建未央宫，极尽壮丽；隋文帝舍弃长安旧城，另筑新都大兴城（即唐之长安），规制的整齐，规模的宏大，都非迄今全世界任何都市可与比拟（包括东京与纽约）。秦始皇的评价姑且不谈，但萧何与隋文帝都是节俭的政治家，何以要这样不惜民力呢？细想起来，此中极有深意。国都为四方观瞻所系，秦汉刚由列国纷争归于一统，隋代也是中国分裂三百年后的初次统一时代，首都的宏大壮丽，对于四方的向心力极具凝聚作用。一个大学为国家最高层次的教育机关，在建筑方面实在应当要尽可能的达到高度的宏壮水准，这样也可以增高青年学生的责任感与自信心，无疑的这也是一种基本的精神教育。武大建校在两座山上，濒临东湖，环境优美，建筑伟丽，就当时中国建筑而言，无疑的已达到最高水准。后来慢慢知道，这都是前任校长王世杰雪艇先生一手擘划树起的规模，当时就叹服雪公的气魄与远见，非常人所能及。再后来又了解到，那些建筑物大多为雪公向各方面奔走呼吁获得捐款而兴建的，并非全由教育部拨款所兴建，这更显示创校的艰难与创校者的能力了。自那时起，雪公校长在我心中已有了深刻的印象。但

直到来台以后，每年一度开校友会，始能瞻仰他老人家的风采，可是仍无缘面聆教益。

一九六二年五月雪公校长接长中研院后不久，大约是看到我刚出版不久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一、二册（秦汉之部），颇为欣赏，约我谈话，询及我的出身，才知道就是他自己一手创建的武大学生。当时老人微笑，也许是感到相当快慰吧！后来屡次约我谈话，备极关怀。有些主管虽然对于我的成绩也相当了解，但他们的观念是“权利要自己争”，而我的禀性，只要生活可过，有书可读，一切听其自然，绝不愿积极的为自己争取什么。而雪公校长每当关键时机，论成绩应有我一分的时候，总没有忘记我。但似又因为有师生关系，不便直接处理，往往兜着圈子，间接的达成他的意思。这是使我非常感念，永远不忘的！但是愚鲁的我，却有些事实在辜负他老人家的好意！

就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校长希望我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他愿意全力支持。但我考虑结果不敢写。因为当时我虽然是在写《地方行政制度史》，但实际上的兴趣早已转移到历史地理方面去了，要想兼顾两方面实在不可能。而且我的写作习惯，纵然只是一篇论文，立意至少也在三、五年之前，慢慢搜集史料，然后一气完成。要写一部大书，限期完成（向公家提出计划一定不能太久），我实在毫无把握。后来校长希望由研究院领导，仿英国《剑桥历史》写一部《中国通史》。上古史部分已由李济之先生承诺，领导编纂。至于中古史，因为我平日发表的论著不出秦汉至隋唐范围，就目前研究院同人而言，我不能辞其责，所以校长要我领导中古史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无论做得好做得坏，只要编成，都可以享大名于一时，但我仍然不能体念他老人家这番美意，来担负起此项任务。我之所以不敢负起此项责任，原因很多：第一，这项工作要邀集国内外很多学人来共同努力，而我毫无行政领导能力。我常说，我在学术研究

方面是个“强兵”，但不是个“良将”。自己做工作，自信是个标准工作者，如果领导他人，不免有联络协调开会应酬及文书处理等等麻烦，我平日书信日记都懒得写，也常常几天不说一句话，如何能做领导工作呢？第二，集体工作本身就困难。中国史学史上最成功的集体著作当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虽然是几个第一流的学者合作编辑而成，然而首尾呵成一气，文章风格一致，如出一人之笔。那是因为司马光以旧相之尊，又是当时文章宗伯，为大家所心服，所以底稿虽多人撰写，但定稿则出司马氏一人之笔，所以能卓绝千古！现在写通史远较九百年前为难，以目前客观环境，纵能勉强凑成，但内容势必不能连贯一气。不但不能一气呵成，而且必将各持所见，矛盾重重，只能算是一部较有计划的中古史论文集，不能算是一部中古史。所以到时纵能缴卷，也等于没有缴卷。第三，我自己的工作实在太繁重，照我多年来已定的计划，非再写三四百万字不能解决；若再承担另一重大工作的领导责任，实在绝非我的能力与精神所能负荷！这次休假回院，校长又旧事重提，屡次告诉我“事在人为，并无不能解决的困难”，但我仍然鼓不起那分勇气。一项工作的开始就没有信心，那将不可能做得好。如果现在勉强承诺，将来把钱用了，而拿不出满意的成绩，那将更辜负老人的知遇！所以终于在惶恐的心情下违背了他老人家的美意，这是我感到十分愧憾的！

雪公校长是一位有气魄有冲劲的创业长才，而王星拱抚五校长则是一位善于守成的良才。抗战军兴，迁校乐山，那时期的同学大家都称抚公为“王菩萨”，大约觉得他是位老好人，具有菩萨心肠吧？抚公每天乘黄包车到文庙办公，在车上正襟危坐，道貌岸然，遇到同学向他敬礼，总是微哂作答；那种肃穆慈祥的面貌与表情，多少也让人加深“菩萨”之感。在这里我想提出几件与我有关的事，透视他老人家办学的态度。

我们那一班历史系人数下多，但对于老师的教课却非常挑剔，尤其是我的好友钱树棠，性情生硬固执，有时弄得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教授们对于我们这一班多感到头痛。系主任方壮猷先生的“宋辽金元史”，前后各班都开课，但却自动的没有给我们讲授。有一次且在“史学方法”的课堂上愤愤的说：“衮衮诸公十年以后都将是大学教授，就知道也不容易！”新聘的教授更要被挑剔。记得有一次请得一位老教授徐光给我们开“秦汉史”与“三国史”。听说他历教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颇有名气，同学们也很高兴。但一经开课，他倚老卖老，好像只有他读过很多书，我们都一无所知！可是他所讲的，不过就《通鉴纪事本末》摘要演述而已，而且有很多错误。听了两堂，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错误十几条，连同钱树棠所写一篇呈文，经全班同学签名送呈校长，这位老先生就此离开了。同时，我们又常要求学校聘请某人某人，学校也都尽可能照办，如钱穆宾四先生到母校作短期讲学，就是一例。这些都可看出抚公校长对于教授的进退，真能做到优先考虑学生的意见，这是今日大学所绝难看到的！恐怕学生也无此要求！到高年级时，树棠与我还做了件荒唐事。我们觉得学校高层次人事不够理想，将来毕业证书由他们签字，不光荣，希望请朱光潜孟实先生出任教务长。是一个冬春的星期日早晨，两人拿着呈文到校长寓所去晋谒，似乎是先将呈文送进去。抚公怒气冲冲的走出门来，严厉责斥我们一顿，说“这是学校行政，你们管什么？你们要请某人担任某职，人家就听你们安排吗？”把我们赶出竹篱大门。但事却出乎意外，后来果然发表朱先生担任教务长！可能是他本有此意，两个傻学生的要求不过加强其决心而已！回忆起来，少年时代荣誉感真太强烈，做出这样荒唐的傻事，此刻写来也觉好笑。无怪当时有些同学都称我们是两个“书橱”，只知装书，不懂世事！

民国三十年毕业后，钱师宾四惠函召我到齐鲁国学研究所继续

读书。三十三年春天，因为想回家看看年届八十的老父，走到重庆，中原战事复起，襄阳老河口通道断绝，只得停留下来，在北碚做事。三十四年春，抚公校长来到北碚，我带着出版不久的长篇论文《两汉郡县属吏考》去看他。他很高兴，告诉我说，他计划下年度每系设立一个“研究助理”的名额，届时我可回到母校历史系专心读书。这正是我所梦寐以求的职位，不想他回校不久就辞职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然是个理想读书地方，但我没有任何人事关系可以联络得上。有时异想天开，想扮演一次毛遂自荐，但又无勇气。后来曾祥和女士说，傅孟真先生为人特别，找人介绍未必能成功，自己把文章寄给他看看，可能会成功。我急切希望有个读书环境，遂决定一试。大约是七月中旬，就选了三篇论文寄给傅先生。不久傅先生果然复信，允许我的要求，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信中又说，抚五先生前曾有信推荐，但无著作，无从考虑。这更出我意料之外！抚公校长在辞职前后百端纷忙中，居然还记得我这个远隔千里之外的一个学生，母校没有机会，仍然希望另外安置在一个更适当的地方！此番爱护的热忱，实在使我感动万分。但后来也就一直没有拜谒的机会，此番盛意只有铭肌刻骨。今日走笔至此，仍不禁涕泪交流，久久不能自抑！

我生平愚鲁迂拙，但却得到不少前辈学人的鼓励，两位校长更是备极爱护。我少年时代欢喜读书，一方面是兴趣所在，一方面也是自己有相当抱负。我违背雪公校长的意旨，没有负起中古史编纂的领导工作，绝不是逃避责任。相反的，是要完成另一项已定的目标。我自小学时代即对地理有兴趣，自民国三十六年开始搜集“唐代交通”、“唐代人文地理”方面的材料，后来又扩大范围到全部“中国历史地理”。现已累积史料近十万条，并已开始撰述。这三部书是逐步扩大、由专到通的连锁计划，意欲从地理观点讲中国历史。这虽非雪公校长指定的题目，但只要有真正贡献，他老人家亦必乐

观厥成。我的身体不算很坏，近几年来又听取校长的教训，每天走路，增进健康，相信还有二十年可努力工作，当能达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为中国史学界开辟一块新的园地，也希望以此项成果报答两位校长及其他师长前辈的知遇之恩！

一九七〇年夏初稿，原刊《珞珈》第二十八期，
转载《学府纪闻》武汉大学卷。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增订重刊，时寓中研院学人宿舍。

附录二

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我是民国三十四年秋天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在这以前，我根本不认识傅先生，也没有很强烈的愿望要进入史语所，因为中央研究院不是个教育机关，不能报名投考。

我在民国三十年夏天毕业于武汉大学后，随从钱宾四师在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继续读书。三十三年春天，因为想回乡省侍年近八十的老父与年逾七十的老母，所以应安徽学院之聘，由成都启程回乡。走到重庆，听说鄂豫地带因战事关系，不能安全通过，所以在重庆北碚停滞下来，先后在北碚修志委员会与金刚碑工艺班做临时工作，很不得意，希望再有个读书机会。

三十四年春天，母校王抚五校长来到北碚，我带着刚出版不久的长篇论文《两汉郡县属吏考》去看他。他很高兴，告诉我说，他计划下年度每系设立一个研究助理的名额，届时我可回到母校专心读书。这真是我所最希望的职位。不想王校长回校后不久就辞职了，我这个希望自成泡影！也许就在那时，我兴起了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愿望，但苦于没有适当的人推荐；因此也曾想到毛遂自荐，又觉得不大可能。后来内子的朋友曾祥和女士说，傅孟真先生的脾气比较特别，请有名的人介绍，未必能成功，不如自己寄几篇论文去申请入所，他若果欣赏，就可能成功。我急切希望有个读书环境，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姑且一试。大约是那年的七月中旬，写了一

封申请书，连同已出版与未出版的三篇论文，直接寄呈傅先生。那是个天真的做法，当然不存多大希望。不想八月二十一日就接到傅先生在前一天（二十日）写的一封快信，果然答应了我的请求。说是照论文程度，自当为助理研究员。但论资历，只能为助理员。这真使我喜出望外。至于职级，我从来就未想过，只要有会读书就好，事实上在那时我也不知道中研院有些什么职级！傅先生的信中还提到抚五先生前曾有信推荐，但无著作，无从考虑。（“但无”以下八字是见面时说的。）这也是大出意外的事。真没想到抚公校长在辞职前后百端纷忙中，居然还记得我这个远隔千里之外的一个学生，母校没有机会，仍然想安置到一个更适合的地方去（我已忘记在与王校长谈话时是否提到过史语所！）前辈学人爱护青年学子的热忱，真令人永远感念难忘！

我接到傅先生手示的第二天，就到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去见他。那时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结束，他非常忙，那天晚上大约十点钟以后才回来。我第一次见到傅先生，他给我的印象，与外间所传的并不一样。一般都说傅先生脾气很大，很专制。我倒觉得他对人很温和，很随便，也不见得很坚持自己的想法。他问了我不少的话，又说他现在事儿多，希望我暂时留在重庆，帮他处理一些文书方面的事。我对于这点很踌躇，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最无办事能力，笔下也很凝滞。傅先生才气洋溢，文思必很敏捷，襄助他处理文书，绝对不能副他所望，所以只好很坦率的说，不能担任这项任务。傅先生听了是这样答复，绝不以为忤，立刻就说：“那么你就先到李庄史语所去，虽然正式的任命要等待所务会议通过，但应该没有问题，你先去也没有关系。”后来回想起那次见面，自己也太直率了，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理想的去处，但主管人的第一个命令就不接受，未免太书呆子气！去年和邢慕寰、余英时两兄闲谈，还提到这件事，都哈哈大笑，说我还未踏入机关大门就不听话！但从这件事也可见得傅先生很有度量！

民国三十五年冬，史语所复员，迁回南京北极阁旧址。那时由后方搬回来的善本图书与由北平接收寄来的善本图书很多。原来在李庄时兼管善本图书的人员张政烺、游小姐都已有高就了，要另找一个人兼管这批图书。不知为什么傅先生把这项任务交付给我，也许是因为我的论文中常常引用石刻材料吧？因为善本书库中藏有极丰富的石刻拓本（我后来点计有三万多份），为国内外很少图书馆所能及。傅先生极重视善本书库的东西，据说他一向指派一位他认为极可信任的中下级人员去保管，因为这批东西没有任何记录。这次委派了我，所以有些同事如马学良兄就和我开玩笑，说我是傅先生面前的红人。其实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根本就很少！

不过，傅先生对于我，确实非常关切。那时国家经济状况不佳，物价波动很大，一个文化机关的低级人员，待遇自然颇低，我与内子又不善于用钱，适长子晓田出生，用度较大，常常感到周转不灵。傅先生不知如何知道了我的经济状况，送给我一笔钱，是他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审查费。我本于长者赐不可违的心情，未坚辞的接受了。他又自动的嘱我写一张内子畹兰的履历表，立刻亲自步行到左邻的考试院，希望能安插一个职位，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但未成功。他马上又写信到国立编译馆，终于成功了。其实他那时极忙，来访的政要人客络绎不绝，但仍记挂了我这个小职员的生活，实在令人铭感不能忘。当时他拿着内子的履历表走出史语所大门的步履姿态，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刻走笔至此，不禁涕泪交流，不能成字！

傅先生对于老年人很尊敬。我的岳母一向跟着我在一块生活，有两次在史语所门前的路上碰面，他都是很有礼貌的亲切的向她问好。当研究院决定自南京撤退至台湾时，他通知我准备同行，并说岳老太太的旅费由公家暂垫，因为非直系亲属不能由公家担负。而事实上，那次撤退，根本无其他同事的直系长辈亲属同来。我最近这次回台湾，才听到一位比我资深的同事说，那时傅先生不允许同

事带老年家属，因为他的责任感很重，对于到台湾以后的生活无把握，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困难。大约他知道我的岳母别无可依靠，所以作出唯一例外的安排！

研究院迁到台湾后，同人先住台北，我与全汉昇兄两家同住在台大医学院的一间大房子中，用帷幕在中间隔开，当然生活上不很方便，但逃难时期，有处可住已很不错了！在生活稍稍安定后，我去谒候傅先生，他问我生活情形，我说还不错，他很感慨的说，你真能安贫乐道，生活容易满足。后来我随研究院迁到杨梅，此后似乎就未曾单独见过他了。

至今想来，我之能有今天这一点成就，一大半当归功于史语所的优良环境——图书丰富，工作自由，并且生活安定。一个研究工作者，在这样环境中，只要内心能把持得住，不怕坐冷板凳，不为外物所牵，不为权位名利所役，加以头脑稍稍灵活一点，他之能有相当成就，是绝对可以预期的。诚如李济之先生所说，我是充分的利用了史语所的优良环境！然而若非傅先生的远见，建立了那样好的环境，让有志之士能从心所欲的研究，又若非他让我进入研究院，并尽可能的照顾，那末我虽然具备了内在的一切条件，但浮沉在这样一个纷乱不安的社会中，纵然今天仍可能在大学中觅得一枝栖，但要想在学术上有一点真正的成就，那就绝对不可能了。所以每当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对于这位前辈学人傅孟真先生，总是寄予永恒的无限的感念！

一九七六年初稿于香港吐露海畔。原刊于《仙人掌杂志》第一号《中国的出发》。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复校重刊，时寓中研院新落成之学人宿舍。自一九八九年史语所获联合报社之支持，举办傅斯年学术讲座，本年度邀请我主讲，昨日开始第一讲。

附录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敬悼严耕望学长

余英时

初见耕望在一九五七的秋季，距今已三十九年。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那时我正在哈佛大学作研究生。有一天回家，我的父亲陪着两位客人在谈话，一位是两年前逝世的周法高先生，另一位不相识，但说一口道地的桐城话。我进客厅的时候，父亲也没有为我介绍这位同乡，而我则认定他是来探望父亲的。不过我有点奇怪，为什么周法高先生会在座呢？因为我虽已和周先生很熟，但我知道周先生和父亲并不曾见过面。这位生客并不擅言辞，在最初十几分钟之内，也一直没有说清楚他的来意。我只好坐在一旁纳闷。再听下去，我忽然大悟了。我情不自禁地向这位生客大叫一声：“你是严耕望！”他笑了，我们也都跟着大笑起来。这是相当戏剧性的一幕，我生平再也没有过第二次这样的经验。但这次初晤也十足地显露出耕望的性格：他质朴无华，根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其实他是来找我的，因为他从宾四师处知道有我这个师弟在康桥。我现在记述这一段往事，心中有说不出的凄怆，因为当时主客四人，今天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们初见虽在一九五七年，但我知道耕望其人其学则早在五六

年前。我在新亚读书的时代，常有机会在课外听宾四师畅谈学术界的人物和轶事。有一次我问他，在他过去教过的许多学生之中，究竟谁是他最欣赏的。宾四师毫不迟疑地说，他最看重的是中研院史语所的严耕望，现已卓然有成。宾四师还补充一句，说：他是你的同乡，安徽桐城人。从此我便留心，想读他的论著。但耕望不写通论性的文字，我最早读到的是《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刊于一九五四年香港《民主评论》为宾四师六十岁祝寿的专号上，深赏其运用史料之广博与生动。后来又在史语所《集刊》上读到关于唐代尚书省演变和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长文，更佩服他的功力深细而又能见其大。在我们相见之前，我对他的认识仅此而已。但我已完全信服了宾四师鉴赏的准确。

在这篇简短的悼文中，我只想以最概括的方式谈两个方面：他的治学精神和他的史学取向。

和耕望相识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学术的全心奉献。我们平时也常说“为学问而学问”、“献身学术”之类的话，但是我在耕望的身上才真正发现了一个最感人的活的范例。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两年，他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不但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已卓然成家，而且足以传世的《唐仆尚丞郎表》四巨册也出版了。但是这两年中，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比我们作研究生的人还要勤奋。每天早晨九点钟不到，他已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五点钟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原来他正在为他的下一个巨大的研究计划作为准备，遍读有关唐代历史地理的中日文书籍，并作详细的笔记。不但如此，为了要通解日文，他还和我们研究生一同上了整整一学年的初级日文，每天一小时。当时教我们日文的是哈佛燕京社社长赖世和教授，后来曾出任美国驻日大使。由于讲授是用英语，他有时不甚明白，便找我一起讨论。他那种认真不苟的神情，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

一九七九年春季他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了一学期的访问教授。因为历史系没有空余的房间，我请校方在我的办公室中为他安置了一张大书桌，使他可以工作并接见研究生。研究生中真能有资格向他问学的人自然不多，因此绝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进行自己的研究。也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由于有这几个月的同室之雅，我对于他的治学精神才获得更深一层的亲切认识。这时他正在撰写《唐代交通图考》这部传之久远的大著作，因此从香港携来了无数笔记卡片。这些笔记卡片凝聚了他三四十年的读书功力，有些是写在抗战时期的粗糙纸张上。他告诉我，他有系统地摘录资料，自大学时代便已开始，从来没有中断，所积资料已不下二十万件。以唐代而言，两《唐书》之外，一千卷的《全唐文》他都有分类卡片。这种日积月累的功夫最能显出他的“恒德”，这是从清代朴学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如陈澧撰《东塾读书记》、孙诒让撰《周礼正义》都在事前有长时期的札记工夫。

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切地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宾四师对他知之最深，一九七三年六月给他的一封信上说：

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我认为这是对他的学术人格的最真切的写照。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这句话我也完全有资格

作见证。上引宾四师的话是因为他坚决不肯应征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的职位而引出来的。香港的大学采用英国制度，每一系只有一位“讲座教授”，其主要职务是处理系的行政。即使行政可由他人代理，这个名位也必然带来许多学术以外的活动。同年七月我回到新亚工作，也曾一再请他考虑，他丝毫不为所动。一九七九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团员中包括钱锺书、费孝通等人，是当时一大盛会。我受学校的委托，在家中接待代表团。无论在公在私，我都必须邀请耕望与会，但他也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像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特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部为后学现身说法的小书，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他的忠厚存心尤为少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所谓“以儒家待人”是指他珍惜人情的一种忠恕心理；所谓“以道家自处”则是指他的“不争”、“寡欲”的生活态度。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这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人生观，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宾四师有一次在给他的信上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也是说他近于道家。以我个人的认识而言，他毋宁是外柔内刚的一型。他平常表现在外的

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至于在治学方面，他不但不是“柔逊”，而且恰恰相反，是充分体现了“刚毅进取”的精神。正因得力于此，他才能在史学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在五十岁以前的著作如《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四大册》和《唐仆尚丞郎表》都在制度史方面。最后三四十年他的研究和撰述则集中在唐代交通路线，其成果即仍在续刊中的《唐代交通图考》（已出五大册）。他的著作无一不由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这是他的史学取向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前两册写秦汉，后两册写魏晋南北朝，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仆尚丞郎表》从收集资料到出版共费去九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他在一九八四年写序言时已说“付出三十七年之岁月”，现在又要加上十一二年，则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这三大计划的进行在时间上自然有重叠的部分，但无论如何，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出现在战乱频仍的二十世纪中国，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难以想像的奇迹。像《唐代交通图考》这样的大计划，在西方或日本都只能出之于集体实践之一途，即由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指导一二十个助手分头进行。现在耕望则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了。

耕望对制度史和历史地理发生兴趣远起于中学时代，但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听宾四师在武汉大学讲“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的开场白却对他发生了定向的作用。据他回忆，宾四师说：“历史学

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得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这一番话便决定了他此后五十五年的研究取向。他自审一己的才性近于追求确实而稳定的历史知识，对于不易把捉的抽象问题则不愿涉足。因此他曾明白表示对于研究具体问题的偏好。这又是他的史学取向的另一显著的特征。政治制度史和历史人文地理则恰好是最具体的研究对象。具体才容易客观，抽象则难免主观。他希望辛勤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不易推翻的定论，因此不肯投身于过分依赖主观判断的抽象领域。从这一点说，他的取向很接近实验的科学家。这也许和他早年偏好数理的背景有关。换句话说，他追求的是实证的历史知识。然而他又绝对不是褊狭的实证主义者，否定抽象领域的重要性。不过他为中人以下说法，并针对着近来中国史学界的一种华而不实的风尚，提出及时的警告而已。

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则充分证明了他在史学研究上的抉择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一切著作不但都包含着大量的新发现，为中国中古史建立了最坚实的基础，而且由于规模广阔，更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无限的用途。以我个人的切身体验而言，我过去研究汉代贸易与扩张和循吏的文化功能都曾得力于《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所提供的架构。此外就我所知，胡适之先生因研究神会而深赏《唐仆尚丞郎表》，最近荷兰的中国佛教史大家 Erik Zürcher 研究唐代佛教与教育也对《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推崇备至。至于《唐代交通图考》，其价值更是难以估计，正如他自己预料的，将来无论是治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宗教史或疆域史的专家都不能不“取证斯编”。

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

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但是他论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的关系则参考了现代行政学上关于行政官与事务官的分别，使两者的职权性质顿然得到清楚的说明。他的历史宏观竟与法国年鉴派大师 Fernand Braudel 颇多暗合。例如他治唐代人文地理取“全史”的观点，即后者十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路向。他治制度史，重点也在长期性的结构，而不在变幻的人事。这自然是受到社会科学的暗示而然，不过未加理论化而已。诚然，他所运用的社会科学甚为有限，仅在大关键处偶一着墨。但这恰好是他的长处而不是短处，因为他的研究主体毕竟是中国史学而不是社会科学。若在社会科学上求之过深过细，则不仅本末倒置，而且也必然流入牵强附会。所以我认为他的著作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的转化。陈寅恪先生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依传统史学的体裁，其用意也在于此。所以他特别指出：“故分别事类，序次先后，约略参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庶几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亦可表见新知之创获。”在这种地方我们才可以看出一个史学家在思想上是不是真正成熟了。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以治学途辙言，他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这是毫无可疑的。然而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

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但今天中国的史学界弥漫着“议论”，而“朴实”一途则空前的寂寞。耕望是史学界的“朴实楷模”，现在他走了，这条路更空寂了。世有闻耕望之风而起者，予日日引领而望之！